大别山上红旗飘

回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

何耀榜讲　苏　波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别山上红旗飘

回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

何耀榜讲　苏　波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1934 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匪帮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施展了灭绝人性的摧残和迫害，疯狂地进行“围剿”，企图通过“雪地搜山”、“地补哨”、“倒林”、“移民”、“碉堡网”等恶毒的反革命手段，扑灭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的革命火种。但是，中国共产党英明地领导着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冲破了白色恐怖，艰苦卓绝、英勇顽强地坚持了革命斗争，保持和扩展了革命火种，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1937 年 12 月，新四军成立，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即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本书作者何耀榜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曾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罗（山）孝（感）（黄）陂特委第一副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兼政委等工作，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地记载了党所领导的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业绩，记载了烈士们不朽的英雄故事，记载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活动。

大别山上红旗飘

——回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

何耀榜讲　苏　波记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4 印张　270 千字

195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7 月北京第 2 版

1983 年 7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150，001—172，000 册　　定价 1.10 元

目　次

第一章　黑夜的火把……………………………………………1
一　在群众中扎根……………………………………………1
二　潢鹰湖初显身手…………………………………………11
三　红二十五军长征了………………………………………16
四　拖住敌人…………………………………………………23
五　董家湾突围………………………………………………30
六　烈火红心…………………………………………………38
七　深入虎穴…………………………………………………45
八　谭家河接信………………………………………………61
第二章　反“地补哨”………………………………………74
九　东边来了大红军…………………………………………74
一〇　雨夜打盐………………………………………………80
一一　五约山会议……………………………………………91
一二　打“地补哨”…………………………………………98
一三　连除二霸………………………………………………108
一四　小庙岗遇险……………………………………………121

第三章　反“倒林”……131
一五　不响枪的战斗……131
一六　成功的经验……152
一七　伸向河口……162
一八　火烧敌营……174
一九　夜战仙居顶……185
二〇　洋人指挥敌人……202
二一　胜利声中……212
第四章　反“移民”……220
二二　走在敌人前面……220
二三　心里向着苏维埃……234
二四　仰天锅伏击……250
二五　一定要坚持下去……264
二六　坚强的革命意志……276
二七　摧毁移民点……289
第五章　转战三省……304
二八　在豫东南……304
二九　三打夏家新寨……314
三〇　调至红二十八军……323
三一　大反“移民”战……330
三二　和敌人赛跑……342
第六章　粉碎“三个月清剿”……355
三三　形势的变化……355
三四　策应黄冈战斗……365

三五　等待交通员……374
三六　党中央指示……383
三七　准备谈判……392
第七章　谈判前后……396
三八　拉开架子……396
三九　紧急关头……407
四〇　九河签字……416
四一　七里坪赴宴……424
四二　走向武汉……435

第一章　黑夜的火把

一　在群众中扎根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我们五个人组成的一支红色便衣队，向着罗山县刘家冲沟走去。正是春天多雨的季节，雨后的山崖十分泞滑，我们每人拿根木棍，就跟瞎子似的，一只手用棍子在前面试探着，另一只手攀住山坡上的树枝、野草或是石棱，一寸一寸地挪动着。稍不留意，就会从万丈悬崖上滚落下去。直到天亮，我们才翻过了山岭，来到刘家冲沟，在河床旁边的一座悬崖下面隐蔽起来。

这是一九三四年的春天。红二十五军在灵隐寺战斗后，已经离开鄂东北，转战到太湖、舒城、桐城、英山、潜山一带地区活动。但是，敌人分布在鄂东北地区的兵力，仍然非常浩大。东北军的一个师驻在罗山县重镇宣化店一带；刘峙的一个团留驻经扶县；程汝怀的七个保安团以及地主豪绅的反动民团遍布各地。残暴的敌人用最毒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在摧残、迫害着鄂豫皖苏区的人民。“清剿”、“搜剿”一天比一天疯狂；而我们的力量在逐渐地减少，活动地区不断地缩小。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以天台山、

老君山为根据地的中共鄂东北道委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改变革命斗争方式，把部队干部分散到敌人的心脏里，组织便衣队进行反白色恐怖。我根据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的指示，在罗山县和经扶县交界的黑狗寨山岭上，组成了这支便衣队，胡金先任队长，我担任指导员，我们的计划是先插到刘家冲沟建立立足点，然后再慢慢地伸向宣化店周围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在悬岩下隐蔽了一天，没有看到一个老百姓，只见民团的兵丁们在河沟里跑来跑去。天黑后，我们才敢伸出头来，看看四外无人，便悄悄地爬向河边，找了一些野芥菜，在河水里涮涮生吃了，填一填饥饿的肚子。黎明前，我们又转移到黑龙潭，利用岩石和青树棵子继续隐蔽。刘家冲沟是原来罗山县第一乡苏维埃，因此我们决心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搭上桥，再深入到群众中去。

同志们忍住饥渴，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太阳偏西的时候，忽然发现一片渔帆，在河水里浮荡着。五个人的心，都在蹦蹦地跳着，五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渔船，深怕它消逝掉。渔船终于缓慢地驶进了黑龙潭。我和胡金先同时认出，渔船上的人是刘家冲沟北湾的刘驼子。胡金先对我说：

“何指导员,我和刘驼子有点拐弯子亲戚,再说,他的老二也在红四军，猜他起码不会坏我们的事。我从水里游到他的船上，套套他的口气，你看怎么样？”

“可以，我两个一齐去。”

我俩从青棵子里悄悄地钻到一块大石头旁边。这块石头正好背着渔船。我两人都识水性，下到水里，便潜入河

底，摸起了两条鱼，轻轻地浮到小船边。胡金先露出头来说：

“老表，你在打鱼，我给你摸了两条。”

刘驼子看到是胡金先，吃了一惊，急忙说：

“河中间不能露面。你快到钓鱼台边的青草里去。我就来。”

我和胡金先游到姜太公曾经钓过鱼的一块石头旁，钻进青草丛中。不一会儿，刘驼子摇着船，晃晃悠悠地来到岸边。他站在石头上，装做整网的样子，提心吊胆地问道：

“你们不走远一点，到这边来干啥？”

“我想找几个可靠的人，见见面，了解一下宣化店的情况。”胡金先回答说。

“伙计，不要再干这个啦！因为这条河沟组织过第一乡苏维埃，国民党看见这条沟都眼红，更不要说看到人啦。看他们那股子劲头，恨不得把苏维埃下的人都杀绝才好。”刘驼子喘了口气，接着说：“伙计，你在山里不知道他们的厉害。现在宣化店还驻扎着东北军的一个师。刘修斋和刘绍彦的民团，从这上面的山，一直到东丰庵山上，全修起了炮楼，专门对付红军。你们少数的人可不能蹲。我看，你还是跟大红军走远一些好。再说，现在谁还敢和你们沾？国民党发布下来说：谁要再和你们通气，就杀谁全家。”

“照你说，我们的苏维埃就这样散啦？再不干啦？”

“干，怎么干？刘修斋、刘绍彦那几个坏种，你还不知道？他们仗着几条破枪，在这一带称王称霸，和联保主任、保甲长混在一起，整天打量着卖红军家属的青年女人，已经

卖的差不多啦！我家因老二在红军，刘修斋把我的小妹妹抢去卖掉，到现在还不知道卖到什么地方。”刘驼子越说越难过，痛心地流下了热泪。“卖了人还不算，又发布下来说：谁家有一个人当红军，就要向他们缴四担红军粮。你看，我全家几口现时就没有吃的，昨天，我最小的女孩子被活活地饿死了！……”刘驼子终于泣不成声。

胡金先激动地说：“老表，敌人这样欺负我们，我们要干下去呀！”

刘驼子哭了一气，然后说：“要干，你们干下去，我实在没有办法。”他擦了把眼泪，收拾起渔网。“我在这里不能久停，要是被民团看见，我全家都没命了。”说着，他就想走。

胡金先紧问一句：“老表，你决定再不干啦？”

“不！不能这样说。不过我现在实在没有力量。你们一定要干下去，我绝不会坏你们的事。”说着，渔船已向河道的中心划去。

这就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个群众。但也不能怪他不革命，事实上，他已够惨啦。

目送着小船渐渐远去，我们沉入水底，返回对岸。天黑后，五个人又沿着河边走去，途中发现野苦菜、野芥菜，扯来就吃。遇上河沟，就趴下去喝点水。摸爬到记宝寺，发现了一眼山洞，大家便钻进去休息。

天蒙蒙亮时，突然听到山上有人走动的声音。我和胡金先立即钻出山洞，爬到高处察看，只见两个老乡向山上爬来。

胡金先往我身边紧爬了几步，说：“那个大个子很象我

嫂子的弟弟。你隐蔽一下，我去看看。”

胡金先在前边爬，我在后边尾随着，两眼注视着前边那两个老乡。他们完全没有发觉我们。胡金先可能是认准了那个人，喊道：

“二哥，二哥!”

大个子猛然扭过身来，仔细地看了看，忙说：

“是你呀！你怎么来的，没有跟红军走？”

“没有，”胡金先简单地回答了一句，紧跟着问：“他们要捉你？你们是来躲藏的？”

“那些王八蛋，看到苏维埃下的人就想杀，我们不能不躲藏一下。”大个子指了指身旁的老乡，对胡金先说：“这是我小佬（小叔叔），不用怕，进来吧。”说着，他们很熟悉地走进另一个石洞里。

不久，胡金先出来给我打了个招呼，我随着进到洞里。他对我介绍说：

“这是我二哥，刘清翼。他是我二哥的小佬，叫刘云焕。”

“你们到这里来有事情？”刘清翼问。

“现在山里边有点紧张，我想到这一带可能更加紧张，因此过来看看。可是一进到这条沟，两天没有见到一个老百姓，昨天下午，在黑龙潭见到刘驼子，叫他给你带个信都不干。”

刘清翼性格强悍，聪敏干练，种庄稼是把好手，又善于打猎、捕鱼，身上经常背着猎枪，枪法很准。一九二八年时，就跟他父亲一起参加了罗山农民暴动。在这次暴动中，他

的父亲牺牲了，所以他对敌人是十分仇恨的。这时，听说我们在河沟里隐蔽了两天，就问道：

“你们几天都没有吃饭？小佬，快把咱们那点饭给他们吃。”说着，刘清翼接过小包，拿出四个用大麦面夹野菜做成的菜粑粑。

胡金先看到这样好的干粮，不忍心独吃。他说：

“我们一块来的有五个人，那边洞里还有三个同志。”

“那怎么够呢？”刘清翼着急地说，“天已经亮啦，又不能出去……这怎么办？”

“够，有这样多就不错了。我给他们送一点过去。”胡金先迅速地爬出洞外。

胡金先很快地返回来，我们就开始向刘清翼了解情况。刘清翼谈的情况和刘驼子谈的差不多。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估计到不单是这一条沟内紧张，整个苏区可能都是一样。

刘云焕对我们说：“你们放心好了，我和清翼都是参加过农民暴动的。自从苏维埃失败后，我们就一直跑反，不敢在家蹲。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只要说一声，我们一定帮忙。再说，咱苏维埃下的人不能没有骨头。”

刘清翼和刘云焕二人，就成为我们插下去的第一个立足点。白天，由他二人带路隐蔽；天黑后，各人在山上扯一些野菜，拿回他们住的棚子，用刘云焕的土罐子，或者用刘清翼仅有的半个铁火盆煮煮，吃了充饥。

插到敌人的心脏里，虽然在刘家冲沟扎了一个根，但由于地主刘老八在这一带的反动统治，我们的行动仍然非常困难。为了多扎根，我们以刘家冲沟北湾为基础，在天黑后

出发找群众见面，但往往是找不到人，就是找到了人，他们总说怕保长，怕甲长，不敢和我们通气，更不敢收留我们。结果，到黎明时，只好再回到刘家冲沟北湾高脚岩山下的流水沟，或是山上的石洞里隐蔽，一整天吃不到东西。

一夜，两夜，许许多多的夜晚都过去啦，工作还是没有做出成绩来。五个人躺在石洞里，研究插不下去的原因。有的同志埋怨群众不革命；有的同志说群众怕死。我想，这些都不能算作原因，里面还存在有问题。我提议说：

"群众都怕保甲长，我们能不能找个甲长拉一拉呢？"

胡金先说："我也这样想，保长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但甲长就不见得，也有穷人。我们先找一个插下脚去，我看是可以的。至于先找谁，这个我们不好决定，还是问问老乡们可靠些。"

天黑后，刘清翼独自来到石洞里。我问他：

"群众都怕保甲长，不敢和我们见面。你看，这附近是否有个比较老实的甲长，想办法和他见上面，拉拉他。"

"别处的，我摸不清楚，只看我们这一甲的，丁老甲长是个穷人，很老实，从来不敢坏别人的事。他就住在岭后边的丁家榜。不过，没有人敢和他通个气，还是不行。"

胡金先说："他的田在哪里？我们到田沟里去等他。"

"到田里去不行，秃田沟子不能蹲人。要等的话，这头上有他一块小麦地，可以到那里去等他。"

徐如意插话说："我认识丁老甲长。到时候，你们隐蔽在山上的棵林里，我一个人蹲在麦田里，总会等到他。"

一天、两天……一连趴了五天，每天都看到民团的兵丁

在沟里象穿梭一样地来回不断。我们沉住气，耐心地继续等待下去。第五天黄昏时分，丁老甲长来到这块小麦地，意外地发现了徐如意。

徐如意压低声音说："老甲长，我在这里就是等你，想和你说点事。"

丁老甲长有些害怕，急忙声明说：

"我当甲长，是他们派的。我可没有做一点坏事呀！"

"你不要怕。我找你不是别的，是想请你帮忙找两个老实人，我们见见面，商量点小事。"

"我也参加过暴动，我心里还是向着苏维埃的。"丁老甲长继续分辩了两句。"你说找两个人？这不能慌，要慢慢来。你在这里不能长站，左右都是炮楼，民团常来沟里搜查。我住的那个小湾是好站，不过，我的弟媳是白区的姑娘，不可靠，不敢叫你们去。你们可能没有米吃，我想法子弄点米，到别人家里煮煮，天黑定了，你到我菜园边上来拿。"他向四周探望了一下，接着说："你快走吧！"

丁老甲长果然给我们煮了一升多米的白米饭。我们拿到刘清翼家里，掺加了许多野菜，又煮了煮，和刘清翼、刘云焕两家人都吃了一顿饱饭。

饭后，我对徐如意说："你家离这里很近，你和孙保林用请假看家的名义回去一趟，看能不能再建立起一个点来。"

徐如意和孙保林去了，很快就转回来啦。徐如意气呼呼地说：

"他们都是怕死鬼，不要说建立个点，连我都不敢留住一夜。"

孙保林看到徐如意有些激动，忙解释说：

“这也难怪。他们那保的保长何宴卿坏透了，经常到他家里去搜查。现在全家的性命都难保，要是再收留我们，被何宴卿发觉了，不但他一家人完蛋，全村都要受到很大连累。他母亲见了他，抱住他总是哭，就是不敢留他，叫他快走远一点。他家没有一粒粮食，他母亲怕儿子挨饿，把家里仅有的一斤多花生种子给了他。我们没有要，又偷偷地给他母亲留下啦。”孙保林叹了口气，“他家实在很可怜。”

保甲长们和民团的烧、杀、抢、卖女人已经成了风气，群众越加恐慌，不敢和我们接近。为了插下去，我们下了最大的决心。我和董志东决定到宣化店附近的董家湾去走一趟。

董文朗是个红军家属，五个兄弟都在红四军。我和董志东翻墙进到他家院子里。他认出我们，惊奇地说：

“你们又在干民国十六年的事呀！”他是指一九二七年的农民暴动。“你们到这里来，我是不怕的。可是这里的保长恶得很，让他们知道了，就不得了！”

“很多人总说怕保长，不敢和我们见面，你看怎么办呢？”我试探地问。

“依我看，你们先打死一个压压火气，以后可能好一点。”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

“哪一个最坏呀？”

“叫我说，当保长的都坏。”董文朗话里有音，不愿意提名指姓，意思是让我们自己决定。我想了想，何家湾这一带，家大姓大，影响也大，如果能打一个姓何的坏保长，其他

的保长就会老实一些。于是，我决定先打一个姓何的保长。

为了打保长，又从其他便衣队调来了两个同志，一共是七个人。一天下午，我们到达了何家湾，把六个同志隐蔽起来，我独自走到湾子里，走进我婶母家。

婶母把我拉进屋里，哭哭啼啼地说：

“你三叔何宴卿自从当了保长，可把你恨死啦！他给甲长们下了纪律，说你一回来就要向他报告。”

我一听，气得浑身发抖，不由得骂道：“他真是不想活了！”

婶母又说：“你们要是能把他杀了，姓何的这一大片湾子，你们都可以住了。……”她接着告诉我，何宴卿这家伙如何向每个红军家属要红军粮，强卖红军家属的妇女，欺负全寨子的妇女……我越听越气，恨不得立刻把何宴卿杀了，给红军家属报仇，给全寨子的百姓们出气。可惜这家伙平时不在家里，行踪不定，难以下手。

恰好在这时，耀本弟弟进来说：

“何宴卿回来啦！在南头甲长家里开会。”

我插好驳壳枪，往外就走。来到街头，就望见前面有个人手拿烟卷，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仔细一看，正是何宴卿。我加快脚步，和他走了个两对面。

“这不是三叔吗？”

那家伙一看是我，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死白，浑身直“筛糠”，扭身就走。我怕他跑了，一脚踢在他的后腰上，只听“扑通”一声，何宴卿趴在地上，吓得大声喊我本家的婶母和红军家属求救：“董二娘！”“李四姐！”……湾子里的老乡们

很快地围拢上来，我看迟延不得，立即开枪，结果了这个坏蛋。

听见枪响，隐蔽的六个同志忙迎了出来，我们便扬长而去。

我们向郑位三同志汇报了详情，他说：“打得对。要想插下去，就得打坏保长！……”从此，我们开始打坏保长。遇到大批的敌人，我们就上山进沟，有树棵就钻树棵，不然，就往田里一卧，不管刮风下雨，搞了一个多月。保甲长是比以前老实了，再不敢向敌人报告我们的行动，我们又站住了脚。

二　潢鹰湖初显身手

镇住了保甲长，群众稍微缓了口气。有些保甲长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变成了两面派，明着是为国民党做事，暗地里给我们帮点小忙。我们的活动开始有了一些方便。但是，地方上的反动民团却很顽固，到处耀武扬威，烧杀抢掠，欺压群众，摧残红军家属，和我们做死对头。不给他们一些厉害，我们在鄂豫皖的革命活动仍然展不开。中共鄂东北道委布置下来，要我们去打个大头。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先打河南民团的团总丁印昆。

丁印昆的祖父在清朝当过大官。丁印昆就仗着他祖宗传下来的财产和势力，统辖河南全省的民团。在那土匪如毛的时代，丁印昆和河南省大大小小的土匪头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自己的庄子就是个土匪的大窝穴。一方面，他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保护下，利用土地、高利贷来压榨人

民的血汗；另一方面，他利用土匪到处烧杀，抢掠人民的资财。在他的家里私设公堂，任意扣押、吊打和屠杀人民。因此，只要听到“丁印昆”三个字，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旧历二月十五日，是丁印昆的生日，那一天，他总要摆酒席、唱大戏来庆寿。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去捉他。但是，丁印昆住在龙新镇附近潢鹰湖的湖心，湖上只有一座吊桥。寨子上更有三道圩子。圩子里、寨门口、吊桥头岗哨林立，共有好几百条枪。显然，要想硬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商议之后，决定装做送礼的混进寨去。又根据地下党的调查，在丁印昆的亲戚中，历年来都是芦家畈姓张的大土老财送礼最多。我们决定抓住这条小辫子下手。

十三日深夜，我和外号叫做“野猪”的罗山县委教导队指导员胡柱先同志，从教导队中选出十几员猛将，带上一个便衣队，共二十几个人，从潢鹰湖西南四十五里的杨万家店出发。黎明前，来到离芦家畈不远的一个山坡上，埋伏在密林里。山坡上的一条道路，是从芦家畈去潢鹰湖的必经之路。

天明后，我们放出两个秘密哨，防备敌人搜山，同时防止在和送礼的人交手时走漏消息。

苦苦地等到上午九、十点钟，秘密哨才回来报告说：

“芦家畈送礼的人出来啦，有二十来个。”

同志们立刻隐蔽地运动到大路边的矮草丛中，准备截获送礼的人和礼品。趴在我身边的是便衣队员张德恒，他曾经在芦家畈给张财主当过佣人，并且曾经两次向潢鹰湖

护送过东家送给丁印昆的礼品。

远远地望见送礼的“队伍”来到了山脚下，佃户们挑的挑，抬的抬，吃力地摇晃着往山上爬。这些人显然是经过一番打扮，衣着虽然半新半旧，却还整齐。礼品是大箱小件，有红有绿，十分排场。

这时，张德恒对我说：“前头那个穿长褂的是我的老伙计。叫柳长豁子。”

我仔细看去，那人的嘴巴上果然有一长条显眼的豁子。我说：

“你来对付柳长豁。往下传，一人对付一个，千万不能叫他们跑掉一个。”

等送礼的人来到近前，胡柱先一抬手，发出了暗号。同志们就从地上跳起来，立刻拥上去，把送礼的人团团围住，一个钉住一个。柳长豁失神地呆在那儿，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

张德恒走向前去：“伙计，有些日子不见了，怎么，不认得我啦？”

柳长豁这才认出张德恒，更加奇怪，惊异地说：

“老张，这，这是怎么回事？”

“小事情，”看到老伙计一副狼狈相，张德恒忍不住笑了，“这些礼物交给我们，保险代你送到丁团总手里。”

柳长豁听他这一说，才恍然大悟，一把拉住张德恒：

“老张，我回去可交不了差呵！”

“交不了差，你就来当红军。”

柳长豁脸色变白了，豆大的汗珠在脸上滚动。张德恒

看了看他的打扮，扯了扯他的衣服说：

“这衣服还不错，借我穿穿吧！”见柳长豁还在那儿发呆，张德恒有点急了：“伙计！快一点，这个地方不能磨时间呵！”

猛然间，柳长豁似乎下定了决心，三下五除二地脱下长褂，交到张德恒手里说：

“泼了，回去反正活不成，干脆，我也当红军。”

这时，同志们已经从佃户们手中接收了礼物。佃户们由几个同志看守，走向一条山沟。然后，我们才顺着直通潢鹰湖的大路走去。三十多里路程，不到天黑，潢鹰湖已在眼前。因为丁印昆是在第二天庆寿，时间尚早，不能进寨子去，要是露了馅，不用说完成任务，就是想走出潢鹰湖，也难如登天。于是，我们就在湖边的矮树丛、荆棘和茅草堆里隐蔽起来。

十五日一清早，拜寿和送礼的人流从四面八方聚拢到桥头上。我们隐蔽着离开湖畔，瞅机会插进送礼拜寿的人丛中，向湖中心走去。过了吊桥，我们暗地留下一人，混在桥头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监视吊桥，负责退路。

进了头道圩子，只见有个小广场，一旁搭着戏台，“咚咚锵锵”地正在大唱河南梆子。拜寿的，送礼的，看热闹的，打杂的，真是人山人海，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把礼物放在一起，十个同志便走出寨门，和外面歇脚的佃户坐在一起乱扯谈；两个同志装做看热闹的站在寨门里面。其他的同志就分别散开。

正在这时，留着八字胡的丁印昆出现在二道圩子门前。

他穿着崭新的长褂子，头上戴着一顶礼帽，笑嘻嘻地在接收礼物；许多人在向他走去，点头作揖，鞠躬哈腰，一片寒暄。

我对张德恒使了个眼色，他立刻手执送礼的帖子，摇摇摆摆地走上前去。

丁印昆问道："你是哪里来的？"

张德恒装出满面笑容，恭恭敬敬地双手捧上帖子。丁印昆接过去，正在看帖子，胡柱先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一个箭步窜上去，左手揪住他的衣领，右手的盒子枪已经顶在他的腰眼上。张德恒急忙抓住丁印昆的两只手臂，拉着就往外走。丁印昆大惊失色地拚命呼唤：

"来人呀！……救命！……"

人们被惊动了，摸不清出了什么事，瞎跑乱撞，又哭又嚎，就连那些唱戏的，竟穿着蟒袍玉带奔下台来，真是闹得个"不亦乐乎"，乱七八糟。圩子内外丁印昆看家的几百条枪，明知出了事，面对着眼前的景况，也无可奈何，只是一股劲地对着天空瞎放枪。

我手执盒子枪，厉声喝问："丁印昆，你是愿死还是想活？"

"要活，请……请大爷饶命。……"丁印昆哆嗦成一团，连八字胡都扭歪了。

"要活就叫他们不要打枪！"

"不要打枪！不准打枪！……"丁印昆使出吃奶的力气，直着嗓子拚命喊。无奈在这喧声连天，枪声震耳的混乱中，没有人理睬他。我们挟着丁印昆，随着人流滚动着，在同志们的接应和掩护下，出了寨门，挤过了吊桥。

民团从后面紧紧追来。我们按照事先选择好的路线，边打边撤。刚退到离潢鹰湖二十五里的潘辛店，中共罗（山）孝（感）（黄）陂特委警卫队的一个排已赶来接应。两军汇合，一个反击，打退了民团。我们抓住时机涉过大河，立即转移到大小鸡笼山上。

国民党的军队联合民团忙着搜山。奔波了三天三夜，才在杨万家店的大路上发现了丁印昆的尸体，于是象得了宝贝似地忙着往回搬运。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又相继打死了罗山自称“二老天爷”的刘子万、阮义伯两个万恶的反革命头子。从此，这一带的民团头子们一听说共产党，就心惊肉跳，不敢随便找我们的麻烦。

三　红二十五军长征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二十五军接到党中央指示，准备北上长征。根据徐海东军长和吴焕先政委的指示，徐诚基同志和我一道来到大小鸡笼山下的何家冲。

吴政委住的地方，没有床，没有桌子，连条凳子也没有，睡觉就在屋角的一堆杂草上面。这正是我们老苏维埃区的特点。吴政委看见我们来了，很和气地握住我们的手，问道：

“程子华同志来了，你们知道吗？”

我回答说：“知道。是我把他接过来的。”

“是的。程子华同志是从党中央来的。他来时党中央有指示，叫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另找地区创造新苏区。”

吴政委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停了一会儿，他突然问：“王福明同志来了没有？”

“可能没有来。年纪大了，怕他过几道封锁线很困难。”

“时间不早了，我们到徐宝珊同志那里去吧！”

同样是一间破房子，靠墙放着一副担架。吴政委向躺在担架上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介绍说：

“这是罗（山）孝（感）（黄）陂特委的徐诚基和何耀榜同志。”

徐书记因为生病，不能说话，只能和我们握手、点头示意。

程子华同志、徐海东同志、郑位三同志都来了。

吴政委说：“郑位三同志，你对鄂东北比较熟悉，你先谈吧。”

郑位三同志很客气地说：“吴政委先谈吧。”

“鄂东北道委书记就确定由王福明同志担任。郑位三同志跟红二十五军走。原来我想带走几个干部，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不带了。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同志们都表示没有意见。吴政委才继续讲下去：

“根据省委的指示，现在把地下党的关系和秘密联络点都交给特委。关于高敬亭同志，我们确定派一个班去找他，如果他在皖西道委把工作布置好，愿意跟红二十五军走时，我们可以等一两天，或者他从淮河一线也可以追上部队。一个月以后，我在桐柏山留一个交通员通知你们。如果高敬亭同志不走，那么鄂豫皖的省委组织可以存在。等我们走后，徐诚基或者何耀榜同志组织一个小部队，去皖西找到

高敬亭同志，传达我们交给你们的任务，和讨论两个道委的组织领导问题。如果高敬亭同志追上部队走了，王福明同志可用鄂东北道委的名义去皖西联系，如果当地有干部，就可以组织领导核心；没有干部时，可派干部前去领导。”吴政委停顿了一会，然后转向徐诚基和我，接着说：“我们走后，鄂东北道委除你们这个特委外，还有几个中心县委；王福明同志已经六十多岁，行动很不方便，虽然以他为领导核心，但工作还是要你们多做。估计我们走后，鄂豫皖的斗争可能更加艰苦，”说到这里，吴政委加重了语气，“你们要以保持革命种子为原则，保存革命力量。便衣队可以设法向白区发展，等伤病员好后，可以组织几百支枪作为机动部队，打游击和配合便衣队活动，但要避免和敌人的正规军作战，主要是对付地主豪绅的民团武装。”

最后，吴政委还谈到地下党的工作、秘密联络点、经济等问题。并且要我们多加照顾鄂豫皖的红军家属。徐海东同志、郑位三同志也都对我们作了许多指示。一直到晚上九点钟，吴政委才说：

“天气不早了，部队下半夜就要出动，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站起身来，和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诸首长一一握手告别。就这样，我们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了。

第二天，我们返回罗山四区，和道委书记王福明同志见了面。徐诚基向他传达了红二十五军的指示，经过研究，决定在金竹林的深沟里召开干部会议。

同志们陆续来到金竹林的深沟里，围坐在溪水旁边。头发花白、六十多岁的王福明笑呵呵地问道：

“同志们，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啦，不过地方上还有很多同志。你们害怕吗？愿意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坚持下去吗？”

“愿意。”

“我们一定坚持下去。”

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对，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把这把红得放光的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老人有力地说道。他那坚毅的目光，在环视着同志们。“同志们都记得，红四方面军在反四次‘围剿’以后，秋天离开了鄂豫皖。他们走后短短的时间里，在鄂豫皖又生长了红二十五军。敌人又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向我们鄂豫皖疯狂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又被我们粉碎了，敌人并没有‘剿’掉革命武装的新生力量——红二十五军。今天，红二十五军离开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是为了北上抗日。大家都应当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被留下来坚持的同志，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使命。……”

王书记的话，句句印在同志们的心坎上，同志们都在严肃认真地倾听着。最后，王书记宣布：为了执行省委的决议，重新组织鄂东北道委会，常委由王福明、徐诚基、何耀榜、吴光陆、罗厚福五人组成，各县县委书记为委员。罗孝陂特委由徐诚基任书记，何耀榜为第一副书记，吴光陆为第二副书记。各县委原有的组织不动。红二十五军走后留下来的几百名红军彩号，对他们的安置问题，王书记也作了详尽的指示。

红二十五军刚一出动，国民党在鄂东北的军队群起前

堵后追，四面夹击。为了策应红二十五军，使他们顺利地离开鄂东北地区北上，道委决定要我们组织力量牵制住敌人。开完干部会议，我和胡金先等同志一起走出了金竹林的深山沟。同志们在会上听说要打大仗，个个磨拳擦掌，精神抖擞，一路上嘻笑谈论。胡金先更是兴高采烈，喋喋不休地对我说：

“指导员，咱们痛痛快快干一场，一定要把东北军钉在汉（口）罗（山）公路上……”

胡金先只顾说话，稍不留心，“噗嗤”一声就从悬崖边上跌了下去。同志们大吃一惊，急忙伏在悬崖边上看去，亏得悬崖不高，下面是块陡坡，只见他滚了两滚，伸手抓住一棵小树，翻身爬起来，在悬崖上找了个落脚的地方。一纵身，伏在悬崖边上的曾照定便伸手捉住他的手，使劲一扯，把他拖了上来。

同志们的心里还在敲着小鼓，胡金先却毫不在乎，继续说道：

“依我看，今天晚上就到汉罗公路上找辆汽车打打，那差事满有意思。”

曾照定看到他一脸鲜血，取出一条土布手巾递给他：

“快把血擦擦。”

“没得关系，”胡金先一摔手，“指导员，要不要通知其他队集合？”

我同意说：“好吧，先到乌子铺了解一些情况。曾照定！”

听到我的喊声，十八岁的曾照定英气勃勃地赶到我身边。

“去通知二、三便衣队到乌子铺附近集合，等待命令。”

“是。”曾照定还象在红二十五军当战士似的，正规地回答着。转眼的功夫，青年人灵活结实的身影便消失了。

我们下到山脚，半途中迎面碰上便衣二队赶来。接近了乌子铺，同志们就在外边隐蔽起来，我和胡金先隐蔽地向乌子铺爬去。

乌子铺里有一位老妈妈，是农民暴动时的领导人王四季的母亲。她在镇子上开了一座小饭馆，暗中为我们搜集敌人的情报。听到暗号声，老妈妈不声不响地开了后门，放我们进了院子。

老妈妈领我们走进后屋里。人们还没有坐定，性急的胡金先就沉不住气地问道：

“老妈妈，今天有汽车过来吗？”

老妈妈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正忙着给同志们拿冷饭，听到胡金先发问，八成已经猜出了我们的来意。她轻轻地把饭盆放在桌子上，一边回答说：

“再照从前的时间打汽车可不行啦。你们打了几次汽车，那些坏种又是烧房子，又是抓人，拿百姓们出气。如今他们改了过车的时间，总是在半夜里过，也不再在这里停车换水啦。”老妈妈缓了会气，接着告诉我们：曾经被我们破坏了的发模墩公路桥，敌人已经重新修好了，今天中午才完工。

听说桥修好了，胡金先一蹦跳了起来：

“走，去看看。”

“看你急的，吃点冷饭再去。”善良的老妈妈劝说着。

胡金先哪顾得这些，向老妈妈摆了摆手，拉着我走出了后门。

发模墩的桥离乌子铺只有三里路。我和同志们站在桥头上，胡金先在桥上走来爬去，内行地检验着，似乎是在研究破坏的方法。我想，桥虽然修的很坚固，破坏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单纯毁掉一座桥梁，作用不大，要是能在桥上给敌人来个迎头痛击，岂不是更好吗？这时间，胡金先已经回到我身边，说：

“看样子，修这桥一定有黄木匠，咱们找他问问。”

木匠黄顿波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群众，就住在不远的刘家湾。一进黄木匠的家门，胡金先劈头就问：

“木匠，这桥是谁修的？”

“不瞒你们，是他们强迫我们修的。不过，想在桥上搞名堂，那还正是个机会。”

“怎么？”胡金先瞪圆了眼睛。

“修这桥，他们急得要命，说是要去追红军，忙着从武汉运弹药给养。桥刚修好，十有九成今晚要过汽车。毁这桥不费事，把中间几根柱子在靠水面的地方锯断，汽车上了桥，可就有把戏看啦！”黄木匠咧着嘴，嘿嘿地笑了。

木匠说的有理。我们连忙叫他找来另外几个木匠，一同返回发模墩桥头。根据黄木匠的指点，需要锯断的桥柱一共有四根。木匠们都是本地人，会水，但也只配成了三对。于是，我和胡金先也凑上一对。正是秋天的深夜里，河水冰凉，冷得我们上下牙直打架。我和胡金先面对面地站在水里，你推我拉地把木头锯得“吱吱”发响。

锯断了桥柱，立刻把三个便衣队集合起来，由胡金先负责，分兵埋伏在河两岸。正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的时候，胡金先突然高兴地说：

“来啦，来啦！嘿，不止一辆哪！”

远处传来大卡车的声响。乌子铺方向出现了一连串车灯的光柱；一辆、两辆……一共十二辆，同志们立刻振作精神，上好子弹，准备战斗。

载重的十轮大卡车，“轰轰隆隆”地来到桥头。第一辆汽车上坐着押车的敌兵，刚开上桥身，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桥压塌了，汽车翻到河里；那些押车的敌兵，自然是喂河底的鱼虾去了。后边的汽车急忙刹住。胡金先一声令下，我们的伏兵拥上来，围住汽车，对着押车敌兵的身影猛烈射击。片刻间，战斗就胜利结束了，只剩下敌人的司机躲在车轮旁嗦嗦发抖。

这时，木匠们已返回村里，带来了大批群众。胡金先爬在一辆汽车上大喊：

“老乡们，快来搬呵，全是洋财！”

使衣队员和群众们纷纷从汽车上搬下子弹、手榴弹、大米、布匹、油印机和纸张等东西，由群众运回村里隐藏起来。而后，我们把汽车推到一堆，浇上汽油，点上火燃烧起来。

至于敌人的司机们，我们教训了一番后，就放他们逃命去了。

四　拖住敌人

便衣队在汉罗公路上频频打击敌人，阻止敌人的交通

运输，不仅拉住了敌人驻守在宣化店的一个师，而且迫使敌人从河南信阳又调来一个骑兵团，驻防肖家畈一带，维持这条重要的交通线。敌人的正规军配合着地方上的反动民团，更是疯狂地搜山查林，企图趁主力红军长征的时候，把共产党留在大别山上的革命火种扑灭。

天黑后，我和胡金先从隐蔽的山凹里走出来。表面上看去，深山老谷里非常寂静，毫无人迹；然而，在几响暗号发出后，深草丛中、悬岩上、树棵下，立即走出了好多英雄的便衣队员。

大家集合后，顺着陡坡下到山脚边。一整天水米没沾牙，同志们饥渴难忍，都趴在溪水边，饱喝一顿。然后各人扯了点野菜，放在一堆。胡金先把一个破罐子架在石头上煮野菜。他一面毛手毛脚地操作着，一面考虑着说：

“指导员，敌人调来了四条腿的，咱们想法子收拾他一顿。”

我也有这个想法，对同志们说：

“大家商议一下吧。”

曾照定提议说：“最好是偷袭，夜晚摸进去，把马拉出来。”

“对啦！”胡金先一拍大腿，“骑兵没有马，那还算个啥？咱们是先搞他的马，再搞他的兵。”

野菜开了锅。同志们分吃了一些，随即出发。没有月亮，山沟里黑漆漆的；同志们悄悄地迅速地前进着。便衣队员们久经磨练，已经掌握了黑夜穿沟过河的本领，不发出一点响动。在路上，可以不时听到敌人哨兵的喝问声：“干什

么的！”“口令！”大家已经习惯了，知道他们是瞎咋唬，没人去理睬它。

约莫十二点多钟，我们摸进了肖家畈。胡金先爬在最前面，向黑暗中注视了一会，回过头来，压低声音对我说：

“你看，打谷场上新搭了一排马棚。”

六个人前后分作三组，向着预定的目标爬去。棚子里连个加草料的人都没有。每口槽上拴着六匹马。曾照定解开一匹马的缰绳，扯着就往外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那马却稳如“泰山”，竟一动也不动。

原来敌人的战马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每个槽上拴的马，不多不少恰好六匹，也许是编的一个班吧？我急忙靠近曾照定说：

“把槽上两头的绳子剪断，六匹马一齐拉。”

曾照定把马槽两头的绳子剪断，解开六条缰绳，攥在手心里轻轻一拉，果然灵验，六匹马驯服地跟着走出马棚。我们急速地顺着来路走回去。

马棚里其他的马，一见六个伙伴走了，不甘落后，挣脱缰绳，撞倒马槽，嘶吼着奔了出来。“嘀嘀嗒嗒”的马蹄震撼着大地，敌人慌忙爬起来追赶。这时，我们早已走出了肖家畈。

我们把马牵到东丰庵的深山老林里放掉了。而后，我们返回罗山一、四区的交界岭，在九龙下海山的悬崖下面，找到了道委书记王福明。听完了我们战斗情况的汇报，王书记说：

“各地便衣队牵制敌人的战斗打得很好。根据最近的

情报，红二十五军已经走出了鄂豫皖。不过，”老人的神色很严肃，“敌人大部分的军队回到了原地，准备‘围剿’我们了。”

红二十五军离开了鄂东北，我们的处境更加严重，更加紧张了。眼前的敌人有：东北军一个师驻宣化店一带，二十五路兵团一部驻守汉罗公路，刘峙用两个团把守经扶县到商城一线，夏斗寅部驻守麻城，徐源泉部驻扎在黄陂、孝感，程汝怀的八个保安团、土匪武装和反动民团更是遍布鄂东北各地。敌人用这样多的兵力来“围剿”我们，形势是十分险恶了。但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着广大的革命群众，一定能够坚持下去，保住革命的种子，完成党给予我们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敌人的“大搜山”，明天就开始了。这一带是东北军的搜山区，估计天一明，敌人就可能先插进刘家冲一带的山沟。这样，我们在山区的机关和彩病号就来不及准备和转移。因此，王书记说：

“我想叫你带领便衣队到宣化店附近把东北军拖住，只要能拖住他一天，山区里就能全部转移。”

我保证说：“王书记，不要看三个便衣队只有十五个人，我们一定想办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把东北军的一个师拉住在宣化店附近，要他明天进不了山。”

和王书记分手后，我立刻召集了三个便衣队的负责同志到一起。由于时间紧迫，大家很快商量了一下，决定一队主打，二队到宣化店以北、三队到宣化店大河以西策应。三个便衣队当即分头出发。

银顶山上驻扎着东北军一个连的军事哨，山脚下的孙家小庄，离北边的宣化店仅仅二里路。我和一队的胡金先、曾照定等同志，就隐蔽在孙家小庄后面的坟园里。上午，东北军驻在宣化店的敌人出动了，其他各地的驻军也在向他们聚拢，并且向东丰庵和杨家大坡的山包上爬去。我和同志们离开坟园，运动到大路旁边。零零星星的敌人正在大路上行走着。

胡金先伏在我身旁，轻声说："敌人是几个团，拉住以后，要先夺挺机枪打掩护，不然不好退出去。"

"对，现在就开始吧。"

话音未落，胡金先扣动枪机，"当当当!"撩倒了公路上几个敌人。东北军对这里的地形生疏，经常以枪声作为他们行动的目标。所以一听到枪声，山上山下的敌人立刻停止前进。与此同时，便衣二、三队的同志们听到我们发出的战斗信号，在宣化店的北面和西面都打响了。

我们立刻转移到枣林岗的村头阵地。敌人在山上摇摆了一会，便分兵三路追下来。从东丰庵山上下来的一团敌人，在机枪和马步枪的掩护下，东北军的大刀队嘶吼着"冲呵！杀呀!"地直奔我们的阵地。隐蔽在大石后面的胡金先，看着那些敌人，讥笑说："看，这样的冲锋队，明摆着不让我们浪费子弹。"他沉住气，一梭子子弹射出枪膛，敌人的大刀队当时就倒下了一排。

但是，敌人仗着新式武器和几挺轻机枪的掩护，前面的倒下去了，后面的又拥了上来，并且越来越逼近我们了。激战中，胡金先瞅准了敌人的一挺机枪，伸手取出两颗手榴

弹，对着敌人掷去。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中，他闯进敌群，抬起盒子枪打倒了面前的几个敌人，夺过机枪就是一阵猛烈的扫射。这时，曾照定和孙保林也同时从敌人手中夺来了两挺机枪。在强烈的机枪、盒子枪和手榴弹的威力下，敌人退缩了。我们乘机抽出枣林岗，后退到身后的胡家榜。

午后，敌人恼羞成怒，纠集了更多的兵力，分两路向我们夹击。正在紧急的关头，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失掉了作用——没有子弹了！

“同志们，把机枪砸坏！”胡金先命令。

砸毁了机枪，同志们取出老武器——盒子枪和手榴弹，迎击敌人。曾照定伏在二尺多高的半截土墙后面，敌人的子弹纷纷掠过他身旁。他为了节省子弹，直到敌人攻到近前，才把手中最后一颗手榴弹掷向敌群。突然，一颗子弹打在曾照定的胸部，他身子一斜，便倒在土墙下。胡金先一旁看到了，马上窜到土墙下，用盒子枪扫倒攻上来的几个敌人，伸手扶住曾照定，只见他胸部鲜血直流，嘴角上挂着血丝。

“队长，不要管我，你们快转移……”曾照定的声音很轻，呼吸很微弱。

胡金先扭头看见几个敌人又攻上来了，立刻再打出一排子弹。

“队长，任务要紧……”

听到曾照定的请求，胡金先激动地说：“小曾，我们一定把你救出去。”说着，左手抱着曾照定就往后退。我急忙指挥同志们掩护。胡金先抱着曾照定撤退，还不时腾出右手，

用盒子枪射击敌人。曾照定咬着牙，忍住伤口的剧痛，不住地请求着："丢下我吧，不能连累同志们……"胡金先不加理睬，只管往后撤。

退出胡家榜，孙保林的左膀也挂了彩，他顾不上包扎，右手不断地回击敌人。一进沙河铺，敌人已经追到了街口，我们利用街道旁的屋墙掩护，阻击敌人。胡金先把曾照定放在一个墙角下，返身爬回我们身边："谁还有手榴弹？"

全队统共只有两颗手榴弹了。就是子弹，每人也仅剩三、五发了。面前的敌人却一群群地拥来。

我对胡金先说："出村钻山林。"

胡金先两眼冒火，等着敌人到跟前，猛然甩出最后两颗手榴弹，扭身抱起曾照定就跑。恰在这时，街两旁的一些茅草房子，在敌人的弹火下燃着了，烟雾四处弥漫。这正是突围的好时机，看看胡金先已经跑远，我们忙抽身出了村子，钻进山沟里的密林中。

我最后走进林中，只见胡金先坐在地上，怀中抱着曾照定。每个同志的身上都是鲜血，我心里猛地一疢；难道都负伤了？我不愿意这样说，改口问道：

"几个负伤的？"

胡金先说："只有小曾和小林。"

我检查了一遍，果然只有他俩负伤，心才放宽了。

林外枪声繁密。这里不能久停，要赶快转移。

"指导员，"曾照定听说要转移，轻声地唤着我，"把枪给我，再留下几发子弹，……"

我慢慢地挨近他，安慰说："小曾，你放心好了，我们能

够转移出去。”

不管怎样说，曾照定坚决请求留下来。胡金先急了，不容他分说，抱起就走。

傍晚，我们转移到水冲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把曾照定隐蔽在基本群众的家里。分别的时候，曾照定吃力地想撑起身子，我急忙扶他躺下，嘱咐他安心养伤。他含着眼泪说：

“我向党和同志们保证，伤势稍好一点，我就归队。”

同志们走过来，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和他握手道别。

刚出了屋门，胡金先忽然又返回屋里，从身上解下装着两斤多米的布袋，轻轻放在曾照定的身边。

五　董家湾突围

这一天，按照约定的时间，罗山县县大队队长汪星高要到宣化店附近的董家湾来同我会面。

便衣一队有个刘庆梦，他卑鄙无耻地背叛了党，背叛人民，投降了敌人，暗地里把我们的行踪，偷偷地告诉了他的叔父、反动民团头子刘修斋、刘绍彦。那天，民团配合着东北军的一个营，事先在董家湾内外埋伏起来。而这一切，当时我们并没有察觉。

深夜，我带着便衣一队来到董家湾，隐蔽地走进了基本群众董文朗的家里。谈完工作，胡金先和四个便衣队员就睡在堂屋里，我和汪星高睡在厨房里边的一间小屋里。约摸午夜十二点多钟，正是刘庆梦放哨的时间，他偷偷地开了大门，把敌人带进院子里，先在堂屋里把胡金先打死了。同

志们被枪声惊醒，立刻与敌人撕拚起来。这时，刘庆梦伪装惊慌的样子，在外面喊我：“指导员，快起来，敌人进来了！”

“你怎么没有发觉，不进来报告呢？！”我一翻身，敌人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膀，我又倒了下去。敌人只当我死了，就乱抢起汪星高带来的罐头、手枪、子弹、布匹和炸弹。趁敌人正在忙乱，我悄悄地爬起来，想从后门冲出去。哪知后门怎样也打不开，敌人已把门倒闩上了。我俯身拿起身边的手榴弹，用嘴咬开盖子，对着正在搬运子弹箱的敌人甩去。手榴弹、炸弹、子弹一阵轰响，几个敌人顿时倒下去见阎王。通过浓烟，意外地发现屋墙炸塌了大半边，我急忙抽身冲出小屋，到了厨房锅台边的窗子下，向外一望，见满院子都是敌人，我知道无法再往外冲。马上从腰间抽出两颗手榴弹，用嘴咬开盖子，一齐甩向院里。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四散爬上屋顶，用全部火力向厨房射击。我的左膀负了伤，鲜血直流，全身是数不清的弹片伤，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我下定决心：死也要冲出去。我把两支驳壳枪都上好子弹，瞅准机会，猛然向敌人打出一条子弹，跟着冲向院子。

刘修斋、刘绍彦在房上看到我冲出来，惊呼：“何耀榜跑出去啦！何耀榜跑了！……”敌人不认得我，更不知道从哪里跑了，顿时一团混乱。我也装做民团，边跑边喊：“跑出去了！跑出去了！”东北军的一个营用两挺机枪和许多步枪封锁大门，听见里面喊叫“何耀榜跑出去了”，立即散开，到处去找何耀榜。我趁空子跑出大门外，一拐弯，跳进一个干旱的池塘里，而敌人却顺着大路追赶去了。

这时，天还没有亮，朵朵的黑云，不时遮住月亮。我爬

上塘坡，一口气跑到村边的小河沟里。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借着朦朦的月光，我看到身上和手上都在滴着鲜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走河沟，不能走路上，如果留下了血迹，敌人会追踪而来。伤口阵阵发痛，浑身软绵绵的，我心里明白，无论如何要坚持着走，不能倒下去，倒下去就会永远爬不起来了。我顺着河沟走去，只知道身上痛，却不知道什么地方痛，全身发热，心在蹦蹦地剧跳，嘴里干渴难熬。我咬紧牙关，只是想着走，走……走了一会，脚抬不起来了，身子直想往下倒。我用了极大的力量，才使思想转移到刚才的战斗，敌人来得这样突然，内部一定有问题，一定有人泄露机密，那么这人是谁呢？……脚步还在移动，只觉得头有千斤重，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在摇晃。忽然，似乎听到有人在叫指导员，我睁大眼睛，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好容易我才弄明白，原来是便衣三队听到这边枪声响了一夜，估计可能是便衣一队受包围，便沿着河沟前来接应，正走着碰到了我，同志们把我围起来，见我浑身都是伤，心痛得掉下泪来。我看到了同志们，心里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想起了便衣一队的同志们，不知他们的生死存亡、下落如何？我立即命令罗山县委书记张家胜同志："你马上了解战斗情况……"这句话不知说到什么地方，我就倒了下去。

当我苏醒时，天已黑了。我不知道是睡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开始怀疑起来：是死了呢？还是活着？我抬动右手，发觉身上的衣服没有了，心里更加疑惑，谁把我身上的衣服脱去了呢？我想坐起来，不料全身一阵剧痛，我"哎呀"了一声，又倒在床上。这时，隐隐约约地听到旁边

有人小声地说："醒了！醒了！"我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女同志。她看到我清醒过来，便指着身旁一个男同志，向我介绍说：

"指导员，这是林院长。"

原来是林之翰同志。他挨在我身边坐下，轻声地问：

"你想喝水吗？"

我点了点头。同时问他：

"怎么我身上的衣服全脱掉了？这象什么样子？"

女同志端着碗走过来，一边喂我喝水，一边说：

"指导员，你不知道，你是便衣队的同志背到医院里来的。你来到医院已有一整天啦，现在才苏醒过来。你身上的衣服不是脱掉的，因为身上的血肉和衣服粘在一起啦，是我用剪刀慢慢剪下来的。你说不好看，这有什么呢？……"

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活着，而且住进了医院。

红二十五军长征时，有几百名彩号没办法带走，便留下了林之翰院长、张映青、张先庆、范小楼等同志和十几名护士、卫生员，负责收容和照护彩号。伤员中，有的失去了宝贵的双目，有的双脚被打断，也有的打断了胳膊，或是打穿了五脏。这一伙坚强的、忠实的革命同志，在山沟里汇合之后，就成了当时白色恐怖下秘密的、唯一的红军医院。他们住在谭家凹前后六、七条山沟里，分散隐蔽在山上、石洞里、悬岩下和泉水沟里。每天吃的是野菜、树叶。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医药用品了，就是连一点盐都找不到。擦洗伤口的棉花，是同志们身上脱下来的破烂不堪的棉袄里面扯出来的棉花；同志们撕破仅有的一些布单子和衬衣，用来包扎伤

口。极少的一点盐水和猪油硼酸膏、碘酒，是医院里最贵重的药品，就是这些药品，也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林院长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把剃头刀，慢慢地走到我身边，坐在石头上，然后看着我，笑了笑说：

“指导员，你身上有些弹片伤，要把弹片取出来，伤口才能很快长好。不过，有点痛……”

“林院长，我不是第一次负伤，不要给我做动员工作啦。我知道你们很困难，没有药，没有用具。没关系，我不怕痛，你们看着办吧！”我一边说，一边移动身子，护士很快地走过来，帮助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并且用双手按住我的两个膀子。我笑着说：“不用这样，你扶住我不倒下去就行了。我不怕痛。”

林院长开始动手了。他先用剪刀剪去贴住伤口的布片。他一面作，一面不住地看我。接着，他用剃头刀子从我身上取弹片，一会儿是挖，一会儿是拨，鲜血顺着伤口直往下淌。我咬紧牙关，右手紧紧地捏成一个铁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去，我尽量不使自己发出任何声音，但身子却不由自主地抖动着。最后，林院长把仅有的一点碘酒，涂在刚挖开的、鲜血直流的伤口上，火烧火燎的很痛。特别是在左手打穿了的伤口上，他用碘酒布条从伤眼里穿过去，镊住两头来回地拉动，真是痛之入骨，我的心脏在急剧地蹦跳着，牙齿咬得吱吱发响，身上的汗水混合着血水往下直淌。那种滋味，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女护士不知从谁身上脱下来一件衬衣，一条条地撕着，然后再把头结起来，林院长就用这样的绷带给我包扎起来。这场血和肉的战斗，在河

边，树棵下，石头上，经历了一个多钟头，才算结束了。

第三天，张家胜来看我，汇报说：

“刘庆梦叛变了。胡金先、董志东、董文朗、孙保林、徐如意等五同志全牺牲啦！董文朗全家被敌人烧光了，他仅有的一个女孩子，也被敌人打死了……”

我只觉得胸部气闷，热泪夺眶而出，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些坚强、勇敢、忠实的好同志，他们经历过千辛万苦，在战场上和敌人浴血苦战，现在，这些英雄们为革命、为党光荣牺牲了。

张家胜还在说些什么，我再没有听清楚。忽然，张家胜喊了一声：

“指导员，我要走了，你好好地休养吧！”一握手，他转身走下山坡。

我目送着他过了河沟，爬上另一座大山；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些亲爱的战友们……

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黑压压的乌云，使大地黑得跟锅底一样。徐诚基同志和特委少共书记方永乐同志来到我跟前。徐诚基同志说：

“何耀榜同志，我们来看你，你还好吗？”

“很好，你们受累了。”

徐诚基同志接着说：“我们同你商量一件事情，不知道你的意见怎样？我和王书记、方永乐同志研究了一下，想把罗山的教导营，河口的特务营，以及一部分轻彩号和逃到山里来的群众，组织一个独立团。”徐诚基歇了一会，又解释说：“自从刘庆梦叛变以后，敌人开始大举搜山，如果能把独

立团组织起来，有了机动部队，再配合各便衣队，就可以给敌人一些有力的打击……”

我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方永乐又对我谈了一些敌情，然后便分手了。

不久，我离开医院，隐蔽到李家岗老干妈的家里去养伤。老干妈的家，独门独户座落在一个小湾子里，三面环山，靠着石崖的一面搭了几间茅草棚子，前面扎着半人高的木栅栏，门前有一棵大树。来到这里，才知道曾照定也转移到这儿养伤，我看到他的伤口有了显著的好转，抑制不住心头的高兴。我们两个人一起隐蔽在茅草棚旁边山崖下的石洞里。

老干妈五十多岁了，乌黑的头发里已经掺杂了一些白发，但身体壮实，精力充沛。这是一位英雄的革命母亲，我们的便衣队员和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都亲切地唤她“老干妈”。无论是早年的农民暴动，或是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下，老干妈始终如一地掩护我们，为我们隐藏和护理彩病号。她一口饭、一口水地喂着彩病号，不分昼夜地给彩病号洗擦伤口。曾经有多少红军战士，在老干妈的细心护理下重新获得了生命，走上了革命疆场呵！

叛徒刘庆梦知道这一带的群众和我们有联系，只是不知道具体的人。这一天，他突然带领着刘绍彦的民团，拥到小湾子里，包围了老干妈的家，然后在草棚子的里里外外到处搜查。有几个团丁忙着追捕老干妈喂养的三只母鸡。

我和曾照定在石洞里隐蔽着，只听得敌人的叫骂声和砸碎东西的响声。不一会儿，通过洞口的缝隙，看到老干妈

和他的儿子李老大、李老四，儿媳三嫂和老彭，都被敌人赶到院子里。敌人的搜查没有结果，就拿老百姓出气，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住李老大，捆起来吊在门前的大树上。

老干妈不动声色，巍颤颤地伫立在院子里，背对着我们隐蔽的石洞。看到身旁的儿媳妇在哭泣，她厉声地说：

“老总捉两只鸡子，有什么好哭的？我们以后再喂！”

我心里明白，老干妈的话是说给我们听的，要我们不要动，不要怜惜老大，养好伤再报仇。

敌人挥舞着皮鞭，一鞭鞭地猛抽在李老大的身上，要他交出便衣队的彩病号。李老大一声不吭。

我的心在阵阵收缩，极力压住内心燃烧着的怒火。曾照定一旁急促地喘着粗气，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扯住我说：

“指导员，我们死了没有什么，不能连累老干妈全家……”

我从石缝里看了看老干妈。老人家仍然屹立在那里，纹丝不动，平扬着头，似乎在注视着远方。

曾照定从牙缝里吐出几个字：“打出去！”

“不！”我连忙阻住他：“照定同志，我们一暴露，老干妈全家更没命了。”

小曾沉痛地低下了头。

最后，敌人无可奈何地停止鞭打李老大，留下少数人在这里看守，其余的野兽都去搜山。直闹腾到黄昏，才滚回老窝去了。

暮色中，老干妈叫小儿子和儿媳去解开吊在树上的李老大，自己提了一个土罐子，一溜小跑来到我们隐蔽的石洞

口，推开洞口的石头，摸进来说："孩子，苦了你们啦。"把手中的水罐子，轻轻凑到曾照定的嘴边。

小曾扶着老干妈，哽咽着说："老大……"

老干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他身强力壮，受得住。只要你们不出事，我就放心啦。"

老干妈的话，字字扣着我们的心弦。它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是鼓舞我们革命斗争意志的最强音。

六　烈火红心

叛徒刘庆梦配合着敌人的情报员，带领着民团到处搜山堵路，夜晚在路口下卡子，并且把便衣一队活动地区的基本群众关系全部破坏了。敌人把我们的基本群众抓到宣化店，耕牛、种子、衣物被抢得精光。敌人在胡家岗胡山古的家里搜出一只驳壳枪的木壳，当场就打死群众六人，抓走十一人；郑家湾的郑孝宗因为给我们保存了油印机，也被敌人打死；石山河后坳上的胡明月，因为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虽然怀着孕，敌人仍然把她吊在树上毒打，以致小产了；何耀如因为给我们挑光连纸，被敌人捉去灌粪，他只是装疯，没有招供……从黄家榜直到麦陡关，敌人全是这样凶恶残暴地对待群众。

我负伤以后，很多同志为我耽心，看到我浑身是伤，以为难活啦。敌人则大肆造谣，说我已经被他们打死。但是，我并没有死，在党和群众的关怀和爱护下，经过医院的护理和老干妈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全身的弹片伤都结了瘢，只有左膀子上的伤口还在化脓。听到敌人对群众的残酷暴

行，我再也呆不下去了，不管同志们和老干妈怎样劝阻，我还是回到了特委。

敌人白天搜山，夜晚堵路，到处都放了情报员，不仅使便衣队不能出山，而且也不能做饭吃。敌人一发觉哪里冒烟或者有火光，就搜向哪里。

我和张家胜带着道委、特委的工作人员和便衣三队，在和尚头、仰天锅一带山上隐蔽，夜晚下到河沟子里来，因为饿的太狠了，想办法做一点饭吃，不料被山顶上敌人的情报员发现了沟里的火光。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敌人把河沟、和尚头全部包围起来。

四面八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紧缩，漫山坡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敌人。

张家胜问我："指导员，怎么办？"

"冲！一定要夺取和尚头的山包阵地。"

邓少东带领三队连续三次冲锋，最后拿下了山包阵地。于是，我们借着有利的地势，边打边退，到了高庙。敌人有刘峙的一个团和当地的民团，总在千人以上的兵力，由叛徒刘庆梦带路，跟在我们后面穷追不舍。而我们仅有三十几个人。我对张家胜说：

"高庙不能隐蔽，敌人已经发觉了，再隐蔽下去就是死。"

敌人的堵击部队已经漫山遍野地向我们涌来。顾士宾跑过来说：

"指导员，我们再不能往山里跑，只能向大路上冲出一条血路。"

“对，冲下去！”

顾士宾、邓少东带领便衣三队立即向大路上冲去，与敌人混战起来，扫开了一条血路。我们于是从大路上退到了黄家冲，而后又转移到灵隐寺。这时，徐诚基带领独立团正在这一带活动，看到我们被敌人咬住，立即把部队展开，埋伏在两旁的山头上，并派传令兵告诉我说：“独立团已经埋伏好，再不要跑了，准备力量与敌人决一死战！”

敌人追击的前锋是民团，徐诚基看到敌人进了鳝鱼篓子，将小红旗一展，两边的埋伏冲下来，与敌人展开肉搏，激战半小时，民团死伤不下百余人。我们虽然打了个痛快，可惜没有打到刘峙的头上。

夜幕渐渐降落了。我们翻过山头，部队就休息整顿。王书记召集开会，徐诚基在会上提出：

“独立团在山区开展活动很困难，如果这样打下去，再打几仗就可能垮。最好独立团到山外去转个圈子。”

王书记说：“尽在罗山、光山转圈子，是带不走敌人的，我的意见是独立团从经扶到麻城过封锁线，到皖西去找高敬亭同志会合，传达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任务，和讨论皖西、鄂东北两个道委的统一组织领导问题。山里边有何耀榜、张家胜等同志，是可以坚持游击战争的。”

徐诚基接着说：“山里因为火的关系，已经多次暴露目标，使我们受到损失。要想办法使敌人不容易发现烟火。最好早晨早一点上山隐蔽，晚上迟一点下山，防止被敌人包围。我和独立团去找高敬亭同志，至少也得一两个月的时间，你们最好再组织一个独立第二团。我从手枪队里留下

一个班，作为特委的警卫班。……”

于是，徐诚基同志带领着独立团到皖西找高敬亭同志去了。

随后，我也带领着便衣一队从罗山四区出发。便衣一队是刚刚重新组织起来的，队长是顾士宾，队员有韩允之、申功臣、胡民山等几个同志。曾照定胸部的伤还没有全好，但他坚持着请求归队。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也编入便衣一队。

翻过罗山一、四区交界的大山岭，已是黎明时分。我们赶到赵家冲，和地下党员方结诚接上头，就隐蔽在他家的楼上休息。赵家冲正处在敌人的心脏，附近有敌人的公路线和碉堡。方结诚又叫他的妻子和烈士董志东的妻子到外面放秘密哨。

中午时分，忽听得方结诚的妻子在下湾大声的喊：“赶牛！赶鸡子！”这是“敌人来了”的暗号，我立刻叫方结诚出去看望，他回来说：

“叛徒刘庆梦带领着民团搜查来了。”

妇女和孩子们乱跑着，又喊又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立即围住村子，把全村的男女老少捆起来毒打。但是，群众忍受着，没有一个人出卖便衣队，说出便衣队住的地方。敌人没有办法，便带着士兵挨家挨户搜查。

敌人来到方结诚家里，见有楼没有梯子，觉得可疑，便到处找梯子想上楼。这时，大批敌人都向这里涌来了，我在楼上的窗口里看去：院子里，四周围都是敌人，想从楼梯上冲下去已经不可能了。在这紧急关头，我命令全队：

“冲！从窗子里跳下去！我留在后面掩护你们。”

顾士宾、韩允之、申功臣、胡民山等同志迅速接近另一个窗口，相继跳下楼去，在敌群里扫开一条血路。曾照定刚要跳楼，不想身子在窗框上撞了一下，胸部的伤口一阵剧痛，他急忙蜷着身子蹲下来，喘了喘气，又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原来的窗口上。

我听到敌人正忙着在楼下搭梯子，一连抽出两颗手榴弹，对着楼梯口掷下去。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楼下的敌人哭爹唤娘，一片鬼叫。我返身准备跳楼，忽然发现曾照定正伏在窗边射击敌人。

“小曾，快跳楼。”我忙爬到他身边。

“指导员，你先跳吧!”

“执行命令!”我有些生气了，对着敌人打出一排子弹，想掩护他跳楼。然而，他一动不动，仍然沉着地一枪枪打击着敌人。

“指导员，不要顾我了。你是特委的负责人，你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指导员，你，快跳吧!”

曾照定的声音是那样恳切、坚定，我心里不由得一震，这才忽然想到，他可能是因为胸部的伤口，不能跳楼吧?

曾照定换上了最后的一排子弹。没有时间多考虑了，我的声音有些缓和地说：

“小曾，没有关系，跳轻点。快!”我轻轻地用左手碰了碰他，“我来掩护。”

“指导员，我是个共产党员。”突然，从曾照定的胸腔里爆发了震人心弦的喊声：“亲爱的党，共产党万岁!”他举起

手来，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太阳穴。

“小曾……”我伸出左臂搂住他。

优秀的共产党员、英雄的便衣队员、十八岁的曾照定同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小心地放下曾照定。我没有眼泪，有的是对敌人仇恨的力量。我咬紧牙关，对准敌人打出愤怒的火链，翻身跳下了楼。

我边打击敌人，边追赶前面的同志们。敌人慌乱了。群众在四散奔跑，我们趁机混在人群里，涌向乌子铺。刚接近乌子铺，炮楼上的敌人认出了韩允之，高喊：“便衣队来了！”“韩允之在里面！”接着，就跟我们打了起来。我向同志们一招手，抽身爬上了后山岭。

敌人蒙头转向，一时分不清共产党哪里去了。到下午一点多钟，炮楼上才响起了军号，敌人集中了兵力，接着向后山岭上追来。这时，我们早已准备好了，五个人分为两组，第一组阻击敌人，第二组撤退；等到敌人来到近前，第二组再用火力掩护第一组转移。围着一条岭，就这样和敌人纠缠了一下午。傍晚时，我们转移到洛家大塘。

洛家大塘是便衣三队活动的地区，他们听到响了一天的枪声，估计是一队受敌包围，便全部化装成群众，带着短枪，分散在田里接应，我们碰头后，立即转入根据地休息。

刘庆梦的叛变，不只是便衣一队的根据地全部被破坏了，而且便衣二、三队和群众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叛徒刘庆梦还卑鄙地化装成我们的便衣队，按着以前便衣队活动的方式，到各处去喊门接关系，进一步破坏了我们与群众的关

系，使得许多群众动摇了，坚定一些的群众也不敢轻易地和便衣队见面，除非是负责同志。但负责同志又不能全跑到呵！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

为了打击叛徒，挫伤敌人的锐气，我们决定打坏保长。群众都说：如果能把雷班寨的陈练青打掉，这一带的保长保险都投降，暗地里顺着我们。

陈练青住在雷班寨东边山脚下的外冲，他是雷班寨的寨主、恶霸兼保长。我带着便衣队到了雷班寨附近的银凹，就得到情报说：陈练青这小子回来了，他刚结婚，新娘子今天回门，所以带了十几支枪住在家里。

我们虽然一整天没有吃饭，有点饿得不行，但为了完成任务，在漆黑的夜里爬过几座大山头，摸到外冲的后面。外冲四周是土围子，寨门紧闭着，十几条枪都在门楼上。我们到处看了看，围子太高，爬不进去，怎么办呢？韩允之说："没关系，我能进去。"对于挖土墙，老韩可是个内行呵！

陈练青住的是明三暗五的房子，房子的后墙紧贴着围子。老韩打量了半天，找来一把锄头就开始挖。他的技术真不简单，挖的又快又没有动静，一边挖一边往里钻。我们几个人插不上手，只好在一旁静待。等了好一阵，老韩才回来，焦急地说：

"不行，没有打量好……"

老韩歇了一会，又重钻进去，拐个方向挖。这一回成功了，他高兴地出来说：

"行啦!"

"看到了没有？"我着急地问。

“看到了，还在睡觉呢!”

“脱衣服了没有？”

“上身脱了……”

正是时候。外面留下人守洞口，我和老韩钻进去，用手电一照，这小子头枕着盒子枪，睡得象个死猪。我轻轻地从他头下抽出枪来，他睡得稀里糊涂地嘟囔着：“去去！别闹，人家在睡觉呵！……”头一歪，又呼噜起来。

我们轻悄悄地走出房外，在大门底下，顺着梯子上了门楼，士兵们也都在睡觉，十几支枪都堆在地上，一下子叫我们抱下来了，然后撤了梯子，回到陈练青的房里，喊他：

“起来，起来!”

那家伙迷迷糊糊地说：“深更半夜的，起来做什么？！”

“是请你来了。”我笑着，一边说，一边就用绳子捆。他见来势不妙，大喊：“快来人呀！……”

门楼上的卫兵被惊醒了，发觉没有枪，也没有梯子，只好站在门楼上急得干瞪眼。

我们提溜着陈练青这个坏蛋走出大门，回过头来对门楼上的士兵说：

“你们的保长被我们捉走了，以后再碰到共产党要客气一些……”

活捉陈练青以后，其他的坏保长和地主劣绅都被镇住了，为我们以后营救群众打下了基础。

七　深入虎穴

我们先前曾说过，凡是为共产党、为便衣队而被敌人捕

去的群众，我们一定设法保出来。目前，由于刘庆梦叛变投敌，加上敌人多次的挨家搜查，前后被敌人捉去了一、二百名群众。这样多的人被敌人押在大狱里，怎样才能为他们取保获释呢？这的确是个大难题。但是，不管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把革命群众从敌人的魔爪下营救出来。

在一个月夜里，我越过大山，穿过深谷，来到鸡笼山上，和罗山县委书记张家胜研究了一上午，也没有想出个办法来。捉保甲长吧，一来比较困难，再说就是捉到一两个保甲长，也只能从敌人那里换出少数群众，不解决根本问题。最后，我考虑只有到宣化店去碰一下，看看那些坏种能不能给保。于是我向张家胜说：

“还是我到宣化店去一次。探一下他们的口气，如果能用钱，咱们再研究。不行的话，回来另想主意。”

张家胜不放心地说：“你去是很危险的。”

“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群众。群众为我们被敌人捉去了，我们能不管吗？”

第二天夜里，我转到便衣一队活动的地区刘家冲沟北湾，打了暗号，然后走进刘清翼的家里，对他说：

“我想到宣化店去一趟，你们能带我进去吗？”

刘清翼着急地说：“干不得，指导员！宣化店除了民团，还有刘峙的一个团，岗哨非常紧，你去做什么？要是买东西，我替你去买。”

“不行，你去不能解决问题。你知道，咱们有一、二百人被押着，我进去想找那几个坏种，叫他们设法保！”

刘清翼半天没有吱声。我问他：

“你怕吗？是不是不敢带我进去？”

“不！指导员，你能为群众去冒险，我们又算得了什么？……我一定带你进去。明天是单日子，逢集，你看怎样去？”

“什么东西在宣化店卖得快呢？”

“这两天宣化店竹子缺市，我把竹园的竹子砍一些，我两个装卖竹子的，你看怎么样？”

我有点耽心地说：“砍竹子，你这样大的竹园不怕砍坏吗？”

“嗨！指导员，现在是救人要紧，竹园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一夜，我翻来复去没有睡着。宣化店是我从小就常去的地方，熟人多，再加上叛徒、情报员，……我一定要化装得让他们认不出来。这次去是为了几百群众的生命，就是死了，也是为了群众的生存，为了党的事业。……罗发之是联保主任；我二姐夫王少堂是商团团长；我姑夫刘海前是个大士绅。他们都是宣化店的“要人”，也是最反动的家伙。进了宣化店，我首先就到他们家里去，看他们拿我怎么办……

天亮了，刘清翼到楼上来说：

“指导员，都准备好了。我挑一担竹子，你的伤口还没有好，背一小捆就行了。另外，我还找了几个同路的。”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指导员，我们族上的几个人押在宣化店，是通过刘海前的关系送牢饭的，他是我们祖上的叔爷，给了我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事情还可以应付一下。”

“我也想找刘海前。”我一边说着，一边取出盒子枪检查一下，压满了子弹。然后又取出三十发子弹，卷在裤腰带里，把盒子枪暗藏在腹部。

刘清翼象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噢，指导员，你和刘海前不是也有点拐弯子亲戚吗？自从你们杀了几个保长和丁印昆以后，他们都有点怕，如果真的到他家去，他拿你也没得办法。”

“对，天不早了，我们走吧。”我心里已打定了主意。进了老城，就叫刘清翼想办法到子城告诉我二姐，就说我到了老城，要上她家去。

我穿着一套旧棉衣，头上戴着顶破瓜皮帽，背着一捆竹子，随着刘清翼和几个老乡出了山沟，向宣化店走去。

到了老城门，哨兵盘问道：“你们是哪一乡哪一保的？”

我们齐声答道：“惠民乡卖竹子的。”

两个哨兵拦住我前边的几个老乡，验看通行证，检查肩上挑的竹子，没有发现疑点，就使劲往门里一推，接着检查下一个。我稳住气，不使自己露出声色，眼看轮到我了。不料，那个哨兵抬起大巴掌，一把正抓住我左膀上化脓的伤口，好家伙，直疼得钻心，我连忙弯下腰来：

“哎呀，二哥，我肚子痛。”

刘清翼感到不妙，急步赶到我身前，掏出那张“特别通行证”，一边给哨兵看，一边客气地说：

“老总，他是我弟弟，身子有病，请行个方便，下集咱们去喝几两。”

“不行，要好好检查！”那小子成心发狠。

刘清翼急了，高声说道：“不要瞎了眼！好好看看，我这通行证是进子城的，难道还不能进你这道门!”

那小子一楞，另一个哨兵忙赶过来，看了通行证，知道刘清翼有点来头，便装起好人：

“对不起，对不起，请进。”

“成心找麻烦!”刘清翼“火气”未消，扶着我走进了老城。

镇子上更是戒备森严。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士兵在那里惹事生非。但我更耽心的是怕碰上熟人，如果被他们认出来，一报告，我牺牲是小事，一、二百个在狱中的革命群众怎么办？来到南山货场，我使了个眼色，刘清翼把竹捆放在我身边，向子城走去了。

山货场上人来人往，敌人的士兵也在东溜西钻。我正在和一个买主讲价钱，侧面走来一个人，抗了我一膀子：

“你也来卖竹子？”

我心里一跳，看看那个小伙子，面孔很熟，就是一时叫不出名字。我瞪了他一眼，粗声粗气地说：

“对，卖掉竹子，好买点油盐。”

转眼间，那小伙子不见了。我心里嘣嘣直跳，头皮有些发麻。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蛋？他走，莫不是向敌人报告去了？不能不早提防。敌人要是来个清街盘查，那就抓瞎了。我忽然想起，前边不远就是何绍耕的家，他是国民党的旅长杨秀丰的妹夫，发现情况，我就闯进他家，他要是把我隐藏起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打死一个够本，就是牺牲了，也要拉他个垫背的。

好容易盼到刘清翼回来了。接着王少堂十来岁的孩子王家耐蹦跳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就喊：

“舅舅，娘叫我来接你。”

“早点出去。”我对刘清翼说了一句，便牵着王家耐的手随他走去。

刚走到子城门，哨兵客气地问：

“小少爷，你带的是谁？”

王家耐说：“是我舅舅。”

哨兵又说：“小少爷，那可由你负责。”

“去你的吧！出了事情来找我。”王家耐满不在乎地将我领进子城。

走到院子里，二姐从屋里出来迎我，第一句话就说：

“刘庆梦来过，他们都说把你打死啦，你怎么搞到街上来了呢？咳，大部队走了，你怎么不走呢？他们恨的就是你呀！你怎么敢来呢？……”

进到屋里，刚喝了一杯茶，王少堂急匆匆地走进来了。我立即用手扣着藏在腰里的盒子枪机头，心想怎么他来的这样快？莫非敌人已经发觉了？我正在疑惑，只见二姐双眼泪涟涟地说：

“小舅，你不要怕，是我叫孩子把他喊来的，看他把你怎么样！”

王少堂看了看说：“是你呀！小舅，你进来如果没有人发觉的话，可以在家休息一下。我知道你不会光在我家，一定还要到别人家里去的。”

“我进来没有人发觉，如果他们发觉的话，也只有你去

送礼。但是你要看看那些保长……。”我有意停顿一下，然后说：“我既进来，不会光在你家里，我还要去看看刘海前姑夫。”

听了这话，王少堂好象抓住了时机，急忙说：

“你要去的话，我陪你一同去，免得被他们发觉。”

我跟着王少堂，从刘海前的铺面进到他的楼上。正巧，罗发之在和刘海前商量什么事情，他们一看见我，都楞住了。

我说：“姑夫，你好吗？”

刘海前结结巴巴地说：“你来了，坐……坐。”他侧转身子，对着罗发之说：“你们不相识吧？这是罗发之，”又对着我说：“这是老四。”

我说：“我知道，他是联保主任。”说着，我们都在太师椅上坐下来。

罗发之说：“我们还是老表呢，小时见过面。老表今天来了也好，不过是这样，我们都是本乡人，祖宗坟墓都在这里，谁也走不了谁。现在宣化店也剿不清共产党，但一时也打不完国民党。我们当联保主任的，也是想为老百姓安居乐业。”

我接着说：“罗主任说的好。我来不为别的，正是为群众。凑巧，今天罗主任、王团长和我姑夫都在场，就请你们想法把群众保出来。”

刘海前胡子翘翘着，手里捧着个水烟袋，总是“咕噜噜咕噜噜”抽着烟。他四下里看了一眼，慢慢腾腾地说：

“今天老四来的正好，上集何耀方（何家湾的保长，和我

们有联系）来时，也提到这回事。我想他们捉这么多的百姓，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哪能都是共产党？这……这明明是他们想发财嘛。老四说叫我们保，这不是个办法。”他抱着水烟袋又“咕噜”了一阵，才继续说下去：“他们捉人就是想发财，你要去保就得出钱。现在百姓连饭都没有吃的，哪里有钱保人呢？就是给了钱，他们放掉一批，又会再捉一批，反正他们总是为了钱。”他从古书柜前面的太师椅上站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到火盆边，在一把古旧的椅子上坐下来。“我看不能保。刘庆梦捉了这样多的百姓，还是要从他头上开刀。”他转脸朝着我说：“你们杀何宴卿时，不是也有刘庆梦吗？这可以叫何耀方出面告他，说他是个两面派。前两天，他领着民团搜山受到损失，他们就有点恼怒他，这正是个机会。”

我听了他这一番话，心想：这个老东西一辈子没有做过一点好事情，今天还算说了几句人话。我于是顺水推舟地说：

“姑夫，就这样办吧！天不早了，我就回去啦。”我又对罗发之和王少堂说：“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办，要由你们负责。姑夫年纪大，经验多，你们还是多多地向他老人家请教。”

王少堂走到我跟前说：“小舅，你以后最好还是少来。这次来，虽然没有被旁人发觉，终究是很危险的事。你来的多了，要被他们发觉，你走得了，我们这拖家带小的可走不掉。我希望你以后有什么事情，最好还是找个老百姓带个口讯告诉我们，我们一定照办。”说着，四个人一同下楼，送

到铺面门外，由王少堂把我顺利地送出了子城。

从道委王书记那里回来，我手头有了六百块银洋，立即把便衣一队队长顾士宾找来，对他说：“你用传呼的办法通知各便衣队，叫他们利用保甲长的关系请客起保。没有钱，可以到我这里来领。”并向他布置了一些具体工作。然后，我带着胡民山等同志，先到郑家湾找到郑远钢保长，又在后坳找到甘允功保长，就一同来到西边山脚下的河沟里，坐在岩石下面。我要郑远钢去保郑家湾的群众，甘允功保姓甘的群众。

甘允功说：“我们保长的效力不大，还是找联保主任甘青山，他今天回来啦。他也知道这一带的保长都和你们有联系。但他这人还不坏。你是不是能够和他见一面，最好是不杀他。”

甘青山一回来，就住在民团的炮楼上，所以我回答说：

“进炮楼是不行的，和甘青山见面也很困难。最好是你们去探一下口气。”

“刘庆梦一叛变，这一条沟的人都扯出来啦，再也瞒不住了。我看把这一条沟在国民党做事的人，都聚到一块谈谈，由你主持好一些。”

我想这还是可以的，就说：“也好，你们想办法把他们弄到一起。”

甘允功说：“联保主任回来了，我是一定要去看看的。那我就先去炮楼里，探探刘达诚的口气。”

刘达诚是民团的一名小队长。甘允功他们哪里知道，

他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秘密工作的同志。

甘允功很快转回来说："我和刘队长谈保人的问题，他说想保姓刘的人，那只好用祖上的名义，但要先和刘八爷商量好，可以在家祠里请客。不过请客我是没有钱的。"

"请客是个好办法，没有钱，我给你们六十元。但是请哪些人呢？"

"刘队长说，联保主任住在他那里，这是一定要请的。当然也少不了刘老八，这你是知道的，他是姓刘的长辈。你看还请哪些人？"

"你们两个和刘队长商量着办吧。"我掏出钱来，交给他们六十元。分手后，我回到刘清翼家里，天不亮就上山隐蔽。

第三天下午两点多钟，刘清翼的孩子来喊我。看看四下无人，我才走进他家。刘达诚正在等我，他说：

"六十元够请两桌的，于是我就大请一下。昨天把请帖都送出去啦，都答应来，就是刘海前不来，说是山边上有时有共产党活动。他说的还很客气，关于保人的事情，他一口答应帮忙。"

"还请了些什么人？"

"有甘青山和这一条沟姓甘姓刘的保甲长，共有十几个人。"

"确定在家祠里摆席吗？"

"是在家祠。请帖说是中午，但是我想中午你不能下来，所以迟延到这会。甘青山这家伙真滑头，看到天晚了，高低不肯出来，说怕有危险。最后我和他打了断头结，如果

有共产党，我就断头，这样他才来了。不过这里边就有文章了，今天你去，要被他们发觉了，这一条沟的人和我就都完啦。”

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去，就破坏了这个巩固的联络点，不但保不出人来，反又送进去一批。不去吧，保人的事情很难解决，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感到左右为难。

刘清翼说：“指导员，你不能去，要是被他们发觉，打了起来，我们就都完啦。”

恰在这时，和我们有联系的何家山的保长来了，一进屋，看到刘达诚在这里，就说：

“刘队长，你今天查这里，明天查那里，总说我们‘通共’，用这顶帽子压我们，原来你也‘通共’呀！”

大家都笑了。

刘达诚说：“还说‘通共’呢，你看这条沟捉去多少人？”

何保长说：“和我们那里的情形差不多。”

沉默了一会儿，刘达诚看了看何保长，问道：

“今天请客，你能提出一些办法来吗？”

他急忙说：“我不敢讲话。”

刘达诚想了想，忽然对我说：

“指导员，你和何保长的身材差不多，干脆，你化装成何保长进去，怎么样？”

“何保长，你认识甘青山吗？”我问。

“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他有些胆寒地说：“何指导员，你可不能穿我的衣服打甘青山，要是有人认出我的衣服，那可不得了。”

“不会，我不打他，我是为了保人。”我换上他的衣服，稍微有些长。“今天我完全用你的口气说话。你放心好了，在刘清翼家里不要出去，等我回来你再走。”

路上，刘达诚告诉我，便衣队的几个同志以民团的身份，装做送饭端茶的，已经混进去了。我进去后，他又暗地里通知他们。

祠堂外的四周，都是刘达诚的民团放的哨。祠堂里，闹腾腾的有好几十人。我心里不由得一阵乱跳，千万不能露马脚，一被他们发觉，几百条性命就算完啦！

刘达诚领我走进东厢房，向甘青山介绍说：

“这是何家山的何保长，大号何再洲先生。”

甘青山站起来和我握手，请我坐下，然后对刘达诚说：

“刘队长，时间不早了吧？”

“是，甘主任，马上开饭。”

甘青山进了正堂，和刘八爷推让着，最后还是坐了首席。饭还好，是海菜席，只是酒席上不那么热闹，在座的人都很沉闷；保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呵。

饭后，大家回到东厢房抽烟喝茶。刘达诚拿出已经写好了的保状说道：

“今天把甘主任和诸位同事请来，是为了保我们族上的一些人。如果诸位不怕受牵连的话，就请各位欠驾签名盖章。”

于是，大家逐个在保状上签下名字。我写下何再洲三字，趁机会说：

“甘主任，保状上说，保出来的人永远不和共匪见面、买

东西，这能做的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不都要受连累？”

甘青山说：“这很难说。共匪白天不敢出来，夜晚他出来。他们是长脚的东西，谁敢保险呢？好吧，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刘庆梦是一个大祸害，他在共匪内做坏事，过来后，也还是做坏事。”甘青山喝了口茶，慢条斯理的、显示自己身价很高的样子说：“昨天，陈区长又文先生请我去，说是一区捉的儿女百姓老老少少的太多啦，要我到山边上来清查一下，这些被捉的是否都是共匪。”

我说：“报告甘主任，青年人南跑北奔的，说通共或许可能；但是这些老老少少的百姓，可能性就不大。如果说这些人都通共，那咱们这一条山沟、河两岸所有的人都没法活下去啦。死，也要死个清白，不能就这样冤枉地死去呀！”

“你的意思是……”

“我们姓何的在这一带和官府没有联系，可说是一个弱小者。我和何耀方大哥商量，杀何宴卿三叔就有刘庆梦，现在又死押这样多的百姓，我们想告他。”

甘允功随着说：“三叔，我们姓甘的也有不少人被押着，你孙媳妇胡明月身怀三个月的孕，被他们打掉胎儿不算，现在还押在牢里。听说刘庆梦还在告我。这样我们也告他。”

甘青山侧过头去，问郑远钢：“郑保长，你们姓准备怎么办？”

“我们保甲长不能看着百姓死去，也准备告刘庆梦。我弟弟当个甲长，就是他杀死的。”

甘青山向在座的保甲长们扫了一眼，然后才说：

“你们都说告，我也同意。捉去这样多的百姓，保，哪有这许多钱？告，和他敌一家伙也好。不过，我明天还是到街上去，先在上面摸个底，找找又文先生，看他怎样说。你们赶集的时候，先到我这里来一趟……就这么办吧，我要走了。”

说完，他和刘达诚回炮楼去了。

我回到刘清翼家里，对何保长说：

“你明天叫何耀方领着何宴卿的女孩，到宣化店去找刘海前，要他给你们想法写呈纸告状。”

刘海前、王少堂、罗发之、甘青山都算打通啦。

等到逢集那天，甘允功、郑远钢去问甘青山，他说：“告！能写呈纸的写呈纸，不能写的到区署去喊冤。”

第一个告状的就是何宴卿十岁的女儿何荣。刘海前领着何荣去过堂，何荣说：

“我爸爸是刘庆梦带人来杀的。”

陈又文问：“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她走到右边，把刘庆梦拉了出来。

陈又文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训道：

“刘庆梦，你在共匪里做了不少坏事情，过来以后，你为了发财，杀了好多人，又捉了这么多儿女百姓，却没有捉到一个共产党。如果再有这样三个人证实，你就要坐牢。”他对站在一旁的甘青山说：“你通知各联保，叫他们来保百姓，不要罚钱和请客。”

头场官司打赢了，就这样保出了第一批群众。

甘允功在刘清翼家里找到我，笑呵呵地说：“你说的办

法真好，今天成功了。”接着，他把区署过堂的情形叙述了一遍。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想到被押的人有办法啦。抓紧时机，我立刻部署工作，并派专人到沙河铺活动董刘氏去告状。

董刘氏由他娘家的叔伯哥哥刘朗山、叔爷刘海前送到区署过堂。董刘氏哭哭啼啼地说：

“刘庆梦说我通共，夜晚总是他来喊‘姐姐’，叫我给他开门。我想，他是我娘家的弟弟，能不开门？开了门，他又放何耀榜进来，这叫我个妇道人家有什么办法？他过来以后，反说我通共，把我丈夫董文朗和八岁的女孩子都打死了……。刘庆梦！你说，你算人吗？我看你是个两面派，在共产党狠，在国民党更狠！你杀了我的人，还不甘心，没收我的财产，烧光我的房子……”她哭闹起来，“今天在场的有我娘家的哥哥和爷爷，这里还有区长，看你把我怎么样？叫我死，我就死在堂上……”

陈又文看看刘朗山、刘海前，更不允许刘庆梦分辩。他坐在一只特别高的椅子上，自以为是一个很清正的法官，瞪着眼睛判决道：

“刘庆梦！你过来虽然有功，但你这样胡作非为，将职员的家眷闹得家破人亡，怎能行！经甘主任到通惠乡调查，知道你在很多问题上都是虚报。再者，今天的保状特别多，你自己是杀人的凶手，还说是别人。……”陈又文说得唾沫星子直飞，“上次你送情报说，共匪只有何耀榜少数人在山上，一定可以捉到。结果打起来，有那么多共匪，使我们损失很大。从各方面看来，你不是真正想改邪归正，怕里边还

有问题。我正式判决：凡是有保的百姓，一律释放。山边惠民乡，每天要有两个人来区署汇报共匪的情况，如果时间来不及，可在山上烧起大烟火为号。刘庆梦从今天起软禁子城，不准出城门。”

这场官司打得真热闹。我们“以毒攻毒”，解放了群众，打击了叛徒。群众回到家里，便衣队立刻分别去慰问，把我们仅有的少数的钱，分给他们作为安家之用。

这时正是初冬季节，雪花纷飞，高山平地到处一片洁白。同志们都穿着单薄破烂的棉衣，山沟里卷出来的寒风，吹在身上，冷入骨髓。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和一队转移到刘清翼家里。刘清翼和他三叔刘云范坐在屋里，愁眉苦脸，正在商量到宣化店向区署汇报“匪情”的差事。

我们围着火盆坐下来。

刘清翼说：“汇报，汇报，这样冷的大雪天，把人的腿都走断啦！你有去汇报的时间，不会在东山上烧大烟，叫那些肥猪出来尝尝这一走一滑、跌跟头的滋味。”

刘云范说：“指导员，你们烤一会火，到西山那个石洞里去。我到东山去烧烟，叫那些肥猪们也来尝尝咱穷人的苦头。”

区署里看到山上冒大烟，知道有“共匪”，警备队马上紧急集合，跑步到了刘家冲沟。警备队长气喘喘地问：“谁烧的烟火？共匪在哪里？”刘云范说：“今天轮到我上区里汇报，刚走出村口，就看到东山上有四、五个人，从北向南山岭上跑了。我急忙烧起大烟。现在，共匪要是走的话，早跑出几里路啦！不过，我看他们没有跑，下这么大的雪，能跑到

哪里去呢？……”队长很不耐烦，恶狠狠地说：“下这样大的雪，搜不到，回来找你！”他转身命令士兵：“搜山！”

天快黑时，刘云范来了，一进山洞就笑眯眯地说：

“嘿嘿，指导员，他们还真的来搜山！你看吧，那些笨猪们在雪山上爬，有的咕咕碌碌滚下去，有的一走一滑，连队长也跌了一大跤。他很不高兴地看了看我，嘴里不三不四地骂着，对士兵说：‘集合！回去……。’指导员，看着他们那股子怪相，歪歪扭扭的，我真想笑……。”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指导员，我们这样干，不是一次啦，刘清翼做的最多。”

我也笑着说：“不单是你们这样做，很多地方都这样做。我看，再有几次，他们就会懒得出来了。”

刘云范忽然想起来说：“指导员，我还给你们煮了红薯粥呢。走，回家去吃吧。”

工作又在群众中扎了根。不管敌人和叛徒怎样凶残和用什么样的手段，也割不断共产党和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

八　谭家河接信

河南省光山、经扶、罗山三县交界的地带，有一片寨子，联接长达九里路，共分十八个寨子，人称“九里十八寨”。每个寨子里都有反动民团和炮楼，十八个寨子共有一千多条枪。寨子里的地主恶霸统治压榨着农民，奸淫烧杀无所不为，青年妇女成群地被他们强拉去卖到外地。寨子的防守戒备十分严密，就是本地的农民也不得轻易出入寨门，只是到了农忙的季节，才有很少的时间出外种田；因此大部分田地都荒芜了，农民们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这九里十八寨有个总寨子，名叫“香炉寺”，住着联保主任陈治忠。他是九里十八寨民团的团总，一家弟兄八个，称霸一方。香炉寺地势十分险要，加上岗哨林立，给我们的活动增加很多困难。过去红二十五军打过，没有打下来。

陈家世代反共，有牢固的工事，有长久储备下的很多粮草，还有一整套统治农民的办法。

陈家几代的一个姓龚的老佃户，两个妹妹从十几岁就被陈老五霸占着，受尽凌辱。姓龚的在寨子里当一名甲长，亲眼看到地主的各种恶行，他通过自己的经历，更深地体会到穷人们所遭受的摧残和压迫的痛苦。旧历腊月二十日（一九三五年初），陈家派他上宣化店筹办年货，他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姑老表、便衣二队队长申功臣。碰巧我正在这个便衣队里视察工作，申功臣向我说明了姓龚的是香炉寺的甲长，是他的姑老表，我们便开始交谈起来。

龚甲长向我们诉了许多苦水，详详细细地谈到九里十八寨的情况，然后看看我和申功臣，求救似地说：

“老表，穷人实在受不了啦！想暴动，你们能帮忙吗？只要你们肯帮忙，我们就和他们拚一场！”

群众相信党，相信我们，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如果不答应群众的要求，怎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呢？答应吧，眼前我们的力量……

沉默中，我和申功臣的视线相遇。他突然说：

“指导员，里应外合是可以干的！”

龚甲长紧接着说：“他们的岗哨严密，这些时都忙着过年，打牌喝酒，比平时倒是松了不少。”

经过反复考虑，我才下定决心：“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的，是为穷人做事的，我们也是穷人，穷弟兄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就是死也要帮忙。我们决定打。大家商量一下，怎样打才好？”

龚甲长似乎胸有成竹，高兴地说：“我买的年货都定好了，明早往回运。二十五日夜十二点钟是我的夜班，该我查哨。我在墙上咳嗽和划洋火为号，然后打开寨门放你们进去……”

“好吧，就决定二十五日夜里十二点动手。你回去以后，把群众组织一下，做些准备工作。凡是自己人，在门上插一个棒子为记，以免受损失。注意，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攻打香炉寺的计划经特委研究通过，并且作了全面的布置。腊月二十五日，我们集合了经扶、罗山、红安三个县的便衣队，和罗厚福率领的一个特务营，共有六、七十人。同时还动员了很多群众，准备在打掉香炉寺以后，把地主豪绅的粮食运到山区里。

天色入暮，我们从无人区的黑山冲出发，奔向四十里外的香炉寺。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山坡上那些久经风霜的柏树，坚强地伸展着它的枝叶。但是，我们英雄的钢铁战士比它更坚强，更勇敢。同志们穿着单薄的衣服，顶着纷飞的雪片。迎着冷彻骨髓的寒风，踩着深厚的积雪，行走在深山老谷里。外号“白面书生”，然而斗大的字都认不得两石的申功臣，手执一根野竹子，敲敲打打地在前头探路，不时嘱咐身后的同志：“跟住，踩着脚印走。”

来到何家畈，前面就是一条河。河水已冰封，河面上的

雪和两岸连成一片。从前，这里是苏维埃区和敌人统治区的交界河。河对岸就是白区，大部分村庄筑有碉堡和寨围子，里面驻守着民团；越接近九里十八寨，这些民团越是反动。

夜色更加漆黑。过了冰河，同志们取出白手巾或是白布条，缠在左胳膊上；后面的人就瞧着前面那点白印子走。九里十八寨集中住着有钱有势的官僚地主和劣绅，所以在每一个寨围子的墙垛上，都点着一盏盏的照明灯，旁边布上暗哨。哨兵总是虚张声势地瞎咋唬："干什么的！""开枪啦！""过来！"……接近九里十八寨的范围，我们的行动就得更加轻捷、迅速，无声无息，为了保证战斗胜利，我们决定全体同志都脱下鞋子，打赤脚走。在冰天雪地里赤脚走路，这种滋味是非常不好受的，何况我们全身穿的又这么单薄。申功臣走到同志们中间，压低声音鼓动大家说：

"同志们，今夜的战斗是为了咱们的穷弟兄，要是暴露了目标，不但战斗任务完不成，穷弟兄们又要死一层。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无敌的，脱下鞋子前进！"

同志们迅速地脱下鞋子。行军走热了的脚板，猛然踩在冰雪上，寒冷直钻心，全身的肌肉顿时紧缩，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没有一个人吭声，更没有一个人畏惧。深夜十一点钟，我们接近了总寨香炉寺。

香炉寺是团总陈治忠的老窝，寨墙高大，岗哨密布。墙垛上的油灯既多又大，把四周照得通红。离发起攻势的时间还有个把钟头，我们只好静静地趴在雪地上，不敢咳嗽，不能动弹，任凭寒风吹扫，雪花撒落在脸上，手上和光溜溜

的脚上；浑身都冻麻木了，手脚开始不听指挥了。但是，冻僵了的手指仍然紧握着枪，同志们在严密地监视着寨子。

好容易熬到十一点多钟，我对同志们说：

“时间快到了，大家把手揣在怀里暖一暖，两个人脚对脚地活动一下，注意不要弄出响声。”

十二点钟，寨墙上出现了一个人影，接着，又见他划着了火柴。同志们看到信号，浑身的寒冷骤然消失，从雪窝里爬起来，挺身冲向寨门。

寨门已经打开。龚老甲长一把扯住申功臣，扭头向着总炮楼走去。罗厚福和顾士宾带领战士跟上去。其他的同志分别在寨门附近散开隐蔽。

敌人正在忙着准备过大年。老远的就听见喧笑声和洗牌声。陈治忠正坐在总碉堡上打麻将，同志们的盒子枪已经对准了他的脑门子，当他还来不及想到这个意外的遭遇，就被我们提溜了出来。

寨子里爆发了激烈的枪声。民团看到总碉堡燃起了熊熊大火，立刻吓掉了魂，慌慌张张地从寨墙上往下跳，多半跌死、跌伤在墙下。

群众看到我们打了胜仗，急忙有次序地冲进寨子，把陈家的米、面、布等东西，挑起来就往外走。我们离开寨子时，寨子内外被冲天的火柱耀得通红；所有的碉堡都被烧毁了。

打下香炉寺，吓垮了其他的寨子，地主、豪绅和保长们有的逃跑了，有的找我们接头，拜年送礼，并且保证以后按时缴纳红军粮。我们经过他们的寨子时，民团保丁再也不敢打枪了。这一带的活动开展了，群众给我们积极支援，送

情报，运粮食。

敌人吃尽了苦头，领教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厉害。国民党为了坚决消灭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又派来了云贵部队一〇二、一〇三两个师，分驻河口、七里坪。

云贵部队来后，配合地方上的反动武装民团，加修碉堡炮楼，把各条公路都组织成封锁线，以最大的兵力搜山，同时组织了许多便衣侦察队，探山沟、钻山洞，在冰天雪地里监视我们的行动。

由于敌人的“驻剿”、封锁，再加上饥寒交迫，无法开展工作，道委、特委的工作人员、便衣队、游击队、跑反的群众纷纷向山上聚来。这是最艰苦、最难忍受的时刻，雪山上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衣服，没有粮食，连仅有的几根火柴也用完了，火，被断绝了！……

天黑后，我检查了哨位回来，处处碰到面黄肌瘦的脸，骨瘦如柴的人架子。有的躺在石头上；有的缩成一团，坐在避风的角落里。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怨言，每个同志都紧握着手中的武器，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严寒、饥饿及死亡搏斗。我心里很沉重，也很痛苦。独立团被封锁在大小鸡笼山上，我们被封锁在这里。山顶上、山坡里、山下都是碉堡和炮楼，住着敌人的正规军；就连村子里贫苦的群众家里，都住上了民团、情报员……。三百多人，有伤病员，有群众，还有年老的王书记，能眼看着他们饿死？不，不能。红二十五军走时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要保留革命种子，向困难作斗争，向敌人争生存！……我很快地走进了张家胜住的石洞里，对他说：

“你们在山上各方面照顾一下。我带便衣一、三队出去活动，看看敌人的动静，想办法搞一些粮食回来。”

刚刚下得山来，就遭到敌人的阻击。我们边打边走，经过两昼夜的辗转战斗，在黄陂站总算搞到一部分粮食。不料回来的时候，却进不了山。在前有堵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打着走进了茅草尖。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上来，我们就在山上和他们转磨。天黑后，敌人才收兵。张家胜听到一天的枪声，知道是我们回来了，派便衣二队的施大安从河沟里找来，在罐子寨上碰上我们。

一见到张家胜，从他的脸色上，我就感到一定出了问题。果然，他告诉我说，就在我们走的那天晚上，关楚印同志回来了，他看到道委书记王福明、从前的道苏维埃主席詹以景这般大的年纪，在山里冻饿得太厉害，就把他们带到和我们有联系的炮楼里隐蔽。昨天，关楚印突然回来说，王书记在炮楼里被敌人发觉，捉起来押送到经扶县城去了。可能情况有变化，这两天敌人搜山更紧张，所以我们回来一时进不了山。

正在谈话之间，经扶便衣队的肖金发、窦明基来报告：“王书记被敌人打得要死。詹以景带着敌人，把过去红四方面军隐藏的枪支起了一千多条，武汉来了很多的汽车拖，并且还在继续起枪……”

我们立即叫他们回去，注意了解情况和敌人的动静，随时来汇报。

当夜刘名榜赶来汇报说：“王书记被敌人打的昏过去，到现在还不能说话。詹以景确定是叛变啦，他领着敌人，不

但起了很多的枪弹，至今还在红安三区三冲门、建筑河等地起了很多的银洋和银子。敌人二十五路兵团的一个团、武汉行营一个团和一〇二、一〇三师各一个营，在这一带山上漫山遍野地争着挖财宝。”他缓了口气，接着说：“叛徒詹以景把三区的地下党组织全部破坏了。群众除了被扣押的，全都逃上山啦。王书记又被敌人带到罗田县‘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

不几天，红安县委副书记郑维忠来汇报：在这一星期内，叛徒詹以景把红四方面军保存在三区一带的枪支、子弹、金银全部出卖给敌人。敌人仍把詹以景留在三区内谭树岗的炮楼上，不知还有什么企图。詹以景的家属都受到国民党的优待……王书记的被捕，特别是詹以景的叛变，对群众的震动很大，大部分群众害怕和动摇。请特委布置今后工作。

我立即召集同志们共同研究，决定把仅有的一点钱全部交给郑维忠带回去，照顾王书记的牢饭和牢内用钱，供给被押群众的牢饭，以及上山群众的暂时生活。

便衣队出外侦察时，带回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一张传单：“鄂东北地区的共匪头子王福明已被国军捉住。詹以景在被俘后有很大的贡献。我军在各地驻剿军队一定要更加严密地封锁，继续剿清残匪。……”

敌人自以为捉去了道委书记王福明，共产党失去了头脑算是完啦。因此更加紧封锁山区。我们的行动也就更加困难了。

我和张家胜坐在石洞里，默默无言，两个人的心情是同

样的沉重。许久，他才说：

“我想，詹以景叛变，他只能把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武器、财产出卖；地下党的关系，他仅知道红安三区，已经出卖给敌人了。其他的地方他不知道，再想破坏也很困难。……不过，无人区越缩越小，敌人越围越紧，空空的雪山上有三百多人，能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地饿死吗？……唉，徐诚基把部队带走半年啦，连个信都不给我们……”他说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起来。

我心里也很难过，不由得落下了眼泪。上面失去了领导，下面有几百人奄奄一息，怎能不使人痛苦呢？哭，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对他说：

“张家胜同志，我们虽然头去了领导，也一定要完成红二十五军给我们的指示，要生存下去。现在山里还有一些人和枪，不能等着饿死，可以组织一支力量打出去，你看怎么样？我想，今天把在山上的干部召集起来，大家开会研究一下。”

同志们个个面黄肌瘦，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蹲在一旁。我首先谈了一下当前的形势和情况，然后提出：

“我有两点意见，请同志们考虑研究，这不是特委的决定。第一，在河口的特务一营罗厚福、王耀松同志没有来，为了生存下去，保留革命种子，我的意见是把便衣队、能动的伤病员、愿意参加的群众，共同组织一个特务二营，拉出去打游击，看能否带动敌人，使山区轻松一下，并想办法解决粮食问题；第二，王书记被捕，我们虽然失去了领导，但还有其他的同志。王书记的秘书罗作范同志对各方面的关系较

熟悉，接待关系仍由他暂时负责，和张家胜同志一起行动，照顾山上的事情。环境稍有好转时，再设法组织领导机关。……”

这两点意见在会上通过了，并决定特务二营由易元鳌任营长，洪益万任政委。

经过一天的组织，便衣队除了留下少数人坚持原地工作外，特务二营共有七、八十人。第三天，我带领着这支新组成的战斗部队，从高庙出发到罗四区，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打进了大小鸡笼山，找到了独立团。

我和吴光陆、郑定国、独立团张政委、团长熊拐子、副团长梁从学交换了情况，确定独立团过铁路到孝感，打三里村何宾玉的民团，然后从黄陂转一个大圈子，回大小鸡笼山。途中碰上特务一营，可以配合行动，目的是牵制敌人，给山区解围。另外，我和易元鳌过路西，找秘密联络点，想办法和上级党取得联系。

我和特务二营穿过铁路，上了中王山，在秘密联络点找到了区委书记张前炳。据他所谈，河南到湖北和信阳进山区的门户——谭家河，敌人有一个民团把守着，对来往行人检查得十分严密，就是党中央派来交通，也很难闯过这道关口。如果能把谭家河的三十多条枪打掉，很快可能有交通过来。

我和特务二营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谭家河又是处在两省交界岭上的要口，地势非常险要，硬打又不行。但是，为了更快地争取党中央的领导，接受党中央的指示，这一仗我们非打不可。决定由地下党负责情报，区委的便衣

队带着特务二营的几个战士，化装成卖柴草的混进谭家河去。

当夜，地下党的同志全部动员起来了，忙着收集情报，帮助特务二营的同志们隐蔽、化装和准备柴草。第二天上午，地下党两个同志送来了许多油果、块块糖、当地特有的一种圆篓箩，和一身穷家孩子穿的破衣衫。十七、八岁的营政委洪益万忙着穿上这套衣服，把篓箩上的带子熟练地往脖子上一挂，左手扶住篓箩，右手把那些油果和块块糖摆得整整齐齐，转身向山下走去。大个子营长易元鳌三步并两步赶上去，粗声大气地说道：

"小政委，进去可要探准。只要你发出暗号，我们立刻赶上接应。"

洪益万来到谭家河寨门时，哨兵正在盘查挑着柴草的两个同志。洪益万瞅定机会，就象调皮捣蛋的孩子一样，头一低，身子一磨，从哨兵背后贴着墙边轻巧地走进了寨门。当哨兵发现时，他已在大街上做买卖了，高喊着："油果！热油果！"转眼消失在赶集的人丛中。

洪益万挂着个圆篓箩，一会儿卖油果，一会儿卖块块糖，游荡在喧嚷的闹市和僻静的角落。他刚走近一所较好的院落附近，就挨了哨兵两脚，被赶跑了；然而，他已经知道这里就是民团的队部。寨子里的地形和敌人分布的情况，就这样收在了他的眼中。他一面转游，一面分别和化装进来的同志碰了头，分配了任务。

午后，估计同志们已经分别监视住四个寨门，洪益万来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掷掉圆篓箩，伸手从腰中掏出盒子

枪，“当当当!”对空打了三枪。刹时间，监视四门的同志们挺身而出，打掉了哨兵；大个子营长易元鳌早已率部赶至寨前，由化了装的同志们带路，分头向敌人攻去；其中的一路径直插向民团的队部。战士们就象赶猪捉鸡一样，俘虏了民团的兵丁。

很短的时间里结束了战斗。部队打扫了战场，休息吃饭，而后押着俘虏离开谭家河，转移到路口的小湾子里等待交通过来。我布置了岗哨，要他们密切注意来往行人，发现可疑的人，立即送来见我。

当夜，果然有一个人挑着一担木耳向路口走来。哨兵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回答说是“贩卖木耳的”；又问他到哪里去，回答说是上中王山。哨兵深觉可疑，马上把他送到我休息的地方。他听得哨兵喊我“何副书记”，便问道：

“你们是红军吗？”

“我们是红军。你从哪里来？”

“从信阳卖票房里来。”

他说出了暗号，正是红二十五军的交通！我立即集合部队，回到中王山许家冲宿营。

我告诉他，我是特委第一副书记何耀榜，并且说：

“我是罗山天竹寺游击队。”

他听我答对了暗语，非常热情，急忙说：

“我来了十几天啦，就是谭家河的口子过不来。一听说谭家河被打掉啦，就知道是你们来接信的，马上赶来，果真碰上了你。我来时，吴政委说一定要把信送到特委，答对暗号才给信。”

他说着，整筐的木耳也不要了，往地上一倒，抽出两张垫木耳的草纸给我。我知道这是秘密信，立即叫传令兵找来一个铁锅，底下烧着火，把草纸放在干干净净的锅里一烤，一个个的字迹显现出来。信写得很长，主要的意思是：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觉察到鄂东北的情况变化很大，希望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信中最后写道："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创造了新苏区，估计敌人也要'清剿'，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返回鄂豫皖，希望你们继续坚持，红二十五军原来的指示不变。你们接到信后，立即写一份汇报给交通带回。"

我们当即写了汇报：

吴政委、徐军长和各位首长：

红二十五军走时给我们的指示，我们有决心完成。你们走后月余，我们整编了近千人的一个独立团，由徐诚基、方永乐同志带去皖西找高敬亭同志，至今没有见到回信。同年十月又组织了罗山独立团、特务一营，共三、四百人。一九三五年二月，王福明书记被捕，詹以景叛变，在外有敌人"驻剿"，内有叛徒破坏的情况下，山区极为困难，再加失去了领导，更感到困难万分。为了打击敌人，给山区解围，又将山里的便衣队、伤病号、跑反的群众整编成特务二营，为机动部队，共七、八十人。因而山区在逐渐解围。我现带特务二营到路西布置地方工作。……

第二章　反“地补哨”

九　东边来了大红军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知道东边来了大红军，估计可能是徐诚基同志返回来啦。我当即赶到仰天锅，和张家胜汇合。要张家胜、关楚印带领便衣队到光山县区内去接应。临走时，我对张家胜说：

“徐诚基同志不知道一〇二、一〇三师到了鄂东北，更不知道云贵部队的战斗力。他们想进罗山四区是很困难的，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接到时，你们同到大小鸡笼山跟我汇合；接不到，也要通知我，我好带特务二营再去接。”

一夜之间，我越过汉罗公路，到达铁丝岗，见到便衣队九分队王定堂，要他立即布置便衣队和基本群众到弯家店、三义店、定远店，以赶集做掩护，了解敌人的动静和枪声的响处。

下午五点来钟，赶集的人纷纷回来了，一致说：镇子上的民团都集合走啦，说东边来了大红军。潢鹰湖和董家墩之间的枪声最激烈。

消息证实了。除叫王定堂设法准备粮食外，我立即出发。经过长岭岗，刚走到何家冲的村头，迎面碰上了哨兵。

“从哪里来的？”

“从罗、孝、陂、信、应特委会来的。”

哨兵听了我的回答，转身走进一所院子。不一会，方永乐同志出来了。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引我走进他的破房子里说：

“你知道吗？军政委也来啦！”

“啊，军政委来啦？我去看看他。”

“军政委在睡觉。他在打脾寒（疟疾）。……”

我看他没有提起徐诚基来，就问：“徐诚基同志来了吗？”

这一问，不料却引起了方永乐一番长谈。原来，徐诚基和他带独立团出发时，全团近千条枪，经过几次残酷的战斗，在敌人的围击、堵击、追击之下，伤亡很大。他们在商城周转了一个时期，终于和高敬亭同志汇合。这时全团还有六、七百人。汇合后，徐诚基虽然向高敬亭传达了红二十五军的指示，但他却说：“鄂东北红二十五军管的到，我们仍然住皖西北。”不久，独立团就被整编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太湖凉亭正式重建红二十八军，共一千三百多人，内设八十二师，以后又陆续组织了几个游击师。红二十八军自宣布重建之后，敌人的“追剿”日日紧逼，在大化坪一战中极为危急，伤亡较大，加上冰天雪地，部队的给养、弹药没有补充，士气不高，又经过几次战斗，部队人数显著下降。高敬亭看到这样下去困难更会增加，决定

把徐诚基放在皖西北任道委书记，创造根据地。又经过几度整编，高敬亭兼任红二十八军的政治委员，并决定来鄂东北，然后去追红二十五军……。

最后，方永乐说："我听一些同志说，你们又组织了一些部队？他这次过来，目的是想去追红二十五军。一进来听说你们有这样多的军队，他就叫吴光陆副书记通知军队来这里集合。罗山独立团和两个特务营都已经来了。部队，他已决定编入红二十八军；你，他也想带走。他说，你当八十二师的政委，叫我当师长。"

"一切为了党，服从上级。他是鄂豫皖省的苏维埃主席，看他怎样决定吧。"

军政委高敬亭正坐在黑布台子上，看到我们来了，站起来和我握手说：

"何团长来了！"——我在红二十五军时曾任过团长。他稍停了一下，问道："你们这些部队什么时候组织起来的？共有多少人？"

"独立团和两个特务营共有七、八百人。特务一营组织的比较早一点；独立团组织起来只有几个月；特务二营组织起来才二十多天。"

"部队都来啦，你知道吗？"

"不知道。"

"是这样，我要过路西去，部队配合我们行动，你有意见吗？"

"上级来了要编部队，这是党的力量，我没有意见。不过我有一个要求，特务一、二营多半是便衣队的同志，如果

把这两个部队编走了，今后地方工作就会产生许多困难。”他似乎在思考，沉默了很久，我才说出要求：“如果部队不能留，能否留下便衣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呢？”

“你们的队长和指导员都是哪些人呢？”

“特务一、二营的分队长和班长。”

“部队里没有队长和班长，还算个什么队伍？”高敬亭不高兴地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再说。”

我回到方永乐的房子里。不久，他回来说：“军政委已决定把独立团编入八十二师，特务一、二营编入手枪团。”两句话刚刚说完，传令兵又来喊他去开会。

天亮以后，部队集合，高敬亭宣布了整编命令。把勤务员、饲养员和号兵等等不能走的三十多人留下，由原独立团团长熊拐子带回。然后，他们追红二十五军去了。

红二十八军一进到鄂东北，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围击，以响亮的枪声迎着他们，并且跟着追击他们。这时候，我们是既无兵又无将，无法组织力量牵制敌人，帮助他们西进。于是，我们只有利用敌人正规军被带走这个较缓和的时机，把特委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研究工作，稳定同志们的情绪和重建便衣队。

不久又得到消息：红二十八军返回来啦。决定我去接头。到了彭沈店，见到高敬亭，他很客气地招待我吃饭，同我谈了很多问题。然后，我随方永乐去休息，刚走进屋子，他就开始向我叙述他们十天来的经过：红二十八军通过桐柏山，刚到平畈的松树岗，就碰上了红二十五军的一个交通，和他接上了关系。交通说，吴政委根据情况，估计到高

敬亭已过路西，可能是追赶红二十五军，如确实的话，请他赶快返回，因为在这一百八十里路的平畈里，敌人有四川和陕西的正规军八、九个团，想穿过这一带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这一带住长了都有被歼灭的危险。交通还说，和你见面的那个交通已经归队，你们的报告也收到了。吴政委估计你有一部分部队，徐诚基也有几百条枪，高敬亭还可能掌握一部分枪，叫你和徐诚基都去找高敬亭，共同组成鄂豫皖省的领导中心；省委书记要等党中央最后决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当天下午就回头。

第二天早饭后，高敬亭很和气地对我说：

“红二十五军走后已近一年，徐诚基同志和我们汇合后，仍然没有照管鄂东北，所以造成了王福明同志的被捕。这是我应负责任的。你以前的意见，我考虑了一下，要一部分便衣队的同志回去加强地方工作是可以的。不过，已经到手枪团的那就不行了。……”

王书记被捕后，鄂东北的党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我向高敬亭提出，要求上级对鄂东北的组织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高敬亭问：

“部队能在这一带周转两个星期吗？如果能停留，就去通知徐诚基同志过来，我们召开一个较大的会议研究一下。”

我说明敌人的正规军、特别是云贵部队，战斗力较强，在这里住长了，和他们打硬仗是很困难的。再说，这里也没有粮食。高敬亭立即叫方永乐把过去在苏维埃工作过的同志，挑选一部分出来，由我带回去。而后对我说：

“道委的秘书罗作范对各方面的工作较熟，暂时还叫他负责和各地的联络工作。特委和各县委都不动，鄂东北地区的工作仍以特委为中心，各种秘密联络番号继续由你负责。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鄂豫皖省的组织作出最后决定。我还要到皖西北去一趟，两个月后带徐诚基同志过来开会，共同研究今后的工作，同时等上级的指示。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有时可以到路西去，经常注意上级的指示；如果上级派人来或有信时，你们不要硬送，等我过来再说。……”

正在谈话的时候，方永乐赶来说：

“根据便衣队的汇报，敌人一〇三师向我们运动来了，二十五路兵团的一个团也追来啦，两路很可能马上打响。”

中午时分，清脆的枪声叫了起来，敌人果然和我们打响了。

高敬亭说：“我们马上要转移。今后的工作就这样决定了。不过，我要求你们最好再组织一个独立团，好配合你们的行动。……”

说着，我们走出院子，方永乐忙着去指挥部队，我和高敬亭走上一座山头，四下一望，满眼都是敌人。

高敬亭非常沉着地问：“我对这一带不很熟，你看怎样冲出去？”

各处的敌人都在冲锋，和我军争夺阵地。我想，眼前的敌人只有东北军的部队战斗力较弱，也只有从他头上开刀。就说：

“从前面过河，占领道子湾。那里驻着东北军留守的两个营，战斗力不强，可以打掉。然后再过汉罗公路。”

“好吧，再会！”高敬亭和我一握手，急速追队而去。

我带领十几个人，同时钻进了山林。

我和吴光陆、郑定国同志由大小鸡笼山返回罗山四区，在周家岗召开了一个较大的会议，参加者还有周惠臣、陈明江、陈守信、张家胜、罗作范、卢从局、洪益万、张驼二爷、易元鳌等同志。我传达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的指示，决定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把道委、特委的警卫队和一部分轻彩号，再动员一部分跑反的群众，组织第三个独立团，仍由熊拐子任团长，特委少共书记洪益万任政委。各县委的组织不变动，首要的任务是恢复和重建便衣队。

一〇　雨夜打盐

盐，这对于我们被困在深山里的同志们，是多么珍贵呵！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盐。由于长期吃不到盐，同志们一个个身子软绵绵的，无精打采，没有力量。彩号们没有盐水洗擦伤口，伤口好得很慢，甚至有的化脓了。只要能搞到一部分钱，粮食问题还有活动的余地；而盐，当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

正是春夏交接的季节。往年，宣化店的河水一涨，就有许多竹排、船只向宣化店运货，其中一定有盐。宣化店的几家大盐商、民团、区公所，还有敌人一〇三师师部，都是极会图利的，他们绝不会不利用这个时机做盐生意。于是，我带着罗山第二便衣队的申功臣、胡民山和驼二爷，到了罗山一区杨家桥。驼二爷是个老农民，从农民暴动开始，他就一直

在区、乡做革命工作，有五十多岁了，在我们的同志中，他的年纪最大了。我要他装做拾粪老农，混进宣化店城里去探听消息。

天黑后，地下党派人来汇报：后天夜晚，有四排盐要到杨家桥掺米粉子。这项消息很可靠，只是不知道是谁的盐。

下半夜，驼二爷回来说：

“宣化店区公所和民团合做了一批盐生意，是用四个竹排运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

两个消息碰了头，打盐有了希望，我心里很高兴。但是，怎样打呢？打下来又怎样驮运呢？……我不免有些忧虑。杨家桥前后的碉堡犹如蜂窝，虽然杨家桥、施家岗和河对岸的野猪郑家湾三座碉堡和我们有点联系，但离杨家桥不远的胡椒顶住着蔡富明的民团，有七、八十人；大胜关赵吉安的民团有一百多条枪；再加上宣化店的敌军，打起来，敌人四面增援，我们用什么来阻击敌人呢？新组织的独立团已经出发了，附近的便衣队和所有带枪的人能否担任起掩护作用呢？……从四次“围剿”起，敌人就严密地封锁我们，在老苏区内，盐一直是最缺的东西。现在有了这样好的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呵！

“这样多的盐，何副书记，你决定打吗？”驼二爷关切地问道。

“打！没有兵也要打，哪怕缴获一斤盐也是胜利。你去通知张家胜同志，叫他集合便衣队和山上所有带枪的人，再动员一部分可靠的基本群众，准备在后天夜晚到杨家桥来

打盐。”

到了约定的时间，张家胜来到杨家桥附近指定的地点。敌我的力量是太悬殊了，我告诉张家胜说，这次打盐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七条长枪、二十多条短枪，便衣队、干部和群众总共二百多人，而敌人光是附近碉堡上的民团就是几百人，何况杨家桥离宣化店只有八里路，敌人的援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赶到。接着，我加重语气说：

“你们要利用明天一天的时间，好好组织群众，使他们不但行动要迅速，还要听从指挥，一发现情况立即上山。部队的布置：便衣一队负责大胜关的哨位，并监视宣化店的敌人；便衣二队负责胡椒顶的哨位。驼二爷负责和各碉堡上的联系。总起来由你指挥。我带三队和干部、群众去河上驮盐。明天的集合地点临时通知。”

一天的闷热使人难以忍受。傍晚时，突然吹起凉爽的北风，随着风势加剧，北边的天空腾起了层层乌云。我心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在大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通知晚九点钟在董家凹集合。

两百多人借着风雨之威，拥出山沟，通过杨家桥饭店门口，笔直地走向河边，奔上盐排。

竹排上没有国民党的士兵，也没有民团。盐排上几个苦力工人，看到这许多人，可能已经猜到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他们并不惊慌，也不喊叫，在我们的劝说下，动手给我们帮忙。

雷声隆隆，大雨倾盆，狂风呼啸。闪电中，只见人们扛着两百多斤的湿盐包，来往奔腾在河岸和魏家冲之间。

我背了一趟盐回来，到盐排上巡视一番，看到堆如山头的盐包，心想，这么多的盐怎能驮的完呢？驮不完，难道留给敌人运走吗？不行，这办不到。于是，我大声喊起来：

“工人同志们！你们知道，敌人用盐来剥削我们，喝我们穷人的血，已经不是一天一年啦！今天的盐驮不完，也不能再让敌人运走。工人同志们，请你们帮个忙，把盐掀到河里头！最后，你们每人留五包，作为你们的劳动报酬。”

我的话声刚一落音，阶级弟兄们就把两百多斤重的大盐包，象耍鸡蛋似地掀滚到激流中。

“何指导员！何指导员！”

听到有人喊，我停下手中正在掀动的盐包，扭过头来，穿过黑暗的雨帘仔细看去，原来是二位保长。

“嗯，你们怎么也来了？”

杨家桥的马保长靠近我，没有必要的压低声音说：

“岗哨，我们都布置好啦。今天这样大的雨，民团是不会发觉的。不过，这样多的盐一下子驮不完呀！何指导员，用不用我们帮忙呢？”

我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来意。盐在这一带地区实在是太困难了，现在把这样多的好淮盐掀到河里，当然心痛。因此，我向他们讲条件说：

“马保长，这样多的盐掀到河里，实在可惜，你们保丁和附近村子里的人都可以来驮。但是有一个条件：驮盐中不能发生任何问题，出了问题由你们两个保长负责。”

“是，是，绝对负责。我左右不离开您，出了事情，请您先打死我。”马保长扭过头说：“施保长，你听到吗？何指导

员开恩啦，驮了盐算我们自己的。快，快，你快去叫他们呀！”

骤雨下个不停。人们越来越多。有的把盐驮到魏家冲，有的直接背上山，直闹腾到下半夜。看看天已不早，我发出命令：

“凡到河上来的人，每人留下一包自己驮以外，大家齐动手，把剩下的盐包都掀下河去，一点也不给敌人留下。”回过头来，我对身旁的马保长说：“你们这里不能不现目标。你马上集合保丁返回碉堡，向河上打枪。不然的话，你们这一带有被破坏的可能。”他刚一抬步，我又想起一件事，忙叫住他说：“马保长，盐只运到魏家冲，大部分还没有运到山上。你们要特别注意转移民团增援的方向，必要时把他们拉走。如果大胜关和胡椒顶的民团同时出动，你们就诱使他们打响后，再悄悄地抽回碉堡，叫他们自己去碰头。”

我们二百多人，正在把盐向无人的山区转运时，清脆的枪声响起了。

稀疏的枪声变成密集的枪声。马保长要他的保丁们在碉堡上向河道的上空和胡椒顶、大胜关方向射击。

大胜关、胡椒顶听到杨家桥的枪声，两下的民团都冒雨出来接应。他们同时向着同一地区合击，黑暗中，两处的民团相互打了起来。马保长听见枪声已经碰了头，立刻把他的保丁撤出火线，回守碉堡。胡椒顶和大胜关的民团仍然激烈地战斗着。黎明时，宣化店一〇三师的一个团赶到战场，三头相聚，直打到大天明，才发觉半夜的苦战却是一场自相残杀。

三处收了兵，怨恨纷纷，同时告状。大胜关告胡椒顶的蔡富明“私自通共”，向共产党缴纳公粮，所以在战斗中故意打伤民团三十余人；胡椒顶告大胜关赵吉安以亲戚关系和何耀榜订有暗约，也是“私自通共”，又以势大欺压弱小者，所以造成民团死伤二十多人；而一〇三师却大骂两处民团混蛋。

这一场官司实在是打的热闹，从区里打到县里，从县里直打到省城。不管他们的官司打得怎么没结没了，而我们的盐却是安安全全地转运到大山上了。

看着数不清的盐包，人们的心里高兴极了，不由得用手捏着一粒粒的大淮盐放在嘴里。盐在口中散发着美味，我好象生平第一次吃到这样好的盐一样。

张家胜手里拿着盐，嘴里吃着盐，兴高采烈地说：

“何副书记，这样多的盐，怎样分配呢？”

这一问，立刻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紧张的现实中，打下了这样多的盐，敌人岂肯善罢甘休！会不会来报复？如果真的来搜山，这些盐放在什么地方呢？……我看了看那堆可爱的盐包，告诉张家胜：把山上的盐尽量分散和设法埋藏隐蔽起来；凡是参加驮盐的群众，和驮回去的盐，也一定要隐蔽好。打盐的事情不能走漏一点消息，这些动员工作由各地的便衣队负责。

估计盐隐蔽的差不多时，我对张家胜、驼二爷说：

“罗山的工作仍由你们负责，我要到各地去了解情况。如果其他地区有信来时，叫他们在罗山一区或者仙居顶等我。”

当夜，我带便衣一队转移到刘家冲沟北湾刘清翼家。

“你想的真周到呀，还给我们送来这样多的盐。”刘清翼带着感激的心情说。在屋里坐下以后，他还在高兴地说着：“何指导员，这批淮盐货色真好。我几个月来都没有看到淮盐啦，这两天可真狠狠地吃了几顿。……”

往常，刘清翼每次看到我，总是先谈情况后说杂事，今天他兴奋得改变了老规律，絮絮叨叨没个完。我急于想了解情况，便截断他说：

“清翼，打盐的风声很大，听到敌人有什么动静吗？”

“你们打盐是真有胆量呀！何指导员，你们知道这盐是谁的？是一〇三师和区公所合办的！你们能打掉这个盐，可真正是不简单呀！……”

他罗哩罗嗦的说着话，手还一股劲地抓头皮。我看他简直被盐给迷住啦，开口闭口总是不离盐，又重复问了一遍：

“你到宣化店去了没有？那里有什么清况吗？”

刘清翼这才慢慢地镇静下来，想了想说：

“宣化店又增加了军队。一〇三师别动队的便衣天天在这一条河内跑来跑去。”

打盐的震动，引起了敌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加上敌人又增加了兵力，估计敌人可能有新的措施和布置。因此，我要刘清翼到宣化店去一趟，通过刘海前了解一下确实的情况。

第二天一清早，刘清翼来到宣化店，先买了点日用东西，然后蹓跶到刘海前家。刘海前正在柜台上，一见刘清

翼，二话不说，拖着他就向楼上走。关上房门，刘海前喘着气问：

“老四到河沟里来了没有？”

这一句问的突然，刘清翼摸不清头脑，就一口咬定说：

“大爷，你还不知道？我是个老实人，胆又小，从来不敢管闲事。你老人家要是说何老四他们，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傻孩子，你要是知道，告诉我又怕什么？”老头子着急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忽而停步说：“这次打盐，别人不敢去，别人也不会知道这样清楚，更不会知道民团内部的纠纷，这定是老四这个冒失鬼。你要知道，这许多盐，光成本得多少钱呀！再说，就是他们驮点去吃，也不应当都驮光呀！”

为了激他说出敌人的新布置，刘清翼故意装做不相信的样子说：

“大爷，你糊涂啦，共产党有多少人，一会儿的功夫能驮走那么多盐？”刘清翼摇了摇头。他心里也知道敌人内部正在鬼打架。“依我看，一定是他们自己搞的鬼。不然的话，盐都打了四、五天啦，他们还没有一点动静。要是别人搞掉了他们的盐，早就该闹腾起来啦！”

“你们这些孩子知道什么！他们这几天到处看地形，准备修碉堡、装电话，还打算把卡防山给围起来。这次国民党的决心很大，所有押修碉堡的都是一〇三师。等他们用碉堡线把各座山都包围起来，只怕共产党以后再不能出头。”

“大爷，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陈又文先生讲的，”刘海前站在古老的书柜旁，又

在摆弄他的水烟袋，显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说下去。“昨天，一〇三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在一个星期后全面动工，两个星期就要完工。一〇三师用两个团专门押修。”

“大爷，你老人家别听他们的鬼话。这几座山占几个县的地面，两个星期，就是二十个星期也修不起来。用两个团押修也不行，就是用二百个团，恐怕也只能压住人，木料、砖瓦可不是一天半会就能造得出来呀！”

刘海前有些不耐烦了：“咳，真笨！你想，木料他还会到山上去砍？还不是用商人的！砖瓦你怕他们还现烧？他们已经决定：命令各姓拆祠堂。要什么，就从武汉、信阳去运来，还说这是南京国民政府下的命令。……”

“国民党这样对付山区，我们以后怎样生活呢？……”刘清翼忽然想起，刘海前在山里砍了一批木料，至今还堆在那里，没有运出来，就装做耽心的样子问刘海前：“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修，要是我们住的那条沟不修的话，我们还可以替你把山里那批木料隐藏起来，如果这一带都修，那可难保得住呀。”

“这个，我已经和陈又文先生做了协商。准备把山里山外所有的木料都卖给国军，并决定点货交钱。你回去告诉你八爷，这次国军的命令很厉害，叫他少管闲事。国军把所有的碉堡修起来后，还要把山区的老百姓都移出来。这是一件大事，叫他早一点作准备。你们也要准备一下。”他又以家族长者的口气吩咐说：“你先回去。这个消息只能告诉你八爷。有什么事情你再来告诉我。”

刘清翼回到石洞里来，天还没有黑，他把刘海前说的

话全部告诉我。刘海前是一个道地的反革命，他捎话给刘老八的意思，是暗示共产党快要完了，不要再交红军粮……。

“清翼，你注意刘海前山里的木料，尽量给他拖延时间，或者根本不给他运出去。以后自有办法对付他。”

我嘱咐了刘清翼后，在天黑的时候，转移到后坳甘允功保长的家里。

甘保长从内室中拿出一张地图，展在我的面前，解释说：

“联保开了紧急会议，要我们按照地图上指定的地点供给砖瓦木料……”

我听到所有的情况都相符，证明敌人有了新布置，而我们也必须采取新的对策。我对身旁的胡民山说：

“你马上到父子岭通知张家胜，叫他们今夜赶到柳树店朱保长家同我汇合。”

张家胜赶到朱保长家里，一见我就说：

“情况有变化，我正要找你。”

“先谈一下你了解的情况吧。”

张家胜汇报说：林让山、胡华山、朱聘山三个反动头子都已经回到罗四区，配合混成旅押修这一带的碉堡，下星期就要完成。宣化店的一〇三师押修罗一区和四区，同样要在下星期完成。东北军的十师驻九柳林、铁铺、三里沈。修碉堡期间，哪个联保发现共产党的活动，就杀那个联保主任和保长。碉堡修好之后，就进行倒林，还可能配合移民。

根据初步情况证明，敌人的新政策是：首先在原有的碉

堡点之间，加修碉堡，组成碉堡线。线与线之间，联接和穿插起来，织成碉堡网，敌人着重加修了黄陂站——苏家河九十多里的碉堡线，在山沟里新修了胡家河——刘家冲沟二十里路；郭家河——老爷湾二十五里路；老爷湾——古家店——大竹园二十多里路三条碉堡线，把我们的根据地分割为四块。配合着地补哨、堵路口、设卡子，断绝交通；然后再倒林移民，企图把我们困死和消灭在碉堡网中！

针对着敌人的新布置，我提出几点意见，作为我们的新对策：首先是拖延敌人修碉堡的时间，办法是发动群众，烧毁敌人的砖瓦、木料等建筑材料，破坏锄头、铁锹等工具，或者把工具隐藏起来。敌人强迫群众修碉堡，群众可以拖延、逃避甚至抗拒；敌人就是从外地调人来修，一来没有材料，二来没有工具，还是修不起来。其次，凡是和我们有关系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叫他们以假积极的面目，都去参加修碉堡，以便将来碉堡修好后，正规军走时，他们可以争取看守炮楼，把敌人的炮楼变成我们的隐蔽地和秘密联络点。再次，敌人修起碉堡以后，就要砍山、烧山、移民。从现在开始，就要动员群众把粮食埋藏在山里，以防敌人倒林移民之后，伤病员和群众在山上有被饿死的可能。

我最后说："估计敌人的新政策不会只是一山一地，可能范围较广。我想到仙居顶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那里的环境不太紧张，就把特委的领导中心转移过去；如果那边同样紧张，就证明敌人的新政策是对待整个的鄂豫皖苏区，我也好及时通知各县委，叫同志们早做准备。"

一一　五约山会议

离开柳树店，一进丁家榜，迎头就碰上了地补哨。站哨的人都是附近村上的，认识我。其中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从今天起，都要实行地补哨，每个哨位都是由甲长带班。

“何指导员，你想出去，最好等甲长来，不然怕出事情……”

正在谈话，丁甲长走来问：

“何指导员，你想出去呀？”

“今夜要出这条沟，你们有办法把我送出去吗？”

丁甲长靠近我，低声地说：

“这一带放地补哨的不单是我们，还有一〇三师的别动队。他们不但监督你们，也监督我们，被他们发觉就不好办了。这一条沟共有三个保，甲长和甲长之间都有联系，你先等一下，我去告诉前边的余甲长，然后再叫他一站转一站地送你出去。不过是这样，你，我们都熟，如果是生人来，请你早通知一声，我们好作准备。”

我经过河南和湖北交界的黄家榜、河口县、黄陂站……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环境都很紧张，敌人正在到处烧山、修碉堡。这天晚上，我和申功臣，还有外号叫做“侉子”的钱运华来到黄陂站北岗路口上的秘密联络点——一家烟铺，发觉情况越来越严重，附近所有的村镇都放了地补哨，我们进来的时候，可能被人看见了。在这个联保地区，只有这个唯一的联络点，如果因为我们的行迹而遭受破坏，以后的行动及和仙居顶的联系都必将更加困难。为了保存

这个联络点，只有打出去。我把同志们叫到一边说：“我们可能已经露了目标，只有公开地走出去……”我随即布置了行动计划。

黑夜，我们上了大路，钱侉子走在最前面。

“谁？”地补哨上发问。

“查哨的!”

钱侉子嘴里说着，快步奔向哨位。哨上的人正睁大眼睛，极力想看清是谁，钱侉子已经扑了上去，把他按在地上。我们急步赶到，用手巾塞在他嘴里，用绳子捆起来，放在道旁。这时，钱侉子弯腰拿起大锣，“咣！咣!”使劲地敲打着，撒腿向公路上跑去。我紧紧跟在他后面，边跑边喊：

“呵！——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

锣一响，我一喊，附近村镇上的保丁和群众，打着呼哨，也高声喊着：“呵！——共产党来了！……”从四面八方蜂拥上了公路。

最前边的几个保丁，气势汹汹地跑过来问道：

“共产党往哪里去啦？”

“到南边去啦!”

那几个家伙顺着我的手势，低着脑袋拚命追去。

大队人马从后边赶来：“共产党到哪里去啦？”

“到大肖家湾去啦!”

吼叫着的人群，随着我们直奔大肖家湾。刚到村头，反动透顶的肖保长带着一伙子保丁，迎上来问：

“向哪里去啦？”

一见送死的来啦，我对钱侉子、申功臣发出警号，大喊：

“肖保长！”手起枪响，把他结果了。趁着保丁们惊慌四散，我们飞一般地向黄陂站南边的公路上跑去。

钱侉子使劲敲打着破锣，我仍然高喊着。沿着公路跑了四、五里路，锣声、吼声此起彼落，各个炮楼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深沉的黑夜沸腾了。保长、保丁、群众混合在一起，真象是一锅烂粥，糊糊涂涂，东奔西流。谁也摸不清真正的共产党在哪儿。

看看时机已经成熟，我扯了把身旁的大个子申功臣，轻声说道：

“你过公路，到河对岸的钱家楼村东打几枪，把目标转移过去。我们到西边的山坡上去等你。”

申功臣穿过杂乱的人丛，渡过大河，直向钱家楼跑去。他站在钱家楼村东头，朝天打了几枪。人们听到东边有枪声，只当共产党在东边，便象山洪一样滚滚东去。

公路上的人渐渐稀少。钱侉子那面破锣，早已不知丢在何处。我们岔道向西山走去。

不一会儿，申功臣摸回来了。我们便悄悄地越过山头，爬上另一座大山。夜色更浓，凉风习习，我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疲劳地坐在山头上休息。隐隐约约地从汉罗公路两旁传来人群的喧闹声和枪声；敌人可能把所有的力量都拉出来啦！

云夜变成了雨夜。我们这才从山头上向下爬去。天黑路滑，常常跌跤，有的同志过悬岩时跌伤了，有的同志被荆棘扎得鲜血直流。终于，我们在仙居顶半山坡上的高山唐村，和吴光陆等同志汇合了。

吴光陆告诉我，东北军、一〇二、一〇三师各有一个团，同时进驻中王山，除修筑碉堡外，把山上所有的树木都砍光、烧光了。大小鸡笼山全部被敌人占据，在上面修了很多碉堡线。平汉线以东的山峰上、山岭上以至路口上，都修上了碉堡，现在又在砍山烧林。重伤员由张家胜同志负责，已经把他们隐蔽到滴水岩一带；轻彩号由林之翰院长带领，到金牛城一带去隐蔽。为了打击敌人修碉堡和烧山，独立团在九里关打了一仗，想进大小鸡笼山，没有成功；又想从信阳以北过路西去活动，一到朱长店，就碰上东北军。独立团政委洪益万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为党光荣牺牲了。熊团长脚上的伤又犯啦，不能行走，现在仍随着部队睡抬子。吴光陆到医院查看彩号时，有一个负伤休彩的团政委陈明江同志，听说部队没有人带领，自报奋勇前去带队。现在独立团暂时由他负责，预定今、明天赶到五约山休息，并等待指示。

我提议趁独立团休息的机会，在五约山上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吴光陆同意后，立即派人分别去通知便衣队队长、指导员以上的干部准时到会。

五约山山势十分险要，林木葱郁。大庙里的和尚跟罗山三区便衣队、陂孝北工委便衣队都有联系。事先我们派人通知了老斋公，发现有情况就急打古钟；没有敌情就叫他打铜磬。

一清早，警卫队和独立团先后来到五约山，隐蔽在古树参天的密林里。我和陈守信、陈明江一同走进庙院里，只见老斋公端端正正地坐在大殿上，闭着双眼，不慌不忙地敲打着小铜磬，嘴巴不出声地微动着。参加会议和担任警戒的

同志们，一个个化装成烧香逛庙的，走进庙院后，立刻把四门严密封锁住，准进不准出。我们就在庙里开始开会。

会议由吴光陆主持。大家一致通过由陈守信代理独立团团长，陈明江代理团政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由吴光陆向同志们作总结报告。他分析了目前的情况：敌人以碉堡、地补哨、倒林三位一体，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和“围剿”，妄想消灭我们。但是，只要鄂豫皖地区的群众死不完，我们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共产党的种子永远不会断绝。反“碉堡”、反“地补哨”，反“倒林”的具体措施，是独立团先打出去，每当敌人出动增援，便衣队就趁空隙烧毁敌人的炮楼和粮草；便衣队同时要配合手枪队，在平汉线两侧阻止敌人的交通；反“地补哨”和分化敌人内部，也是便衣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坚持对敌斗争，必须发展组织，扩大武装力量，首先是发展党员。党员是革命的本钱，有党员就有革命的种子，就能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必须在斗争中考验群众，选出优秀的特别是贫雇农，吸收他们入党。地下党的组织如遭到破坏，便衣队定要去收容他们，然后编入独立团；如有适合在便衣队工作的同志，或由于本人要求，经审查后可以参加便衣队。其次，从秘密党员中的积极分子里面，组织秘密的便衣队，白天插枪务农，夜晚秘密配合便衣队行动。再次，组织好联络网，把同情党的农民组织成农民小组，为我们侦察敌情，购买粮食等等。关于干部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革命觉悟和警惕性，严防变节投敌。刘庆梦的叛变，不但使我们的同志牺牲流血，而且死了很多群众，这是一个血的经验教训……最后，吴光陆说：

“目前，整个的鄂东北没有统一的领导，要统一布置工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目前紧急的情况下，敌人全面地向我们进攻时，我们的某些县、区组织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如河口县委已全部失去了根据地，无法继续坚持，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已经把他们安插在仙居顶隐蔽。类似的情况，不会只限于一县一区。因此，凡是在特委所属的地区内，不管是干部还是便衣队，只要碰到有外县、外区的党组织、地下党、或者是由于敌人的摧残而不能生活的群众，我们都应当尽力地去援助，设法安置隐蔽，而后上报。他们如有经济困难，各地党的组织和便衣队都要尽可能给予帮助。每个同志都要把这件事作为党的任务，必须完成。在思想上应当正确的认识到：全党是一个整体，是统一的，完成一项工作，隐蔽下一个党员、一个群众、都是为了党，促进革命的胜利……”

报告尚未结束，侦察员气喘喘地跑进来说：

“丰家店的民团配合一〇三师一个营的样子，已向山上运动。”

根据情况判断，知道敌人不会允许我们的会议再开下去。我站起来说：

“同志们，敌人连半天会也不让我们开完，又跟上来啦。吴副书记的报告，就是决议，请同志们执行。会议到此结束。团长、政委马上上任，独立团不进入战斗，隐蔽着运动出去。其他同志也分散隐蔽出去。警卫队跟我来，准备进入战斗。掩护同志们和独立团转移。”

天空落下雨点，随之变成倾盆大雨。我们四处站上了岗

哨，监视着敌人的行动。雨越下越大，敌人越爬越近。估计独立团和同志们运动得差不多了，我命令特委警卫队指导员：

“黄陂老，争取主动，边打边退，然后插到南边去。”

敌人随着我们的目标移动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对黄陂老说：

“带警卫队去打九房沟，然后再跟他们转个圈子。我要插下去。”

黄陂老象早已猜透我的用意，高高举起左手，一摇晃，战士们就按照指挥员的意图，向山下冲去。敌人很听指挥地跟随而去。

枪声渐渐向山下转移。我和申功臣从一块大石头旁爬出来，冒着密布的雨柱，转向仙居顶走去。刚走进郑保管属的地区时，碰到便衣三队的同志，他们介绍情况说：

“这一带的群众还是跟以前一样好，可以隐蔽。不过我们所隐蔽的地方，多半在基本群众家里，没有谁敢到保甲长家里去碰。”

这一带的群众从农民暴动时起，一直都是革命的，又经过几个艰苦时期的锻炼，群众会革命到底的。但是保甲长成分较高，最近不知有无变化？我和申功臣商量，要他从便衣三队再选两个同志出来，一同到柳树店朱保长家里去，看看他的态度和表现，如果和以前一样，再试验几家就能成个经验；如果这些家伙变脸的话，也可以和他们干一场。

一二　打“地补哨”

下半夜，我们摸索着走进静悄悄的柳树店，用暗号叫开朱青山的门。

朱保长看到我们来得很晚，也可能对我们的来意猜到了一二，便说：

“天快明啦！你们想上哪里去？依我看，到别处去是不行啦，还是在我家里隐蔽吧。”

“在你家里能隐蔽吗？”

“能隐蔽。不过，我要说明几点，你们考虑。我这里，天一亮就有乡警队、保丁带着国民党的军队来要民伕，要这个要那个，常是一天不断。你们要想在我这里休息，天不明就要上楼，在楼上不能吸烟，不能咳嗽，中午可能吃不上饭。还有一个大问题……”他停住不说啦。

我估计他可能有为难的事情，急问：

“你是害怕，还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不，我不是怕。我的意思是说楼上地方小，人多了大小解不好办。”

“这不要紧，只要有个盆子、桶子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人不多，只有四个。”

他可能是因为人数不多而得到了一点安慰，扭头对他的妻子说：

“贵青，还不快去做饭？天都快亮啦。”施贵青一走，他又对我说：“何指导员，国民党的这些兵简直不是东西，大天白日地打鸡子、打狗子不算，时常到处追赶妇女，不管在什

么地方就……你们可千万要沉住气，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手。你们一现目标，不单我一家是完，这个大村子都招架不了呀！”

“朱保长，你放心好啦。”

天刚蒙蒙亮，乡警队果然带着一〇三师的军队进到村子里，蜂拥到朱保长的门前，口口声声要民工、要铁锨、要锄头等等。保长交不出，他们就带着保长到各家去搜。朱保长走后，我们是有些耽心，不知道他的后果，也很难猜测到他的变化。

一轮搜翻过后，大概是没有找到什么。匪兵们运用老规律，自己动手找。他们到处打鸡子、有的双手抱着抢来的东西就走，有的在行凶，无故吊打农民，三、五成群地追逐妇女……这些难以入目的事情，我们在阁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气得浑身发抖，胸腔都快爆炸了。

申功臣和我利用一个小窗眼在监视敌人，他气得几乎要怒吼起来：

“绝不能让这些畜牲再横行下去，把他们赶走！……”

“申功臣，不准出声！”我立即制止他。

“我们能看着他们这样胡作乱为吗？”

我抑制着自己的愤怒，压低声音在他的耳边劝说：这个村子里有四、五十户人家，如果打，可能把敌人赶走，我们也能跑出去。但以后敌人会向群众报复的。这种行动不仅不能解决群众的痛苦，反而还会加重。我们会记住这笔血债，革命一定要胜利，这股小小的畜牲，早晚会受到应得的惩罚的……。不管我怎样说，也压制不住他那仇恨的烈火，我想

用命令来约束他，但当我看到他那激动的脸色，我的心软了。我想，他没有过错，而是那些腐败透顶了的国民党太野蛮了。

“指导员，下令冲出去吧!”申功臣再一次提出请求。

恰在这时，一批国民党匪兵从保长的大门前奔跑过去。我只得声色严厉地对他说：

“命令你睡下。哨位由我一人负责。”

朱保长象死了亲人一样，哭丧着脸，低着头，没精打采地站在他的门前。他是看惯了呢？还是不敢看？难以猜测。他站着，总是站着，无动于衷，任凭那些野兽们去横行。

这伙子畜牲，猖狂了一阵，抱着抢来的衣物离开了村子。

施贵青走到保长站定的地方，大声说：

“你还不回去？野兽走啦!”

朱保长这才抬起头来，看着走远的野兽，长叹了一声，神色沉重的走回堂屋。他爬上楼梯说：

“你们看到那些畜牲吗？他们根本不是人！……”

整整一天，村子里没有断绝国民党的狗兵。直到天色黑透，方才绝迹。

“朱保长，以后晴天时不会有人来隐蔽，就是碰上了阴天下雨，请你们多加注意。”

我们离开朱保长家，走出柳树店不远，申功臣问：

“到哪里去？前面就是地补哨，很反动，不好通过。”

“地补哨太讨厌了。我们弯到丁家榜后湾老甲长的家里去。你分路去通知一、二、三便衣队，今夜都赶到老甲长

家集合，准备进行反地补哨。”

老甲长看到光我一个人，耽心地问：

“你一个人来的？何指导员，你一个人走动，这可太危险啦！”

“现在是一个，夜晚还会有人来。”

“要来多少人，带米了吗？”

“二十几个人。没有带来。怎么，这里一点米也买不到吗？”

于是，老甲长向我诉说了一大片苦水。不光是他们兄弟三个，这一条沟和所有修碉堡的地方，国民党的士兵把百姓家的米和谷子全部强迫着拿走了。有的连谷种都没有藏下来。洪家河的李老幺磨了几天面，给山里的彩病号送去了，一〇三师别动队看到他的面没有出头，就把他带到师部，吊在树上毒打。老幺实在受不了酷刑，才说夜晚不知从么什么地方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买去啦。随后，一〇三师通知各联保没收磨子，从黄陂站到麦陡关，把所有的磨子都集中起来，用火烧炸了。丁家榜后湾七十三户人家，遮遮掩掩地藏了两个小磨子，所以百姓都是吃麦子加野菜，山区里麦子收的不多，现在又到了下秧干活的时候……

这时，丁老二、丁老三和便衣队陆续来到老甲长家。老三说：

“这样多的人在家里不能隐蔽，到园子后边沟里去吧。”又对他的两个嫂子说：“你们快去，把明天早上吃的煮麦再加一些野菜，做给同志们吃。”

我们二十多人，分散趴在菜园后面的水沟里。这条水

沟的东北，不远就是黑狗寨的碉堡；东南是刘家冲沟南湾，住着一〇三师的一个团部。丁家榜前湾的前边，是一条向西北蔓延的大河，两岸正在加修碉堡线。正因为是隐蔽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我们一动也不能动，甚至连头也不能高抬。

太阳带着夏日的炎威，渐渐升到高空。从老甲长的院子里传来一片喧闹声。我极力向前观察，见老甲长被敌人带走啦；前后湾之间到处是敌人，老人、孩子、妇女们在喊叫……

全身的肉被河沟里的水泡发了。太阳恶毒地照射着我们，同志们的脸红得象苹果，干渴难熬；吃不上饭，饥饿难忍，有人用手悄悄地捧起沟中的脏水喝一口。

漫长的一天总算过去了。老甲长摇晃着血脸向水沟走来。

"呵，老甲长，你挨打啦？"

"那些王八蛋非向我要米、要锄头，我哪有这些东西给他们！"他怨恨地说。

我们回到老甲长家里，刚刚在院子里坐下，老三气喘喘地走来说：

"在院子里不行，还是到屋子里坐保险些。"

走进堂屋，老三把手中提的米放在地上说：

"何指导员，你给我十块钱，到什么地方也买不着米。后来找到刘达诚，他把民团的米破给我八斤。搞到了米，却怎么也走不出炮楼，直等到天黑，刘达诚才亲自把我送出来。"

"老三，你还噜嗦什么。"老甲长打断老三的话，"不快叫

她们去做饭？同志们一天连粒米都没有见。”老三提起米袋就走。“老三，八斤米不够吃，我看还是加点菜吧！”老甲长看看米，又看着老三走去。

八斤米加上野菜，虽然做了不小的一锅饭，二十多个同志只吃了个半饱，便出发了。

在一条深深的山沟里，三个便衣队停下来，我便开始分配任务，近来敌人的地补哨放的更加普遍，更加严密，特别是公路两旁的几个坏保长，使我们不但在行动上遭遇很多困难，而且使我们在这一带地区无法隐蔽。为了除掉障碍，开展工作，要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地补哨。办法是先按住地补哨，捆起来放在原地，然后装做地补哨的样子，沿途打锣呐喊，等保长带领保丁出来时，就打死坏保长。二队到栏杆桥按住地补哨，到蔡家凹打死蔡保长，把目标拖向宣化店，从施家岗插山沟进行隐蔽。三队到刘家湾去打地补哨，等刘建臣出来时干掉他，然后到郑家冲隐蔽。我带一队到沙河铺干掉刘继祖保长，也把目标拖向宣化店，到雷班寨一带活动几天后，返回罗一区。各队都要在晚九点钟打响，必须完成任务。和便衣二、三队快分手时，我又嘱咐大家说：

“少杀人。注意隐蔽。”

九点钟前，我领着一队赶到沙河铺南头，仔细观察时，敌人的地补哨已转移了地方——按在了乌石坡的山高峰。站在这个丘岭的最高峰，可以看到三条大路的交岔点和一长段公路，还能够看到沙河铺、弯塘埂、肖家畈、清水塘四个大村子，地形非常险要，不容易接近。

我们无声无息地渐渐地靠近乌石坡，轻轻分开山坡上

的矮树丛向哨位爬去。九点钟，爬在最前边的大个子朱洋人，趁哨兵转身的时候，猛然扑了上去。哨兵没有来得及反抗，已被朱洋人捏住喉咙，轻轻按在地上。我们赶上来时，朱洋人正在喊：

“快来，拿毛巾塞住他的嘴！”

等我用手电筒照看时，哨兵已经死去了。我生气地说：

“你为什么把他捏死？”

朱洋人听说哨兵已经死了，才急忙松开双手：

“呵，死啦？我还没有用劲呢！”

再仔细一瞧，死者原来是刘继祖的侄儿。“快作准备。”我拿起锣来，“当当当！当当当！”急敲了一阵，然后递给申功臣。

不一会，刘继祖带着六个保丁应声而来。我迎上几步说：

“大叔，你快来，有共产党。”

“往哪里去啦？”刘继祖信以为真。

“向肖家畈的马路上跑去啦！”

我手指扣枪机，一使劲，子弹出膛，面前的反动保长应声倒下去。同志们群起将六个保丁全部捉住，打毁长枪，鸣锣直奔宣化店。

二队和三队也准时打响了。纵横几十里的大地上，刹时间人声沸腾，锣声喧哗，枪声连天，真是地动山摇！走到七里棚时，我紧赶了几步，对着一股劲打锣的申功臣说：

“再不能向前走了。这儿离宣化店只有七里路，碰上一〇三师不好对付。岔道走。”

我们从大河滩爬上一座山头，沿着山岭隐蔽行走了十多里路，在董家凹附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地补哨。仔细看去，约莫四、五个人蹲在一堆。我拉了申功臣一把，低声说：

“装一〇三师的别动队。”

申功臣摇摇摆摆地赶上前去，高声喝问：

“干什么的？”

“放地补哨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对方反问。

“别动队。公路上打的这样紧，你们为什么藏在这里不去呢？白吃饭！……”

申功臣这一阵痛骂，四、五个放地补哨的溜得只剩下一个人。

“我们是堵路口的，怕共产党从这里跑了。”

一听声音，我就听出他是董志望，就说：

“他就是董志望！”

申功臣听得眼前这人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甲长董志望，一伸左手就抓住了他，不容分说，拿着手巾塞住嘴巴，反剪两手，拖拉着就向山沟里走去。

一阵急行军，枪声早已被我们抛在身后。走进一条寂静的山沟里，停住脚步，申功臣把一直没有松手的董志望向地上一推：

“董志望，你还想杀红军家属、卖红军家属、监视红军家属吗？告诉你，今天就要你给死者赔命！”

知道他们要动手，我急忙说：

“不能响枪！”

“噗通”一声，这个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永远啃深山里的石头去了。

我们转移到何家大凹何明富甲长家里。何甲长把我们让进屋里，二话没说，忙着招呼我们休息，张罗着做饭。

饭做好了，何甲长才说道：

“你们快吃，家里不能隐蔽，疯狗们天天要查户口。你们过去常隐蔽的破塘凹，已经被敌人砍成了光山。只有到谭冲那边的水沟里隐蔽。不过，那儿一边是公路，一边是大河，你们一定要警惕，沉住气。我叫你大娘去给你们放哨。”

黎明前，何甲长把我们送到水沟旁。水沟四周所有的树木都被敌人砍烧得一精二光，只剩下稀稀拉拉、又矮又小的一些茅草，根本遮不住人体。天大亮时，我们都下了水沟，蹲在深处，为了减少目标，每人抓几把水中的虾行草盖在头上。

太阳出来的时候，老大娘真地牵着一条大水牛，来到公路边上。公路上，国民党的兵马车辆来往不绝。我们浑身浸在水里，太阳晒，肚子饿，动弹不得。最糟糕的是，水被强烈的阳光晒得发烫，水里的蚂蝗立刻活跃起来，它们象得了宝贝，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了，我们的身上、手上、脚上就成了它们攻击的目标。我们无处躲避，也没有办法驱赶它们，只能慢慢地扯掉它。可是扯掉这个，那个又钉上来了，结果是扯掉的少，钉上来的多。到了下午，身上的痛苦就更多了。我们大部分同志都挂过彩，创伤没有全好，在水里的时间长了，全身的伤疤都被泡掉了，加上蚂蝗一咬，浑身发冷发麻，所有的骨节都发痛，头晕得抬不起来。四点多钟，公路

上正在过国民党军队，胡大河实在忍受不住，说：

“就是死，我也要出去。”

“大河同志，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暴露了目标，我们怎样跑出去呢？再忍耐一会吧，等这一批敌人过去，先把你拖到茅草里去。”

他两眼看着敌人，再没有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夜幕笼罩了大地。我们准备向外爬。然而，人们就好象木头一样，扎在水里，一动也动不了啦。我们中间只有申功臣和胡民山身上没有新伤疤，任务自然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二人先爬出水沟，四外侦察一番，见没有情况，这才把我们一个个从水里拖出来，放在茅草上休息。

深夜，人们的精神才稍有恢复，而饥渴也更加逼人，有的同志在扯着身旁的嫩茅草吃。怎么办呢？我想不出办法，忽听得有人在哭，原来是十八岁的队员何耀列。我费了好大力量，才爬到他身边，问他怎样了？是肚子饿，还是受不了呢？不管我怎么问，他双手抱着腿，一个劲地哭，就是不说话。我知道他是身上痛，就问：

“是伤口痛，还是怕彩犯了呢？”

这一下，他哭泣得更厉害了，身子倒向我的怀里说：

“为了这个伤口，我躺了半年多，现在又给蚂蝗咬开啦……”

他挪开双手，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他那鲜血直流的伤口，我心里一阵难过。忙安慰他说：

“耀列，不要哭，你年纪轻，伤口好了不会再犯的。你休

息一会吧。”

我抱着何耀列，不久就感到受伤的左胳膊很吃力，肚子里不停地咕咕叫。饿，这不是我一个人……耀列停止哭泣，我轻轻地把他放在茅草上，静静地思考着，忽然，我想起了破塘凹有个大地主。

“同志们，撕件破衣服把伤口包扎起来，今夜到陈君臣家去想办法。”

申功臣爬过来，犹豫地说：“何指导员……”

“不用怕，”我明白他的意思，“地主不在家，只有一些佣人。胡民山到前边去，先备准饭。”

同志们裹好伤口，申功臣背着何耀列，开始爬行。到达破塘凹时，饭早已经做好了。

一三　连除二霸

我们离开破塘凹，横过汉罗公路，翻过铁丝岗大岭。同志们隐蔽起来，胡民山进村去了解情况，返回来说：

“联络点上叫西边来的人都到刘家冲沟北湾去，有事情。”

在刘家冲沟北湾的村头上，我们碰到罗山县委朱事务长，他说：

“昨天从黄陂站到宣化店，方圆几十里路闹腾了一夜，不知便衣队受损失了没有。张书记要我在这里等便衣队，然后到毛狗洞集合，有急事。”

便衣队分散隐蔽在山上，我独自进了洞，和张家胜、驼二爷见了面。他们汇报了情况，并告诉我：特委警卫队手枪

班班长张德恒从信阳送秘密信，并带有七万元现款，夜晚宿营在石灰窑，他见财起心，打死孙保才，跑掉两个队员，然后他带着七万元和两支短枪投敌，现在邓方家湾邓石玉联保的碉堡上。医院直属便衣队指导员赵政忠已叛变，到了大胜关。二区熊妖叛变后把他所知道的地下党支部都破坏干净。特委直属便衣队张家勇执行特委指示，坚持金牛城一带的联络。一天，张家勇到北沟联络点去时，被一〇三师的别动队盯住了，正当他叫门时，被敌人打伤。指导员王定堂带便衣队冲出去，损失不大。张家胜说：

“不过，张家勇负重伤后，被敌人抬到宣化店一〇三师师部……”说到这里，他难过得再说不出话来，制不住哭出声来。

“家胜同志，不要哭。哭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尽量想办法……”我想安慰他，一时却也没有更多的话说。

张家胜抬起泪脸，眼不转睛地盯着我：

“何副书记，我弟兄七个参加革命，已经死了四个，小七在独立团，没有信息，家勇又被俘……”眼泪在他脸上滚动着，尽管有着极大的悲痛，他并没有忘记工作：“还有很多情况，叫驼二爷汇报吧。”

“他们弟兄死的多，他很痛心，所以说不出话来。”驼二爷同情地说。“还有一件大事情：林之翰和医院在敌人搜山中受到包围，损失很大，林院长在韭菜沟负伤，被敌人抬到铁铺；林院长的爱人当场牺牲了，孩子也失踪了。还俘去几个护士。据王定堂汇报，医院是在傍晚时受到包围的，当夜他们赶去，收容了一部分彩病号和护士，安插在天竹寺一

带隐蔽。”

我们共同研究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根据红二十五军最近来信的指示，由高敬亭同志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要我们继续坚持鄂东北的革命斗争。关于罗山县委的工作，只有张家胜一人，遇到问题不易作出决定，我建议由驼二爷担任副书记，共同负责全县工作。……

在水中泡了一天，加上五十多里奔波，又从黑夜研究工作到第二天下午，水米没打牙，只觉得头沉得抬不起，浑身虚弱，一会儿，便歪倒在石头上睡着了。当洞口的光线黯淡下来时，我们又立刻振作精神，检查武器，而后一个个从狭小的洞口里钻出来。

驼二爷说："这么多人，在附近做饭吃不可能，只有到岩山北边的小张家湾去做饭吃。"

"驼二爷，那里早没有人了，都被敌人移走啦。"申功臣说。

"你不知道，敌人从孝感移民进来种田，这里按了一家，目的是叫他监视本地群众，可是他来了不久，就和我们有了联系……"驼二爷笑呵呵的，象讲故事一样，末了才说："放心吧，同志，保叫你们吃顿饱饭。"

经过小河时，同志们爬在河边饱喝了一通，有的同志还悄悄地洗了洗脸。驼二爷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正在吃饭，驼二爷拿来一封信说："独立团从联络点上转来的。"

我立刻放下碗筷，凑近灯光去看信：

特委负责同志：

自五约山会议后，我们行动到礼山，打下茅家集，并在县城里休息了一天一夜，但是丝毫没有带动敌人。我们随即执行第二项任务：从茅家集向南转移，打下新屋畈和姚家山一带的移民点，再转移到吴家冲，想进大小鸡笼山。大小鸡笼山的敌人不仅没有动弹，反又调来程汝怀的保八团追上我们，当即进行激战。我们过了路西，那里的环境也很紧张。原红二十八军留在四王山的彩病号，陆续过来了一部分，原扛步枪的同志暂时编入独立团，手枪团的同志都编入手枪队，并将手枪队改为特务队，共五、六十人，由罗厚福同志带领。吴光陆同志带便衣队想进大小鸡笼山……

独立团和保八团战斗了数日，敌人伤亡较大，程汝怀又忙调来保七团，共同对付我们，我们决定带上敌人转个大圈子，从柳林附近经两道桥到光山县东八区，然后再返回罗三区。如有指示，请速送信来。

陈守信　陈明江

独立团的行动不但没有带动敌人，反又增加了两团敌人。刚刚组织起来的独立团，能抵得住这许多敌人么？会不会遭受大的损失？……独立团的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同志们的机动、灵活，我不但没有意见，而且从内心同意他们这一决定。

草草吃罢饭，我带着申功臣、朱洋人，经过三十五里路的急行军，天亮前到达仙居顶东边的板岔村。董志新和钱侉子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

“今天中午，谭拥之要到孙家湾大地主家吃媒酒，正是个好机会。不过白天想干掉他，还得仔细布置一下……”

谭拥之是我们的老对头，是这一带的地头蛇、顽固派，一贯反共。我们一个很好的地下工作者杨道山同志，就是被他们用锄头砸死的。因此，同志们和这一带的群众很早以前就要求我们除掉这个地头蛇。今天，确是个好机会，但怎样接近他们呢？孙家湾南边是彭城店，驻扎着一〇三师一个连，还有张楚杰的民团；东北是黄陂站，驻扎着一〇三师的一个团部；北边是杨德府的炮楼；湾子头上就是谭拥之看守的炮楼。孙家湾正是敌人的心腹之地，加上又是大白天，打了以后往哪里去呢？……但是，错过这个时机，以后怕不好搞掉他。我们虽然只有五个人，为了给群众报仇，镇压反革命，维持这个交通要道，还是下定决心要把他搞掉。

我分配董志新和钱侉子运动下去，由钱侉子混进地主宅院，把谭拥之拖出来。朱洋人监视村头的炮楼。我和申功臣堵后门。五个人中间，只有我认识谭拥之，于是向钱侉子介绍说：

“他有五十多岁，嘴上留着三撇胡子。你拖出来不要杀，等我看看是真是假，可别杀错了！”

天晴气和，红日当空。钱侉子来到地主宅院前门，看看没有人，只有几条恶狗向他嗅来。钱侉子趁机进了院子。孙家正是繁荣的时候，为儿子说媳妇喝媒酒，摆了四桌，桌

上都摆着丰盛的酒菜。席上一片猜拳喧闹，佣人们在忙着四处伺候。这当儿，钱侉子闯了上去，揪住正席上坐着的一个胡子老人，拖起就往外走。酒席上的人们，都被这突然袭击惊住了，又不知里外兵力多少，没一个人敢动弹。

前门忽然爆发了狗的狂叫，一片喧哗。我和申功臣立刻作好准备。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人奔向炮楼。

"申功臣，他就是谭拥之。"

手快脚快的申功臣，一听说"谭拥之"，几个箭步窜上去抓住了他。

我返身赶到村前，只见钱侉子仍然紧拖着那个姓石的胡子老人，不由得放声大笑：

"侉子，错了，放掉他！"

"放了？不行。捉了一个出来，里边一定会有人来，要他们把海菜席送出来请我们吃。"钱侉子不肯放手。

申功臣赶来。不见了谭拥之，又没有听到枪声，我疑惑地看着他。申功臣会意地说：

"他在水沟里喂了鱼虾，永远不会再去看守炮楼啦！"

"把朱洋人叫来，到石岭集合！"

我们正在向后山岭转移，北风突起，黑云奔腾，大雨猛然降落。这时，孙家的佣人抬着酒菜送到后岭，同志们就在滂沱大雨中，用手拿着酒菜猛吃。四周意外的平静，不见敌人出动，不知在搞什么鬼，我放心不下，没有顾上吃酒菜。等大家吃完了，便立刻向山林移动。走到一棵大树下，钱侉子从怀里掏出一堆烧麦和一条鸡腿。

“给，这是你的。”

“何指导员，光吃有啥味？给，这个也是你的。”申功臣说着，顺手捅过来一瓶子好酒。

酒足饭饱，我伸开两手，接着雨水洗了个脸。等我睁开眼睛再看时，阵雨下得更大了，山上的泥水奔泻而下。看看炮楼，连个人影子都没有。山洪爆发，河水猛涨。

“同志们，敌人在河那边，来不了啦。前面是红安和罗山的交界岭，走，上去休息。”

雨慢慢地小了，天色渐渐黑下来。申功臣、钱侉子左右走动一番，看看没有动静，才回来问：

“下一步怎样行动？”

今天的枪声虽然不多，动静还是不小的。怎么没有看到红安的同志过来联络？和他们失掉联系，已经两个多月了，不知那边的情况如何？于是，我们决定走熊家畈、刘家河。这两个村子很反动，熊家畈这村子上出了个熊斌，在陕西当省长，所以这一带的炮楼特别多，估计地补哨也一定放得很严，如果遇到就干掉他们。

一路上，甚至到了熊家畈的村头，都没有发现地补哨，四周意外的寂静。进入狮子冲的山沟，同志们隐蔽起来，我独自爬上山坡，用暗号叫开了老道人的庙门。

老道人告诉我，这一带的民团和地主武装还是原来的，没有什么变动。不过这一带的地补哨放得较早，原因是这一带的保甲长都和熊家畈比，如果熊家畈放，他们就放，所以熊家畈一动，大家也都跟着放了地补哨。后来，看到便衣队打了很多地补哨，熊家畈说放地补哨没啥用场，反正打不

进他们村子，就自动撤去了地补哨。他们势强人众，有四百多条枪，撤了也就算啦。但是别的保甲就不行，因此下畈里仍有地补哨。

我问他五区有人来吗？他说有半个多月没有联系上了。五区的地方武装没有动，混成旅住在老君山上，因为气候不好，死的和病的很多，每天都在往山下送病号；此外再没有正规军了。

“这些，都是我在化缘时了解的情况。”老道说完最后一句，捻动手中珠子，嘴里嘟嘟哝哝不知说些什么。

离开老道人，我们沿着山岭，走到河南和湖北交界岭上黄家榜（又名凉亭）的一个饭店里。在这条岭上，有我们三个极重要的秘密联络点，也是我们来往活动的交通要道和歇脚点，由地下党支部书记、一个姓肖的女同志负责掌握。黄家榜的饭店就是这三个联络点之一，经常在这里看守和联系的是一个姓彭的青年妇女；她的丈夫是个竹篾匠。

肖同志见到我们就说：“今天真是一个好机会，张青莲在屋里，地下党支部和群众一致要求你们杀掉他。”

“为什么？他当保长的时间并不长，都有哪些罪恶？”

“他当保长的时间虽然不长，罪恶确实不少……”于是，肖同志叙述了张川儒、张青莲父子的反革命罪行。张川儒是这条岭的大恶霸，张青莲原是个高中学生，父子俩一向坚决反共。为此，张青莲竟放弃学业，回来当了一名保长，先加强地补哨，后说是要清乡。自从修起碉堡后，这小子更是疯狂了，亲自带领保丁下卡子、补路口，破坏地下党的活动，摧残群众，污辱妇女，甚至以“通共”为名，把穷人家的姑

娘拉到炮楼轮奸……不收拾张家父子，不打死张青莲，这一带的工作不仅无法开展，还随时有遭破坏的可能，而群众更是无法生活下去。地下党配合便衣队，曾经扑了两次，都没有捕到，张青莲说共产党来捕他，一定是本村有人告密，于是捉去几个群众，打得要死。群众都说："如果不杀死张青莲，我们都去当红军，也不做他的刀下鬼！"

"他今天在家吗？"我问。

"在家。他刚结婚，媳妇是九里十八寨陈家大地主的姑娘，今天才从娘家回来。"

"便衣队两次扑空，都没有搞掉他，是什么原因？"

"情报都是准确的。可便衣队进去就是找不到他。估计他是藏在楼上，跳屋顶跑掉啦。你知道，我们便衣队的同志身体不如以前，又没有人能上房，才漏掉了他。"

"干掉他！"申功臣在一旁早听得不耐烦啦，气冲冲地说道："要搞就快搞，天亮就不好办啦！"

这条沟的工作确实很重要，也是我们在这附近唯一的根据地。不打掉张青莲，这条沟的工作有被破坏的危险；打死他，敌人也决不会甘休，也有被破坏的可能。屋里一片沉闷，大家共同考虑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工作不遭受破坏。

申功臣坚持着说："如果这样的话，还是干掉他。反正干掉一个捞一个本。"

地下党的同志也补充说："现在群众就有一些动摇，再加上张青莲把刀架在人们的头上，群众更加动摇。事实证明，不杀他，他就得意忘形，用残酷的手段来对付群众。我

们的性命也都操在他的手心里……。”

最后，我们决定干掉他。为了不牵连这个村子的群众，还商议好把张青莲拖出来，打死在深山沟里，叫敌人找不到尸体。如果敌人在明天一天内找不到尸体，肖同志就去找驼二爷，叫他带着钱，半公开地到张青莲家里，就说张青莲要当红军，按照约定的时间把他接去啦。今后，他家就按红军家属一样照顾。然后，再动员老保长和群众到宣化店和张川儒打官司，就说他儿子在信阳读书，他把他儿子叫回来去当红军。这样，张川儒有被软禁的可能，老保长也可能重新上任，今后的工作就好进行了。

大家吃了点冷饭，肖同志拿来了两根长竹竿。我看看已是午夜两点钟，急忙出发。我们五个人当中，只有我和钱侉子会上房，就要钱侉子从前门上，由董志新掩护；我从后面上楼，由申功臣掩护，张青莲如果逃脱，以手电光为号，由朱洋人负责追赶。同时要地下党和地补哨联系好，发现敌人的援兵，叫他们打锣向其他方向拖走。最后，我又嘱咐大家说：

“争取不要响枪。张青莲是民团的小队长，一响枪，民团就会来援助。”

我和申功臣来到张青莲住的屋子后面，选好了地形，把竹竿卡在地下，由申功臣扶着，我正准备上房，申功臣耽心地问：

“何指导员，你负伤的胳膊有劲吗？”

“还可以，就是怕发生情况，往下跳的时候左胳膊没有反劲。”

我头冲下，脚朝上，双手紧握住竹竿，顺着墙向上倒爬。快到屋顶时，左胳膊很吃力，有点不好用，我咬了咬牙，又往上挪了一点，左脚就搭上了屋檐。我轻轻地用脚把屋上的小盖瓦推开，把脚再向里一踹，就别在棚瓦的格领上，身子一歪，爬上了房檐。

我缓了口气，然后爬上屋顶。四周沉寂，毫无动静，隐隐约约看到钱侉子已经翻墙进到里院。我走向屋角，揭开瓦盖，用脚别住两个格领，轻轻拿起竹竿，向楼里探去。屋角与楼板距离不远，顶多有一人高。我正想把竹竿抽出来，忽听得屋里传出问话：

“谁呀？干什么的。”

我立刻用竹竿撑住楼板，纵身一跳，无声地落在楼板上。这时，听得楼梯响动，估计是张青莲上楼来了。我悄悄地移动到楼梯口，楼梯上有一团黑影，我用力把楼梯一蹬，哗啦一声，楼梯倒啦，只听得张青莲叽哇乱叫。钱侉子刚托开屋门，一见人和梯子倒下来，急忙赶上去捏住张青莲的脖子。董志新随后进到屋里，重新架起梯子。

“任务完成啦，你快下来。”

我顺着楼梯走下来。

新媳妇问：“你们是哪部分？”

“师部别动队。”说着，三个人架着张青莲走向院子。

张川儒和他的老伴在院子里迎住我们：“你们到这里来有何公干？你们是哪一部分？”

“你儿子要当红军！你们老人不要多管闲事，快关门睡觉吧！”

走出村头，我们才把张青莲的双手反剪捆起，把他嘴里的手巾塞得更紧一些。这小子往日那股子威风，早没影啦，这一阵子浑身打战，服服贴贴的。朱洋人拉着他，上山、下坡、过河、进沟……选择好一个地点，就把这个反革命分子结果了。

天色快亮了，到哪里去呢？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前面是一条大河拦住去路。今夜搞掉张青莲，敌人必来搜山，这里是不能隐蔽的。

“走，从黑龙潭过河。”

“为什么？”申功臣问，“河水很大；过河就是四区，那边情况很紧张。”

“四区虽然紧张，地盘很大，敌人不会到那边去搜尸；就是敌人来了，也比在这里好应付。过了河，我们到记宝寺下面的石洞里隐蔽。记宝寺下边就是刘清翼的田，河里发了大水，他一定会来田里看看，说不定还可以搞到点饭吃。”

来到黑龙潭边，面对着白浪翻滚的激流，同志们有些犹豫，这能游得过去吗？我催促着他们用石头砍断葛藤，扭成绳子，拴在我的脚上，准备我先游过去，同志们再过。

董志新看到我要下水，着急地说：

“不行，水这么急……”

“不要看河水急，潭窝子里要好一些。我从小喜欢打鱼，知道一点水性，你们放心吧。”眼看着天色发白，我着急了：“快一点。”

尽管不放心，也没得办法，申功臣和钱侉子心情有些沉重，只得把葛藤绳的一端，拴在我的小腿上。我跳下水去，

除了左胳膊感到有些吃力外，算是平安的到达了对岸。把藤绳拴在一棵柳树上，便招呼同志们过河。

有的同志攀着藤绳，开始渡河。有的同志却尽在岸边徘徊，犹犹豫豫地不敢下水。我再三招手，却无济于事。我复又下到水里，护送他们过河。最后一趟，左胳膊象木头一样，完全不听指挥了。刚游到潭窝中间，浪花一翻，把我打出深潭，漂入河床。我浑身软弱无力，只好任它漂动。忽然，发现断了的藤绳顺水向我漂来，我赶忙紧紧地抓住它，有气无力地向对岸漫游。岸上的同志们，有的忙着拉绳子，有的走到水边来接应。上了岸，我已失去全部力气，朱洋人和钱侉子架着我，拖到悬岩峭壁下的石洞里。

记宝寺庙宇座落在悬岩之上。它的下面，是大大小小的石洞，石洞之间有的相通，有的为巨石隔绝。悬岩上、山坡上、沟边上，到处是洞口，有的洞口就在水里。真是错综复杂，难以捉摸。为此，我们还设计了不少暗号，有特殊暗号，只有少数人知道；也有同志们都知道的普通暗号。凡是进洞隐蔽的人，都和刘清翼有暗号联系。

半上午，刘清翼果然来了，他各处瞄了一下，发现了普通暗号，看看四周无人，一闪身进了大石洞。

“还没有吃饭吧？”话刚说出口，他似乎发觉这是多余的问话，低下头说：“反正现在不能出去。你们隐蔽好了，我出去想办法弄点吃的。”

不等别人回答，他忙起身向洞口走去。

中午，刘清翼夹着一件蓑衣走进洞来。打开蓑衣，取出一些麦渣子夹野菜做的菜饼，分给大家吃了。

“敌人在搜山？搜村子了没有？”我发现刘清翼的神色有些紧张。

“不知哪个便衣队把张青莲杀掉啦！一〇三师一个团配合宣化店的民团，还有本地的乡警队，散满了各山，在搜尸体……今天你们可要晚一点出去。”

“杀掉张青莲，群众有什么反映？”

“都说他作恶到头，该死。张青莲这个畜牲，才当上一名小小的保长和民团小队长，就这么坏，到将来还得了？这种人，只有杀，别无办法。”

对，便衣队每做一件事情，都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不然，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敌人始终没有找到张青莲的尸体。宣化店的一场官司打得热火朝天。到底，张川儒还是被区公所软禁起来了。

一四　小庙岗遇险

深夜两点多钟。我从便衣二队带了几名新队员偷渡过宣化店大河，进了罗山三区便衣队的据根地彭家湾。

董老大娘一见到我，就谈起来：

“何指导员，我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村上的七家红军家属，搬走了六家，只剩下我一家没有搬走。人家的媳妇都改嫁啦，只有我的媳妇还在，国民党今天要抢，明天要卖，她简直不敢在家呆。她娘家总是张罗着要给她另说婆家，还说什么被国民党抢去卖了名声不好……你们看，小儿子又小，只剩下我一老一小，可怎么活下去呢？求你们给我想想办法……。”

董老大娘不歇气地说下去。她越说，我心里越是一阵阵紧缩，越难过。她哪里知道，董志英同志已经为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极力控制住自己，耐心地听她诉述下去，不时向她说几句解释和安慰的话。突然间，董老大娘神色慌张地站起来，歪歪扭扭地跑向厨房。我们正在莫名其妙，她又跑回来，忙说：

“何指导员，你们快吃饭。家里不能隐蔽。你们吃完饭快跑，跑得远远的，我要跑去报告……”老大娘已经慌得不知所措了。

“老大娘，你非去报告不行吗？”

“不报告就要全家活埋。你们来，后边一定有人跟着……”

我们想在她家隐蔽的计划破灭了。过去经常去隐蔽的山林，已经被敌人砍尽烧光，到什么地方去隐蔽呢？

老大娘可能是猜到我的心思：“老虎林和水竹凹虽然没有砍，你们可不能去。自打刘庆梦叛变后，敌人总是先搜那里，再搜村子。”她伸头看看天色，催促说：“你们快跑。跑远一些。我一报告，他们就会到处搜寻。”

我们只得很快离开了她家。来到村头，东方已经有些微亮。四外望去，满眼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到哪里去呢？时间不允许我们久停，我于是下定决定：“走，到宣化店、丰家店大路边上去，找地方隐蔽。”

沿着路边走了很长一段，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再往前走，眼前就是富家堂。向着侧边的小庙岗上看去，山上的树虽经敌人砍烧，由于多是悬岩峭壁，敌人砍烧不到的地

方，树木依然茂盛。我们立即向那里奔去。

爬了一段山，发现一处陡壁上面，有一块不大的地方，因为山势险要，敌人没有能够烧掉上面的矮树丛和荆棘，它就成了我们的目标。便衣二队副队长施大信动作最利索，他以猴子爬山的本领攀登着陡壁，居然爬了上去。他从上边甩下一根绳子，我们拉住它，一个个爬上去。

这块矮树丛地盘不大，隐蔽六个人可满够了。我要同志们各自找隐蔽处。有四个新参加便衣队的同志，对隐蔽没有经验，我仔细地告诉他们：

“要沉着。不管敌人怎样搜，就是负了伤，敌人没有发觉就不准动。谁暴露了目标，谁就一个人打出去，不准惊动别人。到夜晚敌人退了，再找便衣队汇合。”

当他们隐蔽好了以后，我还是不放心，逐个检查一番，不够技术的地方，一一告诉他们。最后，我才爬上一个较高的地方，和施大信隐蔽在一起。

金色的光芒四散，给淡淡的浮云镶上了美丽的彩边。突然，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清晨，随着传来激烈的枪声。

约莫八、九点钟，丰惠乡的民团在离我们不远的小寨岭集合，而后分路搜索。一部分民团果然进了老虎林、彭家湾，一路顺大道至王家桥、顾家湾。姚家畈的民团在丁寺桥分路，一路去彭家大塘，一路奔向王家桥。不久，宣化店的反动武装以至什么“铲共团”之类，统统出动了。中午，号声响起，敌人全部散开，到处搜查，并且占据了所有的村庄和山岭。除了乒乓的枪声，还不时传来敌人的瞎叫声：“捉活的，捉活的！”“出来，出来！”“在这里！”“在那里！”……

到下午一点多钟，小庙岗山的四周已经聚拢了好几百名敌兵。不管敌人的枪声怎样激烈，也不管他怎样的喊叫，甚至嘶吼，我们还是稳妥地躺在那儿，纹丝不动。

“你看，敌人在向上爬。”施大信用胳膊肘碰碰我。

果然，几只笨猪“哼哧哼哧”地在向悬岩上爬。

“不要紧，那个地方根本上不来。”

话音未落，只听得一阵“噗通”——跟肉饼摔在石头上一般。从此再不见有人往上爬了。

也许是皮肉摔痛了，也许是天气闷热难熬，总之，敌人是“怒发冲冠”了。他们端着枪，死命向我们隐蔽的地方打枪。密如细雨的子弹从我们头顶上吱吱掠过去，却有没伤到我们一根毫毛。过足了“枪瘾”，狗兵们一拥窜向河边，趴在岸沿大喝凉水。灌满了肚皮，跑回来又是劈哩啪啦乱打一气。以后，号声四起，敌人这才“收兵回营”。

眼看着敌人远去，施大信出了一口长气，说：

“幸亏他没有机枪，不然咱们得吃点亏。”

情况一松弛下来，立刻又感到新的威胁：干渴，饥饿，闷热的天气令人发晕，浑身不断地淌着汗。人们渐渐地忍受不住了，特别是新参加便衣队的同志，纷纷要求：“下去喝点水吧！”

“不行，现在才五点钟。敌人的军队是走了，可能留有秘密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目标。”

随着夜幕的降临，天空渐渐布满了阴云。我们这才坐起来，任凭微风吹抚。下了悬岩，施大信先爬上山头了望一番，回来说：

“非常平静。让同志们下去喝点水吧。”

阴云越堆越厚，夜色越来越黑。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好了。爬到河沟旁，各人都喝了一肚子水。

“再到哪里去？”

“先到赶鱼儿，找个联络点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有多远呀？”一个新同志问，大概是饿得厉害了。

“不远，七、八里路。这里很好，还有一些野芹菜，大家吃点好赶路。”我扯了一把递给他。

同志们隐蔽在村头。我一个人摸到联络点，看到各种暗号都在，就用暗号前去叫门。不管我怎样叫，却渺无回音；忙仔细地在四处看看，没有发现破绽，这是怎么回事？暗号没动，证明联络点没有遭到破坏。也许，由于今天的“搜剿”，他们转移了，或是进行隐蔽了？……

“找到了吗？”回到村头，迎面送过来问话。

我照实说了：“同志们，忍耐一下，再走四、五里路，到车家山去。那里有地下党的一个女支部书记，她可能在家。”

女支书家的大门紧闭着，四周异常平静。老暗号大牛槽还放在原地未动。我走到门前，从门缝里看去，发现北屋有着微弱的灯光。

“你知道叫门的暗号吗？”施大信也可能看到了灯光。

“很长时间没有来，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暗号。不过根据灯光，估计有便衣队的同志在这里隐蔽。要是真的，她一定会出来放哨。你们去隐蔽，我坐在槽上等她。”

“用以前的暗号叫一下吧？”

“不，不能。现在情况很紧张，敌人又搜了一天，那样一

来就会把他们吓跑。要是再接不上头，今夜和明天一整天都没有办法啦。”

同志们隐蔽起来。我坐在老牛槽上，掏出一支香烟抽着，故意把烟喷得远远的。

“真气死人啦，不知从哪里来的这多野猫，常常来咬我的鸡子。你看，一会儿就拉去了两个……”

院子里传来说话声。门吱呀一声开了，走出一个妇女。她似乎闻到了烟味，东瞧西望地走着，嘴里仍在说：

“这黑的天，到哪里去找呢？……”

我跟她不熟，又加上是个漆黑的夜晚，很难辨清她究竟是不是黄玉兰。

“你是黄玉兰吗？”

她听到声音不熟，扭头就往门里跑。找个人好不容易，不能让她跑了。我急步跟上去。她转身就想关大门，然而我的一只脚已经插到大门里了。

“我是从东边来的……”

不容我说完，她一边用手往外推我，一边说：

“我是找鸡子的，你到我家干什么？”

近前仔细一看，她很象黄玉兰，我这才说道：

“我是何耀榜。”

“呵，是你呀！可把我吓死啦。”她惊讶地看着我，“进来，快进来，就你一个人吗？”

“还有人。”

“人少就进来，人多要到后山上去隐蔽。”

“不多，五六个人。”我找来施大信他们，跟着黄玉兰走

进院子。看看没有动静，我怀疑地问：“有人在这里吗？”

“便衣队的指导员甘允来在这里。你们进屋休息，我去叫他。”她向屋后边走去。

甘允来一见我就哭：“一切责任由我负，何副书记，我要求上级给我处分……”

我已估计到是怎么回事了：“受损失很大？”

“那天夜里，我们从山上下来，到周家湾后面的坳口上，想做点饭吃，被叛徒熊妖带别动队围住啦。立即展开战斗，在紧急关头，我们从屋上冲出来，把区委书记也带出来了。敌人追赶很急，我们要跳过一个很高的坎子才能上山，区委书记年纪大，跳不动，就伏在土坎上打击敌人，掩护我们转移，结果他被敌人打死了……”

甘允来又谈了一些敌情以及地下党和便衣队的工作情况，要求调一个区委书记来领导工作，并且要求上级派一支小游击队过来，给敌人和叛徒一个打击，好开展工作。我告诉他，区委书记一时调不来，要他们继续坚持，关于部队，我到孝感十三区后就派来。

工作安排就绪，我说：

“我要到孝感十三区去，我带来的四个新同志，你们把他们换下来，刘天寿队长另带几个队员送我过去。”

黎明前，我们到达孙家土门。这一带是我们过去活动的地区，由于时间隔得长久，不知有什么变化。我走到孙老大爷的门口，看看四外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便从矮墙边跳到院子里，走到孙老大爷住屋的窗下，压低声音喊：

“老大爷，老大爷……”

“谁呀？”老大爷在屋里问。

六十多岁的老人，打开门，瞪着两眼看我，看样子不认识我啦。

“老大爷，你不敢认我了吧？我是何耀榜。”

老大爷一把抓住我，亲切地说：

“呵，你好久没有来啦。外面还有人吗？这里再不能隐蔽啦。走，我把你们送到后山上老三那里。”

我们就在老三菜园边的山坡上隐蔽了一天。晚上，老三才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煮了一斗米的干饭。吃饱了，还把剩下的饭用包鞋的小包袱各人包了一些。老三看出我们要到铁路边去，就说：

“你们要过长水沟，可不能走水里。国民党量你们不敢从这条沟里通过，才没有砍林烧山。那里他们日夜有巡逻哨，不断地搜查。夜晚可能好一点。你们要靠着石壁下的树棵子慢慢走。二十五里路的长沟，一夜一定要通过，白天是一时也不能停。”

借着繁星的微光，我们沿着石壁下河水边上的荆棘棵子轻巧地向前摸行。突然，迎面传来敌人巡逻兵的嘈杂声和脚步声。我们急忙后退几步，在一堆荆棘棵中伏地隐蔽。敌人的巡逻兵从我们身旁卜通卜通地过去了，嘴里胡乱嚷着：“谁呀！口令！……”

下半夜，才算伴着长流的河水走出了危险的长沟，越过古时诸侯常把守的坳口——土诸岭，进入北安山的松林里。

这片松林十分茂盛，里面密不通风，黑夜中怕迷失方

向，只得暂且休息一会。当强烈的阳光透过松树，我们由刘天寿带路，又开始行动。

初夏的中午，松树里闷热得象蒸笼，一滴水也见不到。同志们全身发软，头发晕，施大信提议说：

“何指导员，休息一下，吃点冷饭吧？”

“不能停下来，要坚持着走，今天一定要走出松林。冷饭要节省着吃，留一半明天吃。”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才到达松林边沿。出乎意外，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片丘陵地，这走到那里来了？我们的目的地是搭茅寨，那里原是高山呵！

“你们都在原地休息。刘天寿跳我来。”

我们利用松林的掩护，爬到一块较高的地方，四面观察，才确定我们是来到了武胜关下的广水沟头；搭茅寨还在西南边。我们返回原地，大家忍住干渴，吃了点冷饭，等到天黑，便向西南方向爬去。

深夜，到达一个较大的村庄附近，从各方面看来，象是张家冲，却难以断定。我们只得在村头上打转转。忽然，发现有一个看园子住的草棚子，我们便悄悄地爬过去。棚子里正有一个人在睡觉，醒来看到我们，很是害怕，不管问什么，都说不知道。

“这村子是张家冲吗？”

“是张家冲。不过我是看庄稼的。”

我估计他不是个坏人，很可能是便衣队的秘密哨，或者是个基本群众，于是对他说：

“你不要怕，我们是外地来的便衣队，想找这里的便衣

队取得联系。你告诉我们不要紧，或者请你给他们传个信，行吗？”

“国民党总说这一带有便衣队，可我没看见。”

一听他露了点苗头，我紧紧追问：

“张家冲被破坏了没有？群众有什么变化吗？”

“这一带没有什么。你要找便衣队，我不知道。我进村找甲长来，叫他告诉你们。”他说完就走了。

不久，从村子里走来两个人，相互看看，都不认识。刘天寿说：

“我们是罗山三区的便衣队。我叫刘天寿。我们是来找陂、孝、北工委黄指导员取联系的。”

两个人逐个地看了看我们说：“走，到村子里再说吧。”

于是，我们随着他二人，走进村内一所空院子。

一个妇女走来问：“你们找谁呀？”

刘天寿觉得有点面熟，近前一看，果然是联络点上的同志。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三区的刘天寿，是来接头的。”

“好，你跟我来吧。”她热情地说着，和刘天寿一同出去了。

不一会儿，他们和黄云先同志来了，大家见了面，非常亲热。黄云先领我走进他住的房间，当即开始汇报和研究这一地区的工作问题。

第三章　反“倒林”

一五　不响枪的战斗

“倒林”，这是国民党匪帮一项极端残酷、灭绝人性的反革命措施。它不仅是对付一山一地，而且是用来对付整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企图利用夏季的砍林烧山，使我们无处隐蔽和安身，进而断绝共产党在大别山的根苗。为此，敌人调动了很大的兵力，把茂密葱郁的绿山，变成了黄色的秃山，各个地区都很吃紧，我们的工作也遭受到一定的损失。怎样才能解脱重围，争取生存呢？红二十五军离我们远，管不到；红二十八军在皖西还没有回来。重担就落在我们自己身上。要组织力量，坚持斗争，突破重围。

在何家冲的一条山沟里，我召集了陂、孝、北工委黄云先同志、柳林区委书记小洪和其他一些干部，共同研究解围的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有云贵部队一〇二、一〇三师，东北军的第十师、混成旅，程汝怀的八个保安团，以及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民团、“铲共团”等等，光中心区内的敌人就有好几万。而我们在鄂东北地区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

个算一个，统共不到四百人。和敌人硬拚，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办法只有一个：利用少数的力量来指挥和调动敌人。当然，站在高山头上，指手划脚地指挥和调动敌人，他是不会服从的。为了支持和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帝国主义派了军事顾问团来到中国；国民党最怕这些洋人顾问在中国有所失落。我们就抓住敌人的致命弱点，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趁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团到鸡公山避暑的机会，抓几个洋人顾问，用他们给我们也当当“顾问”，来调动和指挥敌人，使我们解开重围，争取生存，坚持斗争，实现反“倒林”的胜利。

捉洋人顾问，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决定由黄云先和小洪负责统一指挥和布置。事先一定要搞到准确可靠的情报，细致地侦察地势，特别是抬到洋人顾问以后转移的路线要选择和安排妥当。抬轿子的人，不但要忠实可靠，还要身强力壮，能够抬着人跑的。至于打掩护的部队，从彩号和便衣队员中选拔身体好、枪法准确的同志担任。……蒋少元在四次“围剿”时，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旅长，因“剿共”有功，国民党以他的大号蒋礼山为名，新辟了一个礼山县，他兼县长，属下的团长为区长，把全旅兵马放在县里喝民血。在蒋少元所辖地区失落了洋人顾问，他必然吃罪不起，我们再准备一些传单标语，暗示洋人顾问是蒋少元叫捉的，国民党要想和我们接头、谈判、保洋人，可由蒋少元出面。

最后，我总结说：目前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它关系着我们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今后的对敌斗争，是

否能调动和指挥敌人给山区解围的重要关键。这就要求同志们很好地完成任务，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捉洋人顾问时，我会预先派特委警卫队在三区五约山一带隐蔽接应；我回到罗山以后，也组织一些力量来配合。

会议结束以后，我和施大信、吴大鼻子等同志决定翻越大小鸡笼山到罗山县二区。

乌云密布，夜色浓黑。我们一行五人，顺着大小鸡笼山的西侧，钻行在茂密的森林里。走了二里多路，发现前面一丈多宽的松树，被一层层砍倒在地下，伸手摸摸，树枝已经晒得半干。这使我立刻想到：近来敌人一直高喊着要倒林烧山，可能这就是敌人烧山的第一步。

我扭身对同志们说："看样子，敌人就要烧山。我们的动作要迅速，争取今晚跳出敌人的烧山圈。"

四外黑黝黝的，大小鸡笼山上到处是悬岩峭壁，就连不大的斜坡上，也尽是横七竖八的树干树枝，艰险难行；加上一〇三师伸出来的哨兵，迫使我们要小心翼翼，行动很是迟缓，半个夜晚没有走出几里路，直到东方发亮，眼看是到不了目的地了。我们找到一块林中空地，附近堆垒着高大的青石，五个人于是分散开来，各自钻进石头的缝隙里或是巨石突出的悬岩下隐蔽起来。

上午八、九点钟，敌人象蝗虫一般从四面八方拥上山来，并且在山脚下、沟口里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地把守起来。然后，疯狂的敌人鼓噪着，点燃了砍倒的树木和野草。火势借着风力，迅速漫延开来，不一会儿，整个大小鸡笼山的西半山处处卷扬翻滚着火舌，浓烈的黑烟遮天盖日；我们身

旁的树枝野草也陷入了熊熊的火海。就连地上的石头，也逐渐发热了。

焦灼的热气迎面扑来，令人感到窒息。在火海的包围中，全身的皮肉被烤得焦燥疼痛，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呼吸十分吃力，实在难以继续坚持，我只得发出命令：

“同志们，向火焰作斗争，跳出去！开始动作。”

但是，同志们并没有动作，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我解释说：

“这地方太窄，头上的山势太险，石头被烧到一定程度有可能爆炸崩塌。大家赶快离开这里。”

同志们相继投身火海。火舌直向我们伸来，火花落在脸上、手上和身上，立刻烧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和裂痕。同志们忍住痛，捏熄烧着了的衣角，坚持在地上爬行。终于，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又深又狭的泉水沟，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大家痛快地趴在沟旁，不歇气地喝着凉而发甜的泉水，浑身感到说不出的舒适和轻松。

烟火未熄，狠毒的敌人接着开始大搜山。我们当即赶在敌人前头，向着泉水沟的纵深走去。傍晚时分，绕过一〇三师的碉堡，我在蔡家畈的联络点找到王定堂，要他通知特委警卫队队长方忠厚和指导员黄陂老到铁丝岗开会，分配工作任务。

在铁丝岗一处黑暗僻静的角落里，我向警卫队布置了反“倒林”的任务，传达了捉洋人顾问的决定，并且代表特委任命王定堂代理罗山三区区委书记。警卫队即随王定堂到三区，任务是：一听到北安山上发出激烈的枪声，就是洋人

顾问捉到了，立刻前去接应，而后把洋人顾问隐藏在三区。这次任务必须绝对保密，不得出一点差错。同时，我告诉王定堂说，三区有罗山县最有名的“三亭家”，即颜香亭、华芳亭和曾凤亭，他们都想着找机会发反共横财，来扩张和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三亭家同时扶持他们的孙子颜串铅、华明清、曾伯龙三个高中学生，弃学返里，充当国民党民团的大队长；曾伯龙最近还当了“铲共团”的团总。三亭家的势力浩大，我们如果不把他们先搞住，不但捉了洋人顾问无法隐蔽，就是便衣队在活动中也会遭到损失。这三亭家之间历来就勾心斗角，矛盾层出；我们为了完成捉洋人顾问的任务，就要利用和加深三亭家的矛盾。因此，王定堂和警卫队回到三区，首先瞅个机会，采取半公开的形式，在曾凤亭所属的地区火烧颜香亭的老窠——九房沟。三亭家的矛盾越深刻，斗争得越尖锐，便衣队的活动和洋人顾问的保存就越有把握。

王定堂和警卫队走后，我立刻赶往二区，召集了有区委、便衣队队长、指导员共八、九个同志的会议。自熊妖叛变后，二区就没有区委书记，在这个会议上经同志们推选，产生了新的区委代理书记、副书记。同志们在发言中，纷纷诉说了叛徒熊妖、张德恒的反党罪行，一致要求铲除这两个坏蛋。我对大家说：熊妖无耻地叛党投敌后，同志们都很机动灵活，使便衣队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是地下党受到很大损失，有的支部全被破坏，支书被打死；还苦了全区的群众，有的坐牢，有的跑到山上流浪。现在给你们一部分钱，首先进行善后事宜，死了的人要想办法收尸安葬；照

顾他们的妻子老小，一律按照红军家属一样照顾。在外流浪或坐牢的群众，他们的家属也要很好的安顿和照顾。因为二区受损失较大，不再给你们新任务；你们的任务仍是恢复整顿组织，向大河两岸发展新的根据地。同志们要求除掉叛徒熊妖和张德恒，这很正确，只是现在没有部队，警卫队已经出发去执行新任务；不过我们一定尽力去作，即使一时捉不到他们，也会给他们一个有力的镇压。

我在二区又布置了其他的工作，然后由二区便衣队送我到宣化店附近的大河边上，进入一区。

我和施大信两个人，一夜之间虽然行走了五、六十里路，仍想利用黎明前的时候了解一些情况。我们找到杨家桥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根据暗号知道她不在家，一打听，说是到宣化店去啦。我们转到村头的炮楼边找马保长，回答说他到罗山县城去啦。我们连忙跑到施家岗炮楼找施保长，他也到宣化店去了。一连问了三个老联络点，都没有人，情况不对头，可能环境变化很大，否则，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隐蔽起来了呢?

“何指导员，这一带我很熟，是我们队活动的地区。你看，天快亮啦，咱们先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吧? ”施大信提议道。

没有办法。我们隐蔽着从窦家寨的大岭上向张家畈转移。正走着，施大信突然停下来，低声说道：

“前边路口上有个暗号，你看到了吗? ”

“什么暗号? ”

“县委有规定：在情况紧张，老的联络点不能起到作用

时，必须很快建立起新的联络点，以通夜不熄的小油灯为暗号。你看，路口上那个小棚子里，不是有盏小油灯？你先隐蔽一下，我去看看。”

我在棚子附近隐蔽起来。施大信叫开棚子的门，装做买烟的进去，一看是张家畈村的一个妇女，就问：

“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卖烟的？”

“昨天。驼二爷非叫我做生意，你看我行吗？”

“驼二爷在这里？”驼二爷是罗山县委的副书记。

不料她却反问道：“你带谁来的，几个人？”

“只有两个人。”

“你把那个人叫来，我看看是谁。”

我听说立刻走进棚子。

“咳，可把我吓死啦，”她有些不好意思，“施队长，你怎么不早说？要知道是何指导员，我不早就告诉你了嘛。你们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叫驼二爷，他就在村里隐蔽。”她迅速地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新建立的联络点。我们没有和她打过交道，不敢断定她的真实情况，于是抽身出了棚子，在一旁隐蔽。不久，远远走来两个人，仔细看去，正是驼二爷和那个妇女，一转身，我们又回到棚子里。

驼二爷一见到我们，就慌忙不知所措地说：

“怎么办？情况非常紧张，到哪里去隐蔽？”

我吃了一惊：“怎么，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啦？这一带的工作全部被破坏了吗？”

“姜事务长为伤员们搞米，被敌人捉到宣化店，听说拷

打得很厉害。……”驼二爷说着，把头伸到棚子外面；天色已经微明。“快走，我们到水沟里去隐蔽。”

“各保的变化很大吗？”

“何西暑保长被宣化店区公所扣押，打得要死。现在换上了何四喷。”

“要是四喷当保长，我们可以到何西昆家里隐蔽。”我想，何四喷是红军家属，他当保长，定是地下党在敌人内部活动的。

驼二爷带着两个老交通，我们五个人到了野鸡凹，叫开后门，老大爷一见我们就问：

“你们是想了解情况还是想隐蔽？”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接着说：“算了，天已明啦，再想到别处去也不行了。”

他轻轻地关好门，返身说：“快分开，你们三个人到我房里去，何指导员和驼二爷到我小姑娘房里去。”

“老大爷，在你家里隐蔽行吗？”

“还说什么行不行，别的还能上哪里去？再到水沟里去就是活送死！你们还不知道，现在不同以前啦，沟里的树都被国民党砍了个精光，再没有地方好隐蔽。”老大爷说着，伸开两臂把我们推进小屋子里。

我们服从了老大爷的分配。小小的房间里，只有我和驼二爷。这时我才发现，我们虽然分别的时间不久，驼二爷象老了许多，也瘦了；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沉默不语。直到我催问，他才慢腾腾地开始讲述近来环境的变化：

从麦陡关到黄家榜、仰天锅、高庙这一带的山林，已经

被敌人全部砍尽烧光。倒林之后，敌人紧接着搜山，在高庙山上搜出两个重彩号。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当即把能动的轻彩号集中起来，由便衣三队护送，准备到仙居顶隐蔽。不料中途被敌人发觉包围，损失的情况现在还不知道。

姜事务长为伤病号出外搞粮食，在李家楼附近被一〇三师别动队下的卡子捉去，关在宣化店。据了解，敌人虽然对他施用酷刑，目前还没有招出口供。县委朱事务长得到这个消息，出来送信，因为天太黑，在黑山冲的石坎子上失足摔下来，跌死了；第二天正赶上敌人大清乡，清出尸体和枪支，黑山冲的保长受到牵连，现在还没有被敌人捉去，但已很危险了。姜事务长出事的地点——李家楼归何保，敌人不但捉走了一些群众，还把保长何西署也捉去了。

我们给山区买米，原来是伪装做小挑贩运到沟里，路线共有三条：一条路线是走麦陡关，由何保开具路条通行；何西署保长被捉后，受刑不过，供出了这条买米的路线。敌人立刻在麦陡关一带下了卡子。一〇三师的别动队利用这个办法，到各保去查路条存根，发现杨家桥马保和施保的路条较多；马保长和施保长及时隐蔽起来，虽然没有被敌人捉去，但这第二条买米的路线又被堵住了。后来，敌人又查到吴保路条较多，当场扣押了吴井迷保长。吴保长同样在酷刑下供出这一条运米线上所运的粮食，都是九里十八寨缴的红军粮。发现了这三条运米线以后，一〇三师在所有的山路口都站了岗哨，凡见有挑米的人当场扣押；凡是能吃的，哪怕是南瓜、豇豆或一根细面条，都不准带进山里。何

清记十岁的一个孩子带了一点面，去看望有病的姥姥，被一〇三师查着，押在宣化店；李继成是个大地主，住在宣化店，他哥哥李继如病在山沟里，他拿了一点小菜和一点面想进山沟探望，也被一〇三师查出，软禁在宣化店子城里。原来民团还可以为我们买一点米，现在民团也要按人数买米，一〇三师并且派有专人监督他们。不说别人，就说刘云焕，他老伴饿得快死了，他跑到崖山炮楼上，找队长儿子去要一碗饭。小麻子已把饭盛在碗里，递给了他的老子，被一〇三师的监督人一把将饭碗夺了过去……山里断绝了粮食，彩病号和群众就吃野菜、树叶、树皮、草根。后来，因为搜出了彩号，敌人就大力清乡搜山，搜山时每人带一把铁锹，见到青稞就连根铲掉；砍烧不到的青稞子，就往上面喷洒毒药水；河沟、泉水里，敌人也下了毒药。有的群众生了病，有的中毒死亡，有的被活活饿死了。……

驼二爷零零星星地汇报了一个上午，问题是越谈越多，闷气也是越来越重，令人头晕眼花，简直喘不过气来。

中午，热情的老大爷给我们端来了两碗用南瓜叶子和大麦面做的菜粥。我们两个人却谁也没有吃下一口。

“何副书记，”驼二爷打破沉闷的空气，声调迟缓而恳切，“我们是依靠群众才坚持下来的，要是把群众饿死，或者被迫离开了山区，失掉了群众，我们就是完！依我看，还是组织便衣队带群众去打几次粮。”

“不行，驼二爷。自从打了九里十八寨的香炉寺，我们才摸索出借粮的方法，用征收红军粮代替了过去打粮的政策。因为打粮有时侵犯了基本群众的利益，使党在群众中

的威信受到损失，同时还影响了对敌人的分化工作。打粮的事情，今后再不能重演。不过，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开辟新的运粮路线，利用高价到白区收购粮食，然后组织便衣队用内外接应的办法驮进山区，分给群众。……”

驼二爷想起了什么，忙问：“敌人要甘允吉当罗一区‘铲共团’的团长，他请示组织：要不要他当？”

我对驼二爷解释说，在五约山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反“倒林”，但不等于就不倒林，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多采取秘密斗争的形式，尽量争取群众，只有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上，我们才不怕敌人的封锁和倒林。当敌人集中一切力量从形式上去执行任务时，我们就是为一山一地付出牺牲，也不会得到大的收获。为了今后的工作，避免敌人的怀疑，可以让甘允吉当“铲共团”的团长。甘允吉本来是国民党的信徒，经过教育和改造，他现在已经是我们新发展的共产党员了。他当了团长，要他首先带领“铲共团”及当地的保甲和群众，以假积极的面目进行“倒林”。只是一条：砍山之前，必须有计划地和便衣队取得联系，事先转移彩病号。这种办法，可以叫所有和我们有联系的“铲共团”、民团和保甲长都这样做，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再向各地推广。

小屋里的光线渐渐黯淡下来，已经是黄昏了。同志们轻悄悄地来到院子里，舒展了一下身子骨。看到施大信走过来，我对他说：

“我到一队去。你回二队。”

我和驼二爷、施大信等同志一起离开老大爷家，分做三

路而去。

我带着两个交通，半夜时走到李家园的后湾，刚在甘树仁家里坐定，他就说道：

“便衣三队在去仙居顶的路上，叫敌人包围了。三队受损失不大，彩病号受到一些损失，昨天转回来，叫我把彩病号送到石壁冲沟里隐蔽。三队就在这附近。”

“他们留下地址没有？”

“他们说有事找他们，到甘树利家里去联系。”

“这里离甘树利家不远，你能去叫他来吗？”

“可以。”甘树仁起身走去。

在阴云堆天的黑夜里，胡明月随着甘树仁走来。一进屋，她就满不在乎地喊道：

“何指导员，甘树利当了副保长，我家比以前松一点。这里没有吃的，还是到我家去吧？”

“你坐下，先谈一下情况。”

“山也砍啦，乡也清啦，这一带没有暴露目标。……”她边说边坐在一个小矮凳上。

“这几天有人来吗？”

“有，”她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问：“你都带谁来的呀？”

“只有两个交通，到后洞隐蔽去啦。”

“呵，是他们呀。”她宽宽地出了口气。“在这里也不怕。胡民山大哥是今天来的，还有钱侉子，他们都在我家隐蔽着……”

“三队有人来吗？”

“三队长朱洋人刚离开我家。叫他们都来吗？”

“你马上通知他们到这里来。再告诉他们，从便衣队中抽出几名身强力壮的队员，集合到一个地方。”

“哎呀，这么多人，吃饭怎么办？”

我看着她那副神情，不由得笑了。

“这就落在你们女党员的身上啦！明天晚上，你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吃顿饱饭。”

“行，由我负责。三妹，三妹，”她扭身喊起甘树仁的媳妇，“一会有人来，把我家那点小麦面带来，你给他们煮一顿稀粥吃。”说完，她便走了。

河口县委书记董志新、便衣一队长胡民山、便衣三队长朱洋人和侉子钱运华来到后，我就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把一、三队身强力壮的队员抽出来，由朱洋人带领随我行动。剩下的身体弱的队员，由胡民山带领隐蔽活动。”

任务分配完了，董志新看到没有自己的份，主动提出要求说：

“河口县的几个同志身体都好，我们也跟你去打一场。”

“好，河口县的几个同志，由钱侉子负责集合。明天夜晚到甘树利家去吃饭。”

黎明时，我和董志新进入山洞隐蔽。

胡明月同志完成了任务，她用大麦仁夹着米煮了很多饭，还凉拌了一盆黄瓜。同志们到后，每人都吃了一个饱。然后，我们开始了长途跋涉。横过汉罗公路，渡过大河，同志们在一块叫旦二田的稻田上集合。

我一人爬进了茶坳，找到我亲门下的一个哥哥何耀如。

他一看到我，显得十分惊讶：

“你怎么又搞到这里来啦？这里非常紧张，正在修炮楼，连一点隐蔽的场子都没有……”

“这个炮楼是谁监修？”

“罗麻子和董治钧带一个班，每天下午才来。”他急得简直停不住脚，直转圈子，他是为我着急呢？还是想赶我走？难以猜测。他猛然站定，急匆匆地问：

“老四，你带来了几个人？”

“不少。”我莫名其妙地顺口应承。

“咳，泼了吧！你带的人多，就干掉这个炮楼。这个炮楼修起来，还要加修十几个，那就把你们的路口全给堵死了，连我们也活不成。”

“炮楼修得怎样了？”

“楼板都上上啦。趁他们没有盖瓦，你们就把它搞掉。只要这个炮钱修不起来，别的他也不会再修。”

我们来的任务，就是为了搞掉它。

“搞掉容易，没有隐蔽地，白天不好接近呀！”

“山都砍啦，只有到董家坟园去，就是渴，太阳晒得难受。我这里还有卖剩下的几斤肉，你拿去，想办法煮一煮，临动手的时候再吃，免得打起仗来没有劲，跑不动。”

“就是……”我有些为难地说，“怕敌人的正规军来了没有人报信。”

“我来报信，”他干脆利索地说，“董治钧和罗麻子你认识，要是他们来，那就没说的；要是正规军来了，我就喊二娃，喊的不急就是人数不多，我要是大声急喊，你们可要做

好准备呵!”我临走时，他还再三关切地说：“老四，你要记住，他们总是在下午来，一定要等他们来后，你们才能动手；不然你们可走不掉呀!”

东方发白，我们来到董家的老坟园里。同志们聚拢在一起，听我介绍地形和敌情：我们的正南是唐家店，离这里十八里路，驻着石武桥的民团；东南是乌子铺，是刘修斋的民团，离这里六里路；东北是肖家畈刘新武的乡警队，离这里五里路；正北十二里路就是宣化店，驻扎着一〇三师师部和一个团；西边的雷班寨是毛伯梁的民团，距此地仅三里路；姚家畈是曾伯龙的民团，相距十八里路；西南五里路就是王家桥颜灼文的民团；十五里路就是丰家店陈少堂、颜串铅的民团；硷子湾离茶坳是八里路，这一带都是赵凯清联保，茶坳的炮楼就是归他们联保修筑。

“总之，我们眼前处在三条封锁线和一条大河之间，离茶坳只有半里路。茶坳处在三条大路的交岔点。根据敌人兵力的部署、碉堡棋布、交通便利并有电话联络等情况，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斗，争取不响枪，不得已时也要尽量地少响枪，避免和敌人正面战斗。现在大家分散，各人监视一个方向。”

血红的太阳发射出万道光芒。民工们从四面八方伸展到河边的木鱼包聚拢，然后又分散开来，有的运砖，有的扛木板，有的和泥巴，有的抬瓦，忙乱不堪；号子声、叫骂声混合着人们痛苦的呻吟，此起彼伏。大路上来往的行人，更是络绎不绝。

同志们沉着、镇静地卧伏在董家坟园的坟包后面。强

烈的阳光，烤得我们燥渴难忍，真正是汗流浃背；没有一滴水喝，也没有一粒粮食。钱侉子可能有点熬不住了，偷偷地爬到我跟前。

“何指导员，什么时候干呀？”

“得等到下午，他们出来以后才能动手。”

“你的表几点啦？”

我看看手上的表，时针正指着十一点。

“也是十一点呀！”钱侉子翻身平躺在地上，仰望着炎热的天空说：“嗨，太阳被老天爷钉住啦，今天它动弹不了啦！”

“侉子，饿了吗？”

“没。昨夜出发前，我吃了八碗饭。”他轻轻伸了一下巴掌，比划着，大家不由得嗤嗤笑了。他还得意地添说道：“今天不会饿，明天还不会饿。”

“那么，”有人逗他，“干吗那样着急？”

“这和肚子没有关系，是手痒，想打个痛快！”

天气是越来越热，大家心里更加焦急。我不时看看表，它总是那么不慌不忙、滴滴嗒嗒地移动着。

蚂蚁成群成片地出动了，全力向我们身上攻击。不行，这样下去，就是等到敌人出来，也无法进入战斗；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我开始想窍门，东瞅西瞄，意外地发现看守坟林的董继门家的门口，有一只小水桶，在阳光下发出闪亮。心里一动，想把小桶拿来，提桶水叫同志们喝一口。可是，怎样个拿法呢？董家大小几十口，过去我们常在他家隐蔽，他家的人都认识我；自从刘庆梦叛变后，就再没有去隐蔽过，不知近来变化如何？派个人去，不行，出了问题更麻烦。

只有我去。

“你们注意敌人，我去弄点水来。”

我从坟堆间爬出，顺水沟接近前门。看看四下没人，刚刚伸出手去拿水桶，门里边突然蹦出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问：

“谁呀？”

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定睛看去，原来是小其毛。一被发觉就不好办了，只有把她带回去。我轻轻地喊：

“其毛，其毛，来，跟我玩去。”

小其毛瞪着一对小眼，似乎认出了我，摆动着小手说：

“叔叔，是你呀！我……我不说。你是想要小桶？”

“其毛，你在和谁说话呀？”不料她的祖母正坐在门里，这时伸出头来探听。

这下子可糟了！

聪敏的小其毛机灵地摇摇小手，对她奶奶说：

“不要说话，是叔叔要用小桶。”

老太太出了大门。“是你呀，老四，想喝水？”

到了这种场合，我只有点头称是：“天气太热啦……”

“你快回去。我就给你送来。”

“家里还有人吗？”

“男人们到河里车水去啦，媳妇们都去送饭了，家里没有几个人。你快走吧。”

我一路上心里直嘀咕，这家人变了没有？一回到原地，就对大家说：

“被老太太发现了，她还说送水来，不知可靠不可靠。

大家做好准备。”

不一会儿，小其毛跳着跑进松林。她母亲随在后边，把手里提着的小桶放在坟堆边上，就转身返回去了。

我走到坟边上，一手提水桶，一手拉着其毛，回到坟堆后面。我仍有些不放心地问她：

“家里有人出去吗？”

“没有，奶奶在给你们做馍馍……”

我们不能随便吃群众的东西。我取出一块银洋给她，小孩子没有见过这玩意，不要；钱侉子在一旁掏出几个铜钱，孩子非常高兴。我把一块钱递给她说：“把这个给你奶奶。”小其毛飞快地跑回去了。

其毛的奶奶和母亲抬着一个桶，还提着一个茶壶，仍放在坟堆边上，没有和我们见面就回去了。

有了这桶馍馍和水，问题完全解决了。

民团按照他们的老规律，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了。为了减少目标，我随手把小桶推倒在地上，然后细看敌人的行动。敌人越来越近了。

“注意，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班长董治钧，最后面那个大块头是罗麻子。”我一边说，两眼紧盯着敌人。同志们悄悄地爬拢来，等待着命令。“敌人是十一个，我们只有十个，要想搞掉他们，先要抓住董治钧和罗麻子，其他的人就不敢再打枪。”

敌人没有直接上木鱼包炮楼，在一家茶棚前停下来，把十一条枪靠在一边，然后进了茶棚。只有罗麻子还在外面脱衣服。

机会已到，我马上发出命令：

“钱侉子、朱洋人和我三个人对付董治钧和罗麻子，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跑掉；董志新和其他的同志，接近茶棚先抱枪。开始行动。”

我们爬出坟边，沿着弯曲的田埂边，穿过谷林，进到茶坳南头。我装做从山里出来买东西的样子，向茶棚走去。这时，窦明贵同志走在最前面，首先接近了茶棚。他还没来得及拿枪，有一个团兵认出了我，他不知说了句什么话，茶棚里马上混乱了。窦明贵趁机一抱，把十一条枪都抱在怀里。随后块头高大的朱洋人上前按住了董治钧。罗麻子见事不妙，扭头就向北跑，我紧追上去，一脚把罗麻子踹倒地上，钱侉子上去用手捏住了他的脖子。身强力壮的钱侉子，把罗麻子拖进茶棚，马上用绳子把他紧紧地捆了起来。窦明贵把所有的枪闩卸下来，把空枪发给俘虏们背着。

“罗麻子要捆紧一点，其他人可以不捆。”我扭过头又对董治钧说：“你是一个学生，你自己说，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你，你说的意思我都明白，这十一个人，都不会跑，由我负责，听……听你分配……”董治钧吓得直结巴。

俘虏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面孔很熟，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嘻皮笑脸地说：

“放心吧，我知道红军不杀俘虏，还优待呢，每人发五块钱，这样的生意到哪里去找呢？你看我们还会跑吗？班长，怕什么，你还得双份——十块！”

俘虏们都被逗笑了。不知谁又拉来了一个人，我一看，原来是陈经武——国民党的区长陈又文门下的一个哥哥，

便吩咐说：

“不用捆，叫他跟着我们走，到炮楼上去看看。”

俘虏们背着枪，董治钧在最前面，向着木鱼包走去。民工们只当他们是来监工的，仍然埋头干活。直到便衣队分散在炮楼工地的四面时，民工们才发现被捆着的罗麻子和看守俘虏的短枪。不等他们骚乱，我当即开始讲话：

“乡亲们，不要乱，不要跑。我们是来拆炮楼的，与乡亲们不相干。不过，请大家记住：茶坳的炮楼国民党别想修，他们什么时候修，我们就在什么时候把它打掉！乡亲们，请你们用锄头把炮楼的四角挖空，让它自己坍倒……”正说话间，我扭头发现韩允之已爬上了电线杆。忙喊：“韩允之，不准动！”因为一扯电线，敌人的正规军就会发现了。

这时，董国德气喘喘地跑来，看见他儿子没有被打死，急忙说：

“这……这没有什么，请大家到我家里去吃饭。”

董治钧听说他父亲要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吓得全身发抖：

“爹，不行，不能到家里去吃饭，干不得……怕将来连累村上的人。你还是把饭拿到河边柳树林里来吃，出了事情，我负责送他们出警戒线。爹，你不要怕，红军是不杀俘虏的。”

老头子听了儿子的话，连连点头，只是两眼紧瞅着我，似乎在等我的回答。一听我说“可以”，老头子象得了令箭一般，拚命奔去，就是小伙子也难以撵上他呵！

天麻麻黑的时候，我们都在柳树林里吃饭。这次没有

响枪的战斗，已经顺利结束，并没有惊动敌人，还可以乘机利用伪装战术打下硷子湾，给敌人的内部制造一系列的矛盾，免得他们摧残群众。陈经武虽然是陈又文的哥哥，但他很穷，又不亲，杀了他不起作用。为了保存这一带的工作，可以叫何耀如放了他，实际上是看住他，天亮后，再叫他们一同到宣化店区公所报告，这样还可以瓦解陈又文……

饭后，我向茶坳走去。走不远就碰上了何耀如。

“你怎么又回来啦？还不走，想在这里等死吗？走，走，我也跟你们一路走。不走就要死在他们手里。”他一边说，一边推着我就走。

“耀如，你不能走。你一走，这附近的群众就要受到更大的摧残。”

“呵，你是叫我陪着他们一路死呀！”

“你别着急呀，听我说……”我把我们的计划对他说了一遍。“不过，你这样一做，我们要把你的家烧了，这样陈又文可能受到感动。他要是问你共产党哪里去啦，你就说到陈家河去啦，这样还会挑起他们的矛盾。你记住了吗？”

我先回到柳林里。随后，何耀如才绕道走来了，他当着众人面前，对我说道：

“老四，陈经武先生是个好人，这一带出了事情都是他出面调解，你最好还是放了他吧。”

“胡说，他是个反革命，怎么能放了？再说，就连你也一齐杀……”

我闹腾了一阵，他悄悄地走开了。

临出发，我假装清查俘虏，不见了陈经武，大发脾气，命

令他们到处去找何耀如，没有找到。我怒气冲冲地命令：

“侉子，你带几个人把何耀如的家全部烧光!”

朱洋人和钱侉子应声跑去——只烧了一个小屋和门前的麦秸垛子。

天黑后，我们押着俘虏，大摇大摆地向硷子湾走去。来到炮楼近前，要罗麻子喊门。

“快开门！我是罗队长。”

“怎么这样晚才回来？”炮楼上问道。

钱侉子一手抓住罗麻子，一手用枪抵着他的后心。

“到何家家祠拆瓦去啦，百姓忙着车水，找不到民工。快开门吧!”

罗麻子编的不错。炮楼打开了门。团兵们全部做了俘虏。我们照法炮制，一连叫开了三个炮楼。把炮楼放一把冲天火烧掉，押着俘虏渡过大河，来到陈家河。我们故意惊动了全村的乡亲，然后把俘虏关进陈允之大地主的后房里。

诸事安排定，我们才离开陈家河。

一六　成功的经验

在塘凹，基本群众董新贵告诉我们说：“刘朗山从省里回来啦，在宣化店吹大气，说什么要报仇……”

刘朗山可真是这一带的大祸害。早在农民暴动时，打了宣化店就打沙河铺，把他那位自称“刘孔明”的祖父，还有他的伯父、叔父、哥哥都杀死啦。那时候他在开封读书，回来后，他老子一直教育他“反共报仇”。这一次，他在省里受

了训，又是在省里支持下回到宣化店，真是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区里要他当联保主任，他不干，非要组织“武装清乡团”，专门反共，还说什么凡是参加过农民暴动和抄过他家的人，他都要打死，打不死也要剥去一层皮！因此群众很恐慌，为我们做过保的保人，更是胆战心惊，只怕刘朗山把保人的名册在区里找出来，送到一〇三师师部，再一闹到省里，不单是保人个个要吃亏，就是被保出来的群众，也会重坐黑牢，还可能死一部分人……

要铲除刘朗山这条毒蛇，一时有困难。我想按下不提，以后再作详细的布置。还是先了解一下打茶坳的反应。董新贵简单地谈了些情况，说是民团里互相埋怨，特别是第三天从陈允之家里跑出来五十多个没有枪的团兵，这场官司打得就更起劲了。何耀如天一明就跑到区里去告状，陈又文说他为了陈经武，家里的麦子都被共产党烧啦，还赔偿了四斗小麦……末了，董新贵还是扯到了刘朗山的头上：

“何指导员，你们能打掉茶坳，就不能打掉刘朗山？他要是真的当上‘清乡团’的团长，本地面上的人又要死一层！”董新贵有些激动了。“国民党一向把这几条沟称做‘匪巢’，这几条沟的百姓，对共产党可真是真心实意呀！为了共产党，为了革命，死的死，亡的亡，坐牢、挨打、忍饥、挨冻，什么滋味都尝到啦，百姓们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看到革命成功，恢复苏维埃吗？何指导员，你能看着大伙再遭毒手？……”

董新贵说的对！这几条沟的工作再遭到破坏，“倒林”的围困根本无法解开，就是捉到洋人，也无法存放。打，确

实不易，刘朗山一行动起来总是跟着几十条枪，而我们一个便衣队仅有三、五个人。把警卫队调回来？不行，惊动了一〇三师，那就更难应付了。

“何指导员，你不是经常告诉我们，要坚持这块地区的革命斗争，保留革命的种子吗？我们，泼出几个同志牺牲带彩，也要搞掉刘朗山，保护革命群众。”朱洋人一旁看到我犹豫不决，就提议说。

“对，你们的意见很正确。”我下定了决心。“决定打。但要做好全面的侦察和布置。打的时间临时决定。”

“打”字刚出口，董新贵就嘻笑颜开了：

“刘朗山有事情还是要我跑腿，我可以经常供给你们情况。我看，在别的地方不易打到他，只有在七里棚；刘朗山霸占了七里棚猪店汪掌柜的媳妇王毛，他时常去，只要扑好机会，几个人就能干掉他。”

当天晚上，我在山岭上派人通知罗山县委副书记驼二爷，叫他黎明前到达后坳甘树利家汇合。驼二爷准时来到，说是粮食得到了解决，群众的情绪刚刚稳定下来，刘朗山又从省里回来啦，甘青山吓得要死，宣化店很多人都害怕，就连区长陈又文也有点不安。

我告诉驼二爷，叫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布置干掉刘朗山。刘朗山每次出来，总带着几十条枪，都是他姓刘的人。这些人我们不能都打死，最好是打死刘朗山，活捉刘新武。这样一来，不但吓住了姓刘的，还可能拉一些关系，使他们以后少做坏事。为了减轻这一带的目标，我要驼二爷设法通知阴河区区委书记关楚印同志，叫他带部队埋伏在吴家

大店的山岭上，只要听到仰天锅或和尚头响枪，就是我们打刘朗山，他们就准备接应，暗号是在山上插旗子。敌人如果追得急，关楚印拖不走敌人，再叫便衣二队把杨家桥施家岗炮楼里的地下党员带出来，拉住敌人的尾巴。还不行，就再叫便衣二队队长申功臣组织几个人，准备几条长枪，从孙家沟拖住敌人。

计议停当，驼二爷当即赶回去进行通知和作全面的准备。

白天很快地过去啦。天黑后，我又从便衣队抽出几个人，回转到塘凹。

董新贵还没有睡，见到我就问：

“你带人来了吗？今天才真是个好机会！”

“怎么？刘朗山去啦？”

“今天一清早，我就到了宣化店区公所。吃过午饭，刘朗山让我到肖家畈炮楼把刘新武叫去，还带了二十几条枪。刘朗山叫我找挑夫，说是要回家，走到七里棚就停下来了，把帐子、床具都放在汪家猪店里，还叫我买了些鸡子酒菜。刚才我才回来。他一定在王毛那里过夜，你们想搞掉他，今天正是个好机会。”他谈的情况很具体。

“好，确定今天打。你在这一带监视黄陂站和刘家冲沟的一〇三师，他们若是出动，你在乌石坡放火为号。”

他看到我要走，急忙补充说：

“你知道汪家的猪店吗？他们的老房子做了槽坊，新房子里住人。”

我把同志们集合到孙家坟园。一共十一个人，大家习

惯地围在一起，由我布置工作：刘朗山、刘新武都很年轻，遇事很机灵，也能跑，所以今天不能硬干，要伪装成一〇三师的别动队，以查店铺为名。为了不使他们怀疑，我们可以先查一两家杂货店，不过动作要快，少说话。胡民山带四个人从前门接近，估计他们不让查，你们只要发现刘朗山或刘新武，就打死一个，活捉一个。为了防备他们从后门跑掉，我和朱洋人守后门。其他的同志对付民团。

明月悬挂在当空，飕飕的夜风拂动着河边的杨柳——一幅夏夜的寂静。村镇在沉睡中，听不到一点声音。胡民山带领着同志们，顺利地摸掉了哨兵，然后大摇大摆走到街上，开始“清查户口”。我和朱洋人从稻田里运动到汪家猪店的后门。

从前门清晰地传来说话声：

“干什么的？”

“查户口！”

“这里不用查。刘主任在这里……”

“啪！”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

院子里一阵骚动。紧接着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后门轻轻开启，猛然跳出一个人来。我瞪眼看去，正是刘新武。我急忙向朱洋人打出手势，机灵的大个子轻巧地窜上去，不等刘新武发觉，双手已经卡住了他的脖子。我赶上去把他捆住。

胡民山跑来说：“战斗结束啦！”

“刘朗山呢？”这场战斗意外的简单容易，我实在有些不放心。

“刘朗山被打死啦。民团的枪也全部缴了。那些士兵正在河里洗澡，就叫我们给禁在水里了。屋里只禁了七、八个人。”

老便衣队的同志，枪法是百发百中的，这点我是相信的。但对于一枪就解决了这个战斗，心里总是不踏实。

“死尸在哪里？”

“凉棚下面。”

我急忙赶至凉棚，按亮手电照去，只见一片鲜血；连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跑啦！没有打中要害。”

胡民山愣在一旁。

根据血迹判断，他是跑向半里路之外的肖家畈炮楼去了。我扭头吩咐：

“把枪栓下掉，每个俘虏扛一支枪筒，到炮楼附近隐蔽。争取用伪装叫开炮楼。马上集合出发！”

到达炮楼下，几个民团士兵前去喊门：

“快开门，快开门，后边共产党追来啦！”

“算了吧，伙计，何必做的这样毒？我知道你是何老四。我刘朗山没有死，只是中了你们一枪。炮楼的门，你们是喊不开的。我以后不再做事情，你们快走吧！”

伪装已经失掉了作用，我即走上前去答话：

“你们的刘队长被我们捉住了，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伙计，”刘朗山仍然躲在炮楼里面不露面。“我们从小一起盘泥巴，你何苦这样？我刚才说过，以后再不管事情。

新武哥，你是知道的，我二大爷就他一个，你要什么，我给你，只求不杀他。”

“刘朗山，我们都是本地人，你不该欺压老百姓。以后你放好一点，不然还会有今天，一个刘朗山算不了什么。你告诉刘前初老先生，叫他在三天之内和便衣队接上头，并要送到一万石大米。”

听说不杀刘新武，刘朗山十分客气地回答说：

“何先生，我一定告诉二大爷。”他又搬出我们的政策，一面是压我一下，一面是安慰刘新武：“新武哥，你不要怕，红军到处都有标语，你也看过，他们是不杀俘虏的。你放心吧，我一定告诉二大爷，三天内把东西送到。那时何先生就会放你。”

“刘朗山，你打电话叫一〇三师来追吧！我们要到你家去吃饭。”

“何先生，我这已经够受啦，何必再给我按个矛呢？电话我是要打的，一〇三师不归我调动，他们夜晚不会出来追的。快走吧，不然探照灯一照，你们在公路上不好走。”

“有刘新武先生在一起，我们不怕……”

我们直奔沙河铺而去。

自划破静夜的第一枪响后，民团的枪声也就随之四起，探照灯的光柱到处晃动。在激烈的枪声中，在白色的光网下，我们从枣林岗插宣化店东边，到达络家大塘。看看表，还不到十二点。枪声已经留在背后，那些白线条也都显得遥远了。我们原计划战斗打响后，把目标拖到无人的光山上。但附近的反动武装只是固守炮楼空打枪，硬是不出来

追击，我们拖到空山上又有什么用呢？为了拖延时间，暴露目标，引诱敌人，我们靠近了络摇文看守的炮楼下。

“络摇文先生，请你开开门，让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好吗？”我高声大喊。

“你是何老四吧？”络摇文在炮楼上答话了。“你打了硷子湾，又按了他们一身的矛，官司直打到现在还不开交。今夜响了半夜枪，你又在搞谁呀？我看你是从宣化店过来的，又想按我的矛吗？”

“不是，不是。”我否认说。“刚才我们打了刘朗山，太费力，打的时间又长，实在很疲劳，想找点水喝。请你下来，给你介绍个朋友——看看我们捉的是谁？”

“嗨，你打刘朗山不会要活的。活捉的定是刘新武。伙计，你不要这样缺德，刘前初老先生就他一根苗，你可不能杀掉他，要什么东西我可以通个信。伙计，从今天起，我再不和你们作对头了，你也不要按我的矛。你快走吧！”

“不要怕，我不会给你按矛。快下来给我们点水喝。”

“不管说什么，门，我是不开的。炮楼里也没有水，只有几个西瓜，送给伙计们吃。”说着，窗子上吊下来几个大西瓜。

“络先生，你送西瓜不给刀子，这怎么吃呢？”

“你们还少了刺刀？我看你是故意拖延时间。”

“我们从来都是盒子枪，哪来的刺刀？”

“嗤”地一声，月光下一把刺刀落在地上；而西瓜却早已进了同志们的肚子里。

“何先生，我以后再不反共，否则和谭拥之一样。求求

你们快走吧，要叫他们知道了，我全家都得变成鬼!”

我看络摇文实在吓的差不多啦，就说：

“络先生，说话可要算话。我明天到和尚头、仰天锅，你带他们来追吧？”

“我要带他们去追就是个王八蛋。”

“好吧。以后再见。”

黎明时，我们上到罗山县一、四区交界岭的最高峰——和尚头休息。为了显示目标，同志们在山岭上到处跑着玩，有的在抽烟，也有的睡大觉，可是直到太阳当头，却不见敌人到来。我感到不大对头，刘朗山打电话后，一〇三师布起了探照灯，这证明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离宣化店又不远，为什么不见敌人的面？不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难道敌人知道我们的目的，到前面卡路口去啦？……越想越不对头。我使了个眼色，胡民山、朱洋人随着我走到一个石头边。

“不对呀！我们这么闹腾，为什么不见敌人的动静？敌人到现在还不来追击，很可能跑到我们前头，到姚家湾、吴家凹、雪成坳一带的山岭上按埋伏，想在那里合击歼灭我们。你们考虑怎样？”

胡民山低头闷想了一会说：“这完全有可能。敌人知道我们顾群众，捉到人后不会拖向一区，所以才埋伏在那一带，堵住我们到九里十八寨的去路，想在那些山沟里歼灭我们，救出刘新武。”

意见取得了一致，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我们原来计划白天在这里打响，关楚印和同志们就来接应。现在敌人不来，没得可打，如果到夜晚再打响，就可能和自己的部队发

生误会。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上高庙的最高峰，站在那里可以看得更远，如仍看不到敌人，就顺着路两旁没有被砍掉的矮青稞子里，隐蔽着向官家楼的山岭上运动，那里离关楚印他们埋伏的地方不远，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

大家挨了一天晒，共同的要求就是想喝水。当我们爬上了高庙的山峰顶时，一个新同志提议说：

“何指导员，这里一望无边，根本没有敌人。下到沟里喝点水行吗？”

“绝对不行。这一带所有的水沟，敌人都下了毒药。胡民山，你带两个人留在山上看住刘新武，如果前面打响，你们都公开地走下来。其他的同志随我来。”

我们下了山岭，从山边上没有砍完的矮树棵里隐蔽地、观察着向前运动。刚刚爬上官家楼的坳口，朱洋人回头对我说：

“前面就是敌人的埋伏。”

“敌人发现我们了吗？”

“没有。我们背着阳光。”

我向前方看去，我们和敌人相距不到一、二百米。敌人是一个排的样子，步枪分三堆架着，机枪前面有一个人。其余的大兵都没有穿上衣，坐在树下风凉。我看了着四周的地形，为了争取主动，急令：“打！”一抬手，十发子弹早已飞出枪膛。

八支盒子枪响了一轮，估计敌人一个排没有剩下几个人，我们便迅速地占领了一座山峰。再向四外看时，关楚印同志的白旗暗号已经插了几处。我一招手，胡民山远远地

看见，立刻拉着刘新武公开向山下走来。其他的同志都向着白旗跑去。

朱洋人来到我的身边："没有剩几个，敌人没有来追。快走呀！"

为了暴露目标，指挥敌人，我对他说："诱敌合击高庙！"说着，两条子弹飞向高庙。一转身，我们隐蔽着插向白旗处。跑到一个地势较高的白旗下一看，正巧是关楚印，他亲自掌握着一挺机枪，在这里准备迎击敌人。而敌人真的把白旗当作"铲共团"的旗号，没有向这边追来。

敌人只注意到高庙上下来的人，没有注意到白旗下跑动的人，于是集中了兵力，从官家楼压下来，直奔高庙而去。

黄昏时，敌人合击高庙的枪声还在震撼着山谷，而我们已经插到敌人的后边，进入滴水岩休息。

一七　伸向河口

晚上，我们转移到郑家河棚村头上地下党的联络点——小饭店附近隐蔽。我一人走进店里，装做买烟的。王文兰同志暗示我店里住有客人。我买了烟，立即抽身走出饭店，在一棵大树下停住。王文兰随后跟了出来，对我说：

"今天早晨有两个同志在新庙受包围，敌人除民团外，一〇三师还去了一个营，直到天黑还在各山岭上搜。听行路的人说，国民党天一亮就把新庙围得紧紧的，还打了一阵枪，后来一个大个子从'天上'跑啦，一个麻子从门口冲出去啦。被包围的究竟是哪个便衣队，现在还不清楚。"

新庙是河口县的地区，在那里受包围，很可能是河口县委书记董志新和钱侉子。

“情况可靠吗？是不是你丈夫了解的？”

“是木匠在四姑墩赶集，有一个共产党跑进四姑墩，把集都闹乱了。木匠回来的时候，国民党还在满山上搜呢!”

听了王文兰的话，我心里非常着急，因为捉洋人顾问的计划，在这边仅有董志新一个人知道，仙居顶的交通要道又是他负责，仙居顶一被破坏，我们整个的计划就会全部破产。只听到一处的消息，不能算绝对可靠，为了证实这项消息，我马上赶到地下党的另一个联络点凉亭饭店；地下党的彭同志和王文兰谈的情况一样！彭同志并且说：

“你们今夜不能去仙居顶，去就会碰到危险。”

彭同志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在眼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出去活动，很可能遭受意外的损失。但是，仙居顶的同志们和地下党的各个支部怎么办呢？不行，不能停在这里，要抓住这千钧一发之际，尽一切力量维护党的组织，挽救同志，保住仙居顶要道！我下了决心，对大家说：

“这两个同志对革命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失去革命者的警惕性。马上出发。”

一阵急行军，我们当夜赶到板叉，进到地下党支部书记雷荣真同志家里。雷荣真也有个老规律，正和刘清翼的老规律相反。每次和我们见面，刘清翼总是先谈正经事，再谈杂事；而雷荣真总是先张罗着休息吃饭，而后再谈工作。这次也不例外，刚把我们领进屋里，就忙着要和老伴去做饭。我急忙对他说：

“不要忙，先谈一下情况。”

雷荣真的老规律一下改不掉，照样嘱咐他的老伴去做饭，然后才回到屋里说：

“这几天听说你们在各处打仗，这一带倒还清静。不过今天四姑墩响了一整天的枪，不知是谁又在那边打？”

“可能是董志新和钱侉子受包围。”

“把他们捉去啦？”雷荣真吃惊地问。

“情况还不很清楚。不过根据群众说，一个大个子从‘天上’跑啦，可能是侉子翻房子跑脱；还说一个麻子从门口冲出去，估计是董志新，危险比较大。两个同志都有被俘的可能。不过我们还是提高警觉。你马上派人分头用传呼的方法通知各地，叫他们注意情况的变化，随时准备转移。”

雷荣真出外布置完工作回来，就招呼大家吃饭。看到那些香喷喷的大米饭，我非常惊奇：

“哪里来的米呀？”

“咳，忙得啥也忘啦！这几天便衣队搞得有米，昨天还给我送来了一挑子。”雷荣真还是按照他那老规律，饭一做好就打发老伴到外边放哨去了。

“天快亮了，你看到哪里去隐蔽？”我心里一直发焦。

“到河沟子湾上段家的后边去隐蔽。我告诉你老嫂子注意情况，我也在外边放哨……”

雷荣真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老伴惊惊慌慌地跑进屋里说：

“山上，有人走动……。”

粗鲁的朱洋人跳了起来：“这个家伙来的好快呀！我出

去看看。”

“朱洋人！不能这样鲁莽。”我厉声喊住他。新庙离这里几十里路，如果他们没有被俘，也得到这时候才能来到这里。“大家都出去，一边散开隐蔽，一边观察后边有没有敌人跟随。如果只有一个人，就是突出敌人重围回来的。”走到后门，我又对雷荣真说：“你随我们出来隐蔽，家里只留下老嫂子。”

眼看着董志新贴着院子的墙边，转向了前门。他身后再没有一点动静。我压低声音说：

“雷荣真，是董志新回来啦。你快进去看看。我们在这里不动，你叫我们时用老暗号。”

雷荣真走了不一会，就传出来暗号声。我们重新走进院子。这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中，我握住董志新的双手，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觉得他手上有些发粘。

同志们围着他。没有人说话。

最后，董志新流泪伤心地说：“侉子可能牺牲啦!”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仍然拉着他的手，并肩走进小屋，借着油灯的光亮，只见他的身上、头上、手上，和一双赤脚上都是鲜血，就象刚从血水中拉出来一样。衣服已经成了条条块块，根本遮盖不住身子。看着眼前的景象，听着董志新同志的哭声，想着钱侉子生死不明，同志们不由得热泪盈眶。

胡玉先默默地把自己的衣服和鞋子送到他跟前；雷荣真轻轻地端来一盆热水……

他那伤痕斑斑的身上和脸上，还在流着血。我抑制着

痛苦的心情，轻声问他：

“负伤了？”

“没有。都是跌的、荆棘割的。”他直盯盯地瞪着双眼看着我，大粒的泪珠成串地滚动下来，他丝毫没有理会，也不去擦它。我懂得他的心，他痛苦，落泪，并不是为了自己的遭遇，他在惦念着和他形影不离、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钱侉子。

许久，他的目光才转动了一下，重复说：

“侉子可能牺牲啦!”

“侉子没有牺牲，他跑到四姑墩去啦……”

我的话音未落，董志新的身子突然震动了一下，猛地打断我的话：

“那就不对头！我们不能在这里，赶快上山隐蔽。”他迅速地向水盆里捞起手巾，擦了一把，就忙着换衣服。

我解释说：“估计他可能和四姑墩的地下党接上头，隐蔽起来了。”

“不对，你们不了解情况，昨天包围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四姑墩的民团。”

老嫂子端来了饭，董志新胡乱吃了几口，然后催促说：

“何副书记，我们快去隐蔽吧！还是注意一些好。”

钱侉子如果没有被俘，今天可能到这一带来接关系，我们不能远走。

“大家到河沟后边去隐蔽。雷荣真去告诉段家，注意村上来生人。中午不送饭吃。”

半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中午时，韩允之从秘密哨

位爬回来说：

“南边来了一个人，看样子象是买牛买猪的。近看时，他头上戴着破草帽，身上穿着破土布衣服，肩上驮着一只钱袋，手里还拿着个长渔鼓；真是四不象。很可能是国民党的侦察。他鬼头鬼脑地向段家门前走去。”

“你注意后边有没有敌人的埋伏。”

韩允之爬回哨位。我便向段家的后墙边爬去，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段家院子里的动静。

那个“侦察”拿着长渔鼓，看看四处无人，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就大步走向段家门前。段老大娘看到有人，急忙走进来，关上大门，牢牢地上了门闩。

那“侦察”一见老大娘关了门，出乎意料地高兴起来，手舞足蹈，随着兴头就使劲打起渔鼓来：“咚咚咚，咚咚……”

渔鼓有节奏地响着。他突然大声高唱起来：

渔鼓打得响连天，
只见贤东把门闩。
要是闩门写田约，
我与东家讨酒喝；
要是闩门谢中人，
我与东家讨盘钱。
我请贤东门打开，
斗大元宝要进来。

段老大娘听着声音有点耳熟，就悄悄地走到门边，从门缝里向外仔细一瞄，有点象是钱侉子！她犹豫了一下，才把

门打开。钱侉子看到门已打开，只当是自己的目的已达到，张口就是一阵大洋笑。看着他那副鬼样子，段老大娘也不由得笑了：

“侉子，你来干什么？有人说你过去啦，是真的吗？”

“干妈，你看，我侉子能这样没有良心，叛变了还来害你？”侉子“嘿嘿呵呵”地笑着走进院子里，满不在乎地问：“干妈，有人来吗？”

“从你们走后，再没有人来过。”段老大娘回答着，瞅机会给她十岁的孙女儿递了个眼色，小孙女偷偷地溜走了。“这里没有米，就是来了人我也没有办法。……”

老有经验的钱侉子，早已把她祖孙俩的动作看在眼里，知道附近有人，再三询问，老大娘一口推说不知。钱侉子这才感到问题严重，急忙收敛笑脸，郑重地说道：

“干妈，我昨天受包围，跳楼跑到四姑墩去啦……”

这时，我已爬回隐蔽地。小姑娘钻过荆棘棵，跑来说：

“那个叫侉子的人到我家来啦，奶奶叫我来说一声。”

我们正拉住小姑娘问这问那，荆棘棵里一阵响动；钱侉子提着一小桶饭爬进来了，劈头就说：

“你们好呵？把我当叛徒啦？不会，敌人永远捉不到我钱侉子。”

钱侉子爬到我跟前，把小饭桶放在地上，心情沉重地说：

“我没有完成任务，我们的董书记不知下落，昨夜我跑到新庙附近看了看，没有见到尸体；可也没听说被俘呵！”

“董志新回来啦。他在休息。”

钱侉子一听，脸上立刻恢复了那种无忧无虑的笑脸：

“呵，他倒跑到我前边来啦!”

董志新听说钱侉子回来了，立刻爬了过来，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

“你可回来啦!”

“回来啦，可这口气不能不出呀！董书记，昨夜我又到新庙去啦，保长吴少华还在屋里。今天何指导员又带着人，我们一路去干掉他!”

听到钱侉子的要求，董志新才正式叙述了他们的全部经历——

那天半夜，董志新和钱侉子二人走到新店村，到保长吴少华家里隐蔽；这里是河口县没有被破坏前的一个老联络点。他们原想从这里扎根，再慢慢地向前发展工作。吴少华表面上跟过去一样，暗地里却向民团报了密。黎明前，敌人就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竟没有发觉。天亮后，敌人突然攻了上来，吴保长家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了。董志新和钱侉子在楼上沉着应战。敌人已接近院子，火力十分猛烈。为了突围，董志新叫钱侉子从楼上跳下去，目的是想带动敌人。还好，当钱侉子跳下去后，敌人去追他，院子里松了一下，董志新趁机冲了出来，随之就和民团卷入战斗，边打边退，找到一个隐蔽地就打一阵，然后再跑。直打到后来敌人不敢近前搜索了，董志新才跑脱了身。……

“追你的是民团，可追我的是一〇三师!”钱侉子接口说道。“幸得四姑墩逢集，我往人群里一钻，敌人瞎打枪，集上的人全乱啦，我被夹在乱人丛中，混进四姑墩的一角隐蔽起

来。等混乱和搜剿过后，我才慢慢找到了地下党员吴继发，吃了一顿饱饭，又跑回新庙，看到吴少华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兴高采烈地走进他家大门。当时真恨我是一个人，不能一把抓住捏死他！何指导员，你说要这种保长有什么用呀？我要求干掉他。”

他们二人的意见虽然一致，我似乎觉得还不够杀的条件。董志新看我不下决心，补充说：

“这一带很多过去的老联络点，看到河口县失败啦，都变了脸。再说，这里是三条路口的一个坳口，为了保住重要的交通要道，镇压反革命，开展工作，还是杀掉他。”

董志新的意见提醒了我：这一条山岭原是陂、孝、北工委，河口县，四姑墩，红安县五区进罗山的要道，因为路途遥远，来往的同志们必须在这一带山上隐蔽一天，如果出了坏保长，敌人再修起一条封锁线，我们今后的工作和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阻碍。

“朱洋人，把同志们集合起来，大家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杀掉报密的保长，镇压这一带的反革命，稳定群众的情绪，把革命工作慢慢地伸向河口县境。

既然决定干，就要清点人员，作好准备。胡民山带一个人去押刘新武，还剩九个人，加上董志新和钱侉子，又还原了十一人。十一把盒子枪干掉个把人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新庙的四周都是炮楼，近者一里路，远者不过五里路；而离开我们能够隐蔽的根据地，都在六、七十里路以外。一响枪，四外的敌人一增援，加上又没有可靠的群众关系，单凭在秃光光的山头上和敌人周旋是很难想象的。

“同志们，为了完成任务，天一黑就要出发，天亮前赶到新庙找好隐蔽地。明天下午四点钟动手，天黑前一定要结束战斗。胡玉先和钱侉子现在隐蔽着到雷荣真家里，叫他多煮点饭，尽量准备一些整根的黄瓜。”

深夜三点钟，我们来到高山塘村头停下，想找点水喝。大家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由钱侉子进村“打探”。他使出了侦察员的姿态，猫着腰，左听，右探，前看，后瞄。一闪身就消失了。转眼之间，他又出现在我们面前，粗声粗气地说：

“怎么回事？十几户人家连个放屁的都没有！”

也就是，这一阵连个鸡犬之声都没有听到。可能是群众搬了家。

“侉子，再仔细去看看，可能是你们受包围，敌人强迫群众搬了家。”

“哼，敌人也知道我们的厉害，那就好办。”钱侉子嘴里嘟哝着，转身进了村子。

钱侉子再次返回，我们的估计证实了；全村空无一人。

“没有人正好，走，到前边塘里去喝水。”

钱侉子头前带路，十个人后边跟随。来到塘边，月光下，看到满塘都是狗屎牛粪，根本没有水。

“都干啦！”钱侉子很是惋惜。“走，那边有个浅水井。”

仍然是他带路，十一个人转游到井边。钱侉子忽然客气起来，躲在一旁谦让说：

“请，你们先喝吧。”

同志们走到近前一看，根本不是个井，只是个较深的

坑。水，倒是有点，统共不到一桶，水上漂着一片片的——还是牛粪。大家谁也不愿意喝。

钱侉子看到同志们都不喝，急忙走到坑边。

“几个月没有下雨，你们还想喝清水？不可能，同志。依我说，”他故意把腔调弄得文诌诌，“这样的水营养价值还比较高。”说着，他伸出一只大巴掌，“嗤”地一下，拂去水面上的牛粪，两只大巴掌一合，捧起水来“噗哧噗哧”喝了一气。

同志们都被逗笑了。一两个实在渴得忍不住的同志，也才喝了一两口。

新庙的东头有一个没有水的大塘，塘边上有一些半人高的青荆棘棵子。十一个人爬在这唯一的隐身之地，除了眼珠不受限制外，浑身上下不得动弹，也不能发出响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罗公路上来往不断的各色行人，和忙碌着运送砖瓦的民工，还可以听到打麦场上的呼唤声和喧闹声。

流汗和饥饿似乎已成了常规，没有人提它，就连爱说爱闹的钱侉子，这阵也老实多了，两眼不停地看太阳。我看看表，已是下午一点，便轻声地对他说：

“把饭拿出来吃吧。”

钱侉子四外望了一眼，对同志们说：

“拿碗来吧，不管是早饭还是晚饭，都是它。”他塞了一把黄瓜给旁边的同志，要他传递下去，然后给每人盛了碗冷饭。

公路上的行人开始稀疏，打麦场上的工作也接近结束。

这时，从场边不远的一个门里，走出一个穿白短衣的人，手拿扇子，摇晃着走进打麦场。钱侉子赶快凑近我，低声说：

“他就是报密的坏种。今天非要把他的白衣服染成新娘子穿的红袄。”

姓吴的保长在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个女人送来一壶茶。他摇着扇子，品着茶，眼巴巴地看着打麦场上的挑麦人。我四面观察了一下，再看看表，将近下午四点。

“时间到啦。从公路上走，装一〇三师的别动队。开始行动。”

我们从一条小沟里上了公路，笔直地走进打麦场。

吴保长看见来了人，连忙站起来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

“一〇三师的别动队。”走在最前面的朱洋人简短地回答说。

吴保长刚刚向前走了几步，钱侉子沉不住气，跑进场上，拿起一把耙头直向保长奔去。吴保长见事不妙，拔腿就想跑，朱洋人长胳膊一伸就抓住了他。这时，同志们早已散开，包围了这个仅有六、七户人家的村子和打麦场。

董志新出现在场子上：“乡亲们，我们相识很久啦！情况紧张时，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不叫我们在你们家里隐蔽。但是吴保长不应当表面上很好，暗地里去报密，下此毒手。他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反革命行为。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镇压反革命。……”

钱侉子在一旁听的不过瘾，跑进场子喊起来：

“你们看到了吗？保长见阎王去啦，可我钱侉子的头，

还长的硬着来。今后谁去报密，也叫他去见阎王。……”

我们转移到山上的时候，董志新说：

“我们不能返回仙居顶，如果再把那里破坏了，就会影响到整个的工作。我们回到河口县地区去活动，为了镇压反革命和策应反‘倒林’，先把反动的炮楼毁掉，然后活动在汉罗公路上，阻止敌人的运输，争取打毁一辆汽车。”

“能达到这个目的最好。可以以这里作为基础，再向前发展。如果你们能够一系列地行动下去，可能把山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拉出来一部分，使山区喘口气。我也不回仙居顶，很快返回罗一区，讨论释放刘新武的问题。”我看到只有他和钱侉子两个人，不放心地问：“你们两个怎能行呢？”

“另外两个同志有任务，我已经给他们留下地址，今明即回来。我们有四个人，在群众的帮助下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大家亲切地握了手，便分别了。

一八　火烧敌营

在五家河村边的一条沟里，我见到罗山县三区便衣队队长施大安，他汇报说：

“我们已和区委书记王定堂取得了联系，他对便衣队的工作作了一些指示。全区虽然很紧张，各便衣队仍在原地坚持活动，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只要能制造全区的紧张环境就有办法。当然，施大安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制造这种紧张，所以也不能作出比较全面的汇报。我告诉他：

“环境越紧张，你们就越要设法坚持，越要和群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只要有了群众基础，就不怕环境紧张。你回去后设法通知王定堂同志，叫他抓紧时间到一区去，我在那边等他。”

同一个夜晚，我们沿着通向宣化店的大河，一直走到陈家河才渡过大河，翻过东丰庵的大山岭，到达张家墩村头上张宏胜的小肉店里。张宏胜忙说：

“刘家冲沟北湾来人说：南湾一〇三师的一个团，中午时紧急集合，到黄陂站去啦，天黑还没有回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追问：

“消息可靠吗？”

“是刘云焕送来的。他找驼二爷去了。”

时间已是午夜一点。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

“同志们，急行军赶到刘家冲沟。”

一见面，刘清翼照例先谈情况：

“南湾一〇三师一个团到黄陂站去，连军用铁锅都挑着呢。下午刘达诚从炮楼上来，说这里由他负责留守，围子里还有一〇三师一个连看守营房；一〇三师临走时对他说，明天不返回来，就叫他把这一个连和彩病号送到宣化店。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分做两路去找驼二爷，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何指导员，你既然来了，一定设法把他们的围子烧掉，免得这些畜牲再回来。”他最后还加上一句：“要是你们人不够，我也去。”

“清翼，”我止不住高兴地说：“你去岩山炮楼上把小麻子叫来。我再等一下县委来的人。”

小麻子和刘达诚一样，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刘达诚在民团当上队长，小麻子给他当分队长。小麻子赶来了，一进屋就说：

“这才是个大好机会，打是不行，只有烧。”

显然，他们连作战的方法都考虑到了。我问他：

“你去南湾了吗？”

“下午去了一趟。刘达诚说，一〇三师那个连驻在塘角上的一个大炮楼里，其他的炮楼多半是空的，就是有人，不是门诊所，就是住的护士、彩病号。”

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只有用火烧掉他们的营棚，再接近他们的炮楼放火，只要敌人的一个连出了炮楼，战斗就好解决了。

这时，驼二爷带着胡民山和县委警卫班的六个战士来到了。我告诉驼二爷，大家的意见是用火攻，不过敌人的一个连想全部歼灭是不可能的，只能把他们赶跑。驼二爷说，他和罗山县委书记张家胜商量的结果也是用火烧，所以他只带来了几个人。驼二爷并且告诉我，敌人在宣化店的一个团，被扯在九里十八寨回不去。有情报说，汉罗公路上的烟墩炮楼已被烧掉，还打了一辆汽车，所以拉动了一〇三师驻黄陂站的一个团，这里的一个团才赶到黄陂站驻防。明天就是这里打响，敌人也没有正规军的援兵了。……董志新和钱侉子他们行动的好快呵！真是英勇干练的好同志。

时间已是深夜三点，我布置任务说：

“为减少这一条沟的目标，小麻子负责通知这一条沟里的炮楼，要他们听到枪声后，都放空枪，以迷惑敌人。天明

后，小麻子和朱青山保长带领着炮楼里所有的民团，向张家畈假装追击，再到宣化店去报告，就说共产党过了河，从张家畈过河奔向麦陡关方向去啦。郑保长和甘保长也带上民团，假装追到东丰庵。刘达诚在枪声最激烈的时候，可以放弃炮楼向胡华山的炮楼跑去。现在开始行动。”

我们到了南湾，沿着围墙察看一遍，临时决定胡民山、朱洋人和我各带一路，分三处放火。

刹时间，火舌变成了火柱，浓烟直冲云霄，围子里一片红光。刘达诚炮楼上的枪支和我们仅有的六条长枪，同时集中火力，向塘边上的大炮楼猛烈射击；一〇三师的一个连在那里固守还击。火势借着风力，越烧越大，刘达诚带着他的民团，从火光下跑掉了。大炮楼旁边的一个炮楼，烧得里外通红，摇摇欲堕；突然轰隆一声，侧向大炮楼倒去。在大炮楼里固守的敌人慌乱了，七零八落地穿过火苗，夺路而逃。胡民山眼看敌人要突围，机动地埋伏在塘埂上。朱洋人已经缴获了敌人的四条马步枪，也赶来埋伏一旁。敌人的几挺机枪跑掉了。他们对着后边的敌人。一排步枪打去，随手掏出盒子枪，跳起来压了上去。敌人真是丢魂落魄了，一个班长带着全班举手投降，把一挺机枪和十几条马步枪送到我们手里。战斗基本上结束了，敌人逃的逃，降的降，伤的伤，亡的亡。同志们立刻奔向没有被烧到的炮楼，把那些护士、伤病员赶了出来，纷纷从炮楼里往外搬运子弹、炸弹和西药。然后放火燃着炮楼。

炮楼里没有来得及运出的子弹、炸弹劈哩啪啦，轰轰隆隆地爆炸了。火势漫延，围子里一片火海，真是映红了半边

天，赶走了黎明前的黑暗。一条沟里的民团炮楼都在打枪，更是火上添油，分外热火。

同志们押着俘虏，扛着缴获品，来到火圈外面。凡是自动缴枪的俘虏，每人发给五元钱，没有缴枪的每人发给二元。这时，驼二爷走来说：

“县委警卫班的一个小同志负伤了。”

我赶到小同志的身旁。伤在腹部，肠子已经脱出来了，疼痛难忍。显然，无法把他带到山上去隐蔽了，放在刘清翼家里，又怕被敌人发觉……大家正在为难，刘达诚独自返回来了，看到我们还没有转移，非常着急地说：

“你们怎么还不上山？！天都大亮啦。”

“一个小同志负了伤，肠子脱出一节，抬到山上就是死。你们能想办法用民团的名义，把他送到宣化店去治疗吗？”

“是哪里的人？”刘达诚问。

“就是你们中畈的，刚参加不久。”

“可以装小麻子炮楼上的人。叫刘清翼先抬到刘海前家里，我随后就去。”

小同志被抬走以后，刘达诚又拉住我说：

“何指导员，我来，有个事想问你：你和胡华山有关系吗？我们跑去他不想理。”

“达诚同志，这正是个好机会。胡华山相当反动，不但没有争取过来，他还和邹琴生混在一起共同对付我们。你到宣化店给他按个矛，就说他听到枪声不来接应。如果能搞掉他，从老君山到洪家河这条封锁线就搞开了一个大缺口，今后这条河也就会少出问题。”

“我来就是这个意思。好，你们快上山吧!”刘达诚说完就走。

我一转身，忽然接触到放在地上的那许多炸弹。

“达诚!”我喊他回来，“一〇三师要是来的快，这些炸弹运不走怎么办呢？”

刘达诚看了看满地的胜利品说：“这不要紧，时间来不及，干脆都搬到门口和塘边上。如果一〇三师来搜，就说是我们追下来的。你们赶快隐蔽。……”

我们隐蔽在山上的石洞里。半上午时，小麻子来了，一进洞就哈哈大笑说：

“昨夜的把戏玩得真好，我们还得了赏钱呢!”

看到小麻子那股高兴劲，我们就放下了心；没有出大问题。

小麻子接着说：“一大早我们就去报告，说共产党从张家畈过河到麦陡关去啦。旁边走来一个彩号，也插嘴说：就是，天明以后共产党才走的。你看，这样一来事情不就好办了吗？他们估计昨夜是九里十八寨的共产党过来打的，打完又返回九里十八寨了。并且对我们说：你们是好老百姓，每人赏你们两块钱，回去好好守住炮楼……”

我告诉小麻子：“我们有一个小同志挂彩啦，我叫刘达诚用你们民团的名义送到宣化店去治疗，你要和刘达诚挂好钩，不要出漏子。”临走时，我嘱咐他：“到现在虽然没有出事情，可不能麻痹，随时注意这一条沟的情况。”

中午，秘密哨胡玉先爬进石洞说：

“一〇三师转回来啦，看样子至少有两个营，也可能是

一个团。”

“朱洋人，你和胡玉先去，注意隐蔽，仔细观察敌人的行动。”

一〇三师进来这样多的兵力，会不会搜山呢？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达诚来到石洞里，告诉我们：一〇三师驻黄陂站的那个团，进来了两个营，目的是清查东西和搬运彩号。他们不在这里驻，马上要到沙河铺去驻防。看样子，这里以后不会再驻敌人的正规军。我们县委警卫班那个负伤的小同志，由刘海前通过区公所的关系，送进了一〇三师师部的医院，他的母亲也接到医院里去了。刘达诚又说：

“我和胡华山在一〇三师参谋长面前打了一场官司。师参谋长最后判决：当场扣押胡华山。他所有的枪，已经被进来的一〇三师缴掉，并且全部交给了我们。他的炮楼叫民团给烧得精光。我们仍守原地。”

果然，刘达诚走后不久，胡玉先回来报告：一〇三师又返回东丰庵去啦。

我们转移到罗山一、四区交界的周家岗空山上，见了张家胜和驼二爷。根据他们的汇报，知道山区的粮食基本上已解决，并且了解到关楚印他们的详细情况。——刘新武交给关楚印以后，就被送到九架山一带隐蔽。关楚印又带着部队，到九里十八寨附近活动。第二天上午，一〇三师的一个营追上来打响了。关楚印他们边打边退，退到九里十八寨的三扒老寨子跟前，向寨子上喊话说：你们这个寨子太

顽固，不缴红军粮，今天我们开大红军来打你们！关楚印他们前打寨子，后打一〇三师。等到一〇三师逼近寨子，跟寨子上的火力交锋后，关楚印立即抽出部队，隐蔽在山上休息，观看恶虎相斗。寨子里只当是大红军来了，顽强固守；一〇三师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寨子附近消失，只当是进了寨子，就集中火力硬攻。一个营不行，又调来一个营，连炮也拉进了山区；三扒老的寨子就在一〇三师的炮火下烧了个精光。这时候，关楚印在山上看到时机成熟，带着队伍从山上插下来，瞅住空子就向敌人攻击。一〇三师调过枪口，跟踪追来；关楚印又退到螺丝转顶的寨子附近，帮他们两家接上火，又把部队抽回山上。一〇三师一阵硬攻，杀进了寨子。直到易本印的援兵从南象店赶来，在叫号中才知道发生了误会，急忙停火。一〇三师的两个营有些伤亡，后退到苏家河。关楚印他们当夜转移到大山寨一带隐蔽。

驼二爷接着说："你走后的当夜，刘前初就派人和我们接了头，交出现款五百元。他还说，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求不杀刘新武；并且提出：一、希望能和刘新武见一面；二、缴款要求得到你或是张家胜的收条；三、要求和你或是和张家胜见一面。"

一切工作进行的都很顺利。目前所需要解决的就是刘新武的问题。我对张家胜和驼二爷说：

"这几天我不能出面。关于刘新武，我看可以放了，只是不能在山区里放，最好到定远店附近把他放掉。张家胜可以和刘前初见一面，说明我们打刘朗山、捉刘新武绝对不是为了和他要钱，而是因为他二人太反动，太猖狂，以后由

他负责教育。钱，缴不缴在他，如果缴，张家胜可以给他写个条子。”

离开周家岗，来到父子岭，王定堂已经在这里等我了。他和黄云先取得了联系，据黄云先说，特委吴光陆副书记的小秘书刘庆连叛变投敌，现在反动民团头子刘绍彦、刘修斋那里。这两个人为了发独财，没有把刘庆连叛变的事情公开，正因为如此，刘庆连才没有多做坏事情，只是把吴副书记埋藏的一部分钱扒去了。前几天，刘庆连带着民团不知在哪个山上又扒出来一些银洋。刘绍彦的民团抬着银洋路过一〇三师的防地时，被一〇三师查出。现在两下还在争夺这个叛徒。不过，黄云先最耽心的还是怕捉洋人的计划泄露了。关于刘庆连的叛变，他们估计特委还没有发觉，捉洋人顾问虽然已经做了全面布置，却没有敢动手。目前已是暑期，经常有洋人顾问到鸡公山避暑，机会很多，就是等待特委的命令。

个别人的叛变投敌，这在革命斗争中，在打游击的环境中是很难避免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阻止不了我们的革命活动，而目前也改变不了我们捉洋人的计划。打刘朗山、活捉刘新武，九里十八寨的活动，以及一〇三师退兵苏家河，这一系列的事实得出一条经验：捉洋人，用洋人顾问来调动和指挥敌人，解除“倒林”之围，是会发生一定效果的。我要王少堂赶快通知黄云先，叫他们有机会就动手，干的时候一定要捉到翻译。打的情况和接头问题，由我负责，万一联系不上，我会派部队或便衣队策应。刘庆连的投敌，他起不了大的作用，捉洋人顾问的计划和部署他绝对不会知道。不

过，他知道吴光陆进仙居顶的几条路线，很可能带敌人在几个要口下卡子对付便衣队。

我到了郑家冲，熊驼子告诉我：

“今天仙居顶打了一整天，下午的时候，枪声才渐渐向黄陂站方向转移。可能是哪个部队在仙居顶受包围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出发，赶到凉亭饭店。没有见到彭同志，却先看到了癞痢老五。通过老五才了解到真实情况：原来，特务队在外线活动的时间很长。罗厚福同志曾经三次派交通进山区和特委联系，都没有接上头。最后，罗厚福下定决心，亲自带领部队，想进到罗山一区和特委取得联系。部队天不黑就从铁路边的广水沟出发，走了一夜的山路，拂晓时到达仙居顶的石灰窑，吃了饭立即集合，想到黄家岗山上去隐蔽。刚爬到半山坡，天已大亮，无法继续前进，耽心暴露了目标，只好在原地隐蔽。秘密哨刚放出去，同志们还没有隐蔽好，孙家寨方向的哨兵就跑回来说：发现了敌人。随着跑马岭的哨位也发现了敌人。敌人来得好快呵，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孙家寨来的敌人已在攻上来了。我们想抢占跑马岭制高点，不料跑马岭上也有敌人，迎头压了下来。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向我们紧逼过来；我们已陷入重围，罗厚福当即下令：三、五人分散突围，最后到罗山一区、红安五区集合！说完，他带领几十人插敌人的空隙打出去，横过了汉罗公路。敌人便集中火力去追击他们。剩下的同志，有的乘机突出去，有的找地方隐蔽起来。老五就是隐蔽在当地。战斗中，他看到三个同志负了伤，躺在山上。敌人只顾去追罗厚福，所以当天没有搜山。老五是在

天黑以后，才跑到这里来的。

情况紧急，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立刻到现场去收容和清理彩号。我对老五说：

“你快回红安五区找罗厚福同志，看他们集合了多少人。我马上派便衣三队到仙居顶收容和清理彩号，明天天黑以后送回红安五区。”

老五走后，我要熊驼子通知朱洋人，便衣三队立即出发。并且说，估计今天包围特务队的敌人目的不是有计划地合击特务队，很可能是叛徒刘庆连带敌人去合击和搜查仙居顶，恰巧碰上了特务队。所以，“你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机动灵活，搜索前进。还要把刘庆连的叛变通知下去。”

第三天黎明时分，三队回到一区甘家湾向我汇报：他们没有进到仙居顶里边，只是通过基本群众了解到一些情况。特务队受包围那天，确是刘庆连带领民团和一〇三师的两个营合击和搜查仙居顶，碰上特务队钻进合击圈。特务队负伤二人，当夜由三区施大安便衣队清理战场时抬回三区。昨天敌人在仙居顶进行疯狂的屠杀，把很多小湾子都烧掉了，并且由刘庆连带路，亲手杀死地下党支部书记范鸿章同志，尸体至今未埋。同时捉去雷荣真，还把他的老伴毒打得要死，他的小孩更是无人照管。一到夜里，刘庆连领着一〇三师的别动队在村头路口设卡子，就是当地人也不敢随便行动……

仙居顶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联络线，失掉它，就会影响到整个反“倒林”计划的实现，况且，董志新等同志到罗山一区

来，又是必经此道，不维护这条要道，就会断绝外县区的同志们和特委的联系，或者受到大的损失。因此，我要朱洋人领着三队，带上一部分钱，再次前往仙居顶，利用一切关系掩埋范鸿章同志的尸体，安顿他的家属及雷荣真的老伴和两个孩子，所有为我们而受到连累的基本群众，使他们得到救济，不致受饿。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和重新安插联络点。朱洋人临走时，我再三嘱咐他：

“向群众说明道理，多做解释和安慰。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三队走后，我告诉驼二爷仙居顶遭受破坏的情形。估计刘庆连的破坏活动，还只是一个开端，今后将有更加残酷的斗争。雷荣真的家是吴光陆经常隐蔽的据点，刘庆连也确实知道雷荣真是地下党的一个支部书记，为了进一步的破坏我们的组织，敌人一定会在雷荣真的身上严加酷刑，逼他招供。所以，想保出他来是不容易的，但不管怎样，我们也要想尽办法营救。可以组织雷继如、雷绍争以家族的名义到宣化店请客；找刘前初、络摇文这些两面派的人物帮忙；从前的那些保人，也可以出来做助手。再叫雷绍争借送牢饭的机会，转告雷荣真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能招出口供。这些具体工作，就交给张家胜和驼二爷负责处理。

一九　夜战仙居顶

只相隔一夜，便衣三队又返回了罗山一区，在东丰庵脚下的郑家小湾找到我。朱洋人汇报说：他们一进到仙居顶附近，就开始爬行，黎明前才爬到汉泥冲小湾亢裁缝家里。据

裁缝说，敌人在到处捉人，他所在的支部就被捉去好几个同志。现在这一带地下党各个支部的支书、副支书、党员以及基本群众白天都隐蔽起来了，群众非常害怕。裁缝因为年纪大了，又是个手艺人，才没有上山隐蔽，为的是和我们取得联系。关于救济群众的问题，还是利用他们家族上的穷人装做走亲戚，传递到各地。白天那里还算平静，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天黑后，三队想爬到雷荣真那个支部去了解情况，一到孙家湾就碰上了敌人的卡子，打了一会，便转移阵地，一清查队员，别人没有受损失，独不见了熊驼子。夜色中，遍地枪声，一时找不到他；三队只有几支短枪，无法与敌人持续战斗，便回头穿过公路，想进一区，在吴家凹又碰上了敌人的卡子。过去敌人是单卡路口，而现在却在卡子的四周设下伏兵；三队没有估计到这个变化，所以还是按照老办法，碰上卡子就打，结果遭到敌人的围击。他们沉着地反击敌人，突破敌人的合击圈，插进山沟，才摆脱了敌人，爬过岭峰，隐蔽着回到一区。

不利的情况越来越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堆在面前，使我陷入困境。从到群众中扎根起，熊驼子就是一个便衣队员，经历过扎根、雪地搜山、反“碉堡”、反“地补哨”直到现在的反“倒林”，由于他年纪较大，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多半是做交通联络工作。万一出了问题，不单是特委的工作要遭到大的损失，整个鄂东北地区内的工作都要受到损失。这样一来，想完成上级党留下的任务，就会碰到极端的困难。但是，上级党、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给我们的指示，同志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革命群众的支持，给了我无限的

信心和无穷的力量。我不由得大声说道：

“朱洋人，环境越紧张，我们就越要组织力量打出去，只有打得敌人痛了，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朱洋人抬起头来，一双疑惑的眼光长久地注视着我，然后才慢腾腾地说：

“你说组织力量打出去，你没有看看：独立团正在成长，就被敌人隔在外线进不来；特务队受到包围，还不知集合起来多少人；几十条枪的警卫队，跟敌人从天明打到天黑……你说，用什么来组织力量打出去？便衣队多半是新参加的同志，最大的一个便衣队才只有七个人……”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出自己的意见：“暂时放弃仙居顶的工作。何指导员，你要从多方面考虑考虑。”

是的，朱洋人说的对，我应该冷静下来，具体地分析问题，全面地考虑工作。事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熊驼子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同志，对敌斗争有经验，会隐蔽，也有可能被打散之后隐蔽起来了。总之，不营怎样，光坐在屋里闷头思考是不行的，必须采取行动，把情况弄个水落石出，然后确定对策。

“朱洋人，你马上去派人通知便衣一队胡民山，挑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天黑后到这里集合，由你和胡民山负责清查枪支，多带子弹，每人至少要带五、六颗手榴弹，随我插进仙居顶。”

天一黑，胡民山走来报到：

“一、三便衣队共选出七个人，由朱洋人带领在山上隐蔽。”

我随胡民山走到山上。出发前，向同志们交代任务说：

“熊驼子被敌人打掉，很可能隐蔽在哪里，今天我们到仙居顶去寻找他，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刘庆连叛变投敌，在仙居顶疯狂地进行破坏，捉去了一些党员和大批群众，还在各处下卡子搜索和围击我们的部队。为了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伟大任务——坚持革命斗争，保留革命种子，保护群众，因此，我们到仙居顶去下敌人的卡子，给敌人一个杀伤。任务是很艰巨的，敌我力量是太悬殊了。但是，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刘庆梦叛党以后，带领敌人雪地搜山时，也是到处下我们的卡子，后来我们组织了便衣队，下了敌人的卡子，给敌人以打击，才协同兄弟部队解脱雪地搜山的重围。今天我们去下敌人的卡子，象征着反‘倒林’的胜利，同志们一定能够坚决地完成党给予的任务。”最后，我结束道：“同志们，有勇气的跟我走，怕死的隐蔽下去。”

这些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是忠实于党的优秀党员，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包括鲜血和生命都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事业。任何困难和危险也吓不倒他们。他们毫不犹豫，一个个迈着英雄豪迈的步伐，向仙居顶走去。

云薄星稀，夜色朦朦。我们爬行着横过了汉罗公路，到达葛张家湾后边的小湾。同志们隐蔽在附近，我一个人轻悄悄地爬到团支部书记董凤文的窗子下边，干咳了三声。她把头伸到窗边，看到是我，着急地说：

“前天打仗时，可能有人掉了队，夜晚有时候到这里来打转，我不敢和他接头。据了解，黄陂站没有什么消息，估

计掉队的人没有去投敌，可能还在这一带隐蔽，这几天一到夜晚，别动队就到处偷听，我婆婆和男人总是骂我，你快走吧!”

我再想问她什么，窗边的影子却已消失了。估计掉队的人很可能是熊驼子，我爬回山上，对胡民山说：

“到熊家冲附近去找，熊驼子可能在这一带隐蔽。”

四、五户人家的熊家冲，连只鸡、连条狗也没有留下；全部被敌人移了民。没法子，我们只好无目地爬向附近的山峰，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联系上人。刚爬到半山坡，突然发现一个人影向我们这里爬来。大家立即伏地不动，等那人爬至近前，看看却不相识。他可能认识我们，也没有打招呼，直截了当地说：

“这里都移了民，我是留在山上和你们取联系的。熊驼子被打掉后，就在这附近隐蔽。亢裁缝说，只要和你们接上头，就叫你们把他带走。”

话是不错，听不出有什么疑点。只是和他素不相识，不敢轻信。

朱洋人从一旁爬过来，东瞧西看地捉摸了一阵，觉得有点面熟，就是叫不出名字，便问道：

“你看到熊驼子吗？”

“就在这不远的地方，”那人似乎也觉得我们有些不放心，连忙回答着，“我和他有暗号，叫他来吗？”

“叫他来。”

只见那人拿起身旁的石块，“噗、噗、噗!”一连向外抛去三颗。不一会儿，远远地出现了一个蠕动的人影。待他爬

到近前，正是熊驼子！熊驼子来到我们面前，二话没说，就象久别重逢的亲人，抱头痛哭。

“驼子，不要哭，我们是特来找你的。”我慢慢地靠近他的身子，“饿坏了吧？快吃点干粮。天快亮了，你带路找个地方隐蔽，晚上就给你们报仇。”

熊驼子听说要报仇，停止哭泣，精神立刻振作起来，接过干粮，边吃边说：

“是要报仇！这几天都是刘庆连带路破坏，今天我们人多，非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可是现在到什么地方去隐蔽呢？”

“葛张家湾后边山上有一条深水沟，因为天旱，现在没有水，可以隐蔽，发生了情况也好打出去。”

人们伏在干水沟里，毫无遮身之处，任凭恶毒的太阳晒了大半天。太阳挂到西山头，大家集中在一块，准备行动。我告诉同志们说，今天我们在这一带现出目标，不能使群众受损失，要把这个目标挪到肖华清的头上。他还有一些红军粮没交，把目标拖给了他，不由他不“通共”，也不由他不出面把仙居顶被押的群众保出。我们到他家还可以吃一顿饱饭，带一些干粮。目标暴露以后，敌人必定会来下我们的卡子，天黑后我们再隐蔽着离开葛张家湾，从熊家堂的北边几条交叉路口，把敌人的卡子打掉。“敌人卡我们，我们卡敌人，谁先抓住主动，谁就能胜利。”

我们半公开地走进葛张家湾肖华清家里。这家地主为我们做了不少饭菜，还端来了烧酒，因为有任务，谁也没有喝酒。零零星星的枪声变得紧密了，敌人发现了目标，却并

没有合击的迹象，敌人显然是想用枪声把我们赶到卡子上，然后歼灭我们。同志们胸有成竹，都很沉着。我开始和肖华清商谈如何保出仙居顶被押群众的事情。他借口有很多困难，实际上想推拖逃避。我态度严肃地对他说：

“你如果愿意出面保出群众，除了所花的费用由我们付外，还免去你的红军粮。不然就……”

怕死的肖华清看我动怒，急忙向前拉住我说：

“何先生，红军粮我还是照缴。保人的事情，我一定尽力。”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到宣化店去请客。钱，由驼二爷供给。”

我们在肖华清家里停留了几个钟头，直到天黑，才走出村子。天空多云，到处一片漆黑。我们爬行到一条大路的交叉口上，全部埋伏起来，准备进入战斗。

敌人仍然运用他们的老规律，分路向各个要口慢慢合拢。根据枪声和黑暗中忽明忽灭的手电光，知道敌人在逐渐向我们围拢来。敌人突然停在原地，不再前进了。敌人是在等待我们前进，我们却在等待敌人前进，都想掌握主动，占据优势，在对方前进途中突然给予伏击。相持了几个小时，敌我双方都没有动作。

天上的厚云越聚越浓，也越压越低；没有风，加上内心的焦急，只觉得闷热难忍。路口上格外显得寂静。隐隐觉得敌人在蠕动，手电光的白线条更加明亮耀眼。胡民山无声无息地趴在我身边，凑近我的耳朵说：

“不行呀，敌人越围越拢，前面又有卡子，不能再等，要

先下手呀!”

“不，你们准备好，我到前面去引诱一下，看敌人来不来。”

我平定了一下心情。摸了摸身上的武器，看看会不会发出声响。然后，我慢慢地向前爬去。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眼睛已经不如耳朵管用了。我听着，看着，爬着。突然，左侧发出轻微的响声。我立刻停住，仔细看去，似乎有个东西在动。也许敌人也等急啦，前来引诱我们的。我刚要回头，猛然发现右侧又跑上来一个人。我刚站起身来，准备迎敌，那家伙就和我面对面地抱住了，两个人的枪，夹在两个人的肚子中间。糟糕，这家伙是个大块头，挣不动也甩不脱。自然，我也不能松手。又一想，敌人手里没有枪了，我通常是带两把盒子枪，身上插一支，手里拿一支，我一边和他撑持，一边打开枪机。不料原先发现的那个敌人，已来到大块头后面，拿枪伏在大块头的肩上，一股劲向我瞄，我立刻把头顶住敌人的头，后边的敌人要开枪，就得两人同归于尽。谁想敌人并没有开枪，反而拉住我就走。我情知不妙，一个人抱住我，已经挣扎不开了，再来个人一拉，岂不被他们抓个活的?这时我也顾不得许多了，用尽力气一磨，正好把两个敌人磨成了一条线，我抽出右手，对着大个子的胸膛一枪打去。后边的敌人应声倒地，大块头仍然紧抱着我，一股腥热的气味，直冲到我脸上。我身子一动，大块头就象一座小山似地倒下来；却把我压在底下了。

“叫你们捉活的，为什么打死!”

可能是敌人指挥员的声音。他的话音未落，同志们的

盒子枪、手榴弹便盖向他那里。敌人一片吼叫；战斗展开了。

胡玉先匆匆跑到我身边："负伤了吗？"问声一落，猛然飞来一颗子弹，打在胡玉先的左膀上。胡玉先扭过头去，对着子弹飞来的地方，用盒子枪扫了一条子弹。

"没有负伤。"我躺在大块头敌人的身子下边对胡玉先说。

"没有就快走呀。我负了伤。"

这时胡民山也跑来了："负伤了吗？"

"没有。就是敌人把我箍住了，动不了啦。"

"那家伙死了吗？"

"总差不多……"

胡民山伸出双手来拉大块头敌人，拉不动；胡玉先那只没有负伤的右胳膊，也伸过来拉敌人，还是拉不动。正好，一旁走来了我们的大个子朱洋人。

"指导员牺牲啦？"

"没有，被死人箍住啦；快，把他拉开。"胡民山边说边指挥着。

朱洋人一使劲，"哼哧"一声就把我和死人掀了起来。死人的手紧紧捏着我的衣服。朱洋人把衣服撕破一扒，把我扶起来了。

"敌人跑啦。我还得了支三号盒子和不少的子弹。走，快走。"朱洋人说着，拉住我就跑。

刚刚跑出合击圈，敌人的机枪、步枪激烈地扫向路口。

爬上高高的山岭，胡民山问：

“再到哪里去呀？我对这一带不熟悉。”

“从拐子凹到破塘凹。注意，破塘凹是去宣化店的十字路口，可能还有敌人的卡子。”

韩允之听我说还有卡子，马上提出要求说：

“再干掉它！他们都得了枪，我还没有呢。”

敌人激烈的枪声渐渐落在后面。到了破塘凹附近，我们又开始隐蔽着爬行。

朱洋人出主意说：“这个卡子，不和他斗打。我从半山坡爬过去，如果发现了目标，打手榴弹为号。你们听到敌人的喊叫声，就集中向敌人压盒子枪。这样还可以搞到几支枪。”

朱洋人顺着山坡爬去。我们继续向十字路口接近，还没有来得及散开，“轰”地一响，手榴弹爆炸啦，随之一片叽哇乱叫，我们立刻集中火力向目标攻击。

战斗结束，四周立刻陷入沉寂。同志们在战斗中都缴获了枪支弹药，而我却毫无所获。于是，我开始向敌人的卡子处爬去。碰上一个死人，摸摸他的身上，没有枪，再向四周探摸，果然找到一支盒子枪，又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子弹。我继续向前爬去，在一块石头边又碰到一个死人，他身上有一个装满手枪子弹的皮匣子。显然，这家伙是个小军官，一定有手枪。我东寻西找，摸来摸去，没有结果。再仔细地向他身上搜去，手枪竟紧握在他的手中。我抽出手枪，划着火柴察看：竟是一把崭新的小十三太保！

朱洋人看到光亮，立刻走来说：

“指导员，剩下的几个敌人都跑到破塘凹炮楼里去啦。

我又得了一把三保险。”他看我没有站起来，即问：“怎么，走不动啦？”

“莫瞎说。走，你们有缴获，我也有胜利品！”

两个人跑步跟上了同志们。

打了一夜，恐怕敌人来追击，不能从这里进一区，只能到公路边上，黄家寨后边的墓园里隐蔽。首先清查了人数和枪支，准备应付敌人的追击。

东方发亮。四处没有一点动静。看着同志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血，仔细检查一遍，只有胡玉先左胳膊负了伤。胡民山打开自己的包袱，取出一条干净裤子，撕成布条，给胡玉先包扎伤口。

一夜的战斗，扑掉敌人两个卡子，打死不少敌人，共缴获十三支短枪和许多子弹，同志们都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乐呵呵地抚弄着新缴获的枪支。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思想不能麻痹。我对同志们说：

“这次战斗中所有缴获的枪支，不统计，不上缴，各队归各队。但回去掉换之后，多余的枪支一定要上缴。新缴获的枪，因为不习惯，现在一律不准用；把老枪检查好，准备随时战斗。胡玉先负伤，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血，怕路上留下血迹，敌人寻踪追来。如果发现敌情，就从茶坳的缺口冲向三区；敌人追得紧，我们就打雷班寨。如果没有敌情，天黑后我们返回一区。”

“何指导员，一爬上山岭，熊驼子就把我身上的褂子脱下来，包住伤口，血一点也没有留在路上。你看，”胡玉先手上拿着血衣，“褂子都成了红的。”

一夜的战斗，加上饥渴，我的神经极度紧张，只觉得晃晃悠悠。这时，我才发现他身上似乎缺点什么东西，当一个同志递给他一件上衣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没有穿上衣。韩允之随手也递给我一件褂子，我莫名其妙地接在手中。

韩允之看到我在发愣，就说：

“何指导员，快穿上吧。这里蚂蚁多。”

我不由得“呵”了一声：“谁把我的衣服脱掉啦？”

大家看着我，一阵好笑。

朱洋人靠近我，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说：

“何指导员，死人箍得紧吗？”

“莫开玩笑。”我有点尴尬，急忙掉转话题：“散开隐蔽，各人监视一方。这里的地形，两头是宣化店和黄陂站，相离乌子铺、肖家畈都不远。眼前这条汉罗公路，就是敌人最严密的一条封锁线。……”

在战斗中，早把干粮丢得精光，现在隐蔽在公路边上，连头都不能抬，怎么能捞得到吃喝呢？只有忍着。亏得没有敌情，一天总算平安无事的过去了。为了不和敌人的卡子碰头，天一擦黑，我们就开始运动，抢时间赶过敌人常下卡子的要口，到了东丰庵山脚下付凹的小独湾，想办法搞了点东西吃，随即转至后坳甘树利家里。

朱洋人用暗号叫门，不管说好说坏，胡明月硬是不开门。我走上前去，对她说：

“我是何耀榜，快开门。”

“你们到处说何耀榜被打死啦，头挂在宣化店，身子放在黄陂站，为什么还装他来喊门？我家实在没有人。”

胡明月说得没头没脑，然而却是有声有色，听得我浑身直发麻。我稳住气，解释说：

“不对，胡明月同志，我真是何耀榜，没有死呀！”

我这一解释更糟，不但没有回答，连点动静都听不见了。问题很严重，我立即用第二个暗号叫门。

不一会，院子里传来脚步声，听声音好象不止一个人。待脚步声在门里停住，我赶紧又声明说：

“我确确实实没有死，你们不要听信敌人造谣。”

咯吱一声，门开了，面前站着甘树利，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

“你……咳，你真没有死呀！”

胡明月看到同志们都楞在那儿，就说：

“你们站在外边干啥？还不快进来！”

一进屋，甘树利就谈开啦，说今天一早，国民党就撒传单，给各地打电话，用尽各种办法宣传，说昨夜用三道卡子把何耀榜卡住啦，把脑袋割下来挂在宣化店，身子放在黄陂站；还说什么叛徒熊妖就是独立团团长熊拐子，张德恒就是罗山县委书记张家胜，鄂东北的共产党全都垮啦。还限期三天：所有通共的人都到宣化店去自报，不报则杀。甘树利接着说：

“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去找驼二爷，驼二爷和好些同志，正在那里哭你……嗨，你回来啦，赶快给他们送个信。”

我考虑了一下，对同志们说：

“敌人伤亡可能很大，为了向他们的上级交账，才制造

这许多谣言，同时也是想麻痹和诱降我们的同志。胡民山，你们赶快分散到各处去通知，揭穿敌人的阴谋。”

同志们刚要动身，被门外走来的胡明月拦住了。

“干什么，现在才去通知？”她推着大家说。“你们见了面，谈起来就没完，等你们想起来做事情，早把人给急死啦。你们好好休息吧，我已经叫支部的同志用传呼的方法去通知，这会儿怕走到一里路以外啦。”

看到她那干练的工作，细心的布置，同志们心里涌出一股钦佩的心情。

有的同志穿着血衣睡在院子里做梦；有的同志在洗澡。我只觉得浑身极端疲困，坐在那里不愿意动弹。胡明月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问道：

“何指导员，你病啦？”

“没有。”我轻声回答说。

“可能太累啦。我烧了一点热水，你去洗洗澡吧。”她拿起一个木盆，走进小屋。

洗完澡，我仍然坐在屋檐下，身上轻爽得多了。不久，驼二爷来了。他谈到保人的事情，经过县委全面的布置，今天雷绍争在宣化店城里的馆子里请了四桌客，人们都已到齐，正在谈论，街上突然锣鼓喧哗，有人高喊，说你的头悬挂南门外，要各家出一个人去看。保人们都去了，刘海前回来说：不很象。而其他的保人，却一个也没有回来。天黑后，雷绍争说敌人押着你家族上的人去看尸首，还一定要他们承认是你……

驼二爷还没有谈完，外面突然响起敲门的暗号。胡明

月走去开门。这时天已亮了，从窗子里，我看到是董志新，便站起来迎接他，问：

“你一个人回来的？”

董志新两步跨到我面前，紧紧拉住我的双手，喉咙里象梗了块东西，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瞪着泪汪汪的双眼直看我。许久，他沉重地叹了口气。

“咳，听说你牺牲，同志们都很难过。你牺牲了，便衣队也一定有被俘的，情况就严重了。我这才化了装，冒险在白天就向这里走来……真没有想到你还健在。有人估计说，你没有牺牲，也负了伤。”

“没有负伤，就是被死人箍了一家伙！”朱洋人翻身从席子上爬起来，插嘴说道。

看到他又想开玩笑，我急忙阻止说：

“我们要谈正经事。”

“我知道你们要谈问题，天亮啦，我们可不能都蹲在这里，得上山隐蔽。”他扭头看见了驼二爷，“唉，何指导员，你不是说把缴获那个军官的手枪给驼二爷吗？”他说着，随手递过来那支小十三太保。

“连子弹一齐送给驼二爷。再抽出几条子弹给董志新。你们到山上隐蔽也好，我们要在这里交谈工作。”

朱洋人忙向睡在院子里的同志们说：“快起来，快起来，上山……”

我和董志新、驼二爷留在屋里，交换情况和共同研究工作。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敌人制造出一系列的谣言，是在向我们党进行全面的政治攻势。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宣

传，其目的，表面上是说明他们的“倒林”已经结束，大别山的共产党已经全部垮台；实质上，他们是想迷惑和动摇我们的群众，利用“倒林”后的时刻进行大移民，使我们在失去大山绿林之后，再失去群众；使我们无立锥之地，在大别山上断绝共产党的种子。敌人借口完成了“倒林”，“消灭”了共产党，把正规军抽出山区，放在公路沿线。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严重地打击和挫伤了敌人，使敌人的正规军不能在山区久停，在山区不易调动，处处挨打，这才被迫回到公路线上。

敌人既然向我们发动了政治攻势，我们就要反击敌人，用活人活事，撕破敌人的阴谋。因此，我们决定把过去埋藏的油印机扒出来，大量印刷传单，揭穿敌人的谎言，稳定群众情绪。传单的下款落红二十八军。同时，关楚印配合便衣二队申功臣，用张家胜的名义去打孙家寨；其他的便衣队专门打敌人正规军的哨兵。另外，仙居顶被捕的群众的营救工作，还要继续进行。

“以上三个问题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马上解决。从今天起就开始作全面布置。”

驼二爷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回去。”

“白天可以走吗？”

“我一个人可以。为了减少目标，我从山上隐蔽着走。”

“一、三分队可以分散，各归原队。你回去告诉张家胜，天黑后我到县委去。”

驼二爷走后，我立即想起捉洋人顾问的事情，就和董志新商议说：

“捉洋人顾问的事情，估计不久就会实现，为了全面地反‘倒林’，把敌人指挥到长江一线，就必须在木兰山和宋埠一带现出目标，引诱敌人分散兵力。木兰山我们准备派少数便衣队去打敌人的哨兵，只是宋埠一带没有人去。你能不能配合红安四区的易元鳌同志，把他们的便衣队和你们新组织的便衣队合编成一、二十人的小游击队，到宋埠活动几天，专打敌人正规军的哨兵。现出目标后，估计敌人不等追到宋埠就会退兵；如果敌人大力追击，你们就打着去皖西找红二十八军汇合。”

董志新愿意去这一线牵制敌人。然后我们又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直到天黑才分手。

在罗四区吴家凹上边的一条深山沟里，我见到了张家胜。他已经根据驼二爷的传达，挖出油印机，亲自起草了传单，并且已经印出了一部分。

张家胜又汇报了许多情况，我表示了个人意见说：估计敌人可能有新的布置。首先，敌人很可能配合叛徒，利用“倒林”后的时机，对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搜剿”。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第一，在敌人进行“搜剿”之前，把所有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彩病号，全部抬到四区的空山里，尽量设法治疗，在可能的条件下改善生活，使他们早日痊愈和归队；第二，通知各地基本群众和联络点，埋藏所有的军用品和使敌人可疑的东西；第三，通知所有的地下党和联络点，如发现有敌人的“搜剿”，及时隐蔽，并把刘庆连叛变的情况传达下去；第四，在山上准备好柴、米，新安插一部分联络点。其次，一〇三师完成“倒林”后，可能和其他的军队换

防，由新来的军队进行移民。因此，有一些没有公开的小便衣队一律不要再公开，这些小便衣队和一切秘密的党员、农民小组要利用可靠的关系隐蔽在群众中，在敌人移民时，就插进移民点，使我们以后的工作不致于和移民点失掉联系。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插到白色区域里去发展革命根据地。关楚印和便衣二队如能打下孙家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叫他们就地开展定远店一带的工作。另外，便衣队在出外打击敌人的哨兵时，要配备几条长枪，打完仗就把传单散出去，并且装做是红二十八军的手枪团……

几天之内，这些工作就已布置就绪，开始动作起来了。

二〇　洋人指挥敌人

这天，我和驼二爷隐蔽在莲花石村下边的董家凹。一清早，就听得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仔细听去，象是在北安山一带。

“驼二爷，你听，这炮声是在哪里？”我问富有经验的老人。

驼二爷的神色显得十分惊讶，早就竖着耳朵，在一旁分辨炮声的来处。

“这不是在大小鸡笼山，要是在那里，听得要比这清楚。许是在大小鸡笼山西南方向的北安山一带。”他一只巴掌遮在耳朵上，凝神注意地听了一阵。“这不知又是打的哪个部队，要是警卫队和三区的便衣队，一定会遭到大损失。”语调既耽心，又沉重。

“我听着也是那一带。驼二爷，你派董明远到宣化店董

世民那里去了解一下，了解不到就去问问刘海前。”董明远是个基本群众。而董世民虽然是个穷学生，他住在宣化店，通过同学的关系，消息是比较灵通的。

黄昏时，董明远返回来说：

“我听董世民跟别人说，县里来了电话，说西边来了大红军，在鸡公山捉去了三个洋人。下午，他又对一个人说：共产党在北安山打死了一个洋人。后来，他家来了好多客人，在客厅里唧唧咕咕，有的说，县里叫保洋人；有的说，大红军不同便衣队，不好接头；还有的说，共产党捉到洋人，是保不出来的。他们杂七杂八说了许多，我也弄不清什么洋人土人。……”

“驼二爷，你去通知便衣一、二、三队队长都到雷家油榨开会。我再和董明远谈谈，随后就到。”

我赶到雷家油榨时，同志们已在那里等待了。

便衣一队长胡民山说：“西边打了一整天，据说来了大红军，和东北军接上了火；一〇三师守在原地未动。”

便衣二队长申功臣说：“打孙家寨已全部准备好，只等上级命令。”

便衣三队长朱洋人说：“长枪和传单已准备好，新老便衣队已经混编，并划分了小组和隐蔽的地区。”

同志们谈的简单明了，我当即布置任务说：

“打孙家寨准备好了，明天就开始动作。战斗结束后，如果敌人紧追不舍，就拖着他们去定远店转个大圈子。一队到东丰庵的最高峰，三队到天丝岗的最高峰，任务是专门监视一〇三师的动作。如果一〇三师向西运动，赶快来通

知我；一〇三师如果按兵不动，天黑后你们就到公路线上去活动，专打一〇三师的哨兵，散发传单。敌人追击，不要抵抗；不追就向他们的要害处打几个手榴弹，而后立刻转移。

“另外，把便衣队中没有经验的新队员和身体弱的同志组织起来，分组破坏敌人的交通。首先是割电线，锯断电线杆子，人手不够，可以动员群众。要注意，凡是割下来的电线都要埋藏起来，或是沉入水底；电线杆子要马上当木柴烧掉。

“同志们，党提出反‘倒林’已不是一天了，这个目标不久就要实现。大家听到的枪炮声，就是我们捉到了洋人顾问。今天所有的工作部署，都是为了配合这一计划。我们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在鄂东北保留住革命的种子，现在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因此，不但要求同志们完成任务，而且要完成得更好……”

我和驼二爷一起，在水冲隐蔽。枪声一直没有停歇，到第二天中午，响得更加剧烈了，并且渐渐地向三区移动。

朱青山保长的妻子施贵青来到水冲，找到我们说：

“宣化店叫络保的来了两个保丁，要找便衣队，现在还在我家。不知他们有啥事，朱保长没敢出头。”

“他们说些什么？”我问。

“他们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们，宣化店的王少堂、董世民在络保的炮楼上，打发他们出来找便衣队。还说一定要找到驼二爷才讲实话。”

“你回去就说没有找到我们。保丁走了以后，再叫朱保长到甘青山那里去了解情况。”

天黑后，我进了朱保长家里，刚在桌旁坐下，就看到朱保长十分得意地回到家来。我忙问：

“有消息吗？”

“有呵，还是个大消息！”他把“大”字说的很重。

“什么大消息？”我装做疑惑地问。

“哈哈，”他笑了，“何指导员，你们做的事情，你还能不晓得？你不过是想了解国民党的态度。”他坐在桌旁，面对着摆好的饭菜，把手里的五加皮酒和一些小吃放在桌上，还取出一条上等香烟。“现在不忙说，把这些见面礼吃了，再说也不晚。”

我看着这许多食品，很是奇怪。

“这都是谁买的？”

“我们的老联保主任甘青山买的呵！”他品着酒，慢条斯理地说下去。“老联保主任‘通共’，在宣化店是有名啦。从刘朗山回来，他就一直被软禁在区里。现在，你们一捉洋人，他可又吃的开啦。今天上午，陈区长特地请去甘主任，一见面就宣布从今天起甘主任恢复自由，并且拜托他保洋人，设法和你取得联系。甘主任对我说了许多机密，什么西边来了大红军，在鸡公山上捉了蒋介石军事顾问团的三个洋人，昨天在北安山打死了一个，今天上午又在礼山县城附近打死了一个，还散了好多传单，听说捉洋人是国民党的旅长兼县长蒋少元叫捉的，情报也是他供给的。这一来，可把蒋少元给吓坏啦。蒋少元亲笔写信给陈又文，要他一定设法和你们接上头，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只要能保出一个活的，不然连南京政府都不得了。下午，陈又文又把甘主任

叫去啦。他回来对我说，南京政府来了命令，一定要保出洋人。他还叫我想尽办法找驼二爷，只要和你们接上头，不管是白天黑夜都去告诉他。”朱保长停歇了一会，然后加添说：“宣化店的人现在是开口闭口不离洋人，也不知国民党为什么把个外国人看得这样值贵。”

我对朱保长说：“你明天再去宣化店，告诉甘青山，叫以前帮助我们保过人的老先生，这次都不要出面，以免暴露目标。陈又文要找共产党，就叫他想法找张家胜和驼二爷。”

我正准备转移，便衣二队副队长施大信来到朱保长家，汇报说：今天一早我们就打开了孙家寨。敌人没有派援兵。战斗结束后，一〇三师只是向前推进了一步，驻守杨家岗和定远店的南岗，没有追击。便衣一、三队夜晚打哨时，敌人很少还枪，也不出来追。电线破坏了一部分，不管我们怎样割，哪怕在一〇三师的防地附近割，他也不管。

我交待施大信说：“一、三队继续执行原定任务；你们配合关楚印在那一带活动，专打敌人的哨兵，破坏交通，阻止运输，从一人一户开始扎根，发展群众工作。”

我和驼二爷转移到莲花石的后凹。小湾子里独有一户人家，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睡在一间矮小狭窄的草屋里，靠窗子架着小竹床。窗外明月悬空，夜色格外寂静，我躺在床上，辗转不得入眠，脑子里涌满了几天来的复杂情况……敌人的炮声，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在移动；处在敌人强烈火力下的警卫队，受到什么损失没有？……捉洋人顾问的第一步任务已经完成，在这个基础上，怎样来指挥敌人，结束这场紧张的战斗呢？……黎明时，驼二爷发现我没有睡

着，坐起来问道：

“何指导员，今天是捉到洋人顾问的第三天，宣化店可能有人出来找我们接头，真的有人来了，我们怎么答复呢？”

这正是我夜间思考的问题之一。我提出初步意见说：你们可以灵活掌握。第一，就说是特委配合红二十八军捉的，的确是捉了三个洋人顾问，打死了两个，留下一个。国民党如真想保，县里来人要有县府的印和蒋少元的私章；宣化店来的人要有区公所的印和陈又文的私章，才能有效，予以接谈，否则一概不理。这样就给他们按上了长矛，哪怕蒋介石再信任他的旅长和县长，也难给他拔掉。第二，释放洋人顾问前，要区公所和一〇三师先释放“政治犯”和被押的群众，交出熊妖和张德恒。为了以毒攻毒，可向他们暗示刘庆连是我们派到宣化店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人，叫他们保证不杀并且迅速送回；看看叛徒的下场如何。第三，在军事上停止向我们追击。

“你谈出这三个条件以后，他们一定要求会见张家胜。只有他们接受了这几个条件之后，才能找见张家胜，而后到木兰山和中光易一带找特委联系，确定释放洋人顾问的日期。”

天明后，我们上山隐蔽。

中午时，秘密哨报告：“从北边来了三个人，一个白胡子老头，一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青年，手里拿着些东西……”

我笑着对驼二爷说：“不错，老反动也敢公开地进到山里来了，估计一定是个两面派。你下去吧，到山边上和他们

见一面。”

驼二爷去后，总有两个多钟头才返回来，他笑眯眯地说：

“是刘前初和络摇文，还带来了不少东西。”

“谈到些什么情况？”我问。

“刘前初说，今天上午蒋少元派县大队一个连，拿着南京来的电报，通过一〇三师的防地到宣化店区公所。中午，陈又文把宣化店所有的士绅都叫到区公所，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保出洋人……我讲了咱们的条件，刘前初说回去后一定告诉陈又文。他们临走时，定要请我到宣化店去一次，我没有答应。他们要求和张家胜见一面，并要求留下会面的地址。我答应尽量设法去找，能不能找到，明晚给络摇文一个信。”

我对驼二爷说：“宣化店的问题，由你和张家胜负责。我要过三区去，了解洋人顾问保存的情况以及如何释放的问题。”

当夜，我赶到三区赶鱼儿的村子里，和王定堂汇合。此时黄云先也在这里，他先汇报说：洋人顾问是在下午抬出来的，当夜交给施大安便衣队，由他们秘密带回三区，现隐蔽在观音寨一带。捉洋人顾问的当天下午，敌人一直没有发觉，估计他们在天黑后才发觉，当夜没有任何动作。第二天早晨，敌人才开始疯狂地到处合击、搜查。当情况十分紧张时，我们就现出目标，同敌人展开战斗。敌众我寡，火力又强，无法相持，我们边打边退。敌人追击紧迫时，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打死了一个洋人顾问。敌人发现洋人顾问尸体，

忙着收尸，停止追击。整个一下午，风平浪静。天黑后，我们转移到三区，和王定堂汇合。天一明敌人又发了疯，盲目地“搜剿”合击。战斗中，吴大鼻子为党壮烈牺牲，几个同志负了伤。天黑后才对彩号作了收容和安置，吴大鼻子的尸体已掩埋。在敌人的“搜剿”合击中，有些地方工作遭到破坏，比较严重的是广水沟，现已作了全面的安顿。

接着，王定堂汇报说：我们接到洋人顾问后，就向礼山县附近运动。敌人真的相信旅长兼县长的蒋少元不会“通共”，所以这一带没有搜查。等我们现出目标，敌人才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杀死第二个洋人顾问，散出传单，边战边退，公开地拖进颜串铅所属地区。敌人的追兵是东北军的一个团，看到我们消失在炮楼附近，只当我们进了炮楼，于是拚命向炮楼攻击。颜串铅懵头转向，不知道是谁的军队攻击他，更不知是什么原因，只好采取固守，一攻一守，直打到天黑。今天一早，东北军的一个团就散在颜家家族各村“搜剿”。等到九、十点钟，我们又在朝林山上现出目标，东北军的一个团才跟踪追来，并增调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引导这两个团，和华明清的炮楼接上火以后，才抽身走掉。自从火烧九房沟后，颜香亭、曾凤亭在省里打官司，颜家内部也起了很多矛盾，加上昨天的战斗和今早的“搜剿”，颜家是自身难保，估计他们目前不会大肆向外搜查，洋人顾问在颜家所属地区内保存几天，不会出大问题。

在这一连串的战斗中，有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同志付出了鲜血，这是同志们最痛心的。此外，整个工作的发展还算顺利。对下一步的工作，我提出了个人意见：根

据现有的情况看来，用洋人顾问来指挥敌人，解开“倒林”的重围，是有希望啦。留下的这个洋人顾问，还是决定释放。在放以前，对翻译要客气一些，还要有点优待，向他说明我们捉洋人顾问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翻译和洋人顾问要隔开，每天只准他们见一次面。每到天黑后，就带着他们上高山、走平地、过河沟、过铁路。每当爬上一个大山坡，就说出大别山的一个主峰名称；每走到一块平畈，就说是湖北、河南、四川，过铁路就说是平汉路、陇海路……总之，使他们摸不清我们的活动范围，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敌人追击得紧迫，洋人顾问实在无法保存，就要杀，但不能再杀到礼山县，一定要带到汉罗公路的武汉段去杀，然后拖着敌人转大圈子，以免我们内部遭到破坏。如果敌人停止追击，就证明敌人答应了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先放翻译，后放洋人顾问。这件事情过去后，估计山区里能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很快就会进行全面“搜剿”、大移民等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我们。我们要抓住一时一刻的机会，整顿组织，发动群众。同时，由于我们用洋人顾问指挥敌人的结果，敌人内部自相残杀，损失很大，必然会忙着打官司、整训力量。我们要争取加强对敌人的分化工作。另外，根据这两天的《扫荡报》——在这一时期，我们和上级失去联系，每个负责同志都订了一份国民党的《扫荡报》，从中寻找红军的消息，研究和分析敌情——红二十八军打下了新洲。他们可能从《扫荡报》上得知我们捉洋人的消息，或是看到各路敌人向山区进发，估计我们有所动作，才打下新洲，牵制敌人，配合我们行动。另有消息说，独立

团往西来，很可能独立团配合红二十八军打下新洲后，想进山区。所以我要很快返回一、四区，和独立团取得联系，想法把东北军驻在山区的第十师牵制到平汉线上，然后再对付一〇二、一〇三师。

第二天午夜，我在洪家河找到了驼二爷。张家胜也在这里，他说：

“今天傍晚，宣化店的老头子们分做几路向山区‘进军’，连刘海前也到刘家冲沟刘老八那里去啦。和驼二爷接头的仍是刘前初，因为他坚持要见我，我就和他见了一面。刘前初说：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国民党都已接受。武汉行营还送到大批钱和物资给我们，叫我们派人去宣化店接。刘前初还谈到，陈又文答应以后一切交涉定用公函。国民党的军队从明天起停止追击。凡是宣化店区公所扣押的群众，都已放出。至于刘庆连、熊妖、张德恒是归一〇三师，他们正在和该师师部商谈。在战场上负伤后被抬走的人，释放他们，陈又文说很困难；群众头上没有刻着‘共产党’三个字，可以辩白，但在战场上拿枪作战的人，肯定是共产党，想不出办法来释放，连蒋少元也没得办法，要求在这个条件上放宽一点。”

我对张家胜、驼二爷说道：“敌人所送的钱和物资，我们全部接受，并且要他们送出来。不过，这些东西接到手后，马上分散隐蔽，千万不要散在群众手中。这不是小气，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纸币是新的，号码也是新的，群众一拿出去用，敌人就会发觉，即使当场不扣押，也被敌人掌握了今后进行破坏的线索。必要时，可以利用宣化店的两面派

代我们购买东西，等新票子在外面周转一个时期，再散发给群众们使用。关于今后的活动问题，关楚印和便衣二队共同组成的游击队，由关楚印和申功臣负责，继续活动在定远店以北地区。便衣一、三队各为主力，配合新组织的便衣队，再组织两个游击队。三队仍返仙居顶；一队掩护接收物资……”

二一　胜利声中

深夜，我沿着一〇二、一〇三师防地，穿过灵隐寺的河沟，走进了林木参天的邓沟，和罗山第三独立团会合了。团长和政委详细地叙述了他们出发后所经历的大小战斗，以及他们所活动地区的各种情况。陈明江政委还着重谈到：

“在外线行动虽然有些困难，一则我们是新组成的部队，目标比较小，二来敌人在集中力量搞我们的苏区，所以对独立团不大注意。在外线可以活动，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困难——不易进山区和你们取得联系，更无法配合山区行动和有目的的牵制敌人。我们曾经几次想进山区，都没有成功。后来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方永乐政委派一个班白天打过来，给我们送来了两封信，知道你们捉了洋人，山区情况紧张，他们为配合你们，牵制敌人，去打新洲，我们才趁这个机会，半公开地进到山区；沿途炮楼上的一〇三师和各民团没有任何阻挡。”接着，他又谈到在白区活动的经验说：“凡是接近白区的地方，山上都没有‘倒林’，比较容易隐蔽。最大的困难是粮食。到白区活动还有一个好处：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多是地方上的反动武装，白天也可以活动，进行

宣传，扩充新兵。现在独立团已发展到二百多人。”

陈明江谈完，递给我方永乐的来信：

特委负责同志：

红二十八军自离开鄂东后，一进到皖西北，敌人就以十一路兵团堵击，二十五路兵团追击，一千多人的红二十八军，不分昼夜地与敌人的两个兵团浴血苦战。由于战争的频繁和激烈，加上弹药、给养毫无补充，部队减员甚多，现全军不足一千人。

部队到达皖北后，高政委因鄂东没有统一的组织，放心不下，两度带领部队打向鄂东，都没有达到目的。后因他旧病复发，仅带手枪团一分队下到舒城、霍山、潜山、太湖一带活动，并命令我带部队打向鄂东。我带领部队经多次战斗，才打到经、麻一带，再前进就遇到极大困难，转战月余，连打七次，都未能通过一〇二师所看守的宋、商封锁线，至今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部队伤亡很大，彩病号甚多。虽经徐诚基同志数次补充，部队人员仍在下降。因此要求特委设法扩兵，以便环境缓和时，我们打到鄂东后能得到补充。

根据几个月来行动的经验，部队不能这样继续打下去。我决定把部队分散，轮流到白区去活动，不但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也可以使部队吃到饱饭，多少得到一点休息，如群众工作搞的好，还

可能扩充少数新兵。我和高政委分手已两个多月，想打回去有困难，打向鄂东困难更多。现在我们被敌人卡在空档子里，无法向上级请示，但为了全军，我不能不这样做。待部队稍有休整，立刻集合起来打回皖西北。

我们一直没有接到红二十五军的指示，不知你们接到了没有？如接到时，请派便衣队送过来，我定转给高政委。

方永乐

明月照亮了高山绿林，河沟的溪水闪着星光，三个人坐在清寂的森林里正在交谈，吴光陆、郑定国都来到了。许久未曾见面，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愉快，围聚在一起，谈兴更浓，不觉得已是拂晓。最后的结果是：为了全区的解围，洋人顾问还是确定放。为了牵制东北军的部队，独立团打邓方家湾，便衣队配合去打同山寨，尽量想法打掉或活捉叛徒熊妖、张德恒。然后，独立团插丘陵过平原，到北丰家店去打五里店，尽量把东北军的部队牵制到平汉铁路的郑州段。最后返回大小鸡笼山休整。

大家睡了一上午觉。下午，陈明江、陈守信和我三个人，又坐到寺庙旁高高的岭峰上，在炎热的夏日，享受着松林里的阴凉。为了夜晚的行动，我开始把邓方家湾和同山寨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一番：邓方家湾的围子里，一直是地主、豪绅盘据的中心，里面的富农都很少，历史上就极端反动，又加上邓石玉当了联保主任，与叛徒张德恒勾结一起，更是反动透顶。寨子里一共有十四个炮楼，四、五十条枪。

寨子的前边是一个大塘，靠后寨墙是一排炮楼和楼房。硬攻是难以打开的，只有火烧。熊妖叛变后，为了监视我们的行动，在同山寨这里修起三个炮楼，地势十分险恶，四周多是悬岩绝壁，又是交通要口；站在炮楼上，抬头看高山，低头见深沟，平看是山连着山，所以号称同山寨。寨子里根本没有老百姓，熊妖带着三十几条枪，专门看守和监视大小鸡笼山上便衣队的活动情形。这一带原是一〇三师的防地，洋人被捉后，他们才扯到汉罗公路上。这正是机会，一定要切掉敌人摆在我们心脏地区的这两个毒瘤。最后，我补充作战部署说：

“天亮后，一〇三师可能赶回来增援，你们不必管他，由我们负责拖。我还可以通知关楚印带部队警戒宣化店，或者用策应的办法打宣化店。”

天黑后，我带领着特委警卫队与独立团同时出发。五十多里路的夜行军，在大半夜时就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先找到烧石灰的窑上，买了许多茅草柴，每人驮上一捆，慢慢运动到寨子附近，把同山寨紧紧包围起来。

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惊动了大地，邓方家湾的上空卷起了冲天火柱。独立团动手了。

老奸巨猾的叛徒熊妖，可能是根据枪声，估计攻打邓方家湾的不是便衣队，而是独立团；他很清楚，同山寨在大小鸡笼山所占据的位置比邓方家湾更加重要，既然用大兵力先打邓方家湾，不会不打他。因此，他一死地守着炮楼。我立即下令开始攻击。

火舌卷扬着扑上炮楼。熊妖领着敌人向外冲。一排机

枪扫去，熊妖立刻缩了回去。可惜我们只有一挺机枪，在换子弹的空隙里，熊妖带着残兵冲出贼巢，落荒逃去。

果然，天明后一〇三师赶来增援。我随即带领警卫队迎上去，和敌人接上火。此时，杨万家店和三义店的民团也赶来增援。我们虽然只有二十几个人，众寡悬殊，仍然坚持着同敌人激战，目的是为了牵制住敌人，使独立团迅速转移。

然而，敌人不听我们的指挥，却分兵两路，用两个营去追击独立团，一个营联合着民团回过头来，和我们应战。敌人来势凶猛，火力强烈，我们不可能固守作战，便决定边打边退，把敌人拉起走。每当退到一个有利的地势，我们就抓住时机，来一个反击，用手榴弹把敌人压下去。战斗在持续着，敌人很可能向我们实行包抄。我们抢先分出一部分力量，隐蔽着绕到敌人的尾巴后头，从两面来牵制敌人。

我们这两组战斗队，边打边退，打了一整天，退下来十几里山路。黄昏时，两组战斗队冲散敌人，汇合了。当即决定从胡家关口强渡大河，占据张家河的大山岭。这时，我们才发现大河对岸有了堵击的敌人，而后面的追兵又逼在眉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有攻过大河，才能杀出一条生路。我们于是又分兵两组，轮番掩护、转移。来到大河边，我们猛然返身，把手榴弹集中投向敌群，在爆炸的烟雾中，冲上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措手不及，稍一后缩，同志们翻身跃入大河中。

真是天遂人心，夜幕降落了。暮色中，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攻上了河滩，迎面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我们手中的盒

子枪，在这种场合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手中机动灵活地移动着，枪枪都敲在敌人的头上。敌人的死尸遍布沙滩，鲜血染红了滚滚的河水；面前的敌人有些稀松了，而我们的战士们却斗志昂扬，势如猛虎，扫开一条血路，杀奔上高山。

敌人伤亡很大，自知在黑夜里更吃不到甜头，急忙撤兵，摆在一条山沟里。我们安然上了高山顶。为了显示显示力量，我们在山头山坎，到处燃起一堆堆熊熊的篝火——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兵力。

一夜平静。同志们躺倒在篝火旁，伸展四肢，睡得十分香甜。东方刚发白，四处的哨兵齐来报告：敌人正规军配合民团，已将山头团团围住了。

我们在山头守夜的目的，正是为了牵制敌人，不使敌人去追击独立团。我和特委警卫队指导员黄陂老爬上一个高峰，了望四周敌人的兵力分布，决定找出敌人的弱点，打开缺口冲出去，把敌人拉向金山岗。

从拂晓到天明，敌人只是象毒虫一样地趴在山沟里和山坡上的矮草丛中，没有一个敢向前来。太阳一露头，我们立刻组织力量，用机枪射击敌人，咬住敌人的正规军；手执盒子枪的战士们，立刻向民团的防地冲去。民团一见二十几条“猛虎”下山，早已溃不成军。缺口顺利地打开了。

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走了不到三里路，霹雳一声，两侧的山沟里钻出来两股敌人的正规军，弹雨在我们头顶身旁纷飞。我们着实吃了一惊，当即分兵阻击。战斗正进行的火热，突然从宣化店传来激烈的枪声；随之看到那里的天空

上黑烟滚腾。我心里一阵高兴，关楚印率领便衣队打进宣化店了！

面前的敌人一发现他们的窠穴出了事，立刻慌乱起来，顾不上和我们恋战，纷纷拔腿撒鸭子向宣化店奔去。直到这时，我们才判明眼前的敌人，正是昨日追击独立团的一〇三师那两个营；可见独立团摆脱了敌人，已经安全转移了。

到达金山岗后山岭，我马上派交通去和关楚印联系，要他带队迅速退出宣化店，转移到一区；并通知张家胜日夜不停地赶往三区。

不久，交通返回来说：关楚印看到我们昨天打了一天，便连夜把部队运动到刘家坟园里，今天一清早，趁着敌人内部空虚，又利用群众赶集的机会，打进了宣化店老城北门。敌师部缩进子城，紧闭四门；用一个营的兵力和关楚印的部队在老城进行巷战。……

“他们退了没有？”我焦急地问。和敌人的正规军进行巷战，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出来时，他们说在退。”交通员回答。

我伏在山头上，远远地看着关楚印的部队退出宣化店，我们才向姚家畈转移。

我们安全地到达三区姚家畈，天黑时，进了尹家冲的山沟里。我刚躺到一块大石头上，想休息一会，王定堂带着队伍进了沟。他谈到：翻译已经由黄云先带走了，估计今天会释放。那个洋人顾问现在由一个便衣队看守着。如果上级确定释放，最好早点放。黄云先建议，再用便衣队去放，恐怕引起敌人的怀疑，使全区遭到更严重的破坏，要求特委最

好用半公开的部队去放，而且要把目标拖走。自打了邓方家湾和同山寨，三区的民团都调到金牛城一线上。今天早上打了宣化店，中午时，民团便得到通知："各民团返回原地，固守炮楼。为保出盟友，在一星期内不准出击……"

正在这时，张家胜赶到了。说是敌人送给我们的物资和款子，由区公所派的民伕挑着，一〇三师派一个营押运，已到黑龙潭，我们把它接到空山上，并已分散隐蔽。各部队按原指示坚持工作。特务队已带来，现在沟口徐家寨休息。

我布置任务说："接款子由警卫队负责。放洋人顾问由王定堂和特务队负责。洋人顾问要在礼山县城附近放，然后把目标拖过路西。"同时，我还分别要同志们通知各工委、县委、区委书记和便衣队队长、指导员以上干部，立刻前往大小鸡笼山。

几天之后，大小鸡笼山上沸腾了。同志们汇集在一起，欢欣鼓舞地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总结和布置工作，庆祝反"倒林"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反“移民”

二二　走在敌人前面

一九三五年秋天，反“倒林”胜利之后，敌人内部一片混乱，争吵不休，各自忙于收拾和清理残兵败将。我们抓住这个时机，顺利地对鄂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安排和布置。不久，根据地下党、便衣队和群众的汇报，得知敌人从军队到地方武装，以及地方上的政权组织都起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并且准备对我们进行比往年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秋冬攻势”。为了摸清敌人的内部情况，研究和分析敌人的新政策，以便强有力地反击敌人的“秋冬攻势”，我和吴光陆同志商议以后，决定趁敌人没有布置就绪之前，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研究敌情，布置对策。

雨后的秋夜，显得格外宁静。我和几个同志沿着深沉的幽谷，向仰天锅的高山上爬去。泉水从我们身旁流过，发出悦耳的潺潺声。但是，原先那些茂密的林木，早已不见踪影了，偶尔还可以看到敌人烧山倒林的痕迹。古老的尖塔变成了破砖堆，高大的庙墙变成了断墙残垣，伸腿就可以迈过去，庙院里长满了高及一人的野草。这一切，在淡淡的月

光下显得更加荒凉，它向人们展示着敌人的兽行。

我走进庙门，庙院里无声无息，寂静得令人奇怪，心想莫非通知没有及时下达？待走到里院，发现大殿里映出微弱的灯光，仍不见有什么动静，我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是敌人的埋伏？我警觉地、轻悄悄地接近正殿。所谓大殿堂，其实已被敌人烧得只剩下个屋圈了。

一伙青年人围坐在近五十岁的驼二爷身旁，正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故事。我为了不打扰他们，便默默坐下来。

驼二爷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他讲的是姜事务长的英勇事迹。姜事务长自从出外为彩病号买米，被敌人捕去以后，押在宣化店，受尽了严刑拷打，他没有屈服，没有在敌人的面前低头。敌人在杀害他之前，押着他在宣化店游街，妄想得到一些“精神胜利”。但是，坚强的共产党员姜事务长，在敌人的前面昂首阔步地走着，沿途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从容就义！多少群众被姜事务长的英雄行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驼二爷的心情，深深地感染了这伙青年人；大家都浸入愤怒和仇恨的激情里，沉痛地默默悼念着。

长久的沉默。时间已经太晚了，明天还要开会，于是我站起来对同志们说：

“天快亮啦，大家都去休息吧……”

同志们这才看见我。驼二爷首先问：

“何副书记，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家也纷纷围拢来，又是握手，又是问长问短，十分亲切。我随便答了几句，就连忙催促他们去睡觉。

同志们陆续散去，只剩下我和驼二爷两人，默默地坐在小油灯旁边。驼二爷忽然高兴地说：

“何副书记，咱们好长时间没有会过餐了；明天开会以前，让大家吃一顿怎么样？”

“那当然好，只是买东西临时来不及呀！”

“米，我们有；独立团带有猪肉和粉条；便衣队还带来点酒和一些野菜……。”

驼二爷立时来了劲头，一边说着，一边还把那些东西一一拿给我看，然后就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动手切肉做菜。老人驼着个背高高兴兴地忙得不可开交，他那热爱同志、关怀同志的心情，我是深深体会到的。我也插上一把手，帮着做这做那，听从老人的指挥，把煮饭的半截洋铁桶和煮菜的磁盆，分别架在石头上，接着烧起火来。不大会功夫，屋圈里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黎明时，同志们闻到香味都涌进屋圈里来了，看到这样丰盛的饭菜，一个个喜笑颜开，又说又笑，忙着把两桶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两盆子猪肉粉条炖野菜和烧酒，整整齐齐地放在屋圈的正中央。然而，过了一会，却不见有人盛饭，更没有人去碰酒菜，就连毛手毛脚的黄陂老，也在一旁楞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仔细地把屋圈里的人们看了看，这才发觉不见了驼二爷。我立刻说道：

“驼二爷可能站哨去啦。黄陂老，快去把他找回来。”

过了一会，就听得黄陂老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便衣队早放好哨啦，有什么不放心的？”接着，驼二爷就被黄陂老扯了进来。他似乎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不好意思地挤

在同志们之间，轻声地解释着：

“我是怕哨上不细心……”

“驼二爷是怕喝酒，才躲起来的！”黄陂老仍在一旁嚷道。

几个青年人立刻送过来一碗酒。驼二爷一面推脱着，一面说：

“不行，年纪大啦，不能多喝，你们年轻人慢慢喝吧！”

“躲起来就行啦？罚他喝一斤！”黄陂老说着，从同志们中间使劲挤到驼二爷身边，抬手就把一大碗烧酒举到驼二爷嘴边。驼二爷忙用双手挡住。

“这……这样多……”

看到驼二爷脸上一片难色，竟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怕把这老人难为坏了，我忙给驼二爷解围道：

“驼二爷为大家辛苦了一夜，没有睡觉，待会儿还要开会，今天少喝点，以后再让他多喝吧！”

吃饭的时候，驼二爷看到独立团政委陈明江没有碗，他又看看自己手里那只洁白的小洋磁碗，然后盛满了饭，走到陈明江面前说：

“这磁碗，是捉到洋人以后，蒋介石送给咱们的胜利品，”驼二爷的态度很庄重，“我代表老苏维埃，用这点礼物慰问中国工农红军。请收下吧……”

陈明江站起身来，激动地伸出双手捧住小洋磁碗。……

天明后，特委扩大会议就在仰天锅山头已烧毁的大庙圈里举行。会议分析了敌人总部署的概况：根据地下党和内部的情报看来，敌人已作了“秋冬攻势”的准备。敌人这

次的部署是党、政、军统一步调；口号是“在今年冬季里断绝共产党在大别山上的根苗”。目前，在军事上，敌人首先将一〇二、一〇三师换防。一〇三师的战斗力比一〇二师强，它又在形式上完成了“倒林”任务，得到武汉行营的信任，于是将它调至宋埠镇到商城、麻城、光山、经扶驻防，看守宋商封锁线，企图断绝我们和皖西北的联系，给我们造成孤军作战的劣势；一〇二师战斗力虽然不强，但专门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却是绰绰有余。敌人除了调防主力，还委程汝怀为“鄂东北剿共总司令”，代行武汉行营的职权，且已进驻七里坪。程汝怀到职后，首先调动三个保安团，又把各地的反动武装民团整编成大小不等的搜山大队，起用了世代反动的子弟任大队长。在河南，国民党委任号称“易大帅”的土匪头子易本印为“剿共总指挥”，代行河南省行营的职权，驻光山、经扶交界的南象店，同样把各地民团整编成了搜山大队。在政权方面，各县、区都换上了极端反动的顽固家伙当县长、区长；如红安县新换的县长，就是曾任过湖北省民政厅厅长的蔡小兰。蒋少元、陈又文被调回武汉行营。宣化店的罗一区区长，换上了世代地主的谭继仁，这是个无恶不作的老地头蛇，反动的手段非常毒辣。他一上任，就把“铲共团”团长、保长兼民团小队长——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甘允吉同志扣押了；把杨家桥马保长的民团强并到胡椒顶蔡富明的民团，成为搜山大队的一个中队。紧接着，又宣布全区的九个乡合并为三个大乡，由三个世代反动的子弟刘朗山、邹琴生、邓石玉任联保主任；还利用合并的时机，撤换了不少老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全县的民团都已经

整编成搜山大队；并且要地主的忠实走狗陈少堂当罗三区民团的团总。敌人一公布秋季移民，群众就非常害怕。特别是罗山一区的郑家湾、郑家窿、衣家湾、郑家冲等村子的群众，最是害怕。从前，这些村子共有几百户人家，后来因为他们姓里出了革命的领导者郑新民等人，又组织过第一乡苏维埃，所以敌人特别仇视他们，几次的“搜剿”、烧杀，剩下的人不多了。春天时，我们把这部分人动员到山里种田，估计他们在今年的“移民”中，一定请不到保人；如果被敌人撵进移民点，那又会遭到屠杀。有的群众有些动摇，要求我们想办法；也有的群众坚决表示说：“我们是苏维埃政权下的人民，永远不会向敌人低头，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把生命交给党……”

敌人的“秋冬攻势”可能分做两步：第一步，以一〇二师配合地方上的反动武装，用速战速决的办法，分头搜山、移民，加上抢粮，断绝我们和群众的全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第二步，到冬季敌人再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重重包围，最后把我们的部队撵到卡防或是老君山，进行合击，妄想把共产党在大别山的革命种子一网打尽，因此，敌人用主力堵塞我们和皖西北的交通联络线，使我们无法得到红二十八军的增援。

但是，我们有党的组织领导，有在反“倒林”斗争中生长起来的独立团、特务队、警卫队和许许多多的便衣队，以及地下党和广大的革命群众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敌人越是残酷和疯狂，共产党人越是英勇坚强，革命事业越加发展壮大。参加特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

志，满怀着信心，全面地研究了工作，经过两整天的讨论，取得了一致的决议。

关于粮食问题。敌人在“秋冬攻势”之前，就强迫群众把刚割下的稻谷挑进移民点，连稻草都不准留在山区里一根。根据这新情况，我们对敌人进行的抢粮斗争，也改变了对策，首先动员没有经过搜山的地区的群众，稻谷一黄就抢割抢收，埋到山里；其次，敌人抢的是红军家属和穷人的粮食，我们组织公开的部队，掩护群众收割，敌人白天抢，我们就白天打。夜晚组织群众配合部队，先抢反动头子、恶霸地主如刘朗山、刘修斋等家的粮食。县区的党组织、便衣队和所有的同志都很重视储粮工作。

对于民团内部的分化工作。敌人一开始就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扣押了甘允吉，强编了马保长的民团，使我们受到损失。因此决定工作较好、没有引起敌人怀疑的民团，尽量保持在原地。敌人已有怀疑，或有被整编、遭到破坏危险的民团，一律由民团内的党团支部负责将全部武装及时拖出来；两面派的民团，能拉动就尽量拉，拉出多少算多少。拖出之前，布置要机密、迅速，要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好，最好在拉出来的时候有部队接应。所有拉出来的民团，年轻力壮的，在自愿的条件下，尽量编入独立团；愿意留在本地区的，由警卫队抽出两个班，分别以罗山一区、大小鸡笼山为基础组织第一、第二教导队。队长由民团内的党团支部书记担任。他们凡是愿意带出来的家属，一律上山隐蔽。

至于部队的活动，在敌人大举移民和“秋冬攻势”的初期，我们一定要保持实力。独立团在短时期内得到充实后，

以灵山、四王山一带山区为基础，再伸向平原，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同时它也是策应外线的有力力量。特务队、警卫队和即将组成的两个教导队，活跃在各根据地，配合便衣队打击敌人，掩护群众，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同时，各县区都要有自己所属地区的便衣队。

为了反“移民”斗争的胜利，我们不能和移民点内断绝联系，我们一定要插进移民点，因此决定所有的农民小组，没有公开的小便衣队，地下党的同志，凡是没有被敌人发现和可能被破坏的，都要随着群众隐蔽地插进移民点。

此外，关于安插联络点、联系暗号、彩病号和群众的隐蔽、营救被捕群众，和红二十八军的联系，以及特委负责人的分工等问题，会议也都做了详尽的布置和决定。

会议结束以后，天空撒起了毛毛细雨。我和几个便衣队员来到董家凹的后山上，无处藏身，只好躲在刚够一人高的幼林丛中，任凭细雨迎头浇洒。也许因为下雨的关系，早早地就看不到山脚下的道路了。我从树丛的空隙间向外了望，正想叫同志们转移，忽然发现一个人冒雨钻进树丛，东张西望地向山上爬来。我立即对同志们说：

“快隐蔽好，下边有人。”

我两眼盯着那人，一边心里在捉摸：天都快黑了，这种时候敌人不会出来搜山，这人不会是敌人的探子；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人规定在这里接头呢？可也不对头，我们在这里隐蔽了一天，并没有看到三区的便衣队呀。这时，只见那人东瞧西望，左一钻，右一找，还用手拍打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暗号，这更引起我的警觉。

他爬到离我们不远的一块石头旁，失望地坐了下来，用身上的围裙擦着脸上的雨水，休息了一会，然后又站起来，不安地向四外看看，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再不来啦？"

他大概不是坏人，许是来找便衣队取联系的。我慢慢爬到近前一看，原来是染匠董志保，我便站起来走向前去：

"董大哥，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染匠擦擦脸上的雨水，眯着眼细看，才认出我来：

"老四，是你呀！我们掌柜天天叫我上山找便衣队接头，可一连三天没有找到一个人，掌柜的急的不得了。你到他家去一趟好吗？要不，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叫掌柜的来？"

染匠的掌柜名叫刘子清。最初，当我们镇压了丁印昆、陈练青等反动头子以后，就吓住了一批两面派的地主、士绅和他们的子弟——一些青年学生；刘子清就是其中的一个高中学生，家庭成分是地主兼商人。从那时起，他就跟地下党刘达诚有了联系，帮我们购买子弹，搜集敌人内部情报，彩病号时常在他家里隐蔽。经过地下党的教育和考验，又经特委研究，批准他为中共候补党员。只是我没有和他见过面。我问染匠：

"他有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摸不到头。"染匠回答说，"听佃户们说，便衣队不叫割稻谷。许是为红军粮的事情。"

一听说是为红军粮，我心里有了底；不让割稻谷，可能是因为缴纳红军粮的数字没有确定。这一带的情况我掌握得不够充分，刘子清近来是和罗山三区便衣队王定堂指导

员联系的，有什么事情不好商议，要来找我呢？于是我又问道：

“刘子清近来有什么变化吗？”

染匠回答说：“没有，还跟从前一样。”

“村子里有四个炮楼，敌人把的很严实，我们这样进出，你能保险？我看，没有要紧事，还是不见的好。”

“能保险，前不几天，王指导员还来过。”染匠很是着急，语气恳切地说：“老四，掌柜的是有事情，不然也不能叫我天天上山找便衣队。今天我出来的时候，他再三嘱咐我说：不管找到哪个便衣队，他都要见一面，要是出了事，由他一人负责。依我看，你就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找他来。”

也许，刘子清真有什么急事吧？我答应在山上等一会。染匠立刻顶着雨水，跌跌滑滑地奔下山去。

这时，我又想到：刘子清和罗伸发是同学，最近罗伸发当上了国民党搜山大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看刘子清能否利用同学的关系，拉一拉罗伸发，让他少做点坏事。……

黄昏中，影影绰绰看见两个人向山上爬来。他们穿过茂密的幼树丛，走进了我们的隐蔽地。刘子清拉住我的手说：

“能找到你，什么事情都好办啦！先不谈这个，天黑了，雨这么大，还是到我家里去吧。”他怕我不放心，又说：“别看村子里有四个炮楼，枪不多，绝对出不了事。”见我表示同意，他这才对身旁的染匠说：“你先走，到门口说一声，叫他们换两个可靠的人站哨。”

看样子，他在村里已经有了布置。我放了心，照直走进

他家的厅屋里。刘子清显得闷闷不乐，愁眉苦脸地说：

“这事叫我怎么说呢？”

“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因为我们都是青年人，说话很干脆，太简单，为了红军粮的事，我和王定堂顶了几句嘴。嗨，我一股脑儿全端出来吧，”刘子清有些活跃了，“红军粮和往年一样，这个政策已经传达下来，没有人敢违抗，都表示要慢慢地缴。可是王定堂不叫佃户们割谷，这可真不是一个办法。前几天，区公所有通知到各联保，叫大家做准备，说是今年的秋收是先抢粮后移民，还说什么要组织军队‘帮助’老百姓秋收……哼！说的倒好听，他们一抢到手，再给老百姓按个‘通共’的帽子，粮食不就全是他们的啦！用什么来缴红军粮呢？再说，当民团的官，不就是为了发财吗？我们捉摸，民团对今年的抢粮肯定要下毒手。所以，人们都议论纷纷，表示红军粮一定照缴，只是要求谷黄了就割，宁肯少收几斤，也不愿被民团抢去。这样做，大家还能留下一点口粮……”

听他所谈的情况，可能是三区便衣队掌握了这一带地主的佃户，也许抢粮就从这些地主头上开刀。我想把问题拖一下再解决，就对刘子清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们考虑一下再决定。对这件事，地主士绅们还有什么议论？”

“大家在一块议论了一下，还推选卢子古和我找便衣队接头。你既然来了，是不是也把卢子古叫来见一面？”

“那好，就叫他来吧。”

卢子古是个大财主，又是国民党陕西省省长熊斌的大

舅子。熊斌在家乡的产业，全部由他管理，纯粹是个守财奴、看家狗。他一定是被逼得没了办法，这才硬着头皮到处找便衣队。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听刘子清的召唤，黑夜里竟然顶着大雨，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一见面，他就唠唠叨叨地说起来：

“何先生，不是我不出力，真是找了你好几天，一直没有问到个影子。是这么回事：熊斌由西安派人来收租，收租的人一回来就找我，叫我找王定堂先生商量一下。王先生说要熊斌缴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我说多了一点，王先生很不高兴。咳，其实，我也是替别人办事呵。”卢子古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停了一下，才说：“何先生，你看这事能不能通融通融……熊斌的那份红军粮，非要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吗？”

“熊斌当个省长，有的是钱，为什么还要到本地来刮地皮呢？”我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我看，他所收粮食的一半缴红军粮，不算多了吧？剩下的那一半粮食，他也不会带回西安，必定是在本地卖掉，再在家乡买田置产业。这样：凡是他要出手的粮食，一律不准运出山区，一定要全部卖给我们。这件事，就请卢先生帮忙办理好吗？”

我的话音刚落，卢子古猛然间站了起来，急跄跄地走到我面前，“噗嗵”一声，双膝跪在了地上：

“何先生，我真没有这样多的现钱呀！……”

刘子清在旁边吓了一跳，我一时也懵住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细一回味他的话，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视钱如命呵！他误以为我们叫他出钱。我不

由得笑出声来，对他说道：

“起来，起来。卢先生，只要你缴自己那份红军粮，买熊斌的粮食，钱由我们出；一个钱也不要你掏。在移民的时候，你如果能帮我们一些忙，就是你那份红军粮，还可以给你减免一部分。”

卢子古这才站了起来，点头哈腰，满口称是。我接着说：

“熊斌缴红军粮的数字，和他卖粮的数字，你一定要告诉我；粮食的转移运送，你们和便衣队联系，由他们负责。”

卢子古连连应道：“那好，那好，一定照办……”

卢子古走后，我开始向刘子清询问移民的情况。刘子清说：

“现在我是自身难保。从前陈又文当区长，有事情还好说；如今换上了谭继仁，我完全说不进话。而且，他们把我列为‘政治上的嫌疑分子’。”接着，刘子清告诉我：“大家都不愿意移，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一带过去是罗山第九乡苏维埃。大家聚在一起商议了一番，派人到区里进行商谈，得到的回答是：‘只要过去是苏维埃区，今年都要进行大移民。’要是真的实行了大移民，老百姓又会被他们抢个精光，老百姓现在都很害怕。这一带的移民，一半归罗伸发管，一半归曾伯龙管。如果他们两个的民团不硬往下撵的话，联保里我们已经串通，愿意给我们帮忙打掩护。不过，就是罗伸发和曾伯龙这两个人，我们一点也拉不动，想套一点底都套不出来。”

“你和罗伸发不是同学吗？”

“罗伸发以前还不错。”刘子清有些惋惜地说，“这小子现在变得很荒唐，又吸上了大烟。依我看，将来有六亲都不认的时候，何况同学？”

“你还是多活动几个人，和他拉一拉，叫他少做点坏事情。”我站起身来，“就这样吧，我要走了。”

深夜里，我们迎着连绵的秋雨，走出了村头。翻过一条山岭，在三尼庵的庙里见到了王定堂。他说敌人正在移民，天天搜山查户口，各村都不好隐蔽。今夜为了和我接头，才特地赶到这个小庙来，要在白天，这里是一会儿也不能停留的。情况如此紧张，我考虑只有插到敌人驻地附近，到雷班寨下边地鸡凹的小独湾里去，那里住着葛剃头的，估计他家没有移民。

我们当即动身，到了小独湾，用暗号叫开葛剃头的门。当十几个人走进他那狭小的屋子里，我又感到不放心了。

“你这里能隐蔽一天吗？”

“行。我弟兄两个都是剃头的，满场跑，平时没有人来，也没有叫我们移民。天亮了，我到下边湾子里去剃头，带给你们放哨。”

稍微休息了一会，王定堂就谈到敌人在丰王家店杀了很多人。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他们明知道施大安便衣队在邓一带活动，就是取不上联系。昨天，王定堂和曾伯龙见了一面，他说陈少堂带一部分民团，由陈世杰联保、张瑞清联保和刘绍彦民团配合，进行搜山、清查户口、移民。谭继仁也到了丰王家店，正和陈少堂、陈世杰为移民出主意。曾伯龙说，谭继仁和陈少堂对他有怀疑，才不分配他任务。他祖

父曾凤亭还在省里跟颜香亭打官司，怕他们拿他的错。他提出一个要求：为了减轻国民党对他的怀疑，想抢先主动进行“移民”，等稻谷黄了的时候，再想办法进行收割。

我和王定堂都觉得曾伯龙说的有道理，决定答应他的要求。我对王定堂说：

“你最好再和他见一面，说明我们有一个条件：在‘移民’时，民团不能抢老百姓的东西；进到移民点以后，哨位不能放的太严；山中的晚秋作物，一定要想办法让群众收割。要求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尽量地照顾一下红军家属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如能做到这一点，他的红军粮可以减免一部分。”

最后，我告诉他和卢子古、刘子清见面的事情，要他按照原定的办法给他二人回一封信。分手时，我对王定堂说：

“我从这里到仙居顶去，要经过观音寨，就按照你说的地址想法和施大安便衣队取得联系。”

二三　心里向着苏维埃

我和韩允之走在两头，把三个新参加便衣队的队员夹在中间。天色漆黑，雨不停地下着，地上十分泞滑，大家手牵着手，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走到丰王家店附近时，山高坡陡，更加难行，又耽心被敌人的哨位发现。每到一个村镇的附近，我就爬在前边带路，同志们一个跟着一个，后边的人用手拉住前面人的小腿，这样三寸五寸地向前移动着。黎明时，我们终于走完了这艰难的四十五里路程，到了观音寨

山杨家冲沟里，东找西寻，在山坡上一堆松树枝旁，总算找到了施大安便衣队。

施大安看到我，高兴地说：

“我们和区委失掉联系有十天了。今天我带两个人专门在这里等区委接头，恰巧碰上了你们。”

“是王定堂说你们在这一带，我们才来找你们。”我回答着，在松树枝旁坐了下来。

这一带地区过去不是苏维埃区，群众的觉悟不高。他们主要是靠山上的树木和竹子生活，每贩一次山，就能获得许多钱，一般生活水平很好，虽有贫雇农，但为数极少，不易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个地区的移民，都归陈少堂管。陈少堂这家伙既狡猾，又毒辣，现在稻谷还没有全黄，他就把王家田、杨家冲两条沟的群众都移到丰王家店下边的丰家湾；把黄家湾沟、观音庙南边的几条沟的群众，都移到王家店。民团强迫群众砍倒山上的树木，在移民点周围扎起围子，只留一个门，而且放着双哨。太阳出来后，老百姓才能走出移民点去种田；太阳落山前，就要返回移民点。再加上不断地严密清查户口，我们的便衣队很难插进移民点。反“倒林”后新组织的三个小便衣队，利用关系已经插进孝感地区的杨家田；这里仅有老便衣队在坚持。

敌人这次移民，阶级划分的很清楚，富农以上的都移到小店子的街上；中农以下的才进移民点，由民团严加监视。我们以前所建立起来的联络点，都没有被破坏。只是环境一紧张，群众害怕，不敢和我们联系。施大安便衣队所属的地区里，现在只有杨家冲下湾方二的媳妇黄芝毛一个联络

点，还能供给我们一些情况，送点吃的东西。施大安介绍说：

“黄芝毛是罗一区黄家寨的姑娘，苏维埃时是童子团的团长，现在年纪还不大。下午她可能来，我打算和她研究一下，她如果能够掩护我们，这个便衣队就暂时留在山区；她实在不能掩护我们，我们准备请示区委，暂时撤离这块山区。”

我表示同意说：“一个可靠的联络点都没有，情报、粮食都要自己去搞，便衣队的确很难坚持。还是等一下黄芝毛，了解一下情况再作最后决定。”

松林里透进白光。我们走出林子，只见弥天大雾，三步开外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施大安领着我们，转进另一片松林的深处，隐蔽在林中一块空地上。

松林中非常清静；只是从仙居顶方向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

太阳挂在西树梢。从松林的空隙里，我看到山脚下有一个身材灵巧的女人，敏捷地跳过河沟，绕过巨石，向山上爬来。她走进林中空地，一认出我，立刻被这意外的相遇惊呆了。看着她那细长的睫毛和圆圆的大眼，我的脑际也浮现了一个活泼灵俐、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苏维埃时代的童子团团长黄毛。我深深记得，有一次，罗山一区三乡苏维埃干部会议上，决定斗争恶霸地主“张大老爷”，没收其全部财产。在乡苏维埃办公室里，我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向同志们分配工作说：“干部们负责发动全乡的群众参加斗争大会，赤卫队、少先队负责警戒、站岗放哨，童子团……”童子

团三个字刚出口，黄毛忽地站起来，郑重其事地挺胸立正。“你们的任务是看守‘张大老爷’家里，不让他家逃掉一个人，更不准运走一点东西……”接受了这样一件重大任务，黄毛的心里乐开了花，脸上露出严肃、认真的表情，一时象大了好几岁。在她的颈上，老挂着一只小哨子，出了乡苏维埃的大门，她就拿起来“嘟嘟嘟”地吹着。正在玩耍的童子团员们，听到哨音，立刻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黄毛从排好的队列中，挑选出年纪大一点的团员，然后带着他们直奔向张家湾。来到村头，黄毛将伙伴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放哨，她带领另一组闯进了恶霸家的院子里。“张大老爷”看到这些气势汹汹的大孩子们，急忙献眉献眼，端茶送饭。黄毛板着面孔，不去理会，把老家伙和他的家眷全部关进一间房子里，家中的佣人也被分隔开来；并且一一检验了地主的粮食、衣物和家具，门上、箱子上还工工整整地贴上了封条。“张大老爷”家的里里外外，被童子团把了个严严实实，黄毛有条有理地分配任务，指挥团员们轮班站岗。几天后，直到贫农团来了，黄毛得到命令，才打开门上的锁，贫农团用粗绳子把“张大老爷”紧紧捆住，拖往会场……

过去的黄毛，正是眼前这个黄芝毛呵！多少日子过去了，在敌人残暴的统治下，一她受尽了难以诉说的蹂躏和摧残，今天，她的心情又是怎样呢？我们一同坐在草地上，也许是爬山太累，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只见她扯着衣襟，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水。缓了会气，她才开口说道：

“你们在山上饿了一天，下到湾子里找点东西吃吧。”

“到湾子里去？”我很是惊奇，“那里没有移民？”

“移啦，全移啦。”她刚才那点拘束，完全消失了。“民团还要武的，用枪撵人就象撵鸡狗一样，把老百姓都给赶进了移民点。说实话，民团上的兵，哪个不是老百姓？可一进民团的门，简直变成了畜牲!”

从她的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苏维埃时代她那热情、干练的风度。我问道：

“移民点里管的很严，你出入方便吗？”

“我实对你们说了吧!”黄芝毛往稳实里坐了坐，索性大谈起来。“我初到姓方的家里来，他们全村都有点欺负我，说我是苏维埃的人，有事没事总避着我。我想，苏维埃下的人，又不丑，怕什么呢？有人欺负我，我就不干。再加上我没有公婆，方二又是个老好人，凡事都顺着我，由我作主。慢慢地，他们不敢欺负我了，相反有点怕我了。我和便衣队接上头以后，有时便衣队向地主要红军公粮，我为了拉他们一把，和便衣队商量着给他们减一点，顺便送个人情。从此，他们就在背后叫我‘女光棍’。我还拉住几家小地主，他们保着我，所以我在移民点的出入才比较方便。”说到这里，她缓了会气，接着又说下去。“今天我来，一方面是为了和你们接头，二方面是有几家的红军粮托我找你们说说，要求你们减一点。我也寻思着：现在敌人就这样严，到了冬天会更严，光是我一个人跑来跑去，怕暴露了目标。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减少一点红军粮，也叫他们帮帮我们的忙。杨二家兄弟三个，都是土地主，看财如命，只要能给他们减少红军粮，他们就会愿意帮我们的忙；姓杨的还有几家也是

这样，我没敢和他们公开说，想先来跟你们讨论一下，看这个法子行不行？”

听她所谈的情形，便衣队在这里隐蔽下去还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试探着说：

“这个便衣队本来想抽出去组织游击队，但又想到这一带有很多革命群众，如果把便衣队抽走，怕以后敌人摧残老百姓时没有人报信，部队就无法来接应，那时候老百姓就会更苦。所以我们决定这个便衣队还是留在这一带活动。不过，便衣队吃饭的事情，还要黄同志多想些办法。姓杨的在这一带户族很大，只要他们愿意帮忙和搜集敌人的情报，红军公粮可以给他们减免一部分，甚至全部免除。做到这一步，便衣队在你们的隐蔽下，能扎根坚持下去吗？”

黄芝毛脸色一沉：“何指导员，这一带的便衣队无论如何不能都走完呀！到了冬天，不知有多少穷人需要便衣队呵。……便衣队的隐蔽，多了我不敢说，如果光是施队长和他的几个老队员，可以留在这个山上，由我和方二、杨二，三个人负责。”她边想边慢慢地说：“我是住在山上靠山吃饭的，这块松林多年来没有砍过，早有人和我商议想做这里的木料，为了留给便衣队做隐蔽地，我一直没有答应。现在施队长和同志们留下来，我就可以答应他们，找两个木匠来，在松林里搭起棚子锯木料，这样我和方二来来去去地送饭也有个理由。你们看怎么样？”

“这个办法很好，就是木匠要可靠。”

“这我知道。我回娘家去找两个可靠的人来。”

“黄同志很有才干，我同意这个办法。施队长，你有意

见吗？”

“我没有意见，”施大安笑着说，“黄同志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长大的，她的心一直向着苏维埃。她是我们的老联络点啦，各方面都很可靠。”

“天快黑啦，到下湾去吧，我家方二挖了个洞，里边还留了点吃的。”

黄芝毛陪着我们走进空无人烟的湾子里。她热情地从洞里取出一些米和玉米棒子，还在里边寻找着什么。最后，她站在同志们中间，有些为难地说：

“我带了一个土罐子给你们当锅烧饭用，可是一出移民点就被民团搜去了。”

饿了一整天的人们，眼巴巴地看着现成的粮食，却吃不上饭，身上那股别扭劲，就不用说了。我只好对同志说：

“每人拿两个玉米棒子，马上转移。”

黄芝毛送我们走出湾子，恋恋不舍地和我们分了手。——我们走后，黄芝毛继续为我们搜集情报，掩护便衣队。冬季敌人移民的时候，联保主任强占了她那片松林，用“通共”的罪名，扣押了黄芝毛。在敌人的酷刑拷打中，她坚持着，没有吐露一个字。陈世杰无可奈何，只得把她软禁在移民点里。在一个雨雪交加的黑夜里，她和方二逃出了虎口，在深山里找到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一切，都是后来在反移民胜利的日子里听说的，我还知道她已经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在我们山上的小医院里担任指导员。

在寂静的深山里，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向肖家山上走去。天快亮时，我们在绝壁旁的茅草丛中隐蔽。

韩允之隐蔽在地势较高的荆棘棵内，负责放哨。

天一明，仙居顶方向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中午时分，枪声逐渐接近肖家山。不久，离我们不远的张家冲、曾家田、孙家寨三条山沟里响起了连天枪声。

“听枪声，敌人好象要合围这座山。”施大安低声地说。

我不放心地问他：“你们和仙居顶有联系吗？”

“没有。”

没有联系，这就奇怪了，敌人怎么搜到这座山上来呢？如果是敌人有计划的搜山，为什么没有看到丰王家店的敌人出发？莫非是敌人在搜山中发现了仙居顶的便衣队，追到这边来的？……我正在想着，枪声已来到我们的背后，还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喊叫声：“捉活的！”“再不出来要开枪啦！”

“嗵，嗵，嗵……”就在我们隐蔽的峭壁上头，跑来了一群敌人，高声呐喊：“喂，下边有共匪……”同志们谁也没有动弹。

下午三点多钟，敌人开始收兵，成群结队地从我们身旁的放牛小道上走过去。不一会儿，从葛李家湾就传来老人、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叫声。我不安地问：

“韩允之，民团又在葛李家湾撵人吗？”

“是呵，把村上的柴草都烧啦。”韩允之身子贴在绝壁上，一边观察一边说，“民团的前站已经到丰王家店。……山上再没有什么动静。”

我想和施大安研究一下去仙居顶的路线，刚叫出他的名字，就听得韩允之很惊讶地说：

“不对头！民团虽然收了兵，可山上又下来十几个便衣，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再仔细观察一下。”我扭头又问施大安：“附近有便衣队吗？”

“没有。”他回答得很肯定。

天没有全黑，敌人别动队下卡子的时间还没有到，附近又没有便衣队，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奇怪，韩允之又说道：

“指导员，有点象朱洋人。”

“不要发生了误会，你隐蔽着爬下去看看。”

韩允之爬了几步，我就听得他问道：“谁呀？”

对方一个人反问：“你是谁呀？”

“你先说你是谁？”韩允之再次追问。

对方另一个人说道：“不要误会了，我听是韩允之的声音。”

后边回话的这人，我一听就是何耀烈，便急忙站起身来：

“你是何耀烈吗？”

“是我。”何耀烈回答着。

朱洋人早向山上跑来：“原来是你们呀！你看，我的手扣着机头，正准备开火！”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手中的枪给大家看。

夜幕中，同志们坐在山顶的羊肠小道上。朱洋人向我叙述了他们这个便衣队近两天的活动：便衣队接到驼二爷的任务，从罗一区出发，到仙居顶去布置工作。经过唐家

店、小土居岭、楼子湾和高山塘，到处都看到敌人修起了炮楼。到达于家冲，才在村子里找到一个老太婆，说是张家家族团的大队长张德斋当了区长，他的民团把这一带的群众都撵到彭沈店，走三、四十里路看不到人家。老太婆白天装病，才留下来和便衣队取联系的。她说后山上有独立团一个伤员于介之，在山沟里等便衣队，每天都是老太婆给他送饭。这两天，民团天天搜山，又下雨，老太婆无法去送饭，今天去看，他已经死啦。朱洋人听了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处理，就给了老太婆十块钱，请她设法安葬于介之同志。随后，便衣队就上山隐蔽。上午，一〇二师一个营的兵力分别占领了各个山头；中午，张德斋的民团开始搜山。约莫四点来钟，敌人发现了便衣队，立即进入战斗。几排子弹压去，敌人略一后退，便衣队趁机抢过了山沟。战斗中，小陈同志负了重伤，天黑后转移到硷子沟，小陈同志就牺牲了。便衣队在一个山村子里找到一个老太太，她有一副棺木，好说歹说，出了八十块银洋，便衣队才买下棺木，把小陈同志的遗体埋在沟里。转移时，留下便衣队员熊驼子在附近监视敌人。第二天天黑后，熊驼子回来说：敌人发现了新坟，扒出来、连死人带棺木一齐用柴草烧掉了。……朱洋人谈完后，要我对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作出指示。

三队这样一拖，敌人今天没有搜到，明天还会大力来搜。这里不能停留，要赶快离开。我要施大安便衣队到五约山活动一趟，看看能否在那里建立起第二个联络点；朱洋人的便衣队随我活动，今夜返回罗一区。

一路上，除了无人区，就是移民点。过了河，同志们在

迷家田沟头上休息，我到小庙里去了解情况。老和尚告诉我说，从这里到赵家冲的一条路上，虽然移了民，但刘修斋的民团还是不分昼夜的补路口，这条路再不能走了。到破塘凹的路也不能走，陈君臣回来后，连夜修起了三个炮楼；同时，想走这条路还必须经过陈君臣的门前。……这几条路都不能走，怎么办呢？返回去吗？不行，就是从水里也得走过去。走出庙门，我就对朱洋人说：

“陈君臣回来在村子上修起了三个炮楼，他们门前不能走，就从水里走。我在最前面，你在最后尾。注意，走在水里不能发出响声。”

离破塘凹不远的地方，我们下到半人深的河水中。人们互相牵着手，鱼贯而行。河水凉森森的。每个人都猫着腰，一边试探着，一边慢慢地移动着脚步，深怕在河水中发出大的声响。当我们走出河道，爬上大岭，站在寂静的高山上，放眼四望，只见汉罗公路上的小灯光连成了一串。

“何指导员，又有事做啦。”朱洋人手指着公路说，“你看，敌人大车小车的一长条，一定是运木材修桥。”

“这一带情况可能很紧张。同志们几天都没有吃顿饱饭，要是真的碰上了敌人，怕要吃亏。要想法和一队联系上。”我想了想又说：“还是先到何家大凹了解一下情况：何明富老甲长说过，移民的时候，要是我们没有人，他就把他老伴留在屋里和我们接头。”

全村死一般寂静。走过几家院子，不单是大门用土坯封闭，连窗子都用泥巴糊得密不通风。来到何甲长的院子，看看四周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门窗同样紧封着。我一人先

跳进菜园里，新挖的洞口上照旧压着石板；我又走到一个窗子边，轻轻抽出一块土坯，向里面仔细探看，只见满地都是乱七八糟的稻草。我把那块土坯照样安放好，然后打了个招呼，同志们轻轻地走进菜园。朱洋人掀起石板，大家顺着地洞走进了屋里。

有的同志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有的找个角落躺下来就睡，也有的在找东西吃，把稻草撮向一堆。

“嘿！这里还有好东西哪！”

朱洋人惊异的叫声，立刻吸引了同志们，大家纷纷凑到他跟前，只见他从稻草里端出一盆子冷饭。他急忙问我：“指导员，能吃吗？”

“吃吧。”

同志们已经几天没有看到米饭啦，见我应允了，都伸手到饭盆里抓起来就吃。

朱洋人高兴得直喘气，一边吃着，一边说着俏皮话：

“这饭呀，自动地加了调料，酸溜溜的……”

大家被他逗得吃吃地笑起来，吃得格外有味。

“何指导员，还转移吗？”韩允之接着问我。

“就在这里休息。他老伴不在，估计他白天可能会来，了解点情况再说。多数人睡觉，少数人放哨。”

早晨，韩允之放哨时，发现情况向我说：

“指导员，乌子铺出来了十几个人，很象是民团。”

不知道民团出动的目的是什么，我立即叫醒朱洋人说：

“你到那边窗口去，注意其他地方有没有民团出发。我往意出来的这一股民团。”

我站在窗边，从小缝里不眨眼地盯着那十几个民团一步步逼近村子。他们的后面再没有军队出来，不大象搜山的样子，可是我们在屋子里，四周围都是敌人的炮楼和移民点，不能不作准备，以防万一。我就命令道：

“同志们，准备好。这十几个敌人不搜便罢，要是真的来搜，就先消灭他们，然后进丘陵。”

这时，同志们早已全都起来，而且已经清理好武器，等待着战斗。

民团的十几个人越走越近了。忽然，他们穿过村街，向下湾走去，渐渐地消失了。

我那紧张的心情也随着轻松下来，坐在稻草上，感到极度疲乏，全身没有四两劲，心里热辣辣地难受，真想躺下来睡觉。我把两臂懒懒地一伸，身子还没有倒下去，就又听到韩允之报告说：

“有一个穿便衣的，直向村子走来。”

我急忙爬起，回到窗边。待那人走近一些，才认出来他是何明富。便说：

“他是何甲长，正是咱们要等的人。”

何甲长走进村子，东张西望了一番，又装做挖菜的样子，走进菜园。他大概看到了暗号，知道来了便衣队，便掀开石板，下到洞里。

“你们可来啦！只当你们再不来了，真把我给急死啦！”何甲长走进屋里，四下里看了一看，见我们把稻草都堆在一起，问道：“留下的饭，你们吃了吗？”

“那还能不吃。”韩允之说。“老大爷，要不是你留下饭，

就要把我们饿坏啦。你准备得真齐全，有饭还有水。大家都谢谢你。快坐下歇会儿吧。”

何甲长在我身旁的稻草上坐下来，慢慢地说道：

“这一带移民好几天啦，我们被移进了乌子铺。这附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郑新民领导农民组织过第一乡苏维埃，所以姓郑的人被国民党杀掉的最多，下剩的几个人，也都被国民党扣押着，一直没有人保，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乌子铺是王四季领导着穷人组织过第二乡苏维埃的，姓王的本来户族就不大，又经过一杀，再没有剩下几个人，王四季的老娘也不知逃在哪里。敌人现在对乌子铺还是不放松。唉，现在的乌子铺呀，没有法子说，活象四次‘围剿’后的难民所！”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两眼发直地瞪着我。看得出来，他内心很是痛苦。许久，他才象醒悟过来似的，接着叙述下去。

“移民点先从红军家属身上开刀。陈满子有七个儿子，三个儿子当了红军，剩下的儿子有的死啦，有的给国民党抓差没有回来，家属早被他们卖掉了，只剩下三个寡妇儿媳妇，这次一进移民点，就被国民党捉去，到现在还不知道卖在什么地方，这还不说，那些狗杂种这会又把老头子毒打得要死不活！我老弟兄四个，下边有十二个孩子，跟红军走了三个，剩下的几个就象是老鹰叼小鸡一样，今天在‘赤卫队’牺牲一个，明天给国民党军队抓去送差死一个……连我老弟兄也是这样一个个的死了。现在只剩下我老两口，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儿子，还有两个寡妇老嫂子和两个没有被杀

掉的媳妇。我儿媳妇甘春兰，移民的当夜就被刘修斋的民团强迫着把她捉走，被他们的一个分队长霸占着；我侄儿媳妇甘桂兰，也被宣化店区公所一个区员霸占去做小……何指导员，你看我们能活下去吗？……”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最后放声痛哭起来。同志们也都难过得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的心绞痛得象有把刀在剜割一样，一直沉默着，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语言能够安慰老人破碎了的心！

突然，老人用一种教导的口吻说：

“你们光是几个便衣队，几把盒子枪，这里躲躲，那里藏藏的，这样下去不行。刘朗山自从被你们打过后，名义上不做大坏事了，暗地里他还是做坏事。最近又新换上了一个叫方桂才的大学生，听说国民党叫他当县长他都不干，一定要回到家来当个联保主任，给他父亲报仇。现在地方上有这样多的坏蛋回来报仇，把我们苏维埃下的人移到一起，不明明是对付这几个没有死了的人吗？你们再不能眼看着这几个人被他们杀死，你们要打！”老人有些激动了，“你们再想想四次‘围剿’，五次‘围剿’，哪一次不是打出来的？你们再不打就不行呀！”

“打，群众愿意打吗？”韩允之插问道。

“苏维埃下的人都说：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既然都是死，倒不如打着死个痛快！”

朱洋人犹犹豫豫地说：“你回去带一部分钱，救济一下群众；安慰安慰他们。”

“钱？钱能吃！能买动敌人的狼心狗肺吗！”何老甲长

很不高兴地白了朱洋人一眼。而后，他又慢慢地、沉重地低下了头。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小小的屋子，更加显得狭窄、闷人，只听得人们急促的呼吸声。不知是谁捡起身旁的一根稻草，放在嘴里，用牙齿咬得吱吱作响。

仍然是老人打破了沉默。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恳切地说：

"你们要是再打，可不能学红二十五军那样打。五次'围剿'的时候，刘修斋、刘绍彦的民团把抢来的粮食，都集中在刘家颈上的村子里，红二十万军用一部分军队围攻乌子铺，再分一部分人驮米、谷，一宿就把敌人的粮食驮了个精光。今年那两个小子有了'经验'，怕你们再干那一手，早就把红军家属撵走，再把所有的粮食分散隐蔽在红军家属的房子里。你们决定打时，要事先调查联系好，不然会落空的。"

老人说的很有道理。革命就要有斗争，没有斗争就不能叫做革命。敌人虽然强迫群众搬进了移民点，可是他们只能看守住群众的身体，无法看守住人民的心。想隔断我们和群众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是敌人的痴心妄想，他们永远达不到目的的。有党，有红军，有遍布敌后的游击队，一定会解除群众的痛苦。我向老人解释：敌人的移民点一定要被我们打掉！这不是小事情，也不是一举就能成功的，我们一定积极进行准备和部署。我请老人回到移民点以后，多向红军家属和苏维埃下的人民进行安慰和解释：共产党永远不会垮，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一定和群众联合起来摧

毁敌人的移民政策。

“我们一定熬着，等着你们打掉移民点。”老人充满信心地说道。他疲倦地从稻草上站起身来：“天不早啦，我要回移民点去。看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由便衣队经常和你取得联系。好，你慢慢走。”

何甲长从洞里爬出去。同志们挤在窗前，通过那小得可怜的缝隙，目送着老人慢腾腾地走出菜园，走出村子，直到老人的身影在同志们眼前消失。

二四　仰天锅伏击

何老甲长走后，我一直陷入沉思中。这时，朱洋人挪到我身边，轻声说：

“我们和驼二爷规定的接头时间到了。今天要去接头。”

我这才醒悟过来，问道：

“在什么地方？是驼二爷还是和尚出面接头？”

“地点在东丰庵。规定是和尚接头；和尚要是出了事情，就是驼二爷本人。”

“从这里到东丰庵不好走。”我选择着路线。“这样：咱们从山腰上斜插过去，横过公路，先到顾家冲，再去东丰庵。”

接近顾家冲的山沟，我们就开始爬行。一进村子，满目荒凉，到处是破砖碎瓦、断墙残壁和烧得焦黑的房梁，全村人烟绝迹，这就是残暴的敌人一手制造的“无人区”！

我们穿过整个村落，慢慢向东丰庵爬去。老远地就看

到庙门大开。

“不对头!”朱洋人警惕地疑问道。“我们离开这里时，庙里有几十个和尚，庙门是长年关闭的，这已经成了老规矩，今夜庙门为什么开着呢？”

我对他说：“你到前面去侦察一下。”

朱洋人摸索着爬上山去。一阵子，他就回转来说：

“一个和尚也没有，这怎么回事呀？”

几十个和尚怎么一个也不见了？青柏和尚从农民暴动时就是个共产党员，作事很机密，有经验，一直保持着这个老联络点。想到这里，我更加觉得奇怪，不放心地问：“一个也没有？!”

“真的一个也没有。”朱洋人回答得很肯定。“里里外外我都看过啦。”

“洞里也看了吗？”

“我不知道洞在哪里。”

“韩允之，你负责带同志们隐蔽，注意放哨。”我向朱洋人一甩头：“走，我和你一路去看看。”

两个人同时走进庙门，东找西摸，庙里到处乱七八糟，没有个人影子。几十个和尚都被敌人杀啦？还是被捉去了？会不会跑掉了呢？我找到洞口，打亮手电筒，只见洞里黑乎乎空空洞洞，阴森森的凉风扑面而来。我回过身来问朱洋人：

“你们和驼二爷规定在什么地方接头的？”

“和驼二爷本人联络时，从来不指定固定的地点。”朱洋人回答。

我想这条沟变化一定很大，驼二爷能不能来还是个问题。掌握不住情况，我们就再没有地方好去。就对朱洋人说：

“你把同志们叫上来，用手电棒照照，找一找驼二爷。他要是在这里，看到电光就会出来；他要是不在，目标反正暴露了，天亮了就和敌人干，打响了，好叫一队知道，来找我们联系。”

十几个人散在庙前庙后，里里外外、角角落落都找遍了，还是毫无结果，我这才完全失望了。

“算啦，不找了。都到池边去喝点泉水，好转移。”

大家眼巴巴地看着泉水，干着急，没有碗，喝不着。韩允之想了个窍门，取出手巾，在池边蘸湿了拿起来，一个人拧手巾，一个人在底下张大嘴巴接着滴下的泉水。

在寂静的高山上，四外绝无人迹，大家也就不那样约束了，相互打打闹闹，说说笑笑，闹腾了一阵，正准备转移，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拖长了的干咳声。

“有敌人。”不知谁这样说了一句，大家立刻紧张起来。

“不要慌，绝不是敌人。”我稳住同志们说，“要是敌人，早就打枪了，还会用咳嗽给你送信？看看是不是驼二爷。”

我刚一说完，就听到驼二爷的声音：

“就是我。你们回来啦？”

但我前后左右望个遍，却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不免着急地说：

“你倒是在哪里？快出来呀！”

“我在古塔里。”驼二爷还是那么慢慢腾腾的。“你不要

慌，这里边黑得厉害，我得慢慢下来，要不就摔坏了……”

几个同志马上跑向古塔去迎接他。

驼二爷看到同志们，很关切地问：

“你们回来啦，都好吗？”

“你钻在塔上，我们进来你怎么没有看到？嗨，叫我们好找。”朱洋人的牢骚还没有发完，突然又想起来问道：“驼二爷，和尚怎么一个也没有啦？”

“刘朗山说青柏和尚通共，搜山的时候，叫乡警队把青柏和尚杀了；小和尚娃子都跑散啦。”驼二爷的语调很沉重。“自从杀了老和尚剿了庙以后，敌人天天来搜山，夜晚就在路口下卡子。我是天不黑就从半山坡上爬上来的。你们一来我就看到啦，怕是敌人的便衣，没敢出来。我估计着，要是你们回来，一定要来山上找我。”

每到一处地方，如果不了解那里的情况，我们就会象瞎子一样，没有办法布置和安排工作，甚至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我抑制着急迫的心情，向驼二爷询问情况。驼二爷说，这一带大部分移了民，到处把老百姓撵的很乱，加以敌人天天搜山，移民点的户口管制很严，群众不愿意再让我们到他们家里隐蔽。环境虽然紧张，地下党的联络点没有受到破坏，就是被移了个乱七八糟，有的联络点还没有来得及和我们接上头。甘允吉同志被捕后，没有什么变化，他是个硬骨头，我们想办法保，敌人就是不肯放。……

最后，因为天色不早了，我们十几个人目标太大，驼二爷建议分散隐蔽。

分散隐蔽，这不行，同志们几天来都没有吃一顿饱饭，

拖的够苦了。便衣三队在这一带不很熟悉，分散隐蔽不仅要饿一天，说不定还会碰上敌人，那时候顶不住，又跑不动，必然要吃大亏。我想起附近有一个秘密隐蔽地，便问道：

“驼二爷，甘家祠堂附近有个洞，你知道吗？”

“不知道。”驼二爷感到有点意外。

“这个洞是一队的根据地。你派老交通把王文兰叫到祠堂里，她就会知道洞里有没有人。我们到祠堂后边去等。”

因为路上敌人常设卡子，我只好带着同志们绕道从陡山坡上半走半爬地转移。熟悉地理并且富有经验的老交通，早已走在我们前面，在祠堂后边等候我们了。他说：

“王文兰在祠堂里，她说用以前的暗号联系。”

王文兰是地下党的一个支部委员，是我们的联络点，她既在祠堂里，就证明便衣一队在洞里隐蔽。从这里到洞口虽然不远，却十分难走。我嘱咐同志们说：

“小心跌倒。脚步要放轻，尽量不要踏倒茅草。我在前边带路，朱洋人走在最后，凡是踏倒的茅草，都要用手轻轻地扶起来，丝毫不能留下脚迹。”

每个人都象猴子一样，慢慢地爬到笔直的悬岩下面，攀蹬着悬岩和陡坡之间的怪石，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沿着不到五寸宽的石头边，来到了洞口。洞口很小，四周有繁密的茅草掩遮着，每次只能钻进去一个人。胡民山早已等在洞口，见我爬在前面，说道：

“早看到是你来啦，别人不知道这个洞。好，你先进去，我照顾后边的人。”

“估计你们在洞里。驼二爷在后边，注意照顾他。”说着，我已钻进洞里。

两个便衣队，加上驼二爷和我，共有二十多个人，算得上一个小小的会师了。同志们互相亲热地打闹着，问这说那，石洞里洋溢着一片欢乐。独有驼二爷与众不同，一进洞来，就驼着个背到处察看，东瞄瞄西摸摸，对那一堆木炭、一点米和两盒洋火，外加做饭用的半个磁盆，显得格外有兴趣，在那儿磨蹭了半天。他似乎感到一队有这样大的洞，却不告诉上级，未免有点“自私”。他慢慢地站起身子，挤到胡民山跟前说：

“一队长，这个洞真不坏呀！一个队在里面隐蔽，我看有点浪费，要是让给彩病号们，还能多睡几个人。”

听到驼二爷的批评，胡民山认真地解释说：

“驼二爷，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该太自私，对吗？……”接着，胡民山把这个洞的来历介绍了一番：原来这个洞先前仅是狼扒的一个窠，被甘允吉发现了，看到地势好，就在情况不十分紧张时，夜晚一个人来挖。零敲碎打地挖了一年多，还只能隐蔽下三、四个人。他觉着一个人力量太小，就把我们带到这里，叫我们也来挖。从这时候起，打仗的时候就停工，环境稍好一点，我就带便衣队熬夜挖洞，用钻子一点点地把石头“啃”下来，然后挑到很远的地方去。直到反“倒林”后，在那一段环境缓和的空隙里，才挖出了这样大的一个洞。洞的上边是高大的绝壁，下边是悬岩和陡坡，地势极端险要，上下非常困难。敌人要是从山上来，根本打不着我们；敌人要是从下边来，我们只要有一条枪，就能堵塞住

敌人的来路。最怕的就是敌人围困和封锁，碰到这样的情况，进出不得，粮食弹药一断绝，即使不被歼灭，也有被困死的危险。这个洞挖成后，我们在四周建立了三个联络点，规定了联系的暗号。王文兰和青柏和尚只是用暗号和我们联系，根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这个洞的内幕。甘允吉是最熟悉的，他规定了暗号，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利用黑夜偷偷运来的。甘允吉被敌人扣押以后，我们一直不敢来，前两天知道甘允吉没有变节，我们这才敢来隐蔽……最后，胡民山郑重其事地说道：

“如果这里能隐蔽彩病号，我代表全队没有任何意见。”

驼二爷听得入了神，早已忘了他刚才的意见，这时鼓励说道：

“你们这种做法很好。隐蔽彩病号不够合适，送水、送饭不方便，有了情况也不好转移……”

“吃饭了，吃饭了！”

韩允之一喊，大家的目标立刻转了过去。刚煮熟的白米饭，热腾腾的，又香又甜，大家吃得非常起劲。

饭后，驼二爷谈到这一带的情况说：敌人一开始换防，就是程汝怀的两个保安团从七里坪一带直接插进老君山、高山岗山区，走一步搜一步，搜出来人就带走，见东西就抢，见牛羊就杀来吃，剩下的还要牵走，谷子一发黄，他们就抢割。在山区炮楼附近露营了一夜以后，两个团就分开去宣化店和黄陂站接防。一〇三师的两个团出宣化店、黄陂站，同样分为两路，沿着保安团的来路，和保安团的办法一样，搜剿着走过去，到达七里坪到宋埠、商城一带的封锁线上，

换了一〇二师的防。一〇二师也是如法炮制，拉锯似地进驻宣化店和黄陂站。敌人这样拉锯的目的，第一是为了抢粮，抢东西，发洋财；第二是显示他们的力量；第三是在换防时，封锁线上不留空隙，使我们和皖西仍然无法取得联系。敌人这种拉锯式的搜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最残酷的反革命手段。山区大部分老百姓都被撵进了移民点，就是在山上隐蔽下来的老百姓，经敌人这么一拉锯，也就没有剩下什么。我们隐蔽在山里的彩病号，也遭到一些损失。

拉民团的工作，是由吴光陆副书记统一布置的，各地在一个晚上同时动作，所以敌人没有发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罗山除了刘达诚的民团和这一条沟的民团外，其他所有和我们有关系的民团大部分拖过来了，这些武装一部分扩充独立团，一部分与警卫队合编。警卫队现有近百人，由黄陂老带领在山区里活动。教导二队已经组织起来，也有百余人，由于忠厚带在铁路西活动。

还有一个好消息，独立团打了胜仗。原来，罗二区的移民归陈道荣，而二区大部分的稻谷已收割完了，只剩大河两岸较晚的稻谷还没有收割，陈道荣就打主意想在最后这点稻谷上捞一把本钱。于是，他动员了很多红黄学道徒，配合着他的民团，到杨万家店南边的南河湾抢稻谷。这时，我们的独立团得到情报，早已埋伏在三义店和于家大、小寨两边的山岭上，眼看着敌人进了鳝鱼篓子，等他们割了一会谷，并且装进了布袋和箩筐。直到下午，独立团才动手向敌人攻击，把敌人撵到一座山包上。敌人来的目的是抢粮，没有想到打仗，来的人虽多，扛枪杆的人却不多，所以伤亡很大。

战斗相持到天黑，敌人的残部才夹着尾巴逃回雷辛店。

最后，驼二爷反映了同志们的一致要求：组织力量打击敌人。

打，群众这样要求，同志们也一致要求。只有打击了敌人，才能掌握主动，粉碎敌人正规军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对山区的拉锯政策。国民党的官，总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总以为自己在上司的面前最得信任，最吃得开，反革命也就最疯狂。叫他吃点苦头，扫掉他的威风，打他个头破血流，这些“英雄”就会摇身变为狗熊，为了保持他的官位，也会偷偷摸摸地找我们接头，向我们摇尾妥协。我们应当利用敌人的弱点，拉不动就打，打了再拉。不过，怎样打，先打谁，这就要郑重考虑，切切实实研究一番。

朵朵浮云，飘飘地从月亮旁掠过。这是一个凉爽的秋夜。在周家岗后边的山沟里，楞头楞脑的黄陂老一见我就说：

“敌人这样欺压老百姓，实在难忍，老百姓被敌人糟蹋得太惨啦。咱们要组织力量打，再不打，群众就被敌人杀光啦！”

“你看先打谁？”

“呵，确定打了？”

黄陂老一阵高兴。这是一个三天不打仗手心就发痒的人。这时，他那猴子似的一双眼睛紧盯着我。我没有吭声。他这才平静下来，坐在一块石头上想了会儿，说道：

“谭继仁和陈又文两个虽说都是区长，可有点不同。陈又文是团长兼区长，有兵力，谭继仁就差劲了，是个摇笔杆

的，文诌诌的不会打仗，也没有兵，是个光杆区长，他就是仗着罗伸发那点子力量。区里的机动兵都握在罗伸发和刘修斋、刘绍彦的手里。刘修斋还有点看不起那个光杆区长。依我看，把刘修斋和罗伸发打个落花流水，这一带的环境就可能缓和一些。”

“人人都说你是猛张飞，今天倒变成了诸葛亮。”我高兴地对黄陂老说，“我同意打。现在讨论一下怎样打。张家胜同志，提提你的意见吧。”我望着始终没有说话的张家胜。

“敌人利用换防，在山区里来回拉了三次锯，再加上民团不断搜山，这种手段比四次‘围剿’和五次‘围剿’还要残酷、毒辣。关于打的问题，黄陂老分析的很正确。罗伸发每次到罗一区抢粮，经常在西仰天锅庙前把抢来的粮食集中起来分‘份子’；刘修斋多半是在天丝岗庙前分‘份子’。他们在瓜分粮食时，经常是你争我吵，一团混乱。我们最好在这个时候分头设下埋伏，打他个措手不及。”

张家胜话音刚落，黄陂老立刻抢任务说：

“刘修斋和我是老对头，天丝岗我也很熟悉。我带上警卫队，再配合几个老便衣队员，保险打个漂亮仗。”

“可是，我们设下了埋伏圈，敌人不进来怎么办？这就必须搞到可靠准确的情报，在敌人出发的前夕，把部队运动到埋伏点。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情报？”

张家胜回答我说：敌人自从实行移民后，便衣队为了插进移民点，多半采取秘密活动，这就给了程汝怀一个吹牛皮的机会。据传说，他向武汉行营吹牛，说什么湖北地区的共产党已被他们打得“狼狈大败”，“少数残匪”也是“闻风而

逃”等等。为了追击他所说的“残匪”，只要听说哪里有共产党，就必定搜山。更何况他们搜共产党是小事，借搜山的名义抢粮发财是大事。近来，就是民团内部也有人制造假情报。只要我们确定打，可以叫刘达诚去报信，估计他们一定出发。

打，这就是最后的决定。

我当即赶到刘清翼家里，找来刘达诚，研究怎样调动敌人。刘达诚说：

“明天晚上我派人到区公所去报告，就说有一股便衣队进山组织群众割稻谷，后天他们就会出发。只看你们的时间是否来得及。”

“时间没问题。不过，你们要注意，看他们出发时有没有一〇二师配合，一〇二师如果出动，你想办法立刻告诉联络点。”

我在刘清翼家里休息了一夜，拂晓时进了山洞。

一百多人已经集合在崖山炮楼的山脚下。我召集起干部们，分配任务：

“便衣三队配合黄陂老行动，到天丝岗伏击刘修斋的民团；我带便衣一、二队和县委警卫班的六条长枪，到西仰天锅伏击罗伸发的民团；张家胜带教导一队隐蔽在黑狗寨接应。伏击的目的是打民团，如有一〇二师的配合就不打。打响后，敌人如果按照我们的估计进入山沟，两头的埋伏都压向山沟，教导队也堵住山沟，我们给他一个合击。天黑后，我们的第一个集合点在张家墩，第二个是到周家岗的联络点去联系。”我扭头又嘱咐黄陂老：“注意、刘修斋都是子

孙兵，能打，反共有经验，可不要吃他的亏。如果他们向黄陂站、宣化店跑，你们只准追到界岭上的凉亭，把守坳口，相持战斗到天黑再转移。”

半夜里，我们全部运动到仰天锅的空庙里，拂晓时开始分散埋伏。我对胡民山说：

“你带六条长枪，在孙家坟园埋伏，下午三点钟时，看到敌人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你们就运动到路边草丛中隐蔽，任务是堵击敌人去宣化店的道路。申功臣带便衣二队在半山坡上埋伏。”

然后，我带着便衣一队到空庙里的三层楼上隐蔽。

红艳艳的太阳高悬空中，我从窗边向外望去，仍然看不到敌人的影子，四周格外平静。刘达诚没有去报告？还是敌人不出发呢？我正在估计着敌人的行动，只见申功臣向庙里爬来。

申功臣来到楼上说：“我们爬到前边的高山包上，看到出发的敌人全是民团，从杨家大坡进到郑家湾石山河一带搜山抢粮；前边的尖兵离这里顶多不到五里路。”

“没有一〇二师就决定打。你们还是在坳口两侧埋伏，一打响就占领坳口。”

申功臣应声返去。

我们运动到庙院里，八个人分成两组，从两侧耳门附近的阴沟里钻出去，趴在茅草丛中。刚刚隐蔽好，敌人的尖兵班就越过庙门，向坳口走去。后边上来了很多老百姓，挑着箩筐，扛着布袋，来到了庙门前。民团们指手划脚地叫他们按保甲把粮食排成队。

罗伸发带着三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已经陷进了埋伏圈。我们统共才二十几个人，要歼灭敌人三个中队是不可能的，能打垮一个中队就是胜利。我们钻出草丛，向庙门前跑去，开始射击敌人。胡民山直追尖兵班。申功臣带着便衣队，十把盒子枪拦腰卡断了敌人。毫无战斗经验的“学生官”——罗伸发，听到枪声，动弹不得。几个团兵赶过来，象拖猪一样，架起他就跑。后尾的两个中队也掉转屁股往回跑。同志们机动地压向山沟，很快歼灭了敌人的一个中队，然后调过枪口，集中火力向正北方向逃跑的两个中队追击。这时，埋伏在黑狗寨的教导队，象猛虎扑山一样压了下来，迎头痛击敌人。民团的两个中队被打得呼爹唤娘，抱头鼠窜，坡上、沟里到处都躺着敌人的尸体。罗伸发和他的几个心腹走狗早已逃之夭夭，丢下那些无头的兵丁，成排分片地跪在地上，头顶长枪，高呼饶命。韩允之发现一个白面书生双手捧着短枪，跪在地上直哆嗦，紧跨两步赶上去，一把将他提了起来，大声吆喝道：

“你叫刘树生吗？”

“我……我愿意……缴枪，……饶命……”这小子早已吓掉了魂，连话都说不成句。

韩允之不容分说，一把把他拖到我跟前：

“看，是个小官哪，杀不杀？”

我低头一看，只见刘树生头顶地屁股朝天，跪在地上，口口声声哀告饶命。我心里一阵恶心，忙说：

“押下去!”

韩允之应声提起了刘树生就走。

我随即补充了一句："不准杀。"

打扫完战场，天色已是黄昏。我们释放了一般的俘虏，押着俘虏来的刘树生开始转移。

在张家墩，同志们胜利地会师了。大家都欢欣、喜悦，惟独"猛张飞"黄陂老气鼓鼓地走来对我说：

"刘修斋这小子，真是老奸巨猾，跟我们磨出油来啦！"

原来，黄陂老带着部队埋伏在天丝岗。刘修斋的民团来到大庙前，开始忙着分粮食。我们一开火，那些子孙兵们就有经验地自动集中了火力，一边还击，一边向黄陂站方向冲去。到达凉亭的界岭上，敌人分兵两路，一部分堵击，一部分转向乌子铺撤退。说到这里，黄陂老嘴里的唾沫星子直飞：

"我们地形熟，他们也熟，就在界岭上跟我们转磨，直打到天黑，才把这些小子打跑了。唉！"他用大巴掌抹了抹嘴，显得无限惋惜，"打得倒痛快，只得了十几条破枪，太少了！"

各队干部集合后，我对同志们说：

"今天的仗打得很漂亮，缴获了不少胜利品。这几十条枪，好的由教导队驮起来，不好的砸碎它，子弹都交给教导队。

"同志们，我们打了胜仗，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估计明天一〇二师可能来搜索这一带山区，我们今夜必须很快转移，进行隐蔽。黄陂老带教导队去雷班寨，尽量和王定堂取得联系，然后在那一带活动，刘绍彦不搜山则罢，如若搜山，就和王定堂共同研究打他一个伏击，再转移到罗一区。刘树生由你们负责带走，不要杀，一星期后由我处理。便衣

队分散，各回原地。”

二五　一定要坚持下去

眼看着同志们分批离开了张家墩。我问驼二爷说：

“咱们到哪里去隐蔽呢？”

“民团吃了亏，他们一定要来搜山。隐蔽？……”驼二爷好象很为难，想了一会说：“隐蔽的地方是有，就是没有群众送饭。”

“没有人送饭，敌人要是搜上几天山，我们就得活活饿死。那不行。还是先到刘家冲沟再说。”

四个人沿着半山坡向刘家冲沟南边的小河沟走去。在经常接头的石崖下面，我停住脚步，用手掌拍出了暗号。五十多岁的刘云焕回答了暗号，走到我面前说：

“你们打的倒是挺热闹。一〇二师一搜山，这条沟的几个人就要送命，看你们再到哪里去隐蔽吧！”

“刘达诚回来了吗？”我问。

“他还敢回来？你们一走，小麻子就急得个要死。”刘云焕的儿子小麻子，也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刘达诚的民团里当一名分队长。

“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刘云焕。

“我，你们不要操心，我是要去宣化店的。你们这样一打，他们定要来搜查，我的屋后边再不能隐蔽。看你们到哪里去隐蔽，我好送饭。”

认我们隐蔽的地方不固定。饭，只要求你每天送一次，夜晚就送到这里来。情况要是十分紧张，一、两天不送饭

也行。”

“能送，我一定想办法送。”老人肯定地说，“万不得已，我把饭盛在磁罐子里送来，吃完饭，把罐子留下，实在饿急了，还可以煮点野菜吃。不过，你们千万不要把罐子丢了，被敌人拾去，认出那是我家的东西，那我全家就算完啦！”

刘云焕临回去时，我告诉他：

“你从宣化店回来，要有情况还到这里来接头。”

我在前面带路，沿着河沟走了一阵，才攀登悬崖陡坡，爬上记宝寺的最高峰。把三个同志送到石洞里，我返回身来，把路上被踩倒的茅草一棵棵仔细地扶起来。等我回到洞里的时候，两个便衣队员已经睡着了，驼二爷坐在一旁默默地想着什么。

我靠近他说：“这个山虽不算高，可是在这一群山中比较孤立，突出在河边，所以能看得很远。白天在山峰顶上放哨，不但可以看到宣化店、黄陂站出来的敌人，就是从七里坪出来的敌人，一翻到老君山的这一边，也能看到他们的行动。”

驼二爷这才慢慢从沉思中醒来，说：“我估计明天敌人不会搜山，今天民团受了损失，敌人要是组织力量来报复，或者是进行全面搜山，这样短的时间他来不及准备好。”

半个夜晚的休息，使我感到身上轻松了许多。天麻麻亮，我悄悄地爬出洞口，在一块石崖下放哨。

驼二爷的分析是正确的。果然，一天没有看到敌人的形影。

天黑了，我进到洞里，对驼二爷说：

“敌人没有来搜山，估计刘云焕可能回来。你们在这里不要动，我下去接头，或许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刚走到河沟，离约定的地点还老远，迎面就传来了暗号声。我惊奇地停住脚步，正要判明情况，突然“通”地一声，一块小石头投进水中，这是刘云焕发出的重要暗号，他一定有什么急事，我赶忙放快脚步迎上去。

“最好啦，你看他们一天都没有搜山。”

听到刘云焕用这样大的声音说话，我立刻警告他：

“小声点。”

我们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坐下来，我忙问刘云焕：

“昨天你说要送命，今天又说好啦，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我不是说要去宣化店吗？今天大早我就到了刘海前家。他一看到我，就把我拉到屋里问：昨天的仗是老四带着打的吗？我说不知道。他马上又问：他们捉到俘虏，是从你们湾子里带走的吗？我还是说不知道。我只用了两个不知道，他可就没法子了，向我说了实话。他说，他侄儿刘树生被你们捉去啦，不知道带在哪里，叫我想办法找你们接头。我还是说：没办法。他又对我说了许多好话，还拿出两条香烟和两瓶子酒，叫我送给便衣队，我都不敢拿。不过，我已经答应，想法子给他找便衣队。”

“你在那里一天，都看见谁到他家去？”

“多啦，”他稀里糊涂说了一大堆：“刘达诚早早地就到了他家，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好长时间，不知道说些啥。我们还在一块吃了顿饭——我可没敢跟刘达诚说话。吃罢饭，刘朗山的父亲刘鲁封带着郑远玉来找刘海前，我听见他们

在前厅说话时还哭哭啼啼的，可临走的时候又顶高兴。这一天，区公所和民团就没断过来人，天快黑了，罗发之还带了个老头一起来了，老头很象甘书田。甘书田虽是个穷‘传善’的，土地革命时他却跑到信阳去啦，眼下正是紧张的节骨眼，他回来干啥？他们在厅房说话时，刘达诚瞅空子把我送出东门，还对我说：你回去对小麻子说，一〇二师不出发我不回去，等他们出发我才回去，叫他们按原来的老办法好好守住炮楼。——我回来告诉小麻子，他一定要我再学给你听。这么乱七八糟的算个啥？”

我心里又想笑，又着急。刘云焕哪里知道，刘达诚的话是暗语：一〇二师要配合民团进行搜山，但他却不能掌握敌人搜山的步骤。

刘云焕见我不加解释，也就没有再问，把一箩罐饭递在我手上说：

“我明天还去宣化店吗？”

“你明天不要去了，免得引起他们怀疑。后天逢集你再去。”

“那好。同志们饿了一天啦，快把饭拿回去吃吧！”

躺在漆黑的石洞里，我才静下心来，开始捉摸刘云焕所谈的情况。甘书田，很可能是姓甘的把他活动回来的，他可能愿意保姓甘的人，也可能当姓甘的保长，他能否保出甘允吉来呢？根据刘达诚的暗语，敌人肯定要搜山，不知是一〇二师的两个团配合民团搜山呢？还是程汝怀统一指挥，用他所有的兵力向整个鄂东北来个“进剿”？要是后者，问题就严重了……

一清早，我照例爬出洞外，在石崖下放哨。约莫九、十点钟的时候，从黄陂站和它附近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条、一队队的白旗，向着甫安寨山上游去。在甫安寨集结后，又分散开来，一股到七里岗，一股上三角山，民团爬上了天丝岗。同时，宣化店附近的白旗向西仰天锅游去，在封交树坳集结后，同样分做几路，其中的一路到刘家冲沟北边的黑狗寨高峰，响起了机枪；随着各山峰上的敌人正规军都响起了机枪，民团就打步枪，似乎用枪声在表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时，田野军号鼓噪，白旗招摇，敌兵象疯狗样漫山遍沟来往窜跑。

下午四点多钟，从七里岗下来了二百多敌人，搜到黑龙潭，正准备渡河“搜剿”我们隐蔽的记宝寺，空中忽然响起号声，有的敌兵已经下到水里了，忙又爬回岸上，蜂拥返回七里岗。

敌人并没有返回防地。从宣化店出来的一个团，集中在刘家冲沟一条山沟里；从黄陂站出来的一个团，集中在甫安寨一带；民团则守在山岭上。他们开始搭布棚，架铁锅，进行各种露营的准备工作。

天上的繁星不停地眨着鬼眼。地上的篝火照亮着山谷。山坡上偶然闪现出手电的光柱。四周敌人的哨兵盲目地大声叱叫。

我和驼二爷紧紧地伏在石崖下。我压低声音说：

“看形势，敌人绝不是单搜这一块山，很可能是程汝怀统一指挥，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向山区进行合击。果真如此，明天七里坪、经扶的敌人就会和这一带的敌人会合。估计

到后天才可能收兵。”

“敌人这样干，比拉锯还厉害！不知道便衣队跳出敌人的‘搜剿’圈没有？”驼二爷耽心地说。

“昨天有一天的空隙，他们可能得到情报转移了。我们注意听着，如果他们已经跳到圈外，今天夜里必然会打枪策应，要是一夜平静，没有枪声，那就很危险……”

夜深了，敌人早都钻进帐篷睡觉去了，敌人哨兵的叱叫声也消失了，周围显得更静，只有快灭的篝火在散发着微弱的残光。

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你听，”驼二爷的心情很紧张，很激动地说，“哪里在响枪？”

“象是宣化店……”

说话间，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手榴弹的爆炸声。

很有可能是便衣队跳出了敌人的“搜剿”圈！我高兴地对驼二爷说：

“手榴弹的声音在黄陂站一带。估计是便衣队为了策应山区，在打击敌人的空隙。”

“是呵，”驼二爷的心情轻松了一些，“眼下不要说是一个便衣队，就是一个便衣队员，我们都把他当将用。只要便衣队不受损失，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他想了想，又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敌人没有搜这座山，明天可能要搜。我们该转移一下才好。”

我对他解释说，根据敌人搜山和露营的情况来判断，可能是刘达诚的民团带路搜这一带的山。刘达诚既然叫刘云

焕传来了暗语，可见他知道我们隐蔽在这座山上，他会想办法把一〇二师支吾过去。再说，我们没有掌握敌人这次搜山的步骤，离开这里，再到其他地方去，在敌人搜山的过程中是很难和群众取得联系的，处境就更加危险……

驼二爷听了听，很关心地对我说：

“枪声在转移，天也快亮啦，你到洞里去休息一下，我来放哨。”

“驼二爷，你年纪大啦，还是你去休息吧。”

凉飕飕的秋风呼呼地刮着，特别是拂晓时，更加使人感到冷得有些刺骨。我把身子蜷缩一团，企望野草和石头能遮住山谷里冲来的寒风。为了不间断地监视敌人，我坚持着守护在这里。驼二爷已经回石洞里去了。

第二天，七里坪和经扶的敌人果然也出动了。敌人仍然分别占领各山的主峰，摇旗呐喊，吹号放枪，还加了几门炮，足足又折腾了一天，而后又回原地露营。

天黑定后，驼二爷照老样子爬到我身边，昏花的老眼望着漫山遍野的篝火和手电的光柱，忧虑重重地说：

“敌人用这样大的兵力搜山，山里的群众和粮食可再也剩不多了。”

“以后的问题再想办法吧。”我在考虑应付眼前的处境，“今天各路敌人碰了头，明天敌人可能收兵，对这个突出的记宝寺，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和两个新同志在洞里，一定要注意。”

第三天早晨，无数白旗随着大白旗集中后，又各从原路返回去了。

中午，看到宣化店、黄陂站的敌兵押着手拿箩筐、锄头、铁锹的老百姓，到山上四处搜寻、挖掘，想找出我们埋藏的粮食和物资。见到棚子和没有烧光的房子，就顺手再放把火烧掉。他们把搜出来的人，凶恶地捆成串，用枪逼着往回拖……

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水米没打牙，两只眼皮困得直打架，肚子里干渴难忍，浑身没有一点儿精神。下午四点多钟，忽然发现一股民团直奔记宝寺而来。一瞬间，瞌睡和饥饿早抛到九霄云外，我的精神顿时抖擞起来，眼睁睁地盯着民团步步逼近这座山。一阵炒豆般的枪声过后，他们来到了山脚下。我揉了揉眼睛，极力仔细地看去，心里暗暗希望他们是刘达诚的民团。果然不错，我认出了两面派的保长刘清阳和刘达诚民团的三个分队长，当中就有小麻子。刘达诚自己虽然没有来，但只要是他的民团，他就会给我们打掩护。这时，我才松了口气。民团爬上山来，胡乱搜了一阵，便草草收兵，返回宣化店去了。

敌人搜山后的深夜，显得死气沉沉。我想走下记宝寺，然而力不从心，由于饥饿和疲劳，刚刚爬出洞口，向前移动几步，就被一块石头绊住，身子晃动着摔倒了。我索性躺在石头上，休息了一会，然后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向山下慢慢走去。

我踉踉跄跄地来到联络地点，站在石崖下，没有发现一个人影。用手拍出暗号，没有回音；再拍一次，四周仍然一片寂静。怎么回事？刘家冲沟的人都被敌人撵走啦？还是没有来到呢？……站在石崖下太显眼了，我忙抽身离开石

崖，隐蔽在一堆野草丛中。

不大会功夫，远处传来嚓嚓嗦嗦的脚步声，随着出现了一个人影。我又拍出暗号。

“别拍啦，都听到啦。我爹去宣化店了，临走没有告诉我暗号，我回答不来。我是小麻子。喂，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确是小麻子。我这才钻出草丛：

“你们民团不是去宣化店了吗？”

“刘达诚把我们这个分队留在南湾。他可能有事情要找你。”

“搜山结束啦？”

“搜山是结束了，这一带的人也给撵的差不多啦。现在山上不但没有国民党的兵，连个鬼也没有。这个不说它，我把民团的饭带来了一点，你快吃吧。”

“不行，洞里还有三个人，饿的个半死。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叫他们。”

回到记宝寺下面，我从地上捡起三块石子，朝着洞口掷去。驼二爷听到暗号，领着两个新便衣队员下到山脚。我们一路找到小麻子，匆匆忙忙吃了点冷饭，由小麻子带路到中畈和刘达诚见了面。

刘达诚见了我和驼二爷，真跟见到亲人一样，一手抓住一个，说：

“哎呀，我一直惦着你们，只怕出了事。嗨，现在可算见了面啦！”

大家坐定以后，我问刘达诚现在的情况怎样？

刘达诚说：这次搜山是程汝怀亲自指挥的。老君山、天台山和乌陡尖，由程汝怀的三个保安团加民团搜索；一〇二师的两个团加上民团搜这一带的山；河南的一个保安团配合民团搜大、小鸡笼山；程汝怀还有一个团搜葡萄山、龙王山和杨子山；经扶县所有的反动武装搜莲台山；陈少堂和刘绍彦搜丰王家店一带的山。这就是程汝怀的全盘计划。搜山时，还指定了各地的带路人。我和这一带的保长给宣化店的一个团带路；刘修斋给黄陂站的一个团带路。这次搜山把群众撵下去了很多，没有听到便衣队受损失。不过，就是山上的粮食被他们挖出了很多。

刘达诚还说：你们打罗伸发，打的真好。不打，程汝怀也早已决定要搜山。打了罗伸发，减少了他一个助手。这样一打，罗伸发为了他的狗命和官位，确实害怕。在搜山的前一天，罗发之带着甘书田找刘海前，商量保刘树生，罗发之说：罗伸发已向他表示态度，只要能保出刘树生，他愿意“中立”，并推出罗发之负责，找便衣队接头。后来，他们商量说，甘允吉设法找熊斌的叔父熊吉安出面保；郑远玉由刘鲁封和刘海前保他当保长；姓甘的保长，由甘玉田当，因为他年纪大，不能多走路，还是叫甘树利当副保长。最后，这些计划决定由他们几个人共同去和谭继仁商谈。甘书田回来，是有甘春甫做靠山的。甘春甫和谭继仁的父亲是老同学，又都是清朝的秀才，交谊深厚。他们通过这个线索插手，上述计划能成功。不过，他们如能做到以上几点，最好放出刘树生，利用刘树生拉住罗伸发。

歇息了一下，刘达诚又认真地说道：

“现在，他们对我非常怀疑，只怕以后难以掩遮下去。这几天他们所以没有下手，是因为你们打了罗伸发。不过，他们已经决定调我进驻沙河铺。我向他们提议，想在刘家冲沟南湾留下一个分队，看守移民点。实际上是为你们打掩护，必要时买点粮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目的。这一带，有人说是派陈少堂来守，也有的说是派刘绍彦来守；不管谁来，都会给你们的工作增加很多困难。而我们驻进沙河铺以后，工作也更加困难。我代表我们支部提出一个要求，为了保存实力，最好把民团拖出来。”

拖出来，都拖出来了，以后怎样再能搞到敌人内部的情报呢，当然，他们驻进了刘朗山的老窠，工作必然很难，处境也更加危险。我一面考虑，一面说道：

“达诚同志，我们认为你一向有活动能力，对工作热情，能完成任务，那怕是在最紧张的环境里。这是值得表扬、值得同志们向你学习的。我们做革命工作的人，常常会遇到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原来策划拖民团的时候，为你们这个民团拖与不拖，我们有过争论。最后的结论还是不拖。理由是，如果全部拖过来，虽然能够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但我们却无法得到同敌人斗争、消灭敌人所必须的东西——敌人内部的情报。就拿这次敌人搜山来说，不是你事先透露了消息，不是你给敌人带路，而是一个最反动的民团带路的话，他们会见山见洞就搜，不但便衣队要受损失，很可能连我和驼二爷都要当俘虏。你们的民团，是仅剩下唯一有我们党支部的民团，拖出来，以后再想钻进敌人的碉堡那就非常困难了……达诚同志，根据这些情况，你看是

拖出来好呢？还是不拖的好？”

刘达诚慎重地考虑了一番，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回答：

“何副书记，我以支部书记的身份，代表支部全体党员同志向党保证：不向敌人低头，不妥协，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达诚同志，要坚持下去。不过，要警惕敌人对你的怀疑。保甘允吉和甘、郑两姓的事情，你可以少出面或者干脆不出面。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进沙河铺之前，尽量想办法留下两个分队看守李子园和刘家冲沟南湾两个移民点。实在达不到目的，以后再想办法。你们到沙河铺以后，要时常和我们保持联系，敌人真要下毒手，不能等着让敌人屠杀，可以拖过来。”

刘达诚走后，我对驼二爷说：

刘达诚谈的保人问题，已作出了一个头绪，你再设法和刘海前联系上，只要刘海前能做到刘达诚刚才所说的几点，你就派人找黄陂老，放掉刘树生。不能回到这条沟里放，要王定堂把刘树生送到刘子清家，再叫刘子清负责送回宣化店。再利用刘海前、罗发之的关系，设法拉罗伸发。”

富有经验的驼二爷临走时又向我提出一个意见：“经过敌人这样搜山，估计有许多联络点被敌人冲散了，即使没有遭到破坏，也不容易接上头。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和便衣队、重要的联络点接上关系。”

“这些我也想到了，因为你年纪大，行动不方便，就负责宣化店一摊有关保人、放人和分化敌人的工作，我负责到各

地去联络。”

二六　坚强的革命意志

这一天，我们行动到黑山冲一个无人的空湾子里，准备在这里隐蔽休息一夜。没有想到，张家胜也来到这座空荡荡的村子上，很快就用暗号和我们取得了联系。

在一所被敌人烧毁的屋圈子里，张家胜对我谈了许多敌人搜山时的情况。他告诉我：在罗山四区隐蔽的人都跟着胡山来老主席在一起，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其他单独隐蔽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彩病号在敌人搜山中有无损失，现在还不很清楚。便衣二队所属地区移民最严重，程家凹、顾家寨的群众都被移到窦家寨。群众进了移民点后，就被民团杀了几个人，还卖了不少青年妇女。基本群众和党员团员都被敌人监视起来，一个也接不上头，群众也怕和便衣队接头，所以了解不到移民点内的实际情况。敌人搜山的时候，便衣队跳出了敌人的圈子，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不过，现在既无粮食，又无群众，移民点里连插进去的小便衣队都联系不上，加以一〇二师别动队到处追捕、设卡子，便衣队的活动十分困难。

张家胜继续说：“我想移民点内一定很紧张，敌人对群众的摧残也更加残酷，我的意见是，我们都带上便衣队，插到移民点附近，想尽一切办法和插进去的小便衣队、党团员或是基本群众取得联系，先了解一下移民点里的真实情况，然后再进行具体研究。我准备带二队插到窦家寨附近，你看怎样？”

我同意了张家胜的意见，并告诉他："我带三队插到乌子铺附近，一方面了解移民点里的情况，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关系和胡山来同志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山区的情况。"

第二天，我带着便衣三队向乌子铺出发。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却没有找到和移民点内联络的一点线索，真令人心焦。

一天夜里，我们来到了罗家凹。这座曾经住着三十二户人家的村子，如今仅剩下一些断垣残壁，土堆瓦砾，到处长满了野草和荆棘，凄凉万分。眼前的一片荒凉景象使我愤恨，也给我增添了力量。敌人可以把成千上万的村庄都变成无人区，却永远消灭不了共产党。眼下，我们要利用一切办法，跟移民点内的党支部，跟广大的群众接上头。

"朱洋人，天明后我们不再转移，到村前胡清阳的田边野草丛中隐蔽。上午由你负责放哨，只要看到党员、团员、红军家属或者一个基本群众，我就化装去和他们接头。"

朱洋人听到我这种命令的口气，用惊讶而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迟疑地说：

"何指导员，罗家凹是革命的根据地，敌人对他们很注意，现在又都移了民，平时敌人不会让他们出来的。中午出来种田的时间很短，还有民团监督。你在白天和群众接头，这是非常危险的；再说怕群众也受不了。要求你再作考虑。"

"你看，这个村子在革命前有几十个出力的人，他们参加了农民暴动，以后又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红军。所以，敌人才对这个村子特别注意，烧、杀、摧残，这个村子都快要

平啦！现在剩下没有几个人，被敌人赶进了移民点，是死是活，全不知道。……为了和移民点取得联系，我们在山上蹲了不是一天两天啦！再不能拖延时间。我们要冒险利用中午群众种田的机会，即使找不到一个党团员，也要找到一个红军家属或者基本群众，给我们搭个桥。我说的胡清阳，就是一个红军家属。你考虑怎样？”

黯淡的月光下，朱洋人的目光扫视着全村，当目光接触到胡清阳那被烧得焦黑的屋圈时，他慢慢地垂下了头，似乎在回忆着：胡山修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家，经过敌人几次的烧杀，只剩下一个老父亲和一个叔父。不管敌人怎样打、烧、杀，这两个老骨头硬是不向敌人低头，一直是我们的老联络点。……

“好吧，我同意你的办法。走，我在前面带路。”

来到胡清阳田边的坡沿下，我们都隐蔽在深草丛中，只有朱洋人在一块较突出的石头边放哨。

中午时分，朱洋人说：

“胡清阳来啦。”

“他后面有人吗？”我问。

“人们都散在田里生产。他后面没有人。”

“你先发出暗号，看他回答不回答。”

当胡清阳走近时，朱洋人轻声地咳了一声。

胡清阳连咳两声，回答了暗号，紧接着低声说：

“这里不行，不能多讲话。到我菜园边上去。我正有急事要找你们哪。”

同志们留在原地，我和朱洋人沿着田埂爬到村边，隐蔽

着进到菜园里。坐下后，胡清阳语气沉痛地说：

“我家老大不愿意进移民点，被刘修斋的民团拖进了乌子铺，说他通共，当天就把他拉到河边枪毙啦！到现在尸首还撂在河边上……”

他不由得哭了起来。这位革命老人生前作了很多工作，不想竟死的这样惨，我和朱洋人同时为死难烈士流下了热泪。

沉默了一会，我抑制着悲痛，问他：

“在乌子铺能买到棺木吗？”

“民团总催着叫埋。唉，老大死得这样惨，能连个棺木都不给他吗？我想着找你们设法给他买个棺木再埋。”

“你拿五十块银洋去，剩下的你用。”

“银洋不能用。”他摇了摇头，“民团说，只有共产党才有银洋，谁要用谁就通共。你们给我一点票子吧？”

银洋不能用，这就麻烦了。因为钞票好带，多半给公开的部队带走了，我们用的都是银洋。我和朱洋人搜遍身上，才凑了二十几块钱的票子，连同十几块银洋给了他：

“你拿去吧，以后会有用的。”

老人把银洋仍然还给我：“有这样多的钱，够啦。我的钱多了，被他们知道了也会犯钱法的。”

“乌子铺还杀了什么人？里边的情况怎样？”

“里边的事情就不用提了。杀了哪些人我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向老百姓要钱要的厉害，还卖了一些女人。李家岗你干妈的三儿媳妇，一进去就被民团卖啦；这两天又要卖他的四儿媳妇。你干妈也想着今天出来找你们……我要

回去啦。”胡清阳从园子里扯了把野菜，临走又想起来说：“老大死了，王金瑞来看了一下，他叫我告诉你们用老暗号。”

王金瑞是乌子铺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孤单的老人在我们眼帘消失后，我对朱洋人说：

“你把同志们都运动到半山坡上，放好哨。我到李家岗去一下，可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我沿着一条放牛的小道，转弯抹角地来到了李家岗的后山上，走到我过去常隐蔽的石洞里，老干妈正坐在那等着呢，她见了我，话还没有说出来，就痛心地哭了起来。

许久，老干妈用衣襟揩揩泪水，抬起头来说：

“你三嫂子到底还是被他们卖啦！那孩子临被他们拉走时，哭得很厉害，连头都碰破啦！要是有咱们的大红军来，你可要给你三哥带个信。那些王八蛋，现在又要卖活夫妻彭毛。我找你们就是为彭毛的事。篾匠在外面做活还没有回来，没得别的办法，还是让彭毛跟你们上山去吧!”

我心里也很难过，安慰干妈说：

“三嫂被他们卖掉，也不知道卖到什么地方，只好以后再想办法。老彭的事我们一定想办法。你知道老肖在哪儿吗？”

“我来时，彭毛叫我告诉你们，老肖去黄陂站住在她娘家，有时候回来种田。这两天听说黄陂站很严，不知她出来了没有？”

“你能经常回来吗？”

“只能中午时候回来一趟，早早地就要回笼子里去。你

可别忘了，这里给你们留了两个土罐子，你拿去再藏个地方，不要叫他们搜去了。今天我还带来了几根洋火。就是米，我现在没有一点办法。”

我从小失去了母亲，没有体会到母爱，我总觉得这位老太太对我们比人们所说的母亲对儿子还要好十分。她经常对我们照顾得十分周到，使便衣队的同志们深深感动。看看已到了下午，我说：

“干妈，你快回去吧。老彭的事，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

干妈又仔细地端详了我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吃力地走去。

转往山坡的途中，我考虑到这样多人，在一起天天只吃点野菜，不是个办法。找到朱洋人，对他说：

“你们有九个人，留两个跟我，你带着其他的同志到小黄家冲和王金瑞支书联系。然后，你们到万寿寺的庙上去找我，在最后边一排房子的窗户上用手扣窗子，重扣一下，轻扣三下，再重扣三下，轻扣一下；低声说两次‘香炉、香炉’，里边如果回答‘三和尚、三和尚’，那就是我在里边；如果没有回答，你们要立即转移。”

朱洋人听说我要去万寿寺，表示不同意。

“万寿寺离黄陂站还不到半里路，经常有人到那里烧香，你去不妥当。”

“不要紧，注意隐蔽就行了。”

我带领两个便衣队同志，来到万寿寺庙的窗子下，先扣暗号，得到回答后，便急忙走向耳门；小和尚开了门，放

我们进去。

第三天中午，肖同志来了，进到我隐蔽的洞里。我问她：

“你到这里来方便吗？”

“我很少来。来也是装做烧香的。”

“东丰庵的青柏和尚已经被民团打死了。这个联络点，应当早点警惕。你谈一下情况吧。”

肖同志，这个干练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立刻详细地为我介绍了许多情况：甘允吉已经被保出来了，不过只准他住在黄陂站，不准到山沟里去。甘书田、甘树利还是住黄陂站。从现在看来，姓甘的再没有大的危险。只是地下党支部还有几个没有保的党员住在黄陂站，虽然暂时没有出问题，住长了总不是个办法。这两天听说黄陂站要清乡，把没有保的人都送到五里桥。如果党员们都住在五里桥的移民点里面，就非常危险。

自从陈又文下台后，刘修斋就为两个叛徒——刘庆梦、刘庆连翻案，现在已经把这两个叛徒要回去了。听说还从武汉、信阳等地回来了几个没有杀掉的地主娃子，口口声声地要回来报仇，也都在刘修斋那里。刘修斋近来每天到黄陂站来一趟，和一〇二师驻黄陂站的一个团部关系很密切。所以一〇二师的人说，搜山叫本地的民团和联保带路没有用，他们都“通共”。现在别动队出发都是刘修斋派人带路。

我对肖同志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各地取得联系，收集敌人情报，组织党团员利用各人的社会关系设法多买些粮食。”

我要她带一部分钱回去，除了对红军家属和基本群众进行救济外，剩下的钱留作党支部的机动金。并且嘱咐她说：

“在一般的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在特别紧张的环境下或有危险时，尽量和便衣队联系转移；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转移，可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失掉党的联系。”

经过北岗联络点时，我又和便衣三队接上头。朱洋人说：

“我们用暗号和一队长胡民山接上头，他说甘春兰把她的瞎子父亲留在甘家湾，她常借照顾父亲的名义到沟里来。她正在找县委，可能有事情。胡民山叫我告诉你，看你是不是和她直接取得联系。”

“去看看。有一个月没有进那个村子了，我也想找甘春兰了解一些情况。”

到了甘家湾，村子里空荡荡的。我们就直接走进甘保井家里，看到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就问他：

“你老人家一个人留在湾子里？”

甘保井虽然眼睛看不清楚，却听出是我的声音，马上回答道：

“你是何指导员吗？春兰被他们卖啦，你知道吗？春兰把我留在村上，为的是和你们接头，她说只要有人来，就叫我告诉你们，她还要回来的，叫你们等她。”

“她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定。只要你们等她，我就告诉她去找你们。”

“只要你告诉她说我来过，她就知道了。我们走啦。”

离开老人，我们又转移到后坳。

村子里阴森森的，到处是灰烬，满院抛散着打烂了的破家具，看样子敌人又来搜查过。家家的门窗都用土坯封闭着，我们悄悄看了几家，屋子里都空空如也，连锅台都被敌人挖倒了。

同志们饿了一天，都想找点吃的，我们一边查看，一边向甘树利家走去。突然，我们发现甘树利隔壁一家富农的门窗没有封闭，这使我立刻怀疑起来。对朱洋人说：

“这家是富农，当家的是个商人，很早就死了，剩下个寡妇带着两个儿子，还接了个儿媳妇。她的门窗没有封闭，可能在家里。咱们装做一〇二师的别动队进去。”

朱洋人按亮电棒，东照西照了一阵，看不到什么，就从屋后向窗子里一照，果然有两个妇女坐在屋里。

“唉呀，谁呵？”屋子里惊慌地问。

朱洋人指挥着同志们，把这座院落包围起来，然后回答说：

“别动队。”

“你们等一下，我就来开门。”

门打开了。我和朱洋人装做别动队的模样，一步三摇地走进屋里。主人立刻点着了灯。

朱洋人板起面孔问道：“都移了民，你们为什么还在家里？”

寡妇脸上一片难色，慌张地说：

“我的儿子都在李子园，我是个富农，受了共产党很多罪，保长叫我留在屋里暂时做几天饭，等地里那点庄稼收起

来，就去李子园。”

听说她是保长留下来的，我心里有了底，追问道：

“你们保长是谁？”

“甘树利。”

是甘树利留下来的，我就知道这是个联络点了，便决定实话实说：

“我们是便衣队。甘保长对你说些什么没有？”

她就象小学生背课文似的生硬地说：“我们家，没有米，没有油，只有一点盐。”

听到她用这个老暗号，我心里直发笑，却又不能不佩服老有经验的甘树利。他的立场很稳，阶级观点很明确，今天虽然利用富农为我们做联络工作，却不告诉她现用的暗号。我也只好按着老暗号回答：

“一块钢洋。”

“哎呀，你们装得真象，可把我吓死啦。”她高兴起来，声调也变得自然多了。忙吩咐：“杨毛，你快去做饭。”把儿媳妇支走以后，她才对我们说：“树利说我是个富农成分，才把我留下来好打掩护。他叫我专等你们，还说是只认暗号不认人。我等了好几天啦，每天夜晚都不敢睡觉，这下可等着你们啦。”

“甘树利说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碰巧他今天中午回来了一下，叫我对你们说：和以前一样，还叫你们在那里隐蔽。我收的几担谷没有挑进移民点，都埋在山上哪，他叫留着给你们吃，还留下了几盒洋火和几两盐。”

为了判明她和甘树利的关系，我就追问她说：

“叫我们在哪里隐蔽呢？”

“甘树利的老婆胡毛（胡明月）说，晴天叫从染房里钻洞，进到后边的生鸡（空了的古坟）里隐蔽；雨天就在刘毛的房里隐蔽。刘毛的住房，靠东边窗子上的土坯是活动的，很好抽。还有一个地方他没有告诉我，叫我送饭时送到河边一块石头下面。”

她说出三个隐蔽点，我知道她已经是经过了教育的可靠的联络点。我这才放心地说：

“生鸡里边不保险，人多了怕踩塌。里边的气味也太大。”

“气味已经没有了，我们打扫了好几天，把骨头都拿出来掷啦，还用艾棵子熏了的，里边很干净；就怕碰上搜山，上面的人多踩塌了倒是真的。那里不行就在刘毛家，我娘俩给你们放哨。”

下午，我们正在后山上隐蔽，看到胡民山手里提着一个小竹篮子，摇摆着走上山来。我感到很奇怪：情况这样紧张，他怎么能公开地上山来呢？

朱洋人也看到了胡民山，他急忙爬到我跟前说：

“这咋回事？一天上山的人成群，他怎么能公开地到隐蔽地来呢？我看还是转移一下吧？”

“不，他可能有急事。”

这时，胡民山忽而向上爬，忽而往下钻，这棵树上摸摸，那棵树上抓抓，把我也看迷糊啦，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名堂。不一会儿，他东一爬西一翻地来到我们跟前说：

“何指导员，我把甘春兰带来啦，在下边湾子里。”

我问道：“你带她来怎么办？现在能下去吗？”

“现在是阴历九、十月的节气，正是采五倍子（树上的一种虫茧）的时候，民团想发这批财，所以叫老百姓到各山上采五倍子。你只要提个篮篮，装着采五倍子就可以活动。”

“那好，就把小篮子给我，天黑后你再下去。朱洋人，你带三队转回原地坚持。”

我挎上小篮，一边装着采五倍子，一边走进了后坳。甘春兰看到我就是一场痛哭。

“何指导员，我被他们卖给民团的一个小队长，你可能知道了。唉，我是一个女人，这是敌人对我们的欺凌、摧残，我也没有办法。”她抹了把眼泪，接着说道：“不过，我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长大的，我是共产党员，他们只能买到我的身子，买不到我的心。我还要尽我所有的力量，继续为党工作。我今天来，就是要求上级仍然把我编进小组，继续过党的组织生活。在乌子铺，我见到几个过去和我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因为在移民点里不准发生横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和他们联系，就是见了面大家也不讲话……”

在她的语气里涌现出坚强和力量。我沉默无言。从她诚恳的谈话中，我感到党的伟大，感受到她那颗热烈的、对党纯洁真挚的心。她是一个多么坚强的青年妇女、共产党员呵！她参加过农民暴动，在苏维埃时代热情积极地工作过，苏维埃失败后，她饱尝千辛万苦，历尽敌人的迫害和凌辱，但她并没有向敌人低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执行党的任务，她把自己的心永远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事业。今天，

在敌人的魔爪下，她顽强地活了下来，为的是为党工作。她说的对，敌人可以毁灭一个人的肉体，却永远消磨不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

正在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甘春兰已在汇报她所了解的情况。她说：我利用民团的关系，有时插空到棚子里去看看，红军家属和基本群众的稻谷，多半在田里就被民团抢去了，一进移民点就没有粮食吃；衣物棉絮早被民团抢得精光。特别是后来在搜山中被撵进移民点的群众，最是受苦。从现在起，老的小的就开始围草窠、吃菜饭。

移民点里的臭规矩很多，早晨出来时，门哨要检查，除了中午吃的一点冷饭，什么都不准带；特别是洋火和盐，检查的最严格。出来时，每人发个出门证，而且要直接到自己田里去，不准岔道，也不准打野（玩的意思），民团还派人到高山上监视。种田回来时，除了收回出入证，还要检查全身。天黑后，民团就到各棚子里进行检查，连第二天下锅的米、菜都要看一看；其实就是搜查和点名。

出力的人，说是出来种田，实际上有什么可种呢？现在是整地种小麦的时候，一无耕牛，二无种子，用什么种呢？如果今年的小麦种不上，群众就要饿一整年。我看，无论如何便衣队要想法帮助群众把小麦种上。

民团抢的东西再多，也不会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刚刚分完赃，又在计划着收杂税，地主也在进行倒算。他们还在卖红军的家属，依我看，不久连穷人家的中年妇女也得被他们卖掉。这几天，不知为了什么天天吊打老百姓。……移民点里的苦水一下子说不完呵！

还有一点重要情报：听民团里的人说，他们要对红安、罗山、经扶的山区实行“路不拾金”，他们把钱和粮食放在路口上，发现有人拿去，就跟踪搜山。还有一个消息说，国民党要在甫安寨、黑狗寨的最高峰修炮楼，由一〇二师压修，一〇二师看守。他们要真的在山顶上修起炮楼，路口上的卡子就会更多，今后便衣队的活动就更困难了。……

她谈完了，我才说：

“甘春兰同志，你们原来的支部大部分同志被移进了乌子铺，你原任支部副书记不动。不过，乌子铺是便衣三队活动的地区，支部已经转给三队，我叫一队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去好了。你除了完成党支部的工作外，带一部分钱去，在可能的条件下拉民团的小队长、班长直到团丁，使他们代群众买点米，在某些地方给一些方便。另外，在不影响你隐蔽的情况下，尽量收集敌人内部情报……”

二七　摧毁移民点

在丁家榜后边的山沟里，驼二爷向我汇报情况说：谭继仁仍然坐镇宣化店，他们为了保出刘树生，宣化店是缓和了几天。我们放了刘树生以后，罗伸发对宣化店群众和粮食的进出，查的较以前松了一些。不过群众还是不敢多买粮食，就是多买了，有一〇二师驻在宣化店，还是运不出来。这几天，程汝怀又把陈少堂调驻宣化店，据说是叫陈少堂在宣化店监视、镇压与我们有关系的地主士绅，并负责巡逻几个移民点。现已派出一个分队进驻刘家冲沟南湾，不仅监视老百姓，也监视刘达诚留下的一个分队。区公所已允许地

主在移民点里向老百姓进行倒算；还公布了什么“保路税”，“电话税”，进移民点住他们的棚子要“住地税”，“灶头税”，生了孩子要“人头税”，“剿共”死了人向老百姓要“安葬税”，“剿共”出差向老百姓要“出差税”，“草鞋税”等等七十二种苛捐杂税，弄得群众人心惶惶。

叛徒刘庆梦、刘庆连已经被刘修斋要回去，又在给一〇二师的别动队带路。现在不但是被他们捉过的人害怕，连保人、上告过他俩的人都非常害怕，要求我们急速想办法。……

胡民山汇报说：我们在移民点组织了各种暗号，设法去接粮食，往往时间碰不上头。群众搞到粮食，夜里利用他们方便的时间扔出来，我们去早了不行，去晚了怕被民团的巡逻哨发现，民团如果发现了，认出包粮食的东西是谁家的，轻则挨打坐牢，重则杀头。高家湾姓陈的全族被移进沙河铺，民团硬说他们有多余的粮食运给了共产党，便捉走了十几个人。实际上是因为陈云山在农民暴动时是领导人之一，民团故意找姓陈的错，整姓陈的报仇。

移民点里的敌人真是无法无天，想捉谁就捉谁，随便抓住一点错处，就把你拉到炮楼里吊打、审问。董新贵一家，几辈子种刘朗山祖上的田，搬进移民点里，刘朗山一下子倒算了他几年的粮，他交不出来，刘朗山就把他的大儿子董国良押在牢里，把腿打断了；还把他十五岁和十七岁的两个姑娘强迫卖掉；另外两个儿子没有下落。刘朗山为了想他的两个姑娘，董新贵不愿意，就这样摧残他；别家老百姓的痛苦，由此也可想见了。

便衣队的隐蔽很困难。早晨枯草上有露水，或者有白霜，人走过去有脚印，特别是雨后，脚迹最为明显，敌人常是追踪搜到隐蔽地。有时我们运用过去那种“倒穿鞋”等办法，也难瞒过敌人的眼睛，常被敌人搜出来，一打就是一天。我们有一个小便衣队，在山区里隐蔽，实在饿极了，才出来找我们，刚出来就在东丰庵的路口上看到一袋米，就拿了起来，转移到顾家冲的一个小空湾子里做饭吃，而后隐蔽在塔尔畈前边水沟的坡沿下。第二天，敌人不见了米，就搜那一带的山，中午他们被搜出来，立即进入战斗；队长董国营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同时还牺牲了两个队员，丢了三支枪。其他的同志都被打散，直到天黑后，我们才去收容起来。遇到这样的战斗，我们处处被动，敌众我寡，地势不利；再加上同志们饥寒交迫，不会没有牺牲。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我们的便衣队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因此我们要求打开缺口，或者是想办法打出去。

在一座石洞里，张家胜同我谈到移民点里群众的疾苦。他说，窦家寨是一个非常顽固、非常反动的寨子，想进去和群众取得联系是很困难的。我在寨子附近转游了十几天，用尽了一切办法，才找到了一个红军家属，共产党员何德阴同志，她告诉我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婶母因为给便衣队送饭，全家四口被敌人杀绝了。何德阴那天一返回去，民团说她没有在田里，当夜就拉到炮楼里吊打审问；她几次死去活来，没有一点口供。第二天就被民团卖掉了。从此，窦家寨就把李家楼、程山洵和附近几条沟移民进去的老百姓，统统撵出。现在，被撵出的老百姓又被民团押进了大胜关。移

民点里有个规矩：凡是这个移民点赶出来而转进另一个移民点的老百姓，无疑问地就成了政治上的嫌疑犯；所以这部分被撵进大胜关的老百姓就更加痛苦了。

张家胜还说：我们在山上埋藏的粮食，大部分被敌人在搜山中挖去了，下剩的一部分也被野猪扒吃了。山上的彩病号和群众现在完全依靠便衣一、二队给他们运粮。近来，由于敌人下卡子和一〇二师别动队活动频繁，特别是刘庆梦、刘庆连两个叛徒又带敌人在罗四区几个出入路口卡住，便衣队出入都很困难，运粮就更加困难了。彩病号和群众以野菜度日，眼下已到秋末冬初，遍山霜冻，野菜多半枯萎，又没有火，生活极度困难。等到大雪纷飞的寒冬到来，敌人就会增加兵力，进行雪地搜山，情况就严重了。因此，张家胜建议打掉几个碉堡，击中敌人要害，打出缺口，以免再造成敌人雪地搜山的困局。

一两天之后，我赶到李家楼的空湾子里，和郑定国见了面。他谈到外线的情况说，程汝怀用一个保安团的兵力，在红安三区占据了各个较高的山头，加修炮楼，不分日夜地搜山。我们刚到红安四区的时候，和易元鳌同志有联系，从敌人布置了大搜山以后，一直再没有联系上。不过，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两个在山里隐蔽的群众，据他们说，光山南区便衣队出了两个叛徒，把红安四区的工作破坏的很厉害，仅周八家、周七家两个村子就死了几十人。我们初过去时和安麻中心县委的便衣队有联系，在敌人搜山中，只听到他们那边打的激烈，没有接上头。据了解程汝怀计划这次搜山分四路“进剿”，由于罗厚福带领特务三大队打的很激烈，牵

制住一部分敌军没有能够进到山区。以后再没有和他们联系上。特务队自从搜山后，在山区一直展不开，我来时叫他们去孝感活动，如环境紧张时，就在铁路西活动一个短时期。

在罗家凹的石洞里，我找到便衣三队。朱洋人汇报说：前几天，敌人把黄陂站及其附近移民点的老百姓，都赶到黄陂站开大会，在会上杀死了三个共产党员。我得到消息，当即插到北岗，看了程汝怀的布告，才知道是英张家移民点党支部书记华奇光同志、张子金和他的爱人陈子银同志。据了解，这个支部出了一个叛徒，全支部被敌人一网打尽，在移民点杀了几个党员，还把华奇光等三个党员拉到黄陂站去杀。三个同志死的非常英勇。死后敌人不准收尸，直到五区区委书记黄宏儒想了许多办法，花了很多钱，买动了民团的下层，才抬回安葬了。程汝怀在红安地区捉到共产党，不在红安县城杀，也不在七里坪杀，偏偏要带到红安和罗山两县交界的黄陂站，又是在这样多老百姓的面前来杀，分明是一种极端恶毒的手段，企图威胁、吓住红安、罗山的共产党人和群众。

朱洋人继续说：红安五区这次移民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残酷，都毒辣。以往移民只移穷人不移富人，这次就不同，连地主士绅都移到化家河以南。不说老君山山上的老百姓，就是山脚下的老百姓，来回跑一趟就是一百多里路，还能种什么田呢？

朱洋人还说：我在仙居顶一个秘密的暗号处，摸到侉子钱运华一封信，说他们的便衣队一天夜晚隐蔽在金孔梅家

里，第二天转移到二十四茅草凹，被敌人跟踪追上，战斗中，便衣队没有受损失，就是同志们只顾打仗，没有把金孔梅给他们盛饭的箩罐带走，被敌人搜去，民团认出这是红军家属金孔梅的东西，立即将金孔梅拉出去枪毙了！

听到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感到非常痛心，对朱洋人说：

“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发出两次通知，可能他们还没有收到。你再利用暗号四处传达：凡是我们手中借用的群众的东西，一定要妥善收藏、保存，不得遗失。同时把这件血的教训告诉同志们。”

一个雨夜里，我们正在刘家冲沟北湾的空湾子里隐蔽，王定堂和黄陂老找来了。他俩看到许多人都在这里，高兴地说：

“吴副书记派我们来找特委，可巧啦，你们都在这里。”

听到他们是吴光陆派来的，定有急事，我忙问：

“他们那边很紧张？”

“吴副书记本想回到罗一区里来，因为接到张家胜的信，知道里边很紧张，加以大小鸡笼山也很紧张，所以就没有进来。他说，柳林区虽然没有移民，但在敌人大搜山的第一天，区委书记小洪同志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独立团自从运动出去后，一直活动在灵山一带，在灵南山冲、灵北山冲、北丰家店、青山五里店子一带组织了新的根据地，不过因为独立团在那一带活动的时间较长，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那一带是非苏区，敌人不‘进剿’，但陈道荣的民团和他们仅相隔一道淮河，这边又是河南省的一个保安团，估计不久敌人会从两面进行夹击，这样，独立团

的处境就很险恶了。敌人的目的是想把我们的兵力挤到一山一畈，到了冬季雪天时进行大力合击。吴副书记提议我们先下手为强，及早组织力量打开一个缺口。不过，这只是根据外线情况提出的。”

听完汇报，我对同志们说：

“今天的机会很好，郑定国同志、张家胜同志和驼二爷、王定堂、黄陂老、胡民山等同志都在这里，我们大家就一起研究一下，共同作出决议。”

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敌人这次移民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残酷和毒辣。现在冬季刚开始，移民点里已经死了不少人，山区就更加困难。冬季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依照敌人历年的老规律，肯定要集中力量向山区大举“进剿”、合击、封锁。往年我们总是在敌人雪地搜山的后期，为了坚持，为了生存，才组织力量打出去。今年最好不跳进那个圈子，早早地组织力量，打破敌人雪地搜山的计划，打出一个缺口，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自敌人大移民以来，特委先后派出两个交通，以到陆安贩卖茶叶的名义，去找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同志。至今两个交通都没有回来，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从敌人的《扫荡报》上并没有看到有我们的交通失事，也没有看到皖西方面受到大的损失，估计他们是接上了头。这两个交通方永乐同志都认识，也可能是他们接到信后，要派部队过来策应我们，才把交通留下做向导。根据这样的估计，我们最好在雪天之前就全面打起来。把独立团抽出灵山，打到商麻公路线。特务队和教导二队打熊原钱的老窠红十里店，以便把

他的民团牵制回铁路西。张家胜先派一个便衣队到红安四区通知易元鳌，叫他们动手打，然后到阴河区和关楚印联系，也叫他们打，最好由关楚印设法通知罗厚福也打。全面动作起来以后，驼二爷指挥便衣队专打敌人的据点，也可以伏击最反动的民团。郑定国、王定堂最好去找吴光陆，共同组织一个外线指挥所。我带教导一队打到陂、孝、北策应教导二队。总的目的都是围绕着策应独立团，或使罗山一、四区能和陂、孝、北取得联系，最好是能打出一条路。如果能够得到红二十八军的策应，可能打的很好，或许能得到局部的解围。

决议通过后，已是黎明。临分散转移时，我对郑定国说：

"今天的决议还不能算做最后的决议，你见了吴光陆同志，看他还有什么意见。如有意见，赶快派人回来，再作研究；如果没有意见，由你们通知独立团，我们根据独立团行动时打响的枪声为讯号。"

我集合了教导一队和罗山一区便衣二队，从罗山四区出发，想先把一〇二师的两个团拖到平汉线上去。当我们通过汉罗公路，到了肖家山，刚一出山，一〇二师一个营就追上来了。我们边打边退到孝感搭茅寨山上，正在休息做饭吃的时候，突然发现除了追击的敌人而外，前面又有了堵击的部队和当地的民团，总有千余人，把搭茅寨包围起来。当夜，我们反复冲击，夺得路口，一直转战到金牛城，刚把尾巴上的敌人一个营甩掉，迎面又碰上敌人另一个营，接上火后，想把敌人带到信阳去，刚拖到杨万家店，前边却又遭到

敌人的堵击。我们转身想进大小鸡笼山没有成功，马上抓住敌人一个空隙，插到于家大寨小寨的山上隐蔽休息。敌人随着追到山下，急匆匆调动兵力，企图在天明后把我们歼灭。然而天还未明，我们已经利用黑夜的掩护，悄悄地到了平头畈，吃了饭，又转移到董家堂。路口上有一个小烟店，烟店的主人是和我们有关系的群众，申功臣便装做买烟的去烟店里打听情况。

老人认出申功巨，轻轻地说道：

“今天下午宣化店来了敌人一个营，营部住熊家店，半边店住了一个连。这些，是连长的卫兵来买酒时，我套出来的。”老人机警地向四外张望了一下，接着说：“这一带打了几天，可能是来了大红军。这个营是来堵路口的，怕你们从这里过河。”

申功臣返回来，把老人的话讲给我听，并且说：

“何指导员，一〇二师一直还没有吃到我们的苦头。所以他们总是吹牛说，以前的军队和民团没有消灭共产党，是因为他们都‘通共’。这几天一〇二师咬住我们的尾巴，甩掉一个又跟上一个，再不给点苦头吃，他们就会猖狂到天上去啦！我看，不如在这里组织个偷袭，狠狠地揍他一顿。实在不行的时候，咱们再走也不迟。”

半边店的地势，我是清楚的，它一边靠大山，一边靠大河，不要说一个连把守，就是一个排，我们也难突过这个要口。我便下了决心：

“好，揍掉它。动作巧妙一点。黄陂老，你带一个班作前卫，先搞掉敌人的哨兵；申功巨带便衣队走中间；下剩的

跟我走。”

天上没有星星，夜更黑，北风在怒吼。我们冒着寒冷急速前进。半里的路程转眼就走到，大家立即隐蔽起来观察着敌人的动静。

敌人的前哨是一个班，正在棚子里烤火取暖。路口上只放了一个单哨，哨兵萎靡不振，挎着枪，来回晃游着，丝毫没有察觉我们。黄陂老爬行着靠上去，猛窜起身子，捉住哨兵，拖住他一股劲往回跑。棚子里的敌人发觉了，他们没有出来抵抗，反而向连部跑去。同志们立刻分散开来，将几座茅草棚子包围起来。申功臣拿起棚子里的炭火，放火烧着了第一个棚子。

从连部的院子里，约莫有两个班的敌人冲出来了。我们的机枪一“咳嗽”，敌人急忙缩了回去。这时我才发觉，敌人原来全住在一所院子里。我立即对教导队二班长说：

“拖一挺机枪压到院子的后边去。”

院前院后各有一挺机枪严密地封锁，敌人根本无法冲出院子。这时间，手脚利索的申功臣又拿起火把，顺着墙把敌人住的房子一起烧着了。北风卷动着火焰，把院子烧了个通红。敌人被憋在里边，只是瞎七瞎八地乱打枪，掷手榴弹。

黄陂老站在机枪边，扯大了嗓门直喊：

“缴枪！缴枪不杀！……”

不管敌人的连长怎样弹压，还是有二十多个敌人扛着一挺机枪和举着步枪和子弹带，钻出了院门的火圈。剩下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干脆葬身火海烧个干净；一句

话，一个连的敌人全部被我们歼灭了。

“黄陂老，有彩号吗？”我问。

“嘿嘿，”黄陂老直乐，“打了个便宜仗，一个挂彩的都没有，还得了一挺新机枪和几箱子弹。”

“这样一打，敌人营部必然要从娥眉堂前的大路上赶来增援。黄陂老，你带部队埋伏在娥眉堂山的后边，没有命令不准动。申功臣，敌人的营部出来以后，熊家店一定是空的，你带便衣队去把它烧掉。注意，途中不准暴露目标。”

我和教导队赶到娥眉堂后山埋伏下来。不大会功夫，约有一百多个敌人跑步增援上来。不等敌人拉开架子，我们的步枪和三挺机枪同时吼叫起来。敌人慌了神，拖拖拉拉地退进袁方湾和银山寨。

申功臣带着便衣队跑步返回来。他气喘吁吁地说：

“何指导员，任务完成啦。真可惜，大火一着，里边的子弹就跟过年放鞭炮一样。”

我回头对黄陂老说：“你带教导队到东边山林里的郑家楼隐蔽，吃饭休息，天明后就在那里监视敌人。如果敌人报复搜山，你们就从春秋庙过大河到定远店转个圈子；如果这伙敌人被打痛了，偷偷返回宣化店的话，等天黑后再隐蔽着到张家湾找我。便衣队现在随我出发，到金牛城下边的张家湾去。”

天亮前，我们已经到了张家湾，摸进张聋子的家里隐蔽。

张聋子是邓方家湾移民点的党支部委员。中午时，他回到家来，意外地发现了我们，高兴地说：

“正要找你们，真巧!”

“有情报吗？”我问他。

“我是个‘聋子’，又是干‘测字算命’的营生，他们不大管我。昨天听人说，南边来了大红军。今天一早，我就进宣化店听风声，正看到一〇二师一个团在宣化店南头集合，向南开差去啦!”

南边来了大红军，是不是红二十八军有部队过来？不然的话，敌人不会用这样大的兵力去挡。我对张聋子说：

“你再到南边去侦察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部队？”

天刚擦黑，黄陂老来到张家湾说：

“袁方湾和银山寨那股子敌人，天一亮，连战场也没有打扫，死尸也没有拖，就象狗一样夹着尾巴跑回去啦!”

半夜，胡民山在湾子里找到我说：

“驼二爷叫我转告你一个消息，红二十八军林维先带特务营过来策应我们了，现在已经和独立团接上头。他们准备用伪装战术打掉磙子岗、王家河、长辛岭，直打到河口附近姚家集一带的移民点，叫里边组织策应。”

我在胡家小寨的空山上见到吴光陆，共同研究决定：红二十八军特务营从皖西打过来很不容易，他们的策应能够暂时牵制住鄂东北地区内的敌人，我们要趁此时机，组织移民点里的群众暴动，摧毁移民点。暴动时用火攻，烧棚子，烧炮楼，粉碎移民点，救出群众。所有和我们有关系的民团，配合我们的部队内外夹击，里应外合，拖出民团，解散移民点。移民点里的民团凡是和我们没有联系的，就和地下党取得联系，由他们组织群众以烧棚子为号，我们用部队在

外边接应。暴动开始后，一定要给群众留下向外跑的路口，必要时可以派部队掩护和专人负责，尽量不使群众受损失。马上通知各地立即紧急动员，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为暴动的时间，各移民点同时动手，要求在三、五天内就相继摧毁所有的移民点。暴动以后，群众们的衣、食、住等方面的安置工作，由便衣队负责迅速进行。最重要的是防止敌人对他们的屠杀。在这速战速决的紧急关头，我和吴光陆不能失掉联系，决定在金牛城组织一个临时指挥所。教导二队隐蔽在山上作为机动部队。教导一队和各便衣队立即分头去传达决定和布置暴动。

第二天夜晚，我带着教导二队急行军逼近了芦家畈。在山沟里，我向方忠厚说明任务：芦家畈的民团极端反动，平时就怕我们挖它的老根子，围子里粮草、弹药准备得很充足，碉堡多而坚固。围子的外面有宽阔的水濠，水濠的外面是一片开阔地带。同时，道座湾是信阳敌人正规军增援的一条要口，潘辛店是罗山驻军增援的要口；这两个寨子同样反动，有民团武装五、六百条枪。与芦家畈只隔着一条大河。因此，我们要拔掉芦家畈这个敌人的门户，还要堵住敌人的增援。否则，移民点里暴动得再全面，群众也不能很快转移到山上，那就会遭到敌人的屠杀。

战斗决定在午夜开始。战斗前，我们把稻草打成捆，在水濠里浸湿后，就在围子外边堆成工事。枪声一响，围子里的群众就放火烧着了棚子，转眼间已是火光冲天。民团一见四处大火，直烧得“劈啪”乱响，加上枪声又很激烈，不由得乱成一片，争先恐后地向寨子外边冲来。我立刻命令方

忠厚说：

“压上去！”

几十条步枪和一挺机枪紧紧咬住敌人。敌人借着大河岸的地势顽抗。这时，芦家畈附近移民点的群众也暴动了，到处杀声震耳，烈火万丈。我立即高呼：

“同志们，移民点暴动了。我们把眼前的敌人赶下河去！”

同志们个个精神抖擞，奋勇作战。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一部分民团，也被我们赶到河里。战斗刚要结束，忽然发现河对岸道座湾、潘辛店送死的民团增援上来了。我们踞高临下，不等民团的船只靠拢岸边，就用手榴弹把他们击沉河底。

黎明，我们掩护着反掉移民点的群众，胜利地进入崇山峻岭。

短短几天里，整个鄂东北真是地覆天翻，乾坤倒转。反移民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在林维先营长指挥下，以伪装战术摧毁了一连串的移民点，还打垮了一〇二师的两个营。罗山独立团打开了西张店、乘马岗的移民点。罗厚福带领部队打下了韩各老屋和四店的移民点。易元鳌率领部队打开了周八家、潘家河的移民点。我带教导二队打开了杨万家店和三义店的移民点。胡民山的便衣队配合刘达诚的民团，里应外合摧毁了沙河铺所有的碉堡，刘达诚民团的三十多条枪公开拖了出来。朱洋人的便衣队打乌子铺，乌子铺的地下党组织了红军家属、秘密的小便衣队和红色群众，火烧草棚，手拿斧头菜刀与敌人肉搏，里外

策应，共同打掉了乌子铺移民点。申功臣的便衣队打大胜关，敌人一发现寨子里群众暴动，自己烧掉寨子后就溜之大吉……鄂东北地区老苏区里的移民点，大部分被摧毁。在反移民胜利的时刻里，各部队都发展壮大了，教导一队扩充改编为一路游击师；教导二队扩充改编为九路游击师。党的地方工作也活跃起来了。我们胜利地度过了冬天，继续坚持和扩大发展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第五章　转战三省

二八　在豫东南

腊月间，高敬亭带领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从皖西舒城出发，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里，到达了罗山四区，首先和罗作范、张家胜汇合。

我接到命令的时候，正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当夜，我迎着呼啸的北风，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来到王家凹，和高敬亭见了面。高敬亭叫我通知鄂东北区级以上的干部，和便衣队队长、指导员以上的干部，在后天晚上到罗山四区高庙吴家凹开会。

在这次会议中，高敬亭对工作作了一些安排，宣布陈守信任鄂东北道委书记，郑定国任罗、孝、陂、信、应特委书记，张家胜任红安四、五区，光山南区，陂安南，罗山一、二、四区的中心县委书记。至于我，被调到河南省东南部山区工作。

一九三六年初，我带着郑维孝和两个交通，开始了长途跋涉。大雪下个不停，莲台山披上了洁白的外衣，白茫茫一片，根本找不到一点路迹。我们吃力地爬行着，时而从陡坡上跌落下来，时而被陷在雪窝里。终于，在雪树中间的一个

棚子里找到了夏井区区委书记吴昌夫同志。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向我们介绍了这一带地区的工作情况：红二十五军走前，省委派戴季英负责西高山一带的工作。戴季英走后，根据省委的指示，新组织了光、麻中心县委，书记是张作信，在她的领导下，工作大有发展，并且组织了便衣队。后来在敌人的搜山、封锁中，工作遭到很大的破坏，基本群众渐渐离开了山区。张作信死后，罗厚福接替了她的工作。现在夏井区有三个便衣队；东八区有三个便衣队，没有区委书记；商城砖北区区委书记是刘本福，有两个便衣队；麻城神区有一个便衣队，区委书记姓陈。特务三大队还有几十个人；山上还有一个看守所，共有十几条枪。跑反的群众和红军家属等非战斗人员有百余人。山区无衣无食，生活非常艰难，无人区逐渐扩大，工作很难扎根和向前发展。在大雪封山之际，人们都在奄奄一息……

特务三大队接到通知后，返回莲台山上。我看到他们也十分困苦，大雪天穿着破衣烂衫，没有吃的，连子弹都极少，战士最多的也不过只有五发子弹。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把随身带来的一万块钱，分别交给三个便衣队，组织他们设法到山外去购买粮食。但是，由于敌人严密的封锁和残暴的镇压，群众都不敢给我们代购粮食。

我们召开了干部会议，专门研究怎样解决粮食问题。吴昌夫提议说：“莲台山的北边是夏家新寨，那一片寨子非常反动，死守要口，使我们无法通过；西边是郭家河一片围子，同样无法通过。只有到经扶县城附近去‘打粮’。”

打粮，在现阶段不够合适，它有时违犯了基本群众的利益，造成一部分群众渐渐脱离我们，给敌人钻了空子，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我们处于孤立的状态。但是，我刚来到这个地区，对情况不了解，既提不出其他的解决办法，又不能眼看着同志们和群众一个个饿死。看来，只好再打一次。打，没有子弹，更没有手榴弹，这个仗可怎么打呢？……最后，我对同志们说：

"决定打，就到经扶县城北门外的小店子上去打地主的粮食。子弹不够，我身上带了一百五十发，分给战士们。我们的火力太小，只有虚张声势，再用一次农民暴动时的土办法，装个炮桶。由吴昌夫同志负责，明天买到一个洋铁桶和一捆火炮。"

第二天下午，吴昌夫已经派人买回来爆竹和洋铁桶。我们马上研究作战计划，决定在特务三大队挑选出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担任掩护。再派三个机动灵活的同志负责炮桶，把炮桶挂在县城北门附近；爆竹放完以后，一定要收回空铁桶，不能暴露这一秘密。打，由特务三大队负责。驮粮由吴昌夫负责。

我们把爆竹全部放到洋铁桶里，拉出火引子，紧闭盖口，只留下一个小透气孔。炮桶准备好以后，天黑时从莲台山出发，在积雪中爬行着，半夜时接近了小店子。

提炮桶的同志先爬到县城北门外，把炮桶挂在树上。听到枪声，他们立刻点燃了炮引，铁桶里的爆竹便啌嚨咣当地响起来，加上激烈的枪声，格外显得热闹；敌人只当有强大的武装在攻城，死命守着城墙放空枪，硬是不敢出城门。

我们很快地进入小店子，获得大批粮食。

粮食问题解决以后，我便开始到各单位去了解情况，首先去看彩病号。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留下的彩病号有几十人，重伤号不多。我决定每人发给十块钱，并且调拨了粮食。不久，就有二、三十人出院了，其中还有红军时的两个连长。这些同志就成为我们开展革命活动的大本钱。

我在检查看守所时，所长刘海山汇报说：看守案子的枪有十五支，押有十几个经济案子，有的已经押了半年多，多半是苏区里的破落地主。为了处理这些案子，我留在看守所进行了调查研究，决定除罪恶较大的几个地主以外，其余的全部释放。在释放前要进行政治工作，并要讲好条件：首先，叫他们每人开具一张字据，写明出现款还是缴物资，在规定的时间交到我们手里；其次，今后红军到他的地区时，不得放地补哨，不准报密。红军到他家去三次，他如果不跑、不去报密，字据作废，不再向他要东西；再次，每到夏收秋收，要和便衣队接上头，由便衣队确定他们应该缴纳红军粮的具体数字。分做两批释放，等第一批人的现款、粮食送到一部或全部时，再放第二批。

看守所有几个案子是“小马子”（即土匪）捉的，我们在路上打下来就押在看守所。这些人都是息县的大商人，现在放他，他不敢走，怕回去后国民党以“通共”的名义杀他的头。所以他愿意出钱，只要求我们不杀他。刘海山还告诉我：

“有一个小马子头，已经押了几个月，因为附近有很多小马子，杀了会出问题……”

听说有个小马子头，倒引起我极大的注意。河南省历来土匪众多，势力浩大。特别是河南、湖北交界地区，地主豪绅多半都是小马子的头领，即使不是小马子头，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他们也和小马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一股股大大小小的土匪中间，互相有联系，也互相有矛盾，互相勾心斗角，不外乎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势力较大的小马子，和国民党的政权狼狈为奸，被国民党收买、利用。刘子万原来就是个小马子头，在国民党的助长和支持下，扩大了力量，独霸一方，自封为“人间第二老天爷”，在国民党的唆使下，修起许多碉堡，多次向我们发动进攻。此外如顾金之、易本印之流，亦是如此。这自然对我们不利。我们应该从过去斗争中吸取经验，把小马子争取过来，他们不仅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外围力量，而且其中成分较好的小马子，还可以成为我们扩军的对象。问题是要很好地组织他们，改造他们。我感到这件事很重要，就召开了山上区以上的干部会议，决定和小马子头讲条件，通过了六项条款，即：捉案子，不准捉富农以下的人，不能捉行商和女案子，只能捉地主、劣绅、大商人、官僚资本家……一般的不杀人、不乱抢、不放火、不报私仇。如果要杀人时，必须先通知我方便衣队，同意后方可杀；需要时，为我方当向导；小马子可以扩大，但所属各小干都要和我方有联系，否则打掉不负责任。每干如有一百人以上，要经我方点验，在对方的同意下可编入我方部队；枪支坏了我们负责修理，但每月要给我们收买子弹，款子由我方支付；小马子遭到破坏，到山区隐蔽时，定要预先和便衣队接头，按照便衣队指定的地区隐蔽；

小马子的活动，要按时向便衣队作报告。这些条件，小马子头都接受了，并立下字据为凭。

根据到各地去了解的情况，我感到最困难的就是缺少干部。我决定把吴昌夫调到东八区，夏井区由李又厚同志任区委书记；并决定调黄宏儒同志到河区任区委书记。各区都分别留下几个刚出院的红军彩病号，作为组织便衣队的基础。

在一个月夜，我行动到商城的砖北区，在白雀园和砖桥之间的一个小村子里，我见到了刘本福同志。他们住在保长家里，热情地为我做了雪白的米饭吃。饭后，我们对坐在火盆边上，刘本福就开始向我汇报："我是跟罗厚福同志到豫东南来的，一直留在砖北区。这里的群众基础好，虽然敌人屡次摧残，我们还是建立了根据地。我们运用了鄂东的经验，重视了保甲工作，因此，这里的保甲制根本上变成了两面政府，白天他们给国民党办公，应付一切；到了夜晚就成了我们的世界。……接到你的指示后，我们已把两个便衣队扩编为四个便衣队，活动地区也向外推展了一步……"

砖北区的工作确实比较有基础，我们决定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力向外发展工作；在征得刘本福同意后，组成了商城、经扶、光山工委。

特务三大队自离开莲台山就打起，一直打到砖北区。子弹全打光了，不能外出，隐蔽在砖北区。我考虑这样多的人，又没有子弹，如果一旦被敌人发觉，就有遭受歼灭的可能，所以叫他们悄悄地返回莲台山休息。

不久，得到消息说：一〇三师一个营加上反动民团，共

有三千多人，正向莲台山的公母树山运动，可能想在拂晓时合围特务三大队。三千多装备齐全的敌人合围几十个没有子弹的同志，其处境之危急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当即派出交通，抄近路去通知特务三大队。交通回来后，尽管说三大队没有受到大损失，我心里总是惶惑不安，这样下去必将更加艰险；郑维孝同志又调动了工作，使我越加为难。万般无奈，我只好亲自到鄂东去找高敬亭。当我到达罗山四区时，高敬亭已到大小鸡笼山去了。我征得陈守信的同意，带着关楚印、杨大信等同志返回了豫东南。

在高敬亭多次的督促下，确定组成特委，我任书记，吴昌夫、黄宏儒任副书记，关楚印、刘本福为常委，各工委书记为委员。特委随即召集了第一次区级以上的扩大会议，讨论和布置豫东南的工作。最后决定：第一，夏井区游击队、砖北区游击队、警卫排、特务三大队的大部分、跑反的群众，再扩充一部成分较好的小马子，合编组成三路游击师，共一百多人，由关楚印任师长兼政委；第二，从跑反的群众中收集过去在苏维埃工作过的同志，经过短期训练以后，分配到各地组织便衣队；第三，了解和寻找地下党的线索，使其和上级党经常不断地保持联系；第四，关于小马子的工作，通过了原来的六项条款，作为掌握工作的主要原则。此外，关于收买子弹、改变打粮的方法、经济问题以及群众工作等问题，特委扩大会议均作出了决定。敌人目前的部署，除原有的兵力外，一〇三师全部调驻经扶、麻城，估计雪化后敌人可能大举搜山。因此，凡是小山区或接近平原的地区，先把彩病号送到莲台山，找悬崖石洞隐蔽起来，留下少数的人照

顾他们。各地要准备粮食，加紧备战。

各地的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便衣队已经插到群众中。全区的工作在向前推进着。

敌人并没有等到春暖的季节，却在冰天雪地里就开始了搜山。敌人首先以县大队、地主富农装扮成猎人模样，假装打猎，进入山区秘密地“清剿”。当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将特务三大队调到东八区。而敌人一〇三师随后也跟来一个营，进驻四店、黄家湾、八里畈，在短时间内加修了许多碉堡，进一步插入我们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但是，我们的便衣队也同样插进了敌人的心脏。砖北区的便衣队就伸进白雀园镇，打死了独霸一方的吴保长和反动民团头子。同时，我们利用小马子在敌人内部收买了不少枪支子弹；还整编了一部分成分较好的小马子，充实了特务三大队。正由于我们武装部队的发展和便衣队的活跃，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除一〇三师、顾金之和易本印的反动武装外，又调来陈道荣驻扎白雀园。从此，敌人将所有的公路线都加修成碉堡线，加以山上山下山坡都修上了碉堡，把莲台山脉纷纷包围起来了。

积雪复盖着莲台山脉，到处是一座座洁白的、雄伟的峰峦。这时间，我们正转移到西高山的一条山沟里，行走在积雪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搭个棚子隐蔽休息。然而，我们失望了，大家只好从雪中向山坡上爬去。摔倒了，扶起来；掉进雪窟，再爬上来。终于，我们找到了一处宽阔而又较为平坦的山茶树林。茂密的山茶树枝叶，吃力地把雪堆支撑在半空中。树林里的积雪不多，可喜的是，地上

还长着一些茅草。大家于是高兴起来，动手清除了地上的雪，并且拔了许多有些干枯了的茅草。大家能够躺在软绵绵的茅草“床”上，真是难得啊！

睡梦中，似乎感到有人在走动。抬起身来，果然看见有一个人走进了茶树林。仔细看看，那人腰间扎着稻草，脚上包着稻草，正是东八区区委书记吴昌夫。别看他是个“稻草人”，精神却十分充沛，开口就说：

“何书记，这床铺可真不赖呀！”

我站起身来，看到四周的同志们睡得那样香酣，我轻声说道：

“走，到那边去谈；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我和吴昌夫来到茶树林的一块高地上。坐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远处的空地。吴昌夫说：

“敌人集中了经扶县的县大队和全县的民团，配合一〇三师的一个营，明天就要大力搜剿西高山。”接着，他叙述了敌人搜山的形式和修筑碉堡网的情况。

严重的日子又降临在我们头上。很简单，我们不能摆出一副挨打的架子，必须掌握主动，狠狠打击敌人。

“吴昌夫同志，我们一定要在西高山和七十二莲台山上稳稳地扎住根，向敌人展开无情的斗争。我代表特委决定：组织现有力量，主动地进行反雪地搜山。你负责通知，陈老鼠的便衣队负责警戒和牵制麻城的敌人；特务三大队急速隐蔽在这一条山岭上的茶树林里、石崖下面；在敌人的搜山圈里，所有的便衣队和群众都组织起来，也装扮成打猎的，隐蔽在山里，当敌人开始搜山时，找机会混进敌人的县大队

和民团中去。”

刚说了几句话，东方已在发亮，时间逼人。我总感到战斗的布置不够周全，似乎缺少点什么。我极力思索着，又想起了小马子，这才对吴昌夫说：

“还有，通知小马子头，敌人大搜山时，叫他们在外面专打碉堡。”

吴昌夫当即出外布置工作。随后，他和特务三大队队长陈奇营、政委黄石德同时来到茶树林里。

还没有等人们坐下，黄石德抢先说道：

“我们不但有比较充裕的子弹，还搞到了不少手榴弹。有这许多宝贝，要是真打，就要求让我们打个痛快！”

“我们也准备好啦，战斗开始后，化装成猎人的便衣队员和群众，身上插茶树枝为号。”吴昌夫紧接着说，“根据情报，敌人约有两千多人，天明后开始搜山。”

我分配任务说：“三大队对付一〇三师的一个营，天黑后插向杨畈桥和小马子接上头，在他们的掩护下，白天公开地拉着敌人向光山县平畈地区转移。在那一带活动中，注意对小马子的政策：打击匪头，争取中层和匪众。便衣队于战斗后转移出山区。”

同志们各回自己的岗位，分散隐蔽。

太阳刚一露头，敌人的搜山就开始了。敌人的前锋果然是一群打猎的老百姓，只是和真正的猎人不同，他们是一股股、一伙伙地往山上涌，进了山不去找野兽的踪迹，也不去扑洞口，只是拚命地瞎奔乱叫：“那里有野猪，快追！”“打兔子，兔子跑了！”……这种场面，与其说是“打猎”，倒不如

说是赶庙会更加名副其实。这时间，我们的便衣队员和群众出现了，混在那批“猎人”中间，而且比他们还要积极、热情，活蹦乱跳地到处“打野猪”、“赶兔子”，把敌人带过来，拖过去，弄得他们晕头晕脑，疲惫不堪。

太阳偏西的时候，一〇三师一个营从韩家老屋方向搜到离我们不远的一座山峰。县大队和民团也爬上八里畈前后的山峰山岭，其中一部分并且逐渐接近了三大队的隐蔽地。

搜山的敌人即将会合，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便衣队员和群众的身上，出现了茶树枝，他们朝空石洞口打了几枪，扭身把枪口对准了民团，高喊道：

“搜出来啦，跑啦！……”

刹时间，“猎人”和“猎人”，民团和民团不分头脑地打将起来。县大队和一〇三师不甘落后，赶上去大显身手。正当他们火拚得难分难解，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三大队直扑向一〇三师，手榴弹、机枪与盒子枪子弹劈头盖脑地压向敌人。一〇三师伤亡惨重，夹起尾巴就想逃命。三大队哪里容得他们，把敌人紧紧咬住，展开了肉搏战。这一场混战真打得天昏地暗，敌人的死尸纵横山头，有的地方白雪变成了红雪。最后只有少数敌人留得残命抱头鼠窜。

二九　三打夏家新寨

高敬亭离开鄂东后，带部队运动到河南沟洲，整理和布置了当地的游击战争，于一九三六年春返回鄂东。由于原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参谋长丁少青叛变投敌，带领敌人紧

紧追击红二十八军，同时残暴地破坏便衣队和我党的地方工作。为了保存红二十八军的武裝力量，高敬亭决定斜插过经扶到商城的封锁线或经扶到红安的封锁线，返回皖西。一连三个夜晚，都是高敬亭和我双方约定地点和时间通过封锁线，然而三次都没有达到目的。经扶这条封锁线是一〇三师看守的，极为严密，所有的路口都安了卡子，设下埋伏，还埋了许多地雷、炸弹，因此很难通过。

不管怎么样，为了红二十八军的生存，高敬亭还是决定要通过这条封锁线，并派专人通知我说，他带领手枪团，明天白天经过烟家山封家树坳的封锁线，进到豫东南。兵力的部署情况是：黄陂老带领一路游击师到经扶县城的南边，一方面打南边来的援兵，一方面拉住经扶县城的敌人；李又厚的便衣队卡住经扶县城的北门；黄明富的便衣队卡住丁李家湾的要口；袁爱的便衣队负责给高敬亭带路和打掩护；封家树坳的接应，由我负责组织力量。红二十八军通过封锁线的时间是明日正午。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我带领了三个完整的便衣队和特务三大队，隐蔽着插进烟家山的山口。特务三大队已经全部化装成农民，一部分伸向田间，和农民混在一起种田。我们估计到敌人为了堵击高敬亭，必然设有埋伏，我命令特务三大队的另一部分战士，绕到一条山沟里，隐蔽在敌人埋伏地的背后。

我带领便衣队的同志，渐渐伸向被敌人严密监视着的封家树坳坳口附近。敌人的目的不是打我们，而是单打高敬亭；敌人也知道我们是来接高敬亭的，因此虽然发现了我

们，装做没有看见，反而往后退缩了一下。为了完成接应的任务，敌人不动手，我们自然也不去多管他。

天朗气清，万里无云。一切工作布置就绪，恰是正午十二点钟。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坳口对面。不一会，发现了手枪团的同志们在草丛中爬行，逐渐逼近了坳口。

手枪团的同志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爬过了坳口。他们的动作，我都清晰地看在眼里，而四处埋伏着的敌人，当然不是瞎子，不会看不到的。但是，敌人为何迟迟不动手？莫非看到我们兵多，有些畏惧了？难道就这样看着手枪团顺利通过？不，这绝对不可能，敌人的目的必然是想捉拿高敬亭。

果然不错。手枪团过了大部分，高敬亭乘的黑布抬子夹在战士们中间，刚接近坳口，敌人就发了疯，从四面拚命攻击坳口。敌人的伏兵一露面，我带领的便衣队和隐蔽在敌人背后的三大队一部分战士，立刻动手，向敌人两面夹击。加以手枪团的迎面阻击，激烈的战斗顿时全面展开了。

敌人别动队的特务兵，虽然拿着最新式的武器，然而都是一些怕死鬼。他们一见面对面地火拚，又是两头挨打，立刻着了慌，畏畏缩缩地退到一个半山坡上，一股股敌人脱了群，不料又碰上我们散伏在田间的三大队部分战士，卡断了他们的退路。

三大队盯住敌人，把他们一股股地赶开坳口。我带领便衣队立刻占领了坳口要地。当我正在布置岗哨时，袁爱的五人便衣队毫无差错地把军政委高敬亭送到了坳口上。

枪声在稀落下去。黄石德兴高采烈地跑来了。

“报告，缴获三十六支德国快慢机和很多手榴弹、子弹，俘虏敌人二十几名。”

看到打了胜仗，高敬亭高兴地命令道：

“暂时叫部队休息做饭吃。”

部队随即转移到东八区的庄家湾。

我手拿着一把新式的盒子枪，这家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当然不会用它，怎么办呢？我走到院子中央，坐在一条凳子上，手里仍在拨弄着它，瞄来瞄去，使了好大的劲，才把机件卸了下来，可是无论怎样也按不上去了，又不忍心损坏一支宝贵的武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手枪团一队副队长殷绍礼说：

“你用说服的办法，找个俘虏来拆卸枪。”

殷绍礼带着一个小伙子走进来。他很有礼貌地站在一旁，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卸、怎样上，和它的功能、用途，还告诉我们说：

“这是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新装备起来的一〇三师别动队的枪，共有一百多支。这次打埋伏，是由贵军的长官丁少青先生带路……”

同志们一听到这个叛徒的名字，就气得咬牙咧嘴。

刚吃完饭，一〇三师追来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化装成一〇三师的别动队，进行半公开的转移。高敬亭对我说：

“天已黑啦，我去打韩家老屋的炮楼，你去打八里畈。”

我们到达八里畈，利用伪装战术叫开炮楼的大门，在新式武器的助威下，很快地解决了战斗，然后又打掉黄家湾等

炮楼，午夜十二点钟，在西高山与高敬亭的手枪团会合后，又共同连续打下一片炮楼。拂晓时，情报员报告说：一〇三师又追来啦！这时，高敬亭决定过麻城的封锁线，转移到皖西去，命令我留在原地，把敌人牵制到其他方向去。

一清早，西高山上炮声四起。我们在初升的阳光下，杀开一条血路，边打边退，穿越青山、丘陵，天黑时走了七十多里路，到达商城的西余集。这时，敌人追赶的劲头不那么大了，敌人的枪声也渐渐地和我们拉长了距离，我们就趁机进入便衣队的游击根据地隐蔽休息。

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我们虽也有少数伤亡，但却换来了较大的胜利，工作有了发展，地区也有了扩大。但是无人区的荒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莲台山区仍然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不仅买不到一点必需品，连个剃头的工人都找不到。

光山与商城之间有一片寨子，其中有一个夏家新寨，寨主黄子宪带领民团把守这个要口，他规定：凡有人到山区种田时，必先到他的寨子里签到请保，否则一律不准进山，即使在山里已经种下了田，也不得再进山区，违者就杀头。堵塞莲台山的要口不只是这一个，在经扶和光山之间的一片寨子亦是如此。因此，便衣队虽然在白区动员了一部分群众进到无人区种田，由于怕出事，怕杀头，又都返回了白区，使工作遭到严重的挫折。特委因此开会决定：组织力量打开夏家新寨。

我们组织了便衣队和特务三大队，计划用攻城的办法打开寨子。我们在黑夜里摸到寨子附近，刚一发出攻寨的

火光信号，不料，敌人所有的寨子里刹时间都燃起了无数火把，把大地照耀得通红明亮。这时才发觉，我们的信号和敌人的信号恰巧一致；我们的攻击信号，正是敌人的增援信号。我们被迫把部队抽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第一次攻打夏家新寨失败了，敌人更加猖狂，黄子宪夸下海口说：共产党如能无损地进到寨子里。他就降服；如若不然，休想在他管辖的地区内扎根。敌人并且将寨子围墙统加高了二尺多，围子四周的树木全都砍倒，变成光秃秃的开阔地；夏家新寨座落在独山包上，踞高临下，形势就更加险恶了。

但是，为了巩固豫东南根据地，执行特委决议，我重新组织了便衣队和特务三大队，决定再次攻打夏家新寨。

这一夜没有月亮，淡薄的浮云伴着繁星。我们悄悄地运动到寨子附近。再往前，就没有一点可以隐蔽的地方。寨墙高大，很难攀登上去。只好临时去找梯子。半个夜晚，却只找到三、五个梯子；更严重的是，当我们冲到寨墙下边，梯子往上一搭，太低了，够不着墙头。尽管如此，英勇的三大队战士和便衣队员仍然向上攻击，黄石德、陈奇营、余明等同志在寨墙上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又狡猾，又顽固，在寨墙上又布上一道“人墙”，民团和强迫来的群众挨着个站成一排，手拿枪、刀、矛……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后边的人上不去。上去了的同志又寡不敌众，又不能对着群众开枪。这时，黄石德右手的无名指被敌人的刀砍掉半截，被推跌了下来；陈奇营的胳膊也负了刀伤，滚落梯下。有的战士踩上了敌人埋的土造地雷和小炸弹……眼看着同志们

在浴血苦战，有的负伤，有的倒下，我的心有如刀绞，热血直往上冲，我用极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咬牙下令：

“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下秧的季节即将到来。群众仍然不得出入要口，再加上两次攻寨遭到失败，同志们非常痛心。把彩号安置好以后，我带上三大队，经过几天几夜的转战，在白雀园附近与三路游击师汇合。这时游击师已有二百多人。师长罗厚福，政委关楚印和我都认为：莲台山的几个要口不仅使我们在行动上受到很大阻碍，而且在春夏的季节里，使我们不能把群众安插到无人区种田，到冬季，我们就会失掉群众，形成孤立的状态，加以无衣无食，一切就会更加困难，为此必须打开一个缺口，首先打掉有代表性的夏家新寨。汲取两次失败的经验，从外面硬攻是不行了，只有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才能成功。我们决定把部队全部化装成种田的农民，特务三大队以登记、签到为名，混进寨子里；我和游击师一起，分散隐蔽在田间。

这一天，正碰上倾盆大雨。中午前，三大队的同志们打扮成整田下秧的模样，有的扛着秧架子，有的牵着大水牛；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出现在夏家新寨附近。大个子黄石德虽然在二打夏家新寨时负了伤，仍然不愿意放弃参加这次战斗。当他牵着大水牛，从我隐身的地方走过时，他没有讲话，只是对我笑了笑，而后大摇大摆地向寨门走去。

化了装的三大队跟当地的群众一起，先后混进去几十个人。寨子里立刻忙乱起来，有的在登记，有的在接受检查，也有的蹲在屋檐下、大门里避雨。一点多钟，雨停了，可

能是因为三大队的几个同志在登记时口音不对，被敌人发觉了。黄石德见机挺身而出，英勇地指挥几十个战士同敌人展开火拚。听到枪声，我和埋伏在田野间的游击师随即向寨子攻去。敌人意外地受到内外夹击，寨子里的炮楼又被我们燃起了冲天大火，立刻成了无头苍蝇，随着混乱的群众，一股股、一群群地跑出来，向其他的寨子逃命而去。便衣队也和他们混在一起，跑进别的寨子，就在敌人喘息未定的时候，返身又打了个里应外合，这样，我们乘胜打下两个寨子。

两个寨子里都是黑烟滚滚，火舌伸展。雨后泞滑的田地里，到处是奔跑着的民团、地主恶霸和他们的家小。我们的战士们大显身手，就象捉小鸡一样，在追赶和捉拿他们。激烈的枪声和人们的吼叫声中，黄石德不知怎么竟收罗了一串衣着阔绰的富家老爷，拉到我身边说：

“这些都是寨子里的统治者，杀不杀？”

老家伙们一听到“杀不杀”，顿时都“噗”的一声跪在地上，抖成一团，七嘴八舌地哀告求饶。

……敌人的“围剿”，被我们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抓住这个胜利的时刻，我们很快动员了一批群众迁入无人区扎根落户，进行生产。豫东南的工作在大大地向前推动着。

便衣队的发展，游击师的扩大，使敌人惊慌失措。敌河南省潢川专署的燕专员匆忙召集县以上的官儿开会，严密布置“清剿”。敌人以一〇三师为“清剿”的机动部队，易本印、顾金之、陈道荣等土匪、民团为山区的“搜剿”部队，外加县大队、区中队、红黄学道徒等等，总之，敌人是使出了老本

来全力对付我们了。

雨后的清晨，我信步走出茶林，刚来到一个山坡上，吴昌夫赶来了，说：

“侦察员回来了，说敌人动员了全部力量，可能先搜莲台山。”

先搜莲台山，这是可以断定的，因为敌人知道莲台山是我们的心脏地区。但是，刚进山的群众都在种田下秧，山上的看守所、彩病号向哪里转移呢？不行，时间不允许，我们不能轻易地让敌人占去这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部队决定到山外去牵制敌人。一夜间，我们在路口、山沟里、山坡上埋下了炸弹；还准备了一些炮桶来助威。炸弹网分成三条总导火线，由刘海山等同志负责掌握。

早晨，易本印的全部武装配合一〇三师的一个营，再加上县区的部队和红黄学道徒，约莫几千人，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向莲台山而来。九点多钟，敌人仗着人多，气势汹汹，大叫大喊地开始爬山。旧历四、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到了中午，敌人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疲劳无力，只顾喘气流汗，加上饥饿难忍，尽管长官们在他们屁股后边用枪督促，他们却象老水牛一样，吃力地向山上蠕动。我们在山上看守导火线的同志们，沉着地观察敌人的行动。刘海山清楚地看到，敌人搜山的前锋是红黄学道徒、地主粕富农，中间是易本印的部队，末尾才是一〇三师。很显然，想炸一〇三师是困难的。

到时候啦。刘海山一扯导火线，大山立刻摇撼起来，加以炮桶里的竹炮，震荡着山谷，有如千军万马在厮杀混战。

炸弹的爆炸声中，敌人成群论堆地倒了下去。其他的敌人，不管是悬岩还是高山，往下就跳就滚。易本印被打痛了，连忙窜回老窠。

敌人不甘心失败，复命顾金之组织兵力“搜剿”西高山。顾金之先到商城、金寨等县强迫红军家属集中在商城的班竹园一带，然后由军队押着他们进山，装做红黄学道徒走在最前边，如果遇到埋伏，就先炸死红军家属，敌人这个阴险恶毒的计划，被我们揭穿了。我们立即把埋藏在地下的炸弹收起来，将所有人员转移到其他山区。敌人用尽心计，整整搜了三天三夜，在西高山上却没有见到一个共产党人的影子。

这一天，通讯员跑到山上向我报告：

“从外地来了一股大红军，领头的是一个大麻子，说是来接你的。”

一听“大麻子”三个字，我就估计到他一定是英勇善战、敌人最怕的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同志。

我急忙奔下山去。站在我面前的那位战场上的猛虎，却原来是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说话轻声细气的，和我的想象恰恰相反。他先问了我的姓名，然后传达了鄂豫皖省委书记、红二十八军军长兼政委高敬亭的命令：调我到皖西北任道委书记兼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兼政委。豫东南特委书记由张家胜同志接替。

三〇　调至红二十八军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随特务营从经扶县东八区札家湾

的大山沟出发，在国民党十一路兵团的堵击和二十五路兵团的追击下，我们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在商城青区辛店与高敬亭汇合。我见了高敬亭，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红二十八军的一个营就插进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后边的追兵，和我们身后的追兵相继赶上来了。此刻，辛店四周都是激烈的枪声。

高敬亭和我握了握手，回头先下了一道命令：

“这里的地势很好，各部队分一半兵力堵击敌人，剩下的就地休息。”

我们走进一家店铺里，还没有坐下来，高敬亭首先问道：

“你对调令有意见吗？”

看到我表示没有意见，他接着又说：

“没有意见，现在就上任。”

“我离开上级半年啦，把豫东南的工作情况汇报一下吧？”

“不用汇报了。你听，枪声更近啦，连饭都吃不成就得转移。”说着，他站起身来，急步走向店子头。

敌人的小炮、重机枪不时向坳口打来。敌人的火力很强，我军不能在辛店久停。高敬亭立即下令：

“马上转移。手枪团负责打掩护；一营的一、二连由杨克志带领，跑步插向麻城，去打库天河，一定要想办法带走敌人。其他各部成散兵线打出去，把敌人带走以后，到梅头河找我们。”

各部队分头执行命令去了。高敬亭和我来到辛店旁的

山脚下，在一块为茂密的树木掩遮的悬岩下面隐蔽起来，四周由军部的交通队站哨。突然，辛店四周的枪声十分紧密，一片沸腾，不久，枪声在逐渐分散、转移，以至消失。

大地恢复了平静。高敬亭和我走出隐蔽地，带着交通队和手枪团的一部分战士，安全地渡过河沟，翻越几架山，到达平头山休息。这时，高敬亭为我详细地叙述了方永乐同志牺牲的经过——

原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兼政委方永乐同志，带领着手枪团在麻城龟山一带活动。一天，在黄岗庙西边的山峰上，与追击的敌人一〇三师接上了火。我军虽然占据着高塞要峰，终因兵力单薄，在敌人的围击中退出主峰，向深山里转移。狡猾的敌人紧紧咬住我们，死不松口。方永乐发觉处境险恶，大有全军覆灭的可能，他立即果断地下令手枪团抢过一个山口，要部队急速转移出去。为了使全军安全突围，他亲自带领少数战士留在最后边打掩护。敌人集中火力，猛烈地向山口硬攻上来，方永乐端着马步枪，沉着地射击敌人，当敌人逼近了，他就掷出几颗手榴弹，敌人稍一后退，他的马步枪子弹立刻跟上去。敌人倒下一层，又涌上来一层；不久，敌人从左右两侧山头上包抄过来了。方永乐和同志们仍然沉着应战，他的一双手同时打击敌人：他一手打枪，换子弹时就用双膝帮忙；另一只手拿手榴弹，用牙咬开盖子，掷向敌人丛中。敌人被打得胆战心惊，到处是他们的尸首和鲜血。正在这时，永乐同志负了重伤。战士们奋勇抢救，突出了重围。然而，抬下战场不久，十八岁的永乐同志便为党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高敬亭说到这里，忍不住痛哭起来。我感到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在向上冲荡。红二十八军的处境，确实极端困难。丁少青叛变投敌以后，敌人用几个兵团的兵力和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对付红二十八军，并且组织了一整套的别动大队专门刺探我方情报、破坏地下党和便衣队。红二十八军因此遭到很大损失，现在的部队仅有手枪团、一营和特务营；皖西北道委书记徐诚基死后，各县委和便衣队有半年多没有和高敬亭联系，恐怕大部分垮了……

高敬亭慢慢抬起沉重的头，看着我说：

“我和你分别后，又接到红二十五军的指示，叫我们一定继续坚持鄂豫皖的革命斗争，没有指示不准退出。我们要重新组织省委，研究解决部队的补充和地方工作。不然的话，到了冬季，无人区里无人无粮，到那时我们就是离开了水的鱼，必趋灭亡。我身体不好，长年打脾寒（疟疾），从今天起，你不但要负责八个二师的工作，还要把皖西北道委的担子担起来。”

傍晚，部队开始出发。由于休息了一整天，同志们的精神很饱满，五十里路程，在九点钟就到达了目的地——梅头河。在辛店打出去的部队，拖着敌人跑，有的走了一百六、七十里路，近的也走了百余里，甩掉敌人，在黎明前先后来到梅头河。

高敬亭决定利用刚甩脱敌人的空隙，召开短时间的军人大会。

集合的部队还没有到齐，高敬亭本人刚走到广场边上，传令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迎面向军政委报告：

“从金寨县方向来了一股敌人……”

敌人连个会都不让我们开，高敬亭有些生气地说：

“会，一定要开。一队顶上去，抓个俘虏来!”

一队副队长殷绍礼带领战士跑步离开会场。

刚准备宣布开会，枪声不但紧迫，而且更加接近我们，这真给高敬亭火上添油，他大声命令：

“杨克志、曹云福带领部队立刻进入战斗……”

说话之间，殷绍礼押着一个俘虏走来，向高敬亭报告说：

“是十一路，共四个营。”

“十一路，四个营。”高敬亭重复着，转身对着我：“何耀榜同志，带队去歼灭他一个营。”

我带着手枪团二队和林维先离开会场，抬脚走出不几步，迎头碰上了一营政委曹云福。

“前面打的怎样？”我急问。

“一、二连的制高点阵地失掉啦。”

“为什么！？”我的声调有些严厉。

“部队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实在太疲劳了；敌人又是一面打枪迂回，一面偷袭上来的。”曹云福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

两个要地同时被敌人占领，我军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我命令说：

“林维先带特务营压下去，手枪团一队随我作预备队，二队去掩护军政委。”

一营和特务营联合攻下了制高点。林维先一马当先，

率领战士们向败退的敌人冲去，不等敌人有立足的机会，便用锋利的刺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不到一小时，战斗结束。林维先跑来报告：

“敌人一个营被歼灭，其他三个营正在逃跑，请上级决定是不是追击？”

“不追。”我随又问道：“有彩号吗？缴获多少？”

“我方有三个轻彩号。俘虏敌人七十余人，缴获两挺机枪、一部分长枪和子弹；战场正在打扫。”

“敌人吃了苦头，不会马上就来的。部队很疲劳，各回原地休息做饭吃……”

我正在交代任务的时候，高敬亭走过来问：

“何政委，打得怎么样？”

我把林维先的报告复述了一遍。

“哪个营打的？”

“特务营。”

“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开会和等张三铁匠、石裕田两个县委书记来开会，今天打了一天，还不知他们能不能出来哪。”高敬亭说，“这样吧，确定在这一带拉锯几天，叫部队洗洗脚休息休息。”

当夜我们转到黄毛山休息。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三队长顾士宾派人来报告说：

“敌人二十五路一个团、十一路两个团已开始向我驻地运动。”

高敬亭对我说：“这样拖下去我们的会议也开不成，地方工作也不能布置。还是把部队分散，叫手枪团团长带一

队和特务营出去，把林维先留下来跟你。”说着，喊来了手枪团团长詹化雨，对他说：“你带一队首先和敌人二十五路的一个团打响，特务营就乘机插过去，然后到黄冈，把二十五路拖回原地。两个月后，到岳西县的鹞落坪跟我们汇合，如果不能达到目的，第二个集合点是蕲春的将军山，第三个集合点是英山县的阴山尖。”

下午两点钟，一队和敌人打响，把二十五路拖走了。

秋风吹扫着落叶遍地纷飞，夜幕渐渐地笼罩了山头。部队正在休息，有的还在吃饭。高敬亭对我说：

“一营还是要分散。政治部跟他们行动，最好把敌人十一路也拖走。另外，你要想办法找到两个县委书记。我要休息了，详细的由你去布置。”

军政治部主任吴先元、一营营长杨克志、政委曹云福都已来到了，我对他们说：我们到这一带来是为了布置地方工作，但是来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能和地方上的同志联系上，却把各路的敌人都带来啦。因此，军政委决定部队仍然分散活动。你们下半夜准备出发，到商城附近和商（城）陆（安）公路等地活动，地下党如找你们接头时，他们可以供给很多情报，你们给他们一部分钱，叫他们派个负责同志在一个月后到鹞落坪和我接头。你们进入便衣队的根据地时，要首先把敌人抛掉，而后才能进入根据地休息；必要时，可用伪装偷营等办法打掉移民点，摧毁炮楼，给便衣队和群众解围。另外要避免和国民党的正规军作战，多打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彩号一定要安插和照顾。打土豪时，所得的财产一定要分给穷人，遇到红军家属时，一定要照顾和给他们

一部分钱……

我布置完工作，转到二队时，同志们都在睡觉。二队长于启龙和林维先看到我来了，齐声问道：

“何政委还没有睡觉？”

“没有。林营长，现在特务营向南打，一营向北打，估计可能把敌人带走，一队还要回来，注意联系。这里还有二、三队，如果发现敌情，由你负责指挥。”

午夜两点钟，传令兵进来报告：

“一营在集合，何政委还有什么指示？”

我轻轻地喊醒高敬亭。他起来坐在抬子上问：

“你有什么事情？”

“军政委的命令已完成，一营在集合。”

接着，我把工作的布置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刚说完，曹云福来到了，把我布置的又重复了一遍。高敬亭听到两个人的汇报是一致的，就对曹云福说：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啦，何政委说过啦，他的布置和我一样，你们要好好执行。为了保密，从今天起你们再不要喊何政委，他母亲姓赵，以后你们就喊他老赵。记得吗？”

曹云福回答：“是，记住了。”

高敬亭又对我说：“部队出发，你去动员一下吧。”

我和曹云福向一营的集合地走去。

三一　大反“移民”战

一天，我们行动到东界岭，发现一个秘密哨，把他捉来了，不管怎样问，总不肯说出他是哪一个便衣队。我向他说

明我们是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他这才说他是赤南县委的游击队。我们知道张三铁匠来了，高敬亭就在山头上喊：

“铁匠，铁匠，张三铁匠！”

张三铁匠从树棵子里慢慢走出来，未曾开口，就对高敬亭大哭一场。过了一会儿，他擦着眼泪说：

“整个赤南县的工作都被敌人破坏啦。特别是丁少青叛变后，基本群众被敌人押的押，杀的杀，剩下的群众也都被圈在移民点里。山区就更加困难了，没有一点粮食，这三个多月我们都是吃野菜野果，还饿死了十几个同志。你们在这一带打了很长时间，我们也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出来。”

“张书记，”我问道，“这一带在移民前是否有准备工作，移民后你们和移民点里的基本群众有联系吗？”

“都没有。”

高敬亭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怎么办？你能不能提出具体的意见呢？”

我回答说：“由于在移民前没有做准备工作，移民后，便衣队的工作就更加困难。现在想马上插下去也没有办法，只有叫张书记随我们暂时行动几天，把这一带的情况了解一下再做决定。”

过了几天，高敬亭又对我说：

“这一带地区是个交通要道，非常重要，也是老苏区。你们原来在鄂东不是有反‘移民’的经验吗？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运用一下？”

我告诉他说，主力部队行动到一个地区，是应当帮助便衣队和地方上的组织解围。但是，根据张书记的汇报，和这

几天了解的情况，知道敌人对这一带进行的移民活动，使便衣队遭受很大损失，同时对群众的摧残也非常严重。可以打一下反“移民”战。不过，鄂东是在移民前就把党团组织、基本群众和不公开的便衣队都插进去了的。最后反“移民”要是单纯靠部队打，是没有这样大的力量的，主要是移民点里群众暴动配合部队里应外合，才能全部打掉移民点。但这里移民点里我们没有事先组织插进去，情况不同，不能套用鄂东的经验。最后，我提出具体意见说：

“军政委确定打，可以利用伪装先打大的移民点，把粮食等等分给群众，扩大宣传，使群众知道打移民点是为了群众的利益，然后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

听了我的意见，高敬亭说：

“好，打吧。详细的由你去布置。”

“依张书记所谈，他们的根据地是金岗台、豹子岩。而四道河一带的移民点较多，可以先打四道河、封家树店的移民点。”

征得高敬亭同意后，我对殷绍礼、于启龙、顾士宾说：

“手枪团集合，由张书记带路立即出发。一队担任前卫，如果吴家大店的民团出来，你们跑步抢过去，不要管他，由二队揍掉他。三队随我们为预备队。”

经过吴家大店时，炮楼上的民团看到我们人多，既没有打枪，也没有出来追，装做不知道。我们四十里路的行军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初冬的夜晚，山沟里的小村子特别清静。几天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很疲惫，这时，已经分散休息了。我

考虑到：打，这里的地形和敌人的分布都不够熟悉，很需要找几个同志共同研究。我迎着山沟里吹来的冷风，找到了特务营营长林维先、手枪团一队副队长殷绍礼，二队长于启龙，三队长顾士宾和张三铁匠。根据张三铁匠所谈的情况，知道封家树店炮楼上住着一个联保主任，有几十条枪；赵家河子住着十一路的一个团，经常有一个营的兵力放在公路上，群众都集合在四道河子，由乡警队看守。张三铁匠提议先打封家树店的联保主任，但我原来的计划是先打四道河子。我说：

“张书记，你这几天很疲劳，先去休息吧。明天打时再请你提意见。”

张三铁匠走后，我对同志们说：

“这样决定：一、二队把一部分战士伪装成一〇三师，明天上午九点钟打四道河子，用伪装混进去，捉住头子，掌握住电话，立刻以乡警队的名义打电话给赵家河子的驻军，就说是和一〇三师发生了误会。这样，他们不但不会来增援，并且会打电话给商城、金寨的驻军，说明是误会。即使县城的驻军赶来，三十里路的行军也得在傍晚时分才能到达。打下四道河子以后，不拆毁围子，注意纪律，看守住大门，由军政委和张书记来布置群众工作。封家树店的炮楼地势险要，硬打会有伤亡，可以派少数人把它封锁起来。等打下了四道河子，我再设法和军政委商量，继续打赵家河子。这两处的战斗结束后，联保主任自有办法处理。由交通队负责截断电话线。”

上午八点钟，林维先和一队长邓少东、二队长于启龙带

领着化了装的手枪团一、二队的战士们，轻捷地走出隐蔽地，上了公路，便象一〇三师的别动队一样，大摇大摆地奔往四道河子。

移民点的围子是用木桩扎成的。大门前，两名乡警队的哨兵看到来人气势汹汹，便小心翼翼地问：

“贵军是哪部分？”

“一〇三师的别动队。”于启龙坦然回答着，“乡警队长在什么地方？”

“我带你们去。”一个哨兵巴结着说。

于启龙向身后的总指挥林维先打了个招呼，转身随着哨兵急步走去。闯进一间宽大的厅屋，厉声喝问面前的大胖子：

“你是乡警队长？”

看着八面威风的于启龙，乡警队长果然以为是正规军的别动队来了，慌忙点头哈腰说：

“是，老总，贵军辛苦了。”

“什么辛苦不辛苦！我们是来追共匪的，这附近还有友军吗？”于启龙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

本来见了正规军就有些害怕，再加上正规军过来追“共匪”，乡警队没有出兵增援，乡警队长真是胆战心跳，他急忙摆出一副笑脸，讨好地献烟递茶，一边回答说：

“有，有，赵家河子驻着十一路一个团部，长官都不在，只有一个营的守兵。这一条封锁线上的碉堡，都是十一路的军队看守。”

“他妈的，我们追了一夜，你们这么多军队为什么不接应！？”于启龙破口大骂，“快，乡警队全部集合，把碉堡让给我们休息！”

“是，是。”乡警队长哪敢违抗，扭身叫人吹哨子集合。

这时，林维先已带领同志们来到围子里，分别接收炮楼，把集合起来的乡警队看住了。然后，于启龙逼着乡警队长给赵家河子敌人的营长打电话，就说一〇三师追击“共匪”的别动队要到赵家河子休息。

中午时，高敬亭从隐蔽地走出来问道：

“打的怎样啦？”

我回答说：“已经用伪装的办法打四道河子去了。封家树店的炮楼上有二十几条枪，地势险要，如果打的话，要做一番布置，不然会有很大伤亡。我准备派三队两个班把它封锁起来。”

张三铁匠说：“炮楼里住着联保主任，还是先打掉好。”

高敬亭支持道：“打吧，打吧，由三队打。”

我对三队长顾士宾说：“你马上派两个班把封家树店的炮楼封锁起来，如果联保主任出来就活捉他，不出来不要硬攻。”

这时，传令兵跑来报告：

“我军全部占领四道河子，部队等待命令。”

我接着对高敬亭说：“现在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的伪装，我的意见是继续打下赵家河子，请下决心。”

“好，打下赵家河子比封家树店的意义大，封家树店可

以暂时不打，或者留少数人看守。已下了决心，就按你原来的计划打吧！”

我们一同来到四道河子。我下达命令说：

“林维先带一、二队继续运动到赵家河子附近，我也去。三队埋伏在后山岭。如果金寨的敌人出来，把封家树店的两个班抽回来堵击敌人。交通队把所有的炮楼都接替下来。”我又对张三铁匠说：“四道河子的群众全部没有走，你除了作群众工作外，最好能给我们准备二十个抬子。俘虏和缴获的枪支交给你们。群众暂时不要放走，等战斗结束了再说。”

“后面的事情不用你作布置，由我负责。”高敬亭说道，“你们都到前面去。”

于启龙带领着十八个伪装成敌人的战士，公开地走出四道河子。我和其他的部队隐蔽着运动出去。爬上一座山头，我从望远镜中看到，赵家河子炮楼上的敌人进进出出，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玩耍打闹，街旁的店铺还在做生意。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敌人丝毫没有发觉我们的伪装。于启龙和他的队伍，已经沿着河边的大路接近了围圈门。

敌人守门的哨兵，许是从电话里得知一〇三师的别动队要来赵家河子休息，见了于启龙他们，只是忙着打招呼，没有过细的盘问。于启龙照直进了镇子的中心，上了一座大炮楼，敌人的营长忙出来迎接。

“友军辛苦啦！”

于启龙带理不理地进了屋子，摆起官架子大骂：

“共军在这一带活动了十几天，今天中午占领了四道河

子，你们动都不动！……”

说着，就打了敌营长两个耳光子。不等敌营长开口，我们的几个战士一拥而上，抓住他就扒衣裳；于启龙穿上了敌人营长的衣服。

这时，我和部队已隐蔽着接近围子。看到于启龙进了总炮楼，伪装已经成功，急令：

“部队跑步进去，抢占各炮楼。”

镇子里立刻展开了激战。不一会儿，一股股、一串串的俘虏被押到了街中心。

我走进总炮楼，于启龙双脚一碰，挺胸喊道：“报告！敬礼！请坐！”接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哈哈地笑起来。看着他那身打扮和模样，我不由得笑了。

打掉这两个移民点，意义再大也解不开山区的围。要想解放群众，给山区打开局面，就必须把这一条封锁线摧毁掉！我随即下命令：

“于启龙，你带二队向熊家河打去。队伍分作前后两股，前面的伪装是十一路的逃兵，后面装作追击的样子；前面喊开一个炮楼，后面就烧掉一个炮楼。中途如果遇到敌人，不许回头，我们下半夜就跟上去。林维先带一队用同样的办法向商城打去，但不要进商城，晚八点返回来。”

林维先和邓少东带上队伍出发了。于启龙转身向自己部队的集合场走去，一边解开衣服扣子，把头上戴着的敌营长的帽子扯得歪歪斜斜。他用手指点着，从队伍中选出几名战士，对他们说：

“你们几个都学我一样，跑起来还得弯着点腰；装嘛，就

要装得象。知道吗？”

战士们齐声应是。

“你们到前面去叫炮楼，我就来。”于启龙回头又对其余的战士们说：“今天咱们玩个大把戏，我们在前面叫开一个炮楼，你们在后面就烧掉它。由副队长负责，马上出发。”

于启龙和几个“逃兵”，果然一派狼狈象，跌跌趴趴地奔向炮楼。跑在前面的几个人，气喘吁吁地高声大喊：

“快开门呀，共产党追来啦！”

十一路看守炮楼的士兵，早就在注视着赵家河子方向的大路。看到跑来几个“逃兵”，急忙问：

“营长来了没有？”

“营长在后边……”

“不行，营长不来不开门。”

说话间，于启龙踉踉跄跄地来到了，一见炮楼没有开门，立刻怒火万丈。

“你们他妈的不出来增援，连炮楼门都不给老子开！……”

“是，营长，就开门。”

炮楼上的敌人哨兵赶下来开大门。于启龙毫不含糊，还在认真地骂着：

“快点，当心枪毙你们这些兔崽子！”

大门一开，于启龙迎面闯上去，张开有力的双臂，两手卡住了敌人哨兵的脖子，往半空中一提溜，就象小鸡似地被捆了起来。战士们拥进炮楼，不容分说，把十几个敌人全部缴了械。

副队长率领的队伍及时赶来。于启龙把俘虏和炮楼交给他们，带领原班人马向熊家河方向奔去。不一会儿，身后的炮楼已陷入冲天大火。

下午五点钟，高敬亭和张三铁匠来到赵家河子。

我把战斗的经过和全部部署向高敬亭作了报告，随后说：

“赵家河子的炮楼都烧掉了。豪绅地主、保甲长全押在一个院子里。我的意见是叫张书记布置群众工作，最好能认出最反动的豪绅地主、保甲长和叛徒，当场镇压一两个。不要都杀了，可以跟他们讲条件，这对以后的反移民和老根据地的工作都有帮助。”

高敬亭说道：“这里是老苏区，可以运用一些鄂东的工作经验，你去帮助他们布置吧！”

我对张三铁匠说：“你去看看那个院子里的人，哪个最坏；再找几个红军家属来了解一下情况。”又对传令兵说：“你去四道河子，叫那里的群众每家出一个人到这里来；跟他们讲清楚：我们保全他们的性命。”

在繁密的星空下，两千多群众集合在广场上。

“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红军二十八军。我们知道，这里是老苏区，从四次‘围剿’起，你们受了敌人很多摧残和压迫，红军没有忘掉年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们时刻在想念着你们。红二十八军是在鄂豫皖生长起来的，他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同甘苦、共呼吸！……今天，我们打下了四道河子和赵家河子，豪绅地主、保甲长都押在一个院子里，你

们要看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最反动、最坏，就把他揪出来！现在，红军家属到屋里去，苏维埃时代的贫农团站到一边。”

我随着红军家属走进屋里，对警卫员胡山修说：

“你把银洋拿出来，每个家属发五块。”

家属们回到集合场以后，我要群众把棚子里的东西都搬出来，家近的最好回家，家远的先搬到街上；并且要交通队把地主豪绅的东西分给穷苦的群众。

这时，从红军家属的人群中走出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我说：

“有两个叛徒最坏，你们不捉他，我们什么东西都不敢要。”

我当即叫张三铁匠带便衣队去抓两个叛徒，拉到这里来枪毙。

赵家河子热火朝天，到处喜气洋溢，人们在忙着搬东西。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觉得四肢酸软，不知为什么心里直发慌。胡山修走到我跟前说：

“军政委说，你一天没有吃饭，他那里有稀饭，叫你回去吃。”

吃饭时，林维先率部返回来了。他报告说：

“任务完成啦，摧毁炮楼二十七个，打毁枪支二百余条。商城、金寨方向的岗哨已经布置好，请下令出发还是休息。”

“你们先休息吃饭。这里的地方工作还没有布置好，下两点钟才能出发。”

饭后，我要张三铁匠集合了便衣队，共同研究和布置了地方工作。

下一点，部队集合了。我喊醒高敬亭，一同来到广场，立即向熊家河出发。

部队踩着白霜，追随着于启龙部扫开的道路，迅速前进。黎明时，只见国民党十一路兵团的士兵散落在道路两旁，我耽心伪装战术和我们的兵力失密，命令三队长顾士宾设法把散兵动员到山下去。

“就说我们后边有大红军，要是发生误会，把他们打死就划不来了。”

中午，国民党二十五路兵团可能得知我军攻下赵家河子，发兵急追上来，与我军后尾的一队接了火。一队长邓少东带领四个班轮换着堵击敌人。

忽然，左后侧又发现了二十五路的一股追兵。前面的敌人没有消灭，后面有两路追击，为避免部队受到较大的损失，我急令：

“传令二队长于启龙加速战斗。”

下午三点多钟，又出现了两路敌人：金寨的敌人从西边，大小麻店子的敌人从东边向我们夹击过来。同时，后面的部队又传来请示：

“堵击困难，是否硬拚？要守多少时间？”

至此，我军已是四面临敌。我命令一队的两个班分别到东山头、西山头堵击敌人，天黑时和后面的堵击部队汇合。三方面的堵击部队，统一由林维先指挥。我用望远镜看去，熊家河就在面前，急忙带领三队跑步赶上于启龙。

于启龙返身报告："战斗一开始，我就派半个班专门割电线，所以敌人不知道我们的伪装。不过，熊家河驻着敌人的团部，不好打马虎眼，不行的话，我准备硬攻。"

"对，三队我带上来了，交给你统一指挥。伪装不成就硬拚，战斗结束得越快越好。"

熊家河是这一条封锁线的要地，也是终点碉堡。说是驻着团部，却没有团级长官，只有百多名士兵把守。敌人果然狡猾，死不开门。于是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攻如猛虎的手枪团战士们，机智神速地接近围子，搭成人"墙"，越过了围墙。战斗仅持续片刻，就胜利结束了。

敌人这条封锁线上一百多个炮楼，全部被粉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反"移民"战大获全胜。

三二　和敌人赛跑

夜幕降落了，大地一片漆黑，只有远处敌人的篝火，发出疏散的光点。

敌人照例避免在夜晚和我军作战，于是停止追击，来了个大包围，在山上沟里安营扎寨，企图在天明后歼灭我军。

在熊家河，部队休息下来。高敬亭对我说：

"今天的反'移民'战是打得很好，但熊家河是敌人有经验的合围地，部队容易受到损失。徐诚基带部队打进来一次，方永乐带部队打进来两次，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我自己打进来一次，被敌人围在山上三天三夜。看你今天用什么办法出去。"

根据高敬亭的经验，上山就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从

熊家河往东南，不远就是大小麻店子，是一条封锁线，再过去就是张八岭，又是一条封锁线，还有一条大河拦住去路；正南是一条封锁线和一条河，河面虽然不宽，但水深流急；西南就是莲花山，是一条鳝鱼篓子，好进难出。四周遍布敌人的追兵，要想冲出熊家河，这真是个难题，几乎可说是一个绝境！但是，当我想到身边有着纵横敌后的红二十八军主力，吓破敌胆的夜老虎——手枪团，我感到了信心和力量，急忙走遍各队，召集了林维先、邓少东、于启龙、顾士宾、殷绍礼等同志，来到熊家河村头一座山峰顶上。

脚大腿快的于启龙急匆匆地爬上山来，屁股还没有落地，就粗声粗气地说：

“今天这个打法太痛快了，没有一个彩号，还发了一批弹药财。怕什么？咱们拚出去！我还愿意打先锋。”

“选择一点，今天晚上就冲出去。”一队长邓少东说。

大家议论纷纷，提了许多意见，唯独林维先一言未发，坐在一旁闷头沉思。我问他：

“林营长，你对突围有什么意见？”

他慢慢立起身来，向四野敌人的篝火堆观望了一阵，而后坐在原地，开口说：

“红二十八军以前向熊家河进军过三次，我来了两次，不过都没有这次打的凶，敌人对我们的包围也没有这样严密。我估计，今天从金寨县出来的一股敌人，不是卫立煌的留守营，就是十一路的一个团；从大小麻店子出来的是十一路的一个团；在我们后面追击的是二十五路的一个团。我的意见是：先用少数人打从大小麻店子出来的十一路那个

团，敌人以为我们在突围，二十五路的那个团必然会发起追击，我们引诱二十五路和十一路打响，再把部队抽出来。不过，这个任务是很危险的，总要有一个部队去，最好是我带三队去，一、二队留下来跟你们……。”

“嘿，这个法子妙！”于启龙打断林维先的话，忙着抢任务，“二十五路和十一路碰头的差事交给我，管保让他们碰个头破血流！”

“让林营长说完。”我阻止于启龙说。

林维先继续说：“两路互相打响以后，一攻一守，就得打一整夜。我们装作二十五路的医官、护士和彩号，搞几副抬子，就说是送彩号的，顺原路打回赵家河子。”

我同意林维先的意见，说：“二十五路和十一路互相看不起，不服气，这个矛盾从兵团司令到士兵都很深，我们可以利用。就这样决定：引诱敌人自相火拚的任务，由于启龙负责；伪装战术由林营长和顾士宾带三队去完成。”

回到驻地，于启龙小心翼翼地叫醒了一个班的战士，每人身上加背了一条长枪，叫来了当向导的两个便衣队员，然后把战士们分为两股，沿着山边向敌人的营地走去。

我爬上一个山头，眼望着敌人营地的篝火，心里却在耽心着于启龙和他的战士们。突然，在二十五路和十一路的营地上，几乎是同时爆发了呐喊和激烈的枪声。我马上赶向三队。

三队住的草棚子里，同志们差不多都化装好了。几个年青的小伙子打扮成女护士的模样儿，在那一边扭扭捏捏的出洋相；有的战士化装成伤兵，浑身满脑地缠裹着绷带，

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些红颜色，涂抹在绷带上，嘴里哼着装痛的怪声。棚子里嘻闹喧哗，战士们相互取笑。看见我进来，纷纷问道："象不象？"我被同志们的情绪感染了，高兴地回答说："象，象，都象。"

林维先正在化装成一名医官，听到我的声音，转身走过来说：

"根据便衣队的情报，恢复看守这条封锁线的确是国民党军二十五路，我们就装成二十五路送伤员的，你看行吗？"

"行。"我回答说，"出发的时候，你们把张三铁匠带上，送回东界岭一带。然后你们以伪装战术再把孙塔寺、韭菜河、盘仙地、八里河一条封锁线打掉；从英山到鹞落坪跟我们汇合。"

送走了三队，我赶到高敬亭的住处，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一同转移到熊家河南边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隐蔽休息。

"报告，任务完成啦。敌人不打到天亮不会甘休。"

高敬亭站在大树下，抬起头来，看了看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于启龙，又看了看天色，命令道：

"何耀榜同志，天不早啦，按照你们原来的计划出发吧！"

山沟里的风凉飕飕的。夜色正浓。我们从东面爬上了莲花山，正要进入东西莲花山之间的夹沟时，前哨忽然返来报告：

"半山腰发现两座新修的碉堡。"

情况复杂了。我们原计划趁敌人自相厮杀之际，以最

快的速度抢过这五十多里路的长沟，摔脱敌人。要是在此地发生战斗，暴露了目标，敌人必定会很快追来。敌人要是从两旁的山岭上夹击，我们的部队就会遭受重大损失。然而碉堡上的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我们通行。总之，打，要暴露目标，不打，也要暴露目标。最后，我还是决定打。

“邓少东带一队卡掉它！伪装不成功，也不能让一个敌人跑掉。”

邓少东立即将一队分为两部，一部由副队长殷绍礼率领运动上去。正在这时，碉堡上的敌人发现我军在山上活动，慌忙发出信号，朝天打了一排枪，随后集中火力向我军射击。

枪声划破了莲花山清晨的沉静。一队的同志们机动地向碉堡猛扑过去。几个战士接近碉堡，贴身上去，转到枪眼旁边，拉开导火线，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往里塞。

战斗刚结束，正准备集合队伍急速前进，忽然有人跑来报告：沟底下有个碉堡，可能里边没有敌人。

碉堡是空的？绝不会，一定是敌人跑啦！刚才的战斗，只能暴露我们的目标，敌人不会知道我们的兵力。碉堡里的敌人一跑，就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我对于启龙说：

“碉堡里的敌人一定跑去报信，二十五路很快就会追来。你留一个班殿后，专门监视敌人，但要避免接火，如发现敌情，抄近道赶上部队。”

山风呼啸着，天空撒下了牛毛细雨。同志们在烂泥和滚石之上急步行军。

不久，于启龙带着殿后的一个班跑步追上来了。于启

龙报告说：

“敌人用了较大的兵力向两边的山岭上急速运动，看样子想抢前在沟口上卡住我们。”

一招手，各队负责同志赶到我跟前。我一边脚不停步，一边说道：

“各队加速前进，不准掉队。一定要赶到敌人前头！”

雨越下越大了。透过蒙蒙的雨帘，可以观察到两边山上的敌人。敌人在拚命向前蠕动。

下午三、四点钟，同志们由于饥饿、干渴、疲劳，行走的速度开始缓慢下来。

前面的沟口上横着一条大河，两旁山岭上是众多的敌人，说不定背后的山坡上敌人已经设下了埋伏。全军的处境十分险恶了。抬头看去，西山岭上的敌人跑得很快，几乎和我们拉齐了；东山岭上的敌人比较迟缓，落在我们身后二里来路。敌人瞅得见我们，我们也看得见敌人；敌人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们也知道敌人的企图。谁也没有停下来，谁也没有打枪。

“耀榜同志，抢在前面就是胜利！”军政委说话了。这是命令。

“同志们，争取时间，要快！抢在前面就是胜利！”

下午五点多钟，看看五十多里路的长沟快走到尽头，出口就在眼前。西山岭上的敌人仍然运动得很快；东山岭的敌人却大为差劲。再不紧赶几步，在这最后关头就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

我厉声命令：“跑步斜插东山岭，在河边碰上敌人就挤

牙膏，把敌人抛到河里。不准响枪。老洪随我来!”老洪是高敬亭的代号。

封锁河面的十一路兵团的士兵，看到我军有的穿着一〇三师别动队的衣服，有的穿着二十五路兵团的衣服，错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一股劲地对着我们叫口令。

同志们象出山的猛虎，也不回答口令，飞扑上去，抱住敌人就往河里跳；离河岸远的同志，就在山坡上、山脚下、河滩里跟敌人混战起来，随着也纷纷滚入河中。

我和高敬亭下到河边，正碰上一股敌人，也许是忘记打枪了；不，他们是想捉活的！敌人手持刺刀拥过来，立刻被我们身旁手枪团的几个战士把他们拉进河水中。恰在这时，后面又上来几个敌人，扯住了我的大衣。我立刻摔脱大衣，转身抱住一个敌人，手枪团的同志赶过来，把敌人从我手中抢过去，拖着就往河里走。我一把拉住高敬亭，纵身跳下河去。高敬亭的大衣被河水漂了起来，行动不便，警卫员赶忙把它脱下来掷掉。

滚滚的河水中，人们浮上沉下，好一场水战。只是听不到一响枪声。

我和高敬亭上岸后，才估计到可能是敌人的长官有命令不准响枪。

“敌人的野心真不小，想一个个活捉我们。”我对高敬亭说。

“快打枪，粉碎敌人的阴谋!”

我得到军政委的命令，立刻鸣枪发出信号。紧接着，同志们的枪声震动着河面和两岸的山谷。

同志们迅速上了岸。我们随即向山上转移。

这时，在东、西山岭上追击我们的敌人，赶到河边，把机枪架在高坡上，不分青红皂白，对着河面就猛烈地射击，还不时用大大小小的手电筒向河面上摇晃照亮。刚穿上新棉衣的十一路士兵和彩号，漂在河面上动弹不便，在二十五路的机枪下面，死的死，伤的伤。二十五路的士兵把河里那些“笨猪”当作“共产党”，机枪一个劲儿扫着还不解气，又加上了长枪、手榴弹。这时，碉堡里又开出了十一路的援兵。

看看是个好机会，我要司号员站在河岸的高处吹起敌人的调号；敌人自以为秘密号音万无一失，却哪里知道它早已被我们的司号员掌握了。只见他一会儿调十一路攻，一会儿调二十五路攻，敌人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最后还是苦了新增援上来的十一路士兵，死在二十五路火网下的不计其数。

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山后，纷纷找来树枝野草和一切能生火的东西，烧起了一堆堆的篝火。这些篝火既可以取暖，又能烤干衣服，还可以虚张声势，令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兵力，真是一举三得。

从这里到鹞落坪，只要一天的路程。但是，大批的敌人跟在我们后面，不能把敌人也带进鹞落坪去。

黎明时，高敬亭决定：“今天不能进鹞落坪，要在这一带活动几天，把敌人甩掉。如果敌人过河追来，我们就从英山县城北边的山岭上向西去，想办法把敌人带到罗田。”

二队长于启龙建议说：“部队到了罗田，再到鹞落坪就要过英、罗和英、太两条封锁线，上级如果确定在这一带周

转，最好急行军离开此地。”

高敬亭说：“好吧，就这样决定，由老赵去布置。”

上午十点多钟，二十五路兵团的敌人果然过河追来。我们立即赶在敌人的前面，用少数部队掩护，边打边走，拖着敌人翻山越岭，过河钻沟。走到英山和罗田县的交界岭上，前面的大部队立即插向岭东的深山密林隐蔽起来。只有最后边打掩护的一个班，零敲碎打地和敌人纠缠着，向罗田县境拖去。

敌人走远了，我们抄近路向石头矶西面的山上转移。

皖西和鄂东一样，丁少青叛变以后，他无耻地配合敌人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地方工作；敌人更把所有的山区切成豆腐块，用封锁线、碉堡网紧紧围住。我们原想在这一带山区等便衣队来接头，了解和布置地方工作，然而空等了一夜，大为失望。

形势逼人，石头矶不能久停。我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摆脱追击的敌人，才进入石头矶，而由一个班把敌人带走。这里，一面是重迭的峰峦，一面是奔腾的河水。过了河，是片开阔地，只有到了那里，部队才有周旋的余地，才能够转移出去。但是，滚滚的激流上仅有一座独木小桥，过了桥有敌人的桥头堡，背后又有两个碉堡与它遥相呼应。如果被敌人发现，他们只要用很少的火力就可以轻易地封锁独木桥，把我们阻困在大河与高山之间。

我巡视了部队，察看了地形回来，对高敬亭说：

“军政委，我们要立刻转移。现在我们处在几条封锁线

的中间，敌人一夹击，我们就得完。”

“你看怎样呢？”高敬亭问。

“办法只有一个：过何进入开阔地。”

“天快亮啦。”高敬亭看着天色，不紧不慢地说着，“过去，过封锁线多半是在晚上。白天过封锁线，那是不得已的事情。”

晚上过封锁线当然保险一些。但是，如果天一亮敌人就追来，岂不误了时间，失掉机会？

“军政委，我们在鄂东有时就是白天过铁路。我看可以从独木桥上突过这条封锁线。请下决心。”

“好呵，就决心过，你去布置吧！”

我转到山头上，向石头矶镇的方向望去，只见几名老乡担着柴草，走过独木桥，向镇子里走去。我心里一动：莫非石头矶逢集？忙找来个老乡一问，果然如此。我当即决定叫同志们化装成卖柴赶集的老乡，混过独木桥。

大山和大河之间，这一片地带仅有七个村子，统共才四十多户人家。我们几乎把老乡们所有的扁担、筐筐、篮篮都用银洋买下来了。

地势不利，时间紧迫，通过独木桥能否成功，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我督促同志们化好装，亲自带领于启龙的二队在前面打伪装。

起初，敌人只当我们是赶集的老乡，不加注意。刚过了独木桥，手脚利索的于启龙把柴草担子一摔，扭身猛抱住哨兵。几个同志赶上去，捂住哨兵的嘴，把他按倒了。于启龙抽身出来，一招手，带着几名战士就钻进了桥头堡，民团的

兵士们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我们的盒子枪已经指点着他们的鼻子尖了。

控制桥头堡，押住民团，我立刻传令催兵，要同志们快步通过独木桥。桥头堡后边的两个碉堡上的哨兵，发现有那许多人在过桥，而且行动很快，就有点疑心，拚命伸着脖子、瞪大眼珠往桥上看。恰在这时，高敬亭躺在黑布抬子上，由几个人抬着，在对岸桥头出现了。碉堡上的敌人着慌了，急忙给桥头堡上的“伙伴”们打招呼：“喂！你们为什么不打？红军上桥啦！”“你们眼瞎了？看不见高敬亭过来啦！”

我把手中枪一摆，对俘虏们说：

“快，告诉他们不要打枪！”

怕死的民团兵丁急忙扯着嗓门吼叫：

“喂！你们不要打枪！”

我下了炮楼，看到同志们已过了独木桥，立即下达命令：

“手枪团进入战斗，打掉石头矶的碉堡。”

地方上的反动民团碰上我们的红军，真是鸡蛋碰石头。我们的机枪、盒子枪压上去，把民团打了个稀里哗啦。战斗结束，我们拉出俘虏，烧掉炮楼，部队立即从石头矶插向东山岭。

两三个月转战的目的，是想在鹞落坪开会和休息。我们刚进到鹞落坪，就发现了敌情。高敬亭对我说，敌人摸到了我们行动的规律，知道我们几个比较固定的集合点，就想乘我们部队正在集结的时候歼灭我们。我们的会还是决定

在鹞落坪开，敌人二十五路追来的一个团，由手枪团拖到九江去。

在鹞落坪的桃花冲，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由高敬亭作了政治报告，他并且决定重新组织一个省委直属的皖鄂边特别委员会，共有二、三十个县，由我任书记，八十二师不离职，以后常住皖鄂边；高敬亭常住鄂东北。

正在开会时，易元鳌带着皖西的地方部队战斗营回到了鹞落坪，报告说：

“一营从潜山几次想进鹞落坪，都没有进来，现在可能到广济或将军山一带去啦。”

高敬亭说：“我们为了开会，在这里纠缠了四天，就这样算结束了吧。我今天晚上就走。”

高敬亭走了以后，我在山上各个山洞里查看了一下，把能动的彩病号清出二十几个人，以他们为基础，组织了三十二个人的警卫队。然后，我到霍山、舒城、桐城、万山等地和地方党组织接上头，布置了工作。当我到达小河南时，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县三十几个同志在等待开会。

这样多的人，在什么地方开会，会不会使敌人发觉？我问黄云先：

“这里能够隐蔽吗？估计可以把会开下去吗？”

黄云先说：“这一带虽然敌人破坏得很严重，由于曾经组织过苏维埃，这里的群众非常好，也是我们的根据地。”

我决定说：“我们要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开会，地址由你决定。”

晚饭后，黄云先领我走进一所大屋子里，宣布开会。我

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分析了皖鄂边的形势，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在谈到便衣队和主力的关系时，我说，主力部队长期处在前有敌人堵击后有敌人追击的情况下，一打就是几天或几十天，一跑就是几百里甚至一连要跑好几个县，非常疲惫，常常为了暂时的休息，往便衣队的根据地里一拖，也把敌人拖进了便衣队的根据地，无形中给地方工作造成了损失。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主力部队在进入便衣队的根据地休息时，事先要尽可能把敌人甩掉；而便衣队对于主力部队的休整，也要给予方便和照顾，我们应当正确的认识到红二十八军是目前鄂豫皖唯一的主力军，我们应当爱护他。

离开小河南，我在将军山开完了第二个会，回到鹞落坪不久，即接到高敬亭的指示信：

何耀榜同志：

我在黄冈、麻城一带，和手枪团、一营、特务营汇合，打了一仗，部队很疲劳，也有些减员。我将手枪团、一营带回鄂东休整补充。特务营拖得很苦，如果带到鄂东，仍无法补充，因此我叫特务营仍回到皖鄂边，由你设法叫他们休息和补充。你的精力仍着重在整理皖鄂边的地方工作。

高敬亭

第六章　粉碎“三个月清剿”

三三　形势的变化

一九三七年初，我和皖鄂边特委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冒着严寒和弥天大雪，黑夜里走进了大钢岭的深山大沟。

在一个靠着崖石、用树枝临时搭好的草棚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特委秘书徐文初手拿着敌人新近出版的《扫荡报》，凑近黯淡晃悠的灯光，为我诵读着有关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和文章。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鄂豫皖地区敌人的正规部队在纷纷集结，二十五路兵团集合在安庆，十一路兵团集合在六安，他们大喊大叫地要去“援救”蒋介石。敌人难道要全部开往西北去？绝不会，就是大别中的一座山峰，敌人也不会把它丢掉的。再说，就是二十五路和十一路两个兵团果真要开往西北，为了配合全国形势的转变，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全去，要组织力量，同敌人展开全面战斗，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

特委决定：蕲春、黄梅、广济一带的游击队组成战斗二营，由熊桐柏任营长，前去组编，并立即攻打上述三地的封

锁线；赤城县的四路游击师和赤南县的游击队攻打固始一带的封锁线；新组成的战斗一营打太湖到潜山的封锁线；特务营去打新洲城。各地的便衣队同时行动起来，配合这一全面的战斗。

这时，我们又从《扫荡报》上看到，高敬亭已经把红二十八军的手枪团和一营摆在汉罗公路上打击敌人，独立团和两个游击师以及各便衣队广泛地打击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

鄂豫皖沸腾了，大别山上红旗招展。英雄的红色战士们，日以继夜地到处主动袭击敌人。

早晨，一片激烈的枪声从远处向我们逐渐逼近。我走出草棚，踩着吱吱发响的深雪，向岭峰上爬去。

“哪个部队受了敌人的包围？”徐文初一旁惊讶地说。

一连几天的大雪封山，行动很不便，特委对各便衣队和部队的情况了解的很少。根据枪声判断，显然是敌人在追击我们的部队。不管怎样，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大白天与敌人展开正面战斗是不利的。必须带领部队去接应。

临出发时，我对徐文初说：

“枪声是在大钢岭主峰的南边，我带警卫队去接应，你留在机关里注意各地的情报。”

翻过一条山岭，就接近了土门坳的一条封锁线。这条封锁线是由安徽省保安团看守。部队在山坡上隐蔽起来，我把绰号叫“道士”的班长叫来，让他到前边去侦察。

道士返回来报告：看守封锁线的敌人都在碉堡里，外面只有少数的巡逻哨。

“道士在前边带路。”我说。

擅长翻山越岭，行走如飞的警卫队战士们，神速地接近了封锁线，敌人还没有来得及走出碉堡，我们已经横过了封锁线，返身回击向我们打枪的敌人。

突然，在我们右侧不远的地方，爆发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可能是哪个便衣队同样前去接应，在通过这条封锁线。我立刻命令：

“道士，去看看。”

道士撒开飞毛腿，一溜烟在山边上消失了；当他返回来时，身后随着六、七个人，正是在本地活动的便衣一队。陈队长赶上来报告情况：“乌石畈到野鸡河一带的枪声最激烈。”

我立刻带领部队进入丘陵地带。行不几步，身后就响起了敌人追兵的枪声。我命令道士带领三班殿后，堵击敌人。刚转过一个山包，前面突然又出现了一片灰色的“野狼”；是安徽省驻青田畈的一个保安团。为了达到接应的目的，我发出命令：

“利用山包跟敌人打！”

同志们利用有利的地势，边同敌人作战，边向乌石畈到野鸡河一带冲击。不到一小时，就望见了我们的目的地：那里枪声连天，杀声震耳。司号员马上吹响了联络号。

对方回答了号声，是熊桐柏营长的部队。

战斗二营刚刚组成，就遇到数倍敌人的包围，可见处境的危急了。我连忙命令司号员：

“答号：我们来接应。”

我们向着敌人的包围圈冲去；熊桐柏带领战斗二营也从包围圈里往外冲。两把利剑劈开一条缺口，我们在山包旁会合了。熊桐柏见面就说：

“敌人是程汝怀的保八团和二十五路的一个营。”

在丘陵地带继续战斗下去，我军就会重陷重围。我对熊桐柏说：

“部队由你统一指挥，马上向万山方向打出去!”

熊桐柏果断、迅速地调整了部队，带领着临时组成的突击队，一马当先地向万山方向杀去，胆敢阻拦的敌兵，纷纷在英雄们的面前倒下去。警卫队的一部分战士留在后面堵击着敌人。

大雪在天空中纷飞飘舞。我们的战士和敌人打成一团，人流和枪声都飞快地向万山方向移动。我们到达万山的半山腰时，夜幕开始降落了，但敌人还是咬住穷追不舍。

熊桐柏迎面向我跑来，说：“前面没有路啦!”

敌人用三、四个团的兵力把我们逼上万山，想断绝我军的生路。没有路，这难道能吓住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吗？就是劈出一条路，也要把敌人埋葬在眼前，也一定要走出万山！我咬牙说道：

“继续前进!”

熊桐柏应声带领战斗二营奔向高山。

我扭头看到打掩护的同志们也跟上来了，便要他们退到一个夹道口，准备堵击敌人。这时，我才发现身上带的子弹不多了，便对同志们说：

“节约子弹；用手榴弹拚。”

躺在雪地上的道士班长和他的副班长来二，首先摸出手榴弹，打开盖子，抽出导火线。等敌人来到近前，同志们一阵手榴弹压下去，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道士发现来二的左大腿中彩，便对两个战士说：

“把副班长抬下去。”

“不要管我，注意敌人。”来二严厉地说。

两个战士只得服从命令，没去抬他。

击退了敌人第二次冲锋后，出一个战士背上来二，和我们一起往前追赶战斗二营。

万山顶上到处是狼牙锯齿形的巨石，行走很艰难。战斗二营的同志们在一块高地上休息，身后就是悬崖峭壁。

哪里才是出路呢?

我走到断崖边上，出乎意外地发现了一棵古树，它生长在巨石缝中。我高兴地说：

“看，从这里可以下去。”

熊桐柏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发出命令：

“把绑腿解下来，把衣服撕成布条。”

大家很快用绑腿和布条结成绳子，一端牢牢地拴在树干上。熊桐柏立刻有条不紊地指挥同志们往绝壁下面溜。腿部负伤的来二爬过来说道：

“三班的同志不要下，留下来打掩护。”

眼看大部分同志下去了。来二是个彩号，我叫几个同志先扶他下去。来二坚决不肯。他说：

“总要留下一个同志在最后看绳子，我反正负伤了，牺牲了没有关系。”

我说："小来子，你挂彩了，还是先下去。我们作战从来不丢下彩号的。"

来二坚决不下去，说是他留下来，可以救出一个没有负伤的同志，还可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断崖上只剩下三班的几个同志了，敌人打着手电和火把，眼看就要追上来了。我严厉地下了命令，要来二下去。他一把拉住我，哭着说：

"何政委，你是爱我小来子，还是爱革命？……敌人上来了，你们再不下去，就要多牺牲几个同志……"

我不由得滴下了热泪。无可奈何，我取出两颗手榴弹，轻轻放在来二的手里，怀着一颗沉痛的心，握住了树绳滑下悬崖。

我刚滑到悬崖下，头顶上便响起一片枪声，接着，敌人的手榴弹也从悬崖上滚下来了，在我身旁四周爆炸，但是，我不愿意离开这里，希望来二能够滑下来。突然，绳子断了，从断崖上滚下一团黑影，我不由得脱口喊出：

"小来子！"

喊声引来了敌人密集的枪弹。机智的熊桐柏早已把队伍拉到一个斜坡上，向悬崖上的敌人猛烈射击。我和三班的几个同志在他们火力网的掩护下，东找西寻了一会，终于在一块矮树丛旁找到了来二同志，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同志们满含着眼泪，怀着复仇的怒火，用双手扒开积雪，用石头垒成了石坟。共产党员来二同志永眠在万山脚下。

三、四个团的敌人被甩在万山顶上，要想追上我们，至

少也要走两三天的路程。我和战斗二营分手后，便回到了大钢岭特委机关。

旧历大年三十的夜里，战斗一营来到了大钢岭。他们和二十五路的敌人整打了一天。我发现过去的情报有矛盾，都说二十五路去援救蒋介石去了，怎么还和我们打个没完没了呢？西安事变发展得怎样了？中央有什么新政策？为了弄清情况，我派出两个交通，分别到潜山工委吴云霞和九江的秘密联络点去了解情况，并且要徐文初通知便衣队暂时停止对敌人的总攻击，各回原地区坚持工作。

年初一的上午，我带着两个警卫员，拿着一些肉、糖，走出了大钢岭，沿着鹞落坪，走进了桃花冲的山沟里。范小楼同志正在石洞里煮肉，一见我去，忙抬着两只油腻的手说：

“嗳呀，何书记，我们原说吃了饭去给你拜年，你倒先来啦。”

“我先来给伤病员同志们拜年。”

能够走动的伤病员，都走出石洞，说说笑笑地坐在石头上晒太阳。

“范医官，有多少彩病号？”我问她。

“八十多人，有十几个不能行动的。”

我叫警卫员胡山修把带来的东西分给伤病员，每人发两块钱、又补助伙食费六十元。

徐海山也来给伤病员拜年，他指着一个伤员对我说：

“这就是从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哗变过来的姜术堂同志，他们共有七个人。”

我和他握了握手，在谈话中，我觉得他似乎有什么心里

话，欲说不说的。他要求到特委去一趟，我同意了，对胡山修说：

“你带姜术堂同志先回特委，我还有些事情。”

我分别到各石洞里探望了伤病员，天黑后才返回特委机关。

我进到草棚子里，马上把姜术堂找来。关于他的情况，吴云霞曾经对我讲过一些。所以，我对他说：

“姜术堂同志，不要害怕，把你在安徽省保安团里怎样哗变，又怎么来到这里的详细经过谈谈好吗？”

他看了看我身旁的徐文初。我懂得他的意思。

“不要紧，他是我的秘书。”

于是，姜术堂开始叙述他的经历：姜术堂原是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三团的。在这个团里，有两个连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一向是由红军供给经费的。红二十五军走后，他们和徐诚基接上头，经费就由他供给。徐诚基牺牲以后，他们就再没有和山区联系上。后来，党叫这两个连共同组织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周副营长，姜术堂和另外三个同志为支委，决定由周副营长带领这两个连，以“剿匪”为名到山区接头，把部队交给红军。他们在去年秋天从芦江出发，刚要进入山区，就被国民党发觉打起来，经过一个月的周转，总算进了山区，不料被红二十八军误为敌人包围住缴了械，营长和连长牺牲了，士兵被释放回家。他们在回家途中过封锁线时，触动了地雷，死亡不少，有的跑散了，有的负伤后被炮楼上的敌人抬走了。姜术堂和另外六个人是爬过来的。当时，姜术堂想：接关系的手续是由周副营长负责，他牺

牲了。……姜术堂说到这里，不由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七个人，爬了一天一夜，才碰上便衣队，把我们送到黄云先同志那里，才把我们收留下来。他也问过我几次党内的问题，我不敢和他发生横的关系。黄云先见我不肯说，才把我送到桃花冲山沟里休息。”

姜术堂哭得很是伤心。我安慰他说：

“你不要难过，这是革命中的一个挫折。至于你的组织关系，我们以后设法解决，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吧。”

五、六天以后，派到潜山去的交通返回来了，带来了潜山工委吴云霞同志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说：党中央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一切为了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

随后，蔡炳臣同志在白茫茫的大雪中，来到草棚里，他那冻红了的双手刚刚伸向火边，便汇报说：

“去九江的交通，过封锁线时被敌人发觉，脚上负了伤，现在在我那里休息。他从九江带有信来。”

信的内容和吴云霞的信差不多。

蔡炳臣还说，蕲春、黄梅、广济的敌人又占据了封锁线，而且封锁得更加严密，按上了铁丝网，上面还挂着铜铃。

情况越来越复杂，越加紧张了。

黄冈便衣队赶来汇报：敌人徐源泉指挥部驻仓子铺，军队驻在其庭、宋埠，锺光义、程汝怀部驻岗北黄冈庙。商麻公路上日夜行驶着载运国民党军队的汽车。

六（安）霍（山）工委送来书面报告：国民党十一路兵团司令部已移驻霍丘县城。

潜山工委的书面报告说：安徽敌人开来两个保安团，进驻潜山县城。

蒋介石刚回到南京，就调动重兵封锁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立即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各工委便衣队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原地工作外，都编成游击队，到外线去打游击，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留在山区的同志要注意我们的交通联络和保护群众。

会议结束以后，我坐在雪地里一块石头上，仍在考虑着敌人的调动和特委的决议。我们好久没有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了，和高敬亭也一直接不上头，今后的工作怎么办呢？我心里感到很苦闷。忽然，我发现姜术堂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看报纸，我顿时生出一个念头：姜术堂是哗变过来的，他对国民党的一套很熟悉，最好跑交通。……可是又一想，不行，他还没有接上党的关系呐！

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呢？坐着等待是不行的，一定要想办法主动去找党中央请示。我又看了看姜术堂，他仍在那里坐在石头上看报。我想，叫他去，这正是党考验一个同志的好机会。

我起身走到他的跟前说道："姜术堂同志，你在看报？"

他连忙站起来说："是的。"

"这些日子报上有件大消息，看到了吗？"

"看到啦，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又放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是呵，变化很大，不过，我们被敌人封锁在山里，对真实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也捉摸不清党中央的政策和方针。"

姜术堂很聪明，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向我要求说：

“何书记，如果党相信我，派我跑一趟交通吧。”

“你敢去吗？”

“请你相信我，我有办法出去，争取五、六天就返回来。”

“姜术堂同志，我们相信你。就决定你去外线了解情况。”

“何书记，我现在就出发。”

我要徐文初给了他一部分钱，握着他的手说：

“好，快去快回，路上要谨慎。”

姜术堂只身走下了大钢岭。

三四　策应黄冈战斗

潜山工委转来情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调兵遣将，企图先消灭各地山区的共产党、游击队，再进攻陕北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蒋介石已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驻金家寨，下设岳西、信阳、经扶三个办事处。鄂豫皖的敌人除原有的兵力外，又调来卫立煌和刘峙两人带领的全部正规军，估计敌人的军队总在五十万人以上，由蒋介石、何应钦亲自督导，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开始，发动了“三个月清剿”，口号是：在三个月内摧毁共产党的两个老巢——鄂东的老君山、天台山、卡防、灵隐寺；皖西的鹞落坪、大钢岭、阴山尖。

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队从鄂东北打过来，送来了高敬亭的命令，要我率领皖鄂边全部部队到黄冈三区和他会合。他也集合鄂东北的全部部队到黄冈三区，准备同敌人决一

死战。

我命令手枪团三队立刻返回去；并发出通知，要战斗一、二营从太湖出发，到黄冈去集结。

当夜，我带着六十三个人的警卫队从大钢岭出发。这时，正是敌人进行“三个月清剿”的末期，敌人重兵密布，封锁线上碉堡林立，碉堡与碉堡之间构成了猛烈的机枪火力网。我们三次冲击，都没有能够突过封锁线。最后，我们决定运用我军作战机动、行动迅速和地形熟悉等特点，用调虎离山的办法冲过封锁线去。

天亮后，我们的部队故意在山上运动，暴露目标。果然，碉堡里的大部分敌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追来。和敌人稍一接触，我们就钻空子磨到敌人后尾，直扑封锁线，打掉几个碉堡后，就顺利地穿过了一道封锁线。

傍晚时，我们又通过了太湖到蕲春的封锁线。蔡炳臣的便衣队听到枪声，赶来接应，立即引导我们进入便衣队的根据地隐蔽。

我把各地的情报和高敬亭的命令对蔡炳臣谈了一下，他认为：在敌人这样大的兵力下，我们和敌人决一死战是不合适的。

我和他也有同感，和敌人硬拚，我们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地下党也建议我们保存实力，不要打硬仗。可是，军政委的命令怎能不服从？战斗一、二营已从太湖到广济，是会跟他会合的，我们也不能不去。

说话间，外边响起了枪声，敌人跟进来了。我们只得边打边退，抛掉了敌人，在蕲春的铜山冲碰上工委书记鲁金

瑞，他说：

“军政委有命令，叫经过这一带的部队赶快打到黄冈三区和他会合。”

我问：“他还有什么指示？”

“军政委叫我们把所有的游击队、便衣队都活跃起来，打敌人的岗哨和碉堡。”

我问他：“军政委的命令我们不能不听。你感到打封锁线有困难吗？”

他考虑了很久，才说：“很困难，跟敌人硬拚怕要吃亏。再说，便衣队已经插到群众中去了，要集合起来，就会暴露目标，以后再想插下去就更加困难。”

鲁金瑞、蔡炳臣和我都是特委委员，三个人商议以后，决定公开的部队继续执行军政委的命令，插到群众中的便衣队不集合，想办法牵制和麻痹敌人，使敌人的兵力不能全部集中到黄冈战斗上。最后，我对蔡炳臣说：

“你马上派人到大钢岭，叫徐文初把这个决议向各工委传达下去。但要注意：这个决议在鹞落坪、大钢岭、舒城和桐城不能使用。”

我带上警卫队连夜出发，急行军赶往黄冈三区。

狂风暴雨中，我们来到了齐水县境。前面横拦一条大河，河对岸就是黄冈的大崎山，高敬亭正指挥红二十八军在同敌人作战。

我们急步来到河边。山洪暴发，河中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我们发出暗号，地下党事先准备好的船只，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对岸的渡口。我们忙把部队在河边的坡地上隐蔽起

来，一面监视身后的敌人，一面准备顺序渡河。

恰在这时，一团敌人匆匆赶来，在河床上东张西望，同样是想找船渡河。我想，我们就是过不了河，也不能让这一团敌人过去夹击红二十八军。我发出命令，同志们的子弹、手榴弹立刻向敌人打去。

敌人一面和我们激战，一面用机枪把河中的小船封锁住。突然，敌人又从后面赶来了一个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渡河是不可能了；继续战斗下去，对我们也不利。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敌人拖走，使他们不能过河去攻击红二十八军。我命令警卫队：

“道士，带领全班拉敌人，其他的同志转移。”

敌人一心要过河，无意恋战，我们很快退出了火力圈，敌人也不来追击。道士带着六、七个战士和一挺机枪，不管怎样打，敌人硬是趴在河床上不动窝。

看看敌人不上钩，我又带着两个班返回来。道士一边打击敌人，一边愤愤地说：

“敌人的大队在想法过河，只留下一小股敌人和我们打。要是把这股敌人消灭，或许能拉住敌人的大队。”

我们分兵两路，一个夹击，把那一股打掩护的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下，敌人可恼火了，离开河滩向我们追来。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就走。

我们就这样打打退退，拖着敌人转圈子。途中，碰上齐水县的一个便衣队，根据他们的汇报，才知道战斗一营昨天同敌人打了一整天，也没有能渡过大河。大崎山的战斗打得很激烈，已经打了两天两夜了。

我带着警卫队退到了将军山下的同山冲。同山冲一连串好几个村子，都曾经是老苏区，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便衣队活动的地区，群众基础很好。部队一来到村子里，乡亲们就热情地为我们烧了开水，照顾同志们休息。尽管身后跟着一个团的敌人，但同志们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战斗，异常疲劳，哪怕抓住空隙休息一会也好。

我端着一碗开水，还没有来得及碰着嘴唇，哨兵已急匆匆赶来报告：

“前面发现部队。”

“从哪里来的？”我立刻放下水碗问道。

“广济方向过来的。”

“走，去看看。”

我带着几个战士来到了村边。举起望远镜看去，只见近二百多人的队伍，正在飞快地向同山冲奔来。队伍的最前面，走着一个彪形大汉，穿着一身黑土布军装，手提驳壳枪，腰里鼓鼓囊囊地挂了好多手榴弹。我老远就认出来，他正是战斗一营营长易元鳌。

眼看着易元鳌和战斗一营党支部书记周奇云来到了村头。

易元鳌一看到我，扯着粗嗓门就喊叫起来：

“哈，何政委，在这儿碰上你啦!”

我一边和他们二人握手，一边说道：

“部队到黄冈去过不了河，才转移到这里。”

“那可太巧啦，我们也是过不了河，从广济打过来的。”易元鳌大大咧咧地说着。

看着来到面前的同志们，一个个风尘仆仆，精疲力竭，为了策应黄冈战斗，同志们实在拖得太苦啦。一连几天，他们不仅没有见到一粒米，就连一滴水都没有沾牙。不管怎样，一定要让同志们喝点水。

我和易元鳌、周奇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刚进得村子，不远处便传来清脆的枪声；原来战斗一营的屁股后头也带着敌人，并且比追击我们的敌人还来得快。我赶到一个土坡上，一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一边问身旁的易元鳌：

“你们后边有多少敌人？”

他回答说：“二十五路的一个团。”

我从望远镜里仔细一瞧，忙说：“不对，元鳌，不止一个团。”

易元鳌不加思索地说：“后面许还有个保安团。”

“也不止两个团！”我有些生气了。

易元鳌连忙补充说：“那就有两个保安团。”

“嗨，你这个同志怎么不了解情况？”我放下望远镜，面对着这位“活李逵”，真有些哭笑不得；指挥部队打仗，身后有多少敌人都弄不清，就带着队伍猛打乱跑。

转眼间，乌压压的敌人已接近村头，敌人的子弹就落在我们的身前身后。突然，只听得“嘿”的一声，我的警卫员挂彩了；敌人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小腿上。“活李逵”易元鳌早已撒鸭子跑下去，带着部队就在村头和敌人干了起来。

敌人是正规军两个团和两个保安团。五、六千人吼哇吼叫着，潮水般向我们涌来。冲出去，这是根本不可能了。我立刻下达命令：“警卫队打掩护，战斗一营抢占将军山高

峰。”话音刚落，敌人一颗子弹飞来，正打在我的屁股上。我仍然伏在地上，咬着牙不吭声，和警卫队的同志们一同打击敌人。易元鳌指挥战斗一营边打边退到我们身边，转身准备向山上爬去。

身旁的一个战士发现我在流血，吃惊地问：

“何政委，你……”

“不准出声！”指挥员在战场上挂彩，这对战士的斗志是有影响的。为了使易元鳌能顺利地带领战斗一营转移，我再次命令身旁警卫队的战士们：“不准告诉易营长。”同时我继续指挥警卫队阻击敌人。

然而，还是有人告诉了易元鳌，在密集的枪声中，还是可以听到他那大嗓门在后边嚷：

“警卫员挂彩，政委也挂彩啦！我怎么能走？”接着，他空隆隆地奔到我身边，跪下来扶住我：“何政委挂彩啦？”

“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伤虽然不重，却不能走路啦。“元鳌，快去指挥部队。”

战斗一营党支部书记周奇云右手残废了，他就用左手接连不断地向敌人掷手榴弹。易元鳌向周奇云那边看了看，刚要张口，我立刻捅了他一下说：

“不能告诉他！”

易元鳌看看我，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敌人象一群蚂蚁，越爬越近了。这时，易元鳌也顾不得那许多，伸出有力的左胳膊，抱起我就往山上跑；右手中的盒子枪不停地射击敌人。我虽然被大块头的左膀子挟在半空中，手里的盒子枪也同样打击着敌人。易元鳌挟着我跑

了几十步，在一块大石头后边猛然停住脚步，我正在奇怪，只见他右膝盖一弯，熟练地换上了一条子弹，然后一边往山上跑，一边扭头射击敌人。

在高大的将军山上，同志们就象捉迷藏一样，和敌人周转着，战斗着。易元鳌看看敌人快追上来了，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我往下一放，掏出手榴弹就向敌人掷过去。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扬起了一片烟雾，等爬在地上的敌人睁开眼时，易元鳌早挟着我跑远了。

战斗在持续着，已打了半天啦。虽然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可我们的损失也不小，这场迫不得已的战斗，确实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元鳌，再不能打啦，你不要顾我了，赶快指挥同志们转移。”

易元鳌置之不理，一股劲挟着我东跑西窜，瞅准机会就打敌人一顿。这时，周奇云也知道我挂了彩，紧随在我们后边，左手中的手榴弹不慌不忙，准确地甩向敌群，为我和易元鳌打掩护。

我解释说：“元鳌，这样不行，不光是你死、我死，部队也要垮。”

他急忙开口，声音还是那样宏亮、有力：

“放心吧，我和周奇云一定把你保住。”易元鳌一边说着话，一边挟着我跑，但他手里的枪却没有一刻中断打击敌人。

我被挟在他那刚劲有力的右膀中，无法挣脱，心里真有些急了。

“元鳌，给我留下两个便衣队员，你带着部队冲出去，只要你们把敌人的尾巴拖住，我就有办法隐蔽起来。”我又严肃、又恳切地说：“元鳌，你要从二百多名战士的生命考虑呵！”

听了此话，他才无可奈何地把我放下来，突然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周奇云赶到了，不问情由，伸出那只没有残废的左胳膊就把我抱了起来。

“易营长，快打掩护。”

易元鳌窜起来，左手掷着手榴弹，右手提着驳壳枪，向着面前成群的敌人猛烈打去。

我对周奇云说：“老周，你不该抱起我，部队要紧……”

周奇云就是不理会，吃力地抱着我奔跑。

天色黑下来了。

敌人打着手电，点着火把，步步向山上逼来。同志们机动地集中起来，一阵强烈的火力压下去，敌人被打痛了，停在原地不敢动弹，更不敢向山上冲来。

同志们汇合在山头上。这里不能久停，必须很快突围出去。我自己不能行动，成了个累赘，便对易元鳌、周奇云说：

“你们带部队冲出去，把我一背出战场就甩了，部队好赶快转移。”

到了这个地步，易元鳌和周奇云哪里还听我的，他二人商议了一下，便由易元鳌带领一个班留下来掩护我，周奇云带领战士们突围。

周奇云他们隐蔽着向山下运动。不久，就听得敌人的背后打响了。易元鳌抓住这个机会，背起我就跑，在山坡上的一个豁口中，跳出了包围圈。易元鳌背着我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路，回到了大钢岭。

走进树林，易元鳌把我放下来，便走到一旁去学鸟叫。易元鳌是有名的“口技专家”，什么喜鹊啦、山雀啦，学什么象什么。地下党的同志们一听，便知道是易元鳌来了。这时，只见他在那儿吱吱喳喳地叫着，果然把徐文初给叫来了。

我们回到了特委机关，同志们见了纷纷问道：

“易营长，你怎么把何书记抱着？”

“嘿嘿，”易元鳌咧着个嘴直笑，“不是我抱着，你们早见不到何书记啦！都是我易元鳌吃肉多，才有这个劲头。”——说来不信，易元鳌确确实实一次吃过二十斤猪肉。这时，他轻轻地把我放在床上，立刻扯起大嗓门又喊叫起来：“快，你们快去找护士呀！”

三五　等待交通员

不到两个星期，我的伤就痊愈了。

这期间，姜术堂回到了大钢岭。他说：

“我到汉口没有了解到情况，又坐车到郑州。郑州是我的老家，碰到很多同学，他们说，释放蒋介石是为了国共合作抗日，红军已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西安有一个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正在招收学生。”

我问他：“你是听一个人说的，还是很多人说的呢？”

“郑州的商人和老百姓都这样说，河南的报纸上也登啦，我还带来了一份。”

他取出一份报纸，把有关国共合作的文章念给我听。听完以后，我说：

“国共合作的事情倒是听了不少，但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还是不能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

姜术堂说：“我听同学们说：郑州有一个地下党的特委。只要你能给我写个一般的介绍信，我就可以想办法和他们接上头，再找党中央请示。”

我和徐文初商议了一下，随即给姜术堂写了一封信；他带着信当夜就出发了。

根据地下党的报告，我们知道在黄冈战斗中，敌人伤亡不下一千人。与黄冈战斗的同时，山区各部队也同敌人展开了战斗，敌人伤亡也有一千多人。黄冈战斗打的是卫立煌部，山区里打的是二十五路。敌人的“三个月清剿”受到致命的打击，卫立煌说刘镇华“剿共”不积极，把刘镇华一撤两职，摘下了二十五路兵团司令和安徽省主席两顶乌纱帽，现在还软禁在南京城。二十五路兵团也被缩编为三十二师，师长叫王学森。安徽省新任主席为十一路兵团司令梁冠英。国民党重新布置了兵力，继续“清剿”。鄂豫皖的敌人除原有兵力外，又增加陈诚、薛岳、顾祝同的军队为后备。鄂豫皖所有的“剿共”军队，都由卫立煌统一调动。

蒋介石虽然被迫答应国共合作抗日，但骨子里一心只想消灭共产党，消灭红军，当然更不愿意承认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敌人调动了重兵，企图在短时间内把我们

歼灭，并且四处张贴布告高价悬赏：活捉高敬亭者赏洋五万元，活捉何耀榜者赏洋二万元；报告高敬亭住址者赏洋一万元，报告何耀榜住址者赏洋八千元。哪个部队捉到高敬亭和何耀榜，一律官升一级。甚至连捉到一名便衣队员或红军战士都有赏。

林维先带领着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在大钢岭找到我。说是黄冈战斗后，军政委命令部队分散，叫他回到皖鄂边来。

“你们来时，军政委有指定的任务吗？”我问。

“军政委指定的集合点是两道桥。还有一件事情，卫立煌派了一个连长来给我们送信……”

“信呢？”不等林维先说完，我忙问。

他不紧不慢地说：“信叫我撕啦。”

“信上说些什么？你怎么不把人带来呢？”

“信上说叫你和高敬亭去缴枪‘合作’。再说，他是个白军军官，我怎敢带来，要是叫军政委知道了那还了得？”

我告诉林维先，国共合作抗日是真的，我们已经派人到外面去向党中央请示了。以后如遇到类似的事情，把信收下来，可以打收条，就说把信转给高敬亭或我都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判。然后，我又问他：

“你们来时，军政委是否指定了你们会合的路线？离会合的时间还有多久？”

林维先说：“军政委叫我们从英山、罗田到两道桥，时间就要到啦。”

我又嘱咐他说，估计两个月后时局会有大的变化，在这

一时期里一定要注意保存干部。并且把我们准备的鞋袜拿给同志们换了。

特务营吃了饭，下半夜就出发了。

我和徐文初、易元鳌共同研究如何牵制敌人，以便特务营能顺利前往两道桥汇合。现在我们跟前没有部队，便衣队又来不及通知，只有用警卫队来配合特务营的行动。敌人在这一带烧杀了四、五天，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敌人是要“进剿”鹞落坪和大钢岭。但是，特委的这块根据地不能让敌人轻易进来，可以运用豫东南莲台山反“搜山”的经验，在沟口山旁设下炸弹网，现出目标。等敌人前来追击和合围时，给他个苦头吃吃。

警卫队和特委机关的同志八十多人立刻集合起来，抬着四箱子炸弹，从大钢岭出发，浩浩荡荡地向鹞落坪的山沟里走去。沟口上有个小弯子，筑在半山坡上的房子，已经被敌人烧掉啦，只剩下断墙残壁。为了迷惑敌人，警卫队排好了行列，依次先后把残墙推倒，石头从山坡上纷纷滚下，在沉静的深夜里发出隆隆响声，使山外的敌人听起来好象有很多人在过沟一样。

大部分同志都到前面去休息了，只有我和易元鳌及两个警卫员留下来，把四箱子炸弹一个个埋在沟口、山坡上和树根野草之间，把导火线联接成一根总导火线，直扯到我们的隐蔽地。一切安排好以后，我又叫道士来交代任务：要他带领全班在沟口放军事哨，天明后敌人进来时，人少了不打枪，在一百人以上就打枪，然后从两边山沟翻南山岭，到太湖去找蔡炳臣，如果找不到，就到英山去找便衣队，一个星

期以后到陈家河一带找我们联系。

初夏的清晨，非常凉爽。我们站在山岭上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八点多钟，敌人真的开始运兵，不到半小时，就在沟口打响了。除了看守导火线的同志外，警卫队的同志都散布在大钢岭上，故意现出目标。敌人的一个营分成四路纵队，首先向山沟里攻来，但他们发现道士的那个班向西走了，便不再前进。我就叫四挺机枪佯攻，敌人这才紧张地动作起来，然而却不按照我们布置的路线走。我又命令两挺机枪在半山坡上直接向敌人射击。这样，敌人才按照我们的意图进了山沟，而且后边又跟上了一个营。

当敌人走进炸弹网时，同志们立刻拉断了导火线，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山谷震撼了，敌兵死的死，伤的伤，滚满了山沟；敌人的旅部忙又调来两个团，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山坡、山沟就用大炮、重机枪一阵猛烈轰打。

这时，我们已爬行到鹞落坪的最高峰——探头尖的山沟里隐蔽起来了。

同志们带的一点包谷粉吃完啦，天黑后，人们才能爬到沟里坡上，扯一点野菜，用石头捣碎，在水里洗洗吃。三天以后，就连附近的野菜都吃光了。

我们正处在困难艰苦的处境，敌人又把王学森的三十二师全部开到鹞落坪、大钢岭修炮楼筑工事，一条条山沟，一座座山头都进行仔细地搜索，见到野菜就铲掉，见到溪水就下毒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找来徐海山和另外两个同志，说明我们住在山区里是为了等待去党中央的交通回来，眼前没有吃没有喝，这样多人不能等

着饿死。因此，我要他们三个人留下来等交通，其他的同志分散到霍山便衣队的根据地去。我带警卫队运动出去。交通如果回来，可到吴云霞那里和我联系。

我带着警卫队爬行了一夜，黎明前到达太湖陈家河后面横山岭下边的一条沟里，道士带着全班战士也赶来和我会合。他们周转了几天，没有伤亡。道士还拾到了国民党一份报纸。

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份“捷报”，上面印着：“一〇二、一〇三师已胜利占领老君山、天台山。三三十二师胜利地占领了鹞落坪、大钢岭。匪部手枪团三队在罗田滕家堡被我击败，匪三队队长顾士宾被我击毙。我三十二师一旅追击匪特务营，在黄安公路到桃花冲家河将其击溃，匪营长林维先带残部窜往商城……”

敌人想全部歼灭我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许特务营受到一些损失。我立即通知徐文初，要陈队长带便衣一队负责英山、罗田、商城的收容和联络；太湖、齐水、黄冈、广济由蔡炳臣负责联络。

战斗一营在万山整整和敌人打了九天，也没有能够打出山区。这时，周奇云带着部队来到山沟里。

我对同志们说：“战斗一营是我们目前一支主要力量，一定要想办法打出山区，不然就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实在不行，只有我自己去带领。”

徐文初反对说：“后面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不管，特委更不能失去领导。还是我去吧。”

“你年纪大了，又不能打仗……”

“我去。”突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原来是站在我身旁的手枪团二队队长于启龙。

于启龙在战斗中负伤，双手成了残废，伤口至今还缠着绷带。他一直跟着特委机关养伤。这时，他看到部队处在险境，挺身出来要求任务：

“何书记，你不能走，特委的工作还要你领导。请党命令我去。”

这样艰险的任务，怎能交给双手残废、伤口未好的同志呢？于启龙看到我犹豫不决，再三请求要去；我又想到姜术堂，他不带回党中央的指示，鄂豫皖今后的全盘工作怎么办呢？考虑到这里，我只好咬牙下定决心。

“于启龙任战斗一营营长，周奇云任政委，徐文初为特委的党代表。你们打出山区以后，到达桐城、舒城组织一个指挥部。我如果发生意外，由徐文初暂时接替我的工作。”

双手残废的营长和一只手残废的营政委，带领部队出发了。为了策应战斗一营的行动，配合他们打出山去，我集合了警卫队的同志们，商量通过封锁线的办法。我问：

“今天通过封锁线，大家的意见是打过去还是爬过去？”

道士班长提议说：“还是我们三班先去吧，到了那里见机行事。”

我同意说：“好吧，行动要灵活。”

道士带领全班爬上一个山头，打掉了岗楼上的地补哨，打死了联保主任，很快返回来说：

“何书记，好过啦。”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一道封锁线，然后在山沟的山树丛

中隐蔽休息。

中午，远处的枪声忽然向我们隐蔽的山沟移动。枪声中，只见徐文初爬进了山沟。他看到我，连汗都没有来得及擦一下，就急着说：

“我们一进万山就被敌人包围，现在已经把敌人带过来，周奇云带着四、五十人和两挺机枪在岭上堵击敌人。”

我说：“你先回去，尽量堵击到天黑，或者把敌人带走，不行的话，我们也打出去。”

徐文初走了不久，我就听到一阵熟悉的冲锋号，我知道这是周奇云自己在吹，可能是战斗一营在反击敌人了。不大一会功夫，周奇云又在吹集合号，战斗一营向太湖与潜山方向冲去了。

枪声消失了。我在考虑着：今天打了一天，敌人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条岭和两边的山沟的。敌人来搜索，我们上哪里去呢？上鹞落坪，敌人在二十多天内修了一百多个炮楼，大大小小形成了十七条封锁线；到英山，七十几里路中间，敌人修了五十几条封锁线。我们的四周，到处是敌人的封锁线和炮楼，真是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山顶上休息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我们便转到潜山、太湖交界岭下一片树棵子里隐蔽了一天。道士带着两个人，装做放牛和砍柴的，去察看封锁线上铁丝网上拴的铜铃子。黄昏时碰到地下党的便衣队，和他们商议了我们过封锁线的时间，决定由便衣队用棉花、纸团把铜铃塞住，使它不能发出响声，再把铁丝网和木桩子拉开一个缺口。晚九点钟，我们几个月来第一次不响枪地通过了一道封锁线，

在潜山找到了黄云先。

黄云先告诉我说，手枪团一队在将军山和敌人打了一仗，牺牲一人，负伤二人，队长邓少东也负了伤。手枪团一队的两个班长，带着十几个人找到了蔡炳臣，蔡炳臣就带着他们去大钢岭，一看情况太紧张，就回到潜山这里来。蔡炳臣临走时说，他去收容被敌人打散了的同志们。

手枪团的战士是不怕被敌人打散的，就是被敌人打散了，他们也能够主动找到组织，蔡炳臣的措施是很正确的。我叫黄云先把一队的那两个班长找来，问他们：

“你们从哪里出发，有任务吗？”

两个班长回答说：“我们从罗山仙居顶出发，因为两道桥打了七天七夜，没有能和特务营会合，军政委命令我们找特务营，再跟何政委汇合。”

“部队损失大吗？”

“三队队长牺牲啦，……”

顾士宾同志光荣牺牲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停了一会，我接着问下去：

“一营的情况你们知道吗？”

“到路西去啦。”

“道委还住在罗四区？”

“罗四区和罗一、二区全给敌一〇三师和一〇二师的两个团占据了。敌人有一个团专门追击军政委和红二十八军的主力。”

我对同志们说：“我们一定要等到姜术堂回来，有了党中央的指示，党的工作就有办法了。”

三六　党中央指示

这天晚上，哨上来人报告：

“从鹞落坪爬来了三、四个人。”

果然是姜术堂回来了。我忙带着他们走进草棚里。没有灯，想法找来一个破磁碗，倒上点油，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作灯芯，然后大家坐了下来，我着急地问姜术堂：

“你找到红二十五军没有？”

“没有找到红二十五军，找到了军委，他们没有给我信，只是叫我带回来几份文件。”姜术堂一边说一边从身上掏出文件来。

为什么没有信呢？……我感到棚子里闷得发慌，便顺步走出棚子；姜术堂跟着我走了出来。

我问他：“你在军委看到了哪些人？”

姜术堂这才向我叙述了他的经历：“我带着特委的信到了郑州，找到地下党设立的一个联络点，他们看了介绍信，说是各地地方党来的人都到西安七贤庄去，在那里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又坐车到了西安，在七贤庄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处长接见了我，要我就在办事处住下。四天后，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召见我，向我询问鄂豫皖地区的情况。我向王主任说明，我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只能把我所知道的一些简单情况，向他作了汇报。王主任给了我一些文件，并且说：蒋介石用了很大的兵力，想把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区的游击队歼灭，歼灭不了也想打垮一部分。你回去告诉何耀榜同志，叫他们尽量设法和国

民党谈判，谈判的条件文件上有。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起来，防止敌人歼灭我们。谈判时，我们的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部队集合的地点，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要使干部们认识到，谈判是为了团结抗日，绝不是向敌人投降。你告诉何耀榜同志最好找到高敬亭同志，共同组织鄂豫皖的部队和谈判。我们已派三次交通到高敬亭同志那里，都没有回来，不知什么原因。在可能的条件下，何耀榜同志最好派一个干部来，实在派不出干部，也要把鄂豫皖的部队和党的力量，特别是目前的情况送一份较详细的报告来……”

我回到草棚里，和同志们一起阅读文件，这是党中央书记处印发的文件，内容是对西安事变应有的认识，国共谈判的意义、办法和条件等。读完以后，我对同志们说：

“党中央叫我们去人，目前高敬亭同志不在这边，派干部比较困难，如果写公开的报告，姜术堂同志，你能拿出去吗？”

姜术堂说：“公开的报告不好拿出去，码头、车站上检查的很严；特别是七贤庄周围，国民党检查的更严格。最好是用密写法。”

大家开始了讨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国共合作谈判是肯定了，关于鄂豫皖地区的问题，应当找到高敬亭，由他决定。但是，卫立煌的部队首先占领了黄冈，想切断我们和鄂东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派部队去找高敬亭，来回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何况目前身边也没有部队可派。

大家的意见一致同意还是派姜术堂带着报告尽快到党中央去，到武汉后就坐飞机去西安，请党中央派人来。我们便找了一些明矾，化成水，用毛笔在土造纸上写下给党中央的报告，交给姜术堂，并派人护送他出封锁线。同时，去找高敬亭联系的交通也出发了。

随后，我对易元鳌说：

“你带警卫队三个班去桐城、舒城，叫于海青、徐文初把国共合作谈判的问题在干部和部队中作一些动员工作。你带的三个班编进战斗营，便衣队各回原地坚持工作。”

以往，党中央和我们的联系是通过潜山工委的，为了进一步了解有关国共合作谈判的问题，我便赶到潜山工委。吴云霞对我说：

“我们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快有一个月了，我向鹞落坪爬了三次，都没有找到你，真急死人了。”

他忙取出三份文件，我仔细一看，和姜术堂带来的文件完全一样。

吴云霞接着说：“根据地下党的情报，国民党一部分军队在向安庆、上海运动；卫立煌的部队和三十二师仍在大别山，他们的口号是‘清剿’不限时间，直到捉住高敬亭、何耀榜为止。”

“根本办不到。”我说着，仍然在考虑谈判的问题。我们是工农出身，文化不高，社会常识也少，真要和国民党那些官油子打交道，定有不少困难。因此，我对吴云霞说：“地下党除了供给我们情报以外，要求安庆和上海的地下党最好能以灰色的面目想法帮助我们。”

离开吴云霞那里，我们从后火山出发，穿过封锁线，经过马家畈下面的一个小湾子，黎明时隐蔽到狼家山上。

下午四点多钟，哨兵来报告："那边满山岭都是穿灰军装的敌人。"

一定是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踪，向敌人报了密，否则敌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动搜山？敌人倒林烧过的山上，幼树一簇簇生长得十分茂密，特别是带着步枪和机枪，在山上行动很是困难。我们要利用这个条件来打击敌人和突围。我决定一个班下到河沟里，先打响，引诱敌人向河沟合击；另一个班埋伏到横岭上，敌人攻上去时就地堵击。我们突围的方向和集合点是桐城、舒城。

我们只有三个班，四十多条短枪，而敌人却用了一个旅，就在这样的兵力对比之下，同志们在狼家山上英勇地和敌人厮杀起来。天色很快昏暗下来，敌人到处吼叫着："不打枪，捉活的!"同志们非常沉着，弹不虚发，边打边退，直纠缠到夜晚九点钟左右，我们才算突出了敌人合击的中心，来到一个山崖上。这时，才发现走进了绝境，四下都没有路，眼看着敌人打着火把，正在到处搜寻，我们心里更加焦急，在漆黑的夜色中摸寻道路。我似乎觉得前面是一条路，就伸出脚去试探，右脚踏上去，觉得很稳固，弯下身子一摸，是石头，我抬上左脚，同样很踏实，心想是路，可以走。刚往前走了两步，不料这竟是一块被雨水冲刷的陡壁，只觉脚下一滑，跌倒了，听到警卫员胡山修说了句："政委滚下去啦！……"以后，我就失掉了知觉。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天空和星星，听到的是

小河沟潺潺的流水声。这是怎么回事？我躺在什么地方？我轻轻地抬起手，摸摸身上，缠着许多葛藤；再摸摸身旁，一边是几棵树，一边是斜石。这才明白，我是从悬崖上滚下来的，葛藤和这几棵树把我挡在半山腰。再摸摸身上的枪和子弹，还都在。我掏出怀表，划亮一根火柴看看：时针指着午夜十二点。四周很寂静，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枪声。我更清醒了，知道掉了队。活动活动身子和腿脚，虽然有些痛还能动。我扶着树干慢慢坐起来，发觉身下是个陡坡，我只好用手抓住树棵，慢慢伸下脚去，慢慢溜下河沟。

我爬上了一座山岭。根据星星来判断，是在狼家山西面的山岭上。再往西去，便是岳西县便衣队四分队的活动地区，往南走，是潜山工委吴云霞活动的地区。但是，敌人在各处堵塞了路口，我又穿着一套灰军衣，怎样才能找到同志们呢？

时间已是下两点。先走着想办法吧。我试探着往西走，顺着放羊小道，发现前面有个棚子。摸到近前，发现绳子上挂着一件上衣，我连忙取下来，再看看四周，棚子前面有个盆子，便轻悄悄地走过去，伸手一摸，捞起一条裤子，心想，我必须把便衣换上，才能通过敌人把守的路口，回到同志们那里。可是，又不能随便把人家的衣服拿走呵！我搜了搜身上，还有些钱，便放在盆子旁，用一块石头压住。然后，我抱着水湿的衣服顺小路跑去。

走进一片棵林，我脱下了军装，把上衣和那条湿裤子，也不管合身不合身，就穿上了。然后检查了武器，又把军装埋起来，一切准备停当，便倚在一棵大树旁休息，想等到天

亮再行动。

天色发亮。我看了看身上的衣服，不由得大吃一惊，竟穿着一条女人的裤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坐在地上，只好把裤腿上的花边扯掉。

上午九点来钟，三十二师的炮、车、人、马络绎不绝地经过林外的公路，向狼家山拥去；狼家山和两边的山沟里，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直到天色黑透，我才走出棵林。在闷热的棵林憋了一整天，又饥又渴，觉得头很晕，眼前老发黑，两腿酸软，我渐渐地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又来到一座草棚子，我就在棚子旁边的树下蹲下来，休息休息，抽根烟。

屋里的人还没有睡，不时传出小孩的哭声。突然，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锄头，带着一只大狗走出棚子，朝着树下走来，我忙把烟头弄灭，看来他还没有发现我。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不能让他先动手。我便立刻行动，用枪指住他问：

“谁呀？”

“是我，”那人答道，“你是周队长吗？”

他扭脸一看不是，拔腿就向山沟里跑去了。一会儿，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根据他的问话，我知道这里是便衣八分队周队长的联络点。可是，他不回来我又有什么办法？我只好走近他的棚子，喊他的女人：

“嫂子，嫂子……”

不管我怎样喊，她硬是不起来，也不答应。蘑菇了好

久，她总算答应了，起来开了门，放我走进棚子。

她又盘问起来：“你是谁呀？”

“我是周队长。”

“老徐不是出去了吗？”说着，她仔细地一看，不认识我，连忙说：“管你是干什么的，我这里没有人，我男人叫你们打的要死，昨天才回来，你们又来作什么？快出去，出去！……”

她一连串说了这许多，一边又忙着推我出来，弄得我有口难辩，左右为难，我只得顺着她走出棚子。

到哪里去呢？他一家肯定是基本群众，可是他躲在山沟里不出来，能有什么办法？不过，他既然到山沟里去，里面一定有隐蔽的地方。想到这里，我便决定也进山沟里去隐蔽，等明天晚上再来找他想办法。

不料，第二天晚上我来到草棚子时，他们一家人已经搬走了。

我万分失望地离开草棚子，沿着小路漫步向前走去。刚走了不远，忽然碰到十几个锄秧草回家的人。他们看到我就大声地喊叫起来：

“谁呀？……”

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十几个人便四散向炮楼跑去。我没有办法再隐蔽，只有跟着他们跑。炮楼上看到人们乱跑就打枪，却找不到目标。我趁着混乱的当儿，抢过了到潜山去的封锁线。翻过一座山头，下到半山腰一块石头上，不想石头是活动的，连人带石头一起滚下山去。这一次虽然没有跌昏，可是跌得腰酸腿痛，头上、手上和脚上也都被跌碰得鲜血直流。

漆黑的深夜里，我摸到吴云霞一个联络点的门前，发出了暗号。老太太开了门，我刚走进屋里，吴云霞和老太太的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看到我成了个血人，机灵的女孩子忙给我端了一盆水，又马上送来一碗开水。吴云霞还没顾上和我说两句话，易元鳌却一头撞了进来，抓住我的手就说：

“咳，你可回来了。自你掉下山崖以后，有的同志哭了好几次，真把我们急坏啦！”他缓了口气，紧接着说：“为了找你，我们刚来不到两个钟头，警卫队都在山上隐蔽。不过，我们也把目标拖来了，看情况，敌人想在这里合击，你看打出去还是在这里隐蔽？”

吴云霞说：“打出去很困难，最好到后火山上竹林里隐蔽起来。”这片竹林纵横有五、六十里，几十年没有砍过，不但竹子茂密，里面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这里边我很熟，在离出口不远的地方隐蔽八、九十个人满可以。敌人不知道路，根本进不了竹林，他们总不能一下子就把竹林削平了！”

听吴云霞说完后，我和她及警卫队全体同志都进入竹林隐蔽。

天刚麻麻亮，女孩子进来了，告诉我们说：

“国民党军队天一明就把这里包围起来。我躲在沟里，他们把我妈妈抓住捆起来，还在打她。”女孩子擦着眼泪，继续说：“我来的时候，看到路上有你们走的脚印，我用小木棒拨了竹叶盖好啦。”

我们安慰了她一番后，叫她暂时不要出去，就在竹林里一起隐蔽。

敌人不敢进竹林里来，只在外边发狂，胡乱地打了一天枪炮。

傍晚，竹林外到处响起了敌人集合的号音。敌人走了没有？是回碉堡去了，还是就在附近露营？女孩子似乎看出我们的意思，凑近吴云霞身边，轻声地问："吴老师，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什么。"吴云霞含含糊糊地说。

"吴老师，我出去看看我妈，好吗？"看到吴云霞瞪大了眼睛，女孩子坚持说："我不怕，反正我是个学生。"

吴云霞想了想，这才说："好吧，快点回来。"

女孩子一听老师已答应自己的要求，高兴地向竹林外轻捷地走去。

我和吴云霞又谈到党中央的指示，我告诉她：

"我们已经准备出面和国民党进行谈判。"

"谈判？和敌人谈判！"易元鳌在一旁听到我们的谈话，立刻把身子磨了过来。

"为了团结抗日，我们要和国民党谈判……"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易元鳌一把抓住我，粗声粗气地说：

"老何，你要想向敌人妥协投降，叛变革命，你看清楚！"他拍了下腰中的枪，"我一枪先把你敲掉！"

我了解易元鳌的性格，知道他对革命赤胆忠心，尽管他这样鲁莽，我一点也没有生气，只是耐心地对他和警卫队的同志们解释说：

"国共谈判是党中央的决定，目的是为了团结抗日，绝

不是向敌人妥协投降……”接着，我把党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扼要地向大家作了解释，易元鳌这才平静下来。

约莫过了半小时，女孩子返回来了。她对大家说：

“国民党军队向东走啦，他们把我妈带到东山岭上才放回来。家里煮了点粥，妈叫你们快回去吃。”

走出竹林，大家在湾子里吃了点粥，我又对老太太安慰了一番，才和吴云霞分手。

三七　准备谈判

在蛇林岗下边的山沟里，我和陈明江联系上以后，便进入便衣四分队的根据地。

我把党中央的指示对陈明江谈了一下，而后问道：

“你和鹞落坪上的三队有联系吗？他们有人来没有？”

“黄子香同志去联系了，还没有回来。你在这一带休息几天吧，这里的联系工作还好，可以在林子里住，就是敌人清乡也没有问题。”

陈明江当时就找了个地方，安置我休息。

午夜，便衣队指导员黄子香回来了，找到我说：

“我没有到三队，在联络点上碰到三队来的人，说是徐文初、黄云先因为听说你被敌人打掉，就用特委的名义发出通知：除桐城、舒城和我们这个队外，要特务营、战斗营、各地的游击队和便衣队都行动起来，向敌人发起进攻。”

据黄子香说，各处都打得非常激烈，鹞落坪上的敌人只有三十二师一个团看守，其他的兵力都散开啦。由于我方部队处处打击敌人，敌人也就处处还击和搜山。我们的五、

六、八便衣队的处境最紧张。手枪团一队在鹞落坪上整整和敌人打了两天两夜，昨天一队抽下了山，卫立煌的两个团和三十二师的一个团发生误会，自相残杀了一夜，便衣三队有人看到敌人今天从九河向岳西抬了很多伤员。据说，手枪团一队副队长殷绍礼在鹞落坪战斗中负了重伤，被敌人抬到岳西县去了。

高敬亭是跟手枪团一队行动的，根据便衣三队的情报，他很可能是过来了。

我和易元鳌刚走到军政委住的院门，房里值班的队员立刻喊醒了军政委。我走进屋子说：

“军政委来了。”

高敬亭很快从黑布抬子上起来，一把抱住我，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看到他这样亲热和激动，我还是第一次，对他说：

“军政委路上辛苦了。我听说手枪团一队在鹞落坪战斗，估计一定是军政委来了，就赶来见你。”

大家坐下来。高敬亭看了看易元鳌，而后对我说：

“我不辛苦，和你们一样。听陈明江说，你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

我回答说：“信是没有，只有红军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的口头指示，和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份文件。”

高敬亭问，“指示，说些什么？”

我把王稼祥主任的口头指示复述了一遍，接着忙取出文件递给他。

“王稼祥主任的指示是真的，谈判是可以，但可不能投

降。”高敬亭翻看了一下文件，“这文件我也得到了，不过不是真的，也不是中央送来的，是地方党送来的，所以送来三次我都没有回信。你这个是中央送来的，一定是真的，我们两个都看不懂，叫陈明江来读给我们听听。”

陈明江把文件反复读了三遍，高敬亭听完以后，说：

“意思是差不多，就是字句不一样，以前的文件定是假的，这个是真的。”

我说：“军政委，我把半年来皖鄂边的情况汇报一下吧？”

“不用，陈明江已汇报过啦，大概的情况我已知道了。你们这边还有这样大的力量，鄂东在敌人的‘三个月清剿’中受损失很大。红二十五军所指定的鄂豫皖省委的常委，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啦，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来，在这个全国性的大变化中，一定要把各项工作做好，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代表省委决定：从现在起正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我问他：“我们虽然有一些准备工作，由于没有省委的决定，没有进行谈判。如果确定谈判，军政委你看选择哪个地方合适？”

陈明江建议说：“这里就比较合适，我们有些联保工作，要是写信，可以送到蛇林岗的炮楼里，由岳西县三区区公所转递。不过，就怕敌人发觉军政委和何政委都在这里，要是被敌人包围起来，情况就紧张了，请你们考虑一下。”

高敬亭说：“中央叫打着谈判，我听说你们把特务营补充起来啦，手枪团三队也收容起来了，我也把手枪团一、二

队带来了。那么，你们就通知手枪团、特务营、战斗营都到这里集合，先打响，再谈判。”

我对高敬亭说，党中央指示不能把部队全部集合起来，这样容易被敌人歼灭。国民党一向不讲信用，要流氓手段，在湖南，我们把部队集合起来，国民党无耻地以“误会”为名，把我军打散了，使后来的谈判遭到损失。因此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通知主力部队在外围作战，我们带领交通队和警卫队在里面谈判，万一敌人包围我们，我们里外接应，也可以冲出去。另外，我们两个人不能同时出面，敌人知道我们两个人同在一个地方，必然用最大的兵力来捉我们，如果都被敌人捉去，谈判就无法实现了。

高敬亭听了，高兴地说：

“对，王主任的指示真详细，他还顾及到我们的力量，这才真是中央的指示。你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就这样决定。今天晚上，先叫陈明江根据我们的意思写一封信，明天送到三区。其他的具体问题由你去布置。”

一九三七年七月，红二十八军发布命令：手枪团、特务营、战斗营、各工委、游击队、便衣队为配合国共合作谈判，立即全体动员，与党、群配合散发有关谈判的传单、标语，并供给外线情报。

第七章　谈判前后

三八　拉开架子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皖鄂边岳西县三区蓝田村，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主动向国民党提出进行国共合作谈判。

蓝田村座落在山上，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它的附近有国民党三十二师的一个团。我们派人把公函送到山下的蛇林岗炮楼里，由岳西县三区区公所转交给国民党"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督办卫立煌。

当天中午十二点钟，从蛇林岗炮楼来了一名乡丁，送来一封信："高敬亭先生：我方愿意形成谈判。兹派我方代表赵先生前往蛇林岗炮楼，请你们也最好派人到蛇林岗炮楼里来，作第一次交谈。"下款是"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岳西办事处"。

敌人行动得好快呵！谈判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有准备，敌人是没有准备的。再说，敌人即使很快地接到信，也总要有一番周转，绝不会来得这样快。

在一间矮小陈旧的小屋里，高敬亭和我几个人坐在用门板搭的床上。正是夏天的中午，天气很炎热，每个人又肩

负着沉重的担子，小屋里就如一个蒸笼，闷热、烦燥，汗珠不时往下掉。大家都在考虑着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显然，这是敌人的圈套，是一个阴谋，很可能是想把高敬亭和我诱进炮楼，加以杀害，而后动用重兵把我们的武装消灭在蓝田，这是敌人一贯使用的卑鄙伎俩。但是，又不能不去，如果不去，不仅无法实现党中央的指示，而且敌人必然会造谣说我们对谈判没有诚意，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没有诚意，甚至于会影响到全国范围的国共合作谈判。

形势摆在面前，我们是非去不可。

"军政委，要谈判就不能不冒险，更不能怕牺牲，就是牺牲也是为了党，我看，还是我带一班人去看看情况。"我停顿一下，等待高敬亭的同意。但他一直在沉默着。我又补充说："情况变化很快，要早点作出决定。我走以后，部队由易元鳌负责，路线，陈明江最熟悉。事先一切都要准备好，发现情况立即进入战斗。炮楼里要是出了事，你们听我的枪声为号。"

没有其他更好、更妥善的办法，最后只有这样决定了。

临走的时候，高敬亭握住我的手说：

"今天的谈判是你亲自去……你一定要多加注意。"

我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走到蛇林岗炮楼附近。国民党的那位代表先生架子十足，竟坐在炮楼上不出门，门口的哨兵满神气地立在那儿。自然，我们也不能马马虎虎地进炮楼，就在不远的一座凉棚下坐下来，乘凉休息。

一支烟没有抽完，从炮楼里走出来几个人。到了我们面前，为首的一人自我介绍说：

“我是本区的区长，姓李。贵姓？”

我站起来回答说：“我是红军八十二师何师长的警卫队长，姓吴。”

“噢，吴队长，请稍候一会。”

说着，李区长急忙返回炮楼，随即带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到凉棚下，为我们互相介绍说：

“这位是岳西办事处的联络参谋赵先生；这位是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何师长的警卫队吴队长。”

姓赵的挪动着屁股坐下来，故意慢腾腾地、装腔作势地说：

“你们的师长呢？不见他，是不能谈判的。”

看到他那股酸劲儿，我心里不由得暗暗发笑。

“我是奉我们何师长命令来的，是和你们接头，并不是谈判。你们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达给我们何师长。”

姓赵的开口就泄露了他们的阴谋：

“那好，咱们就摊开来谈吧。吴先生，交一挺重机枪五百元，轻机枪一百五十元，盒子枪一百元，长枪八十元。你们的官，到我们这里来还当官；你们的兵，到我们这里来都当排长。”

“赵先生，你是奉谁的命令来谈判的呢？”

“我是奉卫督办岳西办事处的命令来谈判的。”

“这不是谈判，是做买卖。你回去问问卫立煌，他是真心谈判，还是假谈判？是想当亡国奴，还是想团结抗日？”姓赵的呆头呆脑地听着，“这样吧：我们的师长离这里不远，我们的枪也都在这几条沟里，我回去报告师长，再请你们一同

去看看，或者叫你把枪拿回去。”我懒得和他纠缠，想着脱身回去。

“好吧，你回去告诉何耀榜，叫他不要走，我回去告诉我们长官。”

“放心吧，何师长是不会走的。因为国难当头，为了挽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当亡国奴，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这正是我来谈判的目的，不象你们这样胡说八道。”我抓住这个机会，教训了他一顿：“你要知道，你们打了十年内战，共产党没有被你们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今天想叫共产党投降，那是做梦！你们要活捉高敬亭、何耀榜，你们捉到了吗？就是被你们捉住，鄂豫皖还有千百个高敬亭、何耀榜。老实告诉你，我们提出来谈判不是随随便便的，是奉有我党中央的指令。”

谈话之间，李区长从炮楼里走出来说：

“赵参谋，我刚才打电话给方县长，他说卫督办有命令，不管在任何地区，如果有高部发起谈判，当地的军队不得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但不能给他们麻烦，而且还要供给他们的给养。方县长一再嘱咐说，这是国家大事，事关重大。”

恰在这时，又有人来喊赵参谋去接电话。他进了炮楼，很快就返回来，神色有点变了，慌张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谈判的条件。办事处叫我现在就回去。少陪了，少陪了。”

我说：“赵先生，你回去转告你们的卫督办，以后的谈判问题由岳西县三区转达。这里离县城不远，我们等到晚六

点，你们打电话给李区长，要他去见我们的师长，表示你们对谈判的态度和诚意。不然，发生了武装冲突，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我转身对李区长说：“我党中央和国民党谈判中有一条规定，我部住在哪一地区谈判，由当地国民党政权供给给养。从今天起，你们每天至少要供给十石米。我来时，何师长说：如果没有粮食吃，部队明天晚上就开到岳西县城附近。”

李区长忙说：“吴先生，晚六点不管岳西县有无指示，我一定到友军驻地求见何师长，听取指教；只是不知能否见到何师长？”

我笑着说：“李区长，我留下两个人，六点钟你们从大路上来，我在外面迎接，保你见上何师长。”

我回到蓝田时，高敬亭正等在村头，迎上来说：

“我一直用望远镜看着你们，那里每个人进出，我都看得很清楚，身上都汗湿透了。直到你上了山，我才放心。”

说着，我们一同走进了屋子。

我把在蛇林岗的经过，向他叙述了一遍，然后提出我的看法：由于谈判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敌人措手不及，派来的人没有准备，不是真来谈判的。一方面，他们以金钱、官位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的态度；另一方面，企图以军事力量来威胁我们，使我们在谈判中的条件低于党中央提出的条件。同时，敌人即使答应谈判，在一两天内很可能先派军队来直接威胁我们，就是他不另派军队来，三十二师也在我们附近，王学森是相当反动的。因此，我估计今夜就有被三十二师包围起来的可能，这样我们就应当做好全面的准备。

接着，我对高敬亭说：

“我是要留在这里的，就是牺牲也是为了党。不过，军政委最好带交通队和警卫队的一部分，到鹞落坪上面去。估计三十二师一定要从鹞落坪上压下来，到青天畈和九河一带；鹞落坪上就可能是空虚的。不知军政委的意见怎样？”

高敬亭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不愿意上鹞落坪。他说：

“现在鄂豫皖省委仅剩下我们两个人，如果你牺牲了，我失去了左右手，今后的工作更不好办了。这样，我两个在一起，有时候还可以给你壮胆。敌人包围我们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见得会同我们硬打，而是威胁和诱降。情况万一紧张时，我们一同冲出去。”

下午六点钟，李区长果真来了，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吴队长，方县长说，单是岳西办事处和你们谈判，怕你们不和他谈，因此叫我来看看何师长，如果何师长在这里，卫督办可能派他随身的少将高级参谋刘刚夫先生和政训处丘处长来，同友军开始正式的谈判。吴队长，不知何师长能否接见我们？”

“我就是何耀榜。”

听到我的回答，李区长大吃一惊，楞在一旁，不眨眼地看着我。过了一会，他似乎明白过来，吁了口气说：

“何师长，王学森的部队正在运动，你们住在这里不能说完全没有危险，你们还要加意提防。”见我没有吭声，他又表白说道：“何师长，请你相信，我是信阳人，是董必武老先生的学生，我虽然没有参加革命，自从当了区长，就和本区

的便衣队有联系。……我来时准备了一些东西，不敢叫老百姓送，离这里只有几里路，请何师长派人抬回来。”

我随即把管理科长杜立保叫来，让他带些人跟李区长去抬东西，并要他分一些东西给区公所的乡丁们。谢谢他们的帮忙。

天黑后，我到各处查过哨，顺步走到了一座山峰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点点堆堆的篝火，激烈的枪声震荡着夏夜的山谷。我们处在敌兵的重围中。

回到小屋里，高敬亭和我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互相商议着眼前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直到黎明，陈明江进来报告：王学森已将三十二师全部开到我军驻地附近露营，后面还有军队在继续运动。手枪团一队埋伏在霍山和潜山的交界岭上，和三十二师打了一整夜。三队在后火山一带不知跟哪个部队也打了一整夜。

我对陈明江说，为了谈判，我们是不能走的，你们把敌人包围圈内外的联络工作一定要布置好，送信如果有困难，就用传呼的方法。另外，你们动员基本群众多找一些铁锹、锄头，配合战士们在所有的大路上、山头上筑起集团工事来，越快越好。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按作息时间叫号兵在山上吹军号。

中午，岳西县派来了民政科长，锣鼓喧天地送来了一百多挑子酒、肉、鸡子等，名义上是来慰问，实际上是来探看我军的实力。我抓住这个机会，对群众讲了话，说明我党提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对杜立保说：老百姓为了给我们送东西，在炎热的夏天走远路，非常辛苦，每人发一块

钱，给乡亲们喝水。

这时，一名新闻记者请求我接见他并发表谈话。我认为，红二十八军真心诚意地提出谈判，国民政府到现在还没有派代表来，所以谈判能不能形成，还不能决定，目前没有必要发表谈话。但是，那个记者仍然找来了，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你就是何先生吗？”

“我就是何耀榜。”

“你们的高军长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河南。”

“何先生来谈判，是否有毛先生的指令呢？”

“我们党中央有指令给高军长，高军长指令我在此地向贵军主动提出谈判问题。”

“何先生是否是红二十八军的正式代表？”

“我是高军长特派的红二十八军的正式代表。”

“我听何先生说是和国民政府谈判，如果卫立煌先生派代表来，何先生是否和他们谈判呢？”

“如果国民政府令卫立煌先生派代表来和我们谈判，是可以的。谈判能否成功，决定于国民政府的诚意如何。”

“何先生当代表是否是固定的呢？”

“不，我不是固定的代表。我是谈判局部的停战问题，凡属全国性的问题，由我党中央决定。”

“何先生今日所谈的，我们能发表吗？如能发表，我们要求照一张照片，可以吗？”

“可以。”

下午五点多钟，李区长来了，他告诉我王学森的三个旅已经全部调来，正在赶修工事。并且说：

“关于这里的谈判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已经知道了。”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国民政府叫安徽省行营也派人来了，他姓郭，是个副官，他是代表地方上的，明天到达岳西县，可能到三区来。方县长在电话上说，卫督办派来的代表因为天气热，今天没有赶到岳西县。”李区长停了一下，而后小心翼翼地说：“我看，你们和三十二师是处在战争状态，何师长是否能和王学森先谈一下，双方取消战斗状态？”

我回答李区长说：“王学森用全部兵力将我们层层围住，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的部队是打仗的部队，绝不会怕他。根本没有和他谈判的必要。”

傍晚，我把一天的经过向高敬亭作了汇报。高敬亭说：

“昨天一夜虽然打的很激烈，我们受的损失可能不大；估计今夜就不会那样顺利了，我们的部队和群众可能受到较大的损失。”

我告诉他，陈明江这里保存了很多炸弹，已在各山沟埋了一部分。敌人过去吃了几次埋伏战的苦头，再不敢轻易进山沟。还剩有一部分炸弹，可以安埋在第二道工事里，形成炸弹保卫线。如果敌人胆敢向我们发动攻击，我们就用四个班堵击敌人，看守炸弹线，等待时机给敌人一个杀伤，我们乘机带领另外三个班从山沟里打开一条血路冲出去，去潜山找特务营会合。陈明江已派人去和他们联系，还没有回来。如果战斗营能和手枪团各队联系上，我们就可以

里应外合，他们会把我们接出去的。

高敬亭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谈判可能形成。明天是第三天了，国民党应当有正式代表来，如果明天一不来代表，二不退兵，我们就突围。

我还有一种看法：敌人包围我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威胁我们，使我们降低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想用重兵包围使我们动摇而突围，这样，他们可以乘机歼灭我军，并且把罪名强加在我们的头上，说我们要谈判又没有诚意，不单使我们的谈判遭到失败，而且给党中央的谈判也会增加困难。因此，敌人不打响，我们就不突围。

高敬亭和我正在研究情况，陈明江回来了，说是手枪团的三个队都在敌人的外围，已和战斗营、便衣队取得了联系。敌人除王学森的三个旅以外，还有安徽省的四个保安团，把我们里外围了四层，且在各山岭上准备了柴草，好在打响后用来照明。根据各工委的汇报，昨夜凡是接到通知的部队和便衣队都动作起来了，今夜向包围我们的三十二师发起总攻击。

午夜十二点钟，手枪团三队爬过敌人四道包围圈，进到了蓝田。我立即叫杜立保烧热水给他们洗脸洗脚，并且煮饭炖肉，让战士们饱吃一顿。然后带着三队的负责同志来见高敬亭。

一见面，高敬亭就说：

“三队真不该来，来了也要突出去。”

三队来了正是个好机会，我忙对高敬亭说：

“军政委，三队是来保护我们的，确是一番好意。现在

不只是干部，就是每一个战士，都在为谈判的成败和我们的安全耽心，今夜他们又发起总攻势，这样看来，我们在外围的力量还是有的，他们机动地牵制住敌人，减轻了我们的危险。”高敬亭表示同意我说的话，于是，我建议：“下一点叫三队出发，隐蔽着走出敌人的一、二、三道包围圈，到第四道包围圈时，就公开地向外打出去。敌人如果有意谈判，就不会强攻和追击三队；如果敌人向我们发动攻击，我们埋伏的炸弹可以给敌人苦头吃。”

高敬亭对三队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就按照何政委的指示去作吧。”

我对三队副队长补充说：“我们如果突围时，就在附近烧起大火，你们看到火光后，就和手枪团一队分作两路来接应，一路从蛇林岗来，一路从九河来。”

三队走后，我信步来到一个山峰上。四周的山头上、山坡上，到处是敌人的篝火，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晃动着的人影。四野炮声隆隆，炸弹、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这时，高敬亭也来到山峰上。他缓慢地走近我身旁，向四外注视了一会，然后说道：

“外面能再打两夜，谈判有可能成功。不过，这样打就怕我们自己的伤亡太大。”

“不会的。我们的战士打麻痹战是有经验的，他们不会去硬攻，估计伤亡不会大。”

经过一天的忙碌和炎热，能够站在山头上，享受着夏夜的凉爽，是十分惬意的。然而我们的心头并不轻松。这时，我正惦记着三队，心想三队已出发一个钟头啦，该快到第四

道包围圈了，不知究竟敌人打不打。

突然，在敌人第三、第四两道包围圈之间，爆发了十分激烈的枪声。我和高敬亭专注地倾听着。枪响的时间继续并不长，不久，便开始疏落了。

山风吹来，身上稍微感到有些凉意。东方在渐渐发亮，高敬亭已有两夜没有睡觉了，我劝他趁早晨凉爽的时候，去休息一会，说不定上午还有事情。

在返回住屋的路上，高敬亭仍然惦记着说：

“你估计三队的伤亡大吗？”

“枪声虽然激烈，但时间不长，敌人大概没有追击三队。”我回答说。

谈判已经拉开了架子，敌人想消灭我们更没有可能。

三九　紧急关头

上午，枪声停止以后，敌人开始慢慢向我们推进，把我们围困得更加紧密了。敌人的前哨已靠近了我们的哨位。

李区长来了，告诉我安徽省派来的郭副官经过岳西，已经到了三区。郭副官看到这边的情况，就给王学森打电话，说他的军队围的太紧，谈判的代表不好出入，要他们退出一个路口来。王学森要是能够让出一个路口，郭副官可能到蓝田来。李区长最后问我：

“郭副官现在炮楼里，何师长是去呢，还是叫他来？”

“那就请他来吧，我们各走几步，到哨位附近见面；也请他来看看：国民党军队把共产党谈判的代表里里外外包围起来，究竟是什么企图？”

李区长下山不久，便领着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哨位附近，为我们相互介绍说：

“这位是何师长，这位是郭副官。”

郭副官寒暄了一番，而后才说：

“我是为了国家大事，来真心实意谈判的。在外面不好谈话，我愿意跟何先生到贵军驻地去交谈。”

我们一同走进了蓝田我的住房里。房间很小，连一条凳子都没有，大家就坐在用门板搭成的床铺上。有心眼的传令兵，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了一把土茶壶，放在摇摇晃晃的破桌子上，每人面前放了一小洋磁碗白开水。

郭副官开始谈到他的使命：“因为贵军在安徽省地区内和卫立煌先生举行谈判，所以南京国民政府要安徽省派人来协助谈判，这就是我来的任务。我愿意在双方正式代表没有接触之前，先与何先生随便交谈一下。何先生，你们的谈判是否有贵党中央毛先生的指令，才提出来谈判的呢？”

“我是红二十八军的代表，只能代表鄂豫皖地区的局部谈判，一切涉及全局的问题，都由我党中央最后决定。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昨天贵军的记者来访问时，我已作了答复，想必郭先生已经知道了。”

“何先生昨天的谈话，今天报上已经发表了。”郭副官说着，取出一张报纸递给我。

我接着问他：“卫立煌先生命令王学森的军队包围我们谈判代表，郭先生来时看到了吗？这难道是对谈判有诚意吗？”

他回答说：“卫立煌先生已经下令：在发起谈判的地区

内，我军不得随便打枪，特别是住有代表的地方，并且不允许对代表有任何侮辱和伤害。如因当地驻军而使谈判不能形成，一律由当地驻军负完全责任；如共方逃走，则由共方负责。”

“郭先生是听到的呢？还是看到了电文？”

“我在办事处时，他们拿来电报，我亲眼看过的。”

看到郭副官还有些诚意，我便向他讲述了党中央提出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国民党军队对我们疯狂的进攻，岳西县办事处那位赵先生的威胁和诱降，王学森全师及安徽省保安团共十三个团的兵力里外四层包围我们的谈判代表，以及国民党的正式代表至今未来等等。他表示说，这些是应该由国民党政府负责的。不过他不是正式代表，只能把这些问题转达给岳西县办事处。分手时，他说：

“请何先生放心，谈判是一定能成功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会搭桥到底。”

郭副官能说出这几句话，是很难得的。

下午五点来钟，李区长送来卫立煌七月十六日的信，主要内容是表示愿意谈判，并派他的少将高级参谋刘刚夫为正式代表，随带丘处长来到岳西，请我们的代表到岳西县谈判。

晚九点多钟，陈明江走进我们的住房，报告说：

“手枪团二队全部爬行进来啦。昨夜的战斗，部队伤亡不大，就是地下党牺牲很多，潜山吴云霞同志领导的工委全部牺牲了。”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同志们的心情十分沉重，默默无

声。小小的房间里更加闷热逼人。

长时间的沉默以后，高敬亭终于开口说道：

“根据你们的汇报，潜山工委是能接到中央指示和外援力量唯一的联络点，为什么全部牺牲了呢？我们的部队受损失不大，敌人怎么恰恰就打中了我们的要害？”高敬亭认为，这里面可能有托派，敌人是想首先切掉我们的外援，使我们和中央失掉联系，从而使我们在谈判中陷于孤立。卫立煌的信和那个姓郭的，很可能是来麻痹我们。因此，我们目前的处境相当危险，随时有遭到敌人围歼的可能。接着，高敬亭又说：“敌人向我们进攻时，就是拚死，也不能让敌人捉一个活的。”

我认为高敬亭的分析是正确的，今夜明晨，确实是最严重的关头了。敌人如果在夜晚向我们发起攻击，虽然会有伤亡，我们还是可以冲出去的，要是敌人明晨向我们进攻，那就更困难了，伤亡必然会更大。手枪团一队和三队都已经分配了任务，二队既然进来了，就把他们留在这里，敌人当真向我们进攻时，我们这一百五、六十人是可以拚出一条血路冲出去的。敌人如果真心谈判，明天应该有正式代表来，但是，敌军不退后二十里外，我们就不去岳西谈判；如果明天敌人仍然没有正式代表来，就证明敌人没有诚意谈判，我们也就不再跟他们纠缠下去。

潜山工委全体同志牺牲，这是我们最痛心的，断绝了中央的指示和外援，使我们在谈判过程中的困难增多。我的意见是要陈明江同志派人去了解情况，看这个工委的同志们是因为敌人估计到他们在谈判中的作用而被捕牺性的，

还是由于他们没有经验，在组织力量同敌人斗争中牺牲的，待了解到确实情况，然后再加以研究分析。

陈明江离开我们后，高敬亭问我：

“除了这个工委，你们是否还有第二个联络点和中央取联系呢？”

我告诉他：“第二个联络点在九江，但自从敌人的‘三个月清剿’以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秘密，只有我亲自去才能接上关系；显然，眼前我离不开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地下党的同志，党中央关于谈判的指示就是他联系上的，我又派他到西安去了，已经走了一个月，估计他快回来了。他回来的快，可能党中央有详细的指示；他如果回来的慢，可能党中央有人来。”

我走出闷热的小屋。四周的枪声比昨夜更加激烈。看看天色，已近黎明。我立即命令部队赶快吃饭，作好战斗准备。当我返回小屋时，高敬亭对我说：

“敌人一夜没有行动，他们一定是知道我们人不多，想在天明后歼灭我们。”

严重的时刻逼近了。我们统共才有一百五、六十人，而四周的敌人却是十三个团，好几万人。流氓成性的敌人，如果背信弃义地向我们合击，难道我们就等待着全部牺牲、束手就擒？不，这是敌人的妄想，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为了党，为了保存鄂豫皖的革命武装，我们一定要拚出去，就是我牺牲了，也要想办法叫高敬亭和一部分同志突出敌人的重围，让革命的熊熊火焰，烧遍鄂豫皖、大别山！

我下定决心，对高敬亭说：

“军政委，军队已经准备好了。你最好带手枪团二队和警卫队的一部分战士，埋伏在我们的第二道工事外边，一旦敌人发动攻击，我就带领少数同志冲到沟里，敌人必然要堵击和追击我们，乘我们带动敌人的机会，你和同志们突出去；如果不能带动敌人，我们就拉响炸弹网，与敌人同归于尽。敌人看到我的尸体，也就满足啦，你们要抓住时间离开这里……”

高敬亭仍然在犹豫。见他不下决定，我坚持说：

“军政委，现在你还没有出面，敌人不知道你在这里。你突围出去，保存了革命力量，还可以重新和敌人进行谈判。”我开始一一地向他交代手续。“皖鄂边的财政是徐文初管理。另外，大钢岭上埋着一千八百个银洋，我的警卫员胡山修知道，你把胡山修带去吧……”

听到这里，高敬亭和在一旁的易元鳌、胡山修同志都感情激动，流下眼泪。我心里也很难过，眼看就要和亲爱的党、和亲爱的同志们分别了，不过，我尽力抑制着自己。

我把一切布置就绪，已是十九日早晨七点钟。这时，易元鳌走来说：

“何政委，敌人已爬到我们第一道工事里来了。”

“叫号兵照常吹开饭号。你派人到原有的哨位上去，看敌人打不打。敌人要是打枪，你们就甩手榴弹。”

我继续密切地监视着敌军的一举一动。上午八点钟，胡山修跑来说：

“军政委从望远镜里看到蛇林岗炮楼里出来两个人，可能是郭副官和李区长。军政委请你回房去，这一带由易元

鳌看守。”

我随即返回房里。为了保密和便于行动，高敬亭决定以军政治部“李主任”的身份出头露面，和我一起同敌人周旋。

我独自呆在房里等待。不一会，果然是郭副官和李区长来到了。郭副官首先说道：

“卫立煌先生派来的代表已到岳西县，昨天来电话说，请何先生到岳西县去谈判，由我相陪。”

“叫我到岳西县去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走以后，这里还有部队和高军长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他是来掌握谈判的。因此，你们要叫三十二师的军队后退二十里路。如果不退兵，那就不是真心真意的谈判，很可能别有用心，我怎么好轻易到岳西去呢？”

郭副官问道：“何先生到岳西去谈判，李主任去吗？”

“他不去。”

郭副官这才表示说：“为了谈判，双方应当退兵。如果三十二师退后二十里路，友军是否能够停战和退后呢？如果可以，我再打电话与岳西办事处商谈。”

“郭先生，这个村子只有几家老百姓，我们已经住了五天，加上贵军对我们的包围，各方面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上午十点钟转移驻地，原想去通知贵军，现在你们来了正好，如在转移驻地时发生问题，一切由贵军负责。”

“何先生，贵军转移驻地的时间最好改在十一点钟，十一点前，三十二师如果不退兵，发生了问题应由国民政府负责；我打电话时，三十二师如说不退兵，我立即赶来告诉

你们，如果退兵，我和李区长十二点钟再来。”

送走了郭副官和李区长，我找到高敬亭，正在交谈，传令兵跑来报告：三十二师在收哨，各处都在吹集合号。我赶到山头上，只见四面的敌人一股股、一堆堆地在集合，向后退去，直到敌人消失在第四道包围圈后面，再看不到时，我才返回屋里。这时，便衣队的同志正在向高敬亭汇报：三十二师的一个旅向岳西方向去了；两个旅向潜山方向去了。

十二点钟，郭副官和李区长按时来到。郭副官转达了岳西办事处提出的两个要求：我军今夜停止攻击和要求我在今明两天能赶到岳西办事处。我向他说明：

“李主任是我们的上级，有关谈判的问题都要经过他。我现在去请李主任来，大家见见面。”

一找到高敬亭，我说出了敌人的两点要求，请他确定。高敬亭说：

“停战问题我没有意见，关于你去岳西的问题，我要和他们讲一下条件，如果他们敢扣留你，我军就发起总攻击。”

“军政委，停战只能答应在三区内实现，其他地区通知不到。我今天可以先到三区。”

说着，我们走进屋内，我向双方作了介绍。坐下以后，高敬亭说：

“关于停战问题，今夜只能保证在岳西三区内停战，其他地区一时很难通知到；何耀榜同志到岳西，今天是到不了啦，不过可以先到三区。”

郭副官说：“谈判是一件大事情，在很短的时间里不可能结束，何先生走后，还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可能经常要来

和李主任见面和请教。”

我想，到岳西去的时间要是太长了，容易出问题，于是对高敬亭说：

“李主任，我到岳西去谈判能否成功，三天内一定回三区汇报一次。”

随后，我和高敬亭及同志们握手告别，与郭副官、李区长一同向山下走去。

三区区公所不在蛇林岗，而是在离蛇林岗五里路的南雅江小镇子上。镇头，一部分国民党的士兵和群众在等候欢迎。我走进了区公所，晚上就在李区长的住房里休息。

屋子里放着三张木床。桌子上点着一盏洋油灯。我在房间里走动了一圈，就在窗下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脑子里在考虑着：三十二师没有走完，这里留下了一个团，并且把我们的住所包围得紧紧的，这是为了什么？国民党是不讲信用的，历史上就常常耍流氓手段。总之，我要每时每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正在默想的时候，郭副官走进来了，似乎看到我独自闷坐在那儿，因此问道：

“何先生不舒服吗？”

“没有什么。”

“这里还留有一些军队，目的不是别的，他们是怕你溜走。”郭副官微笑着解释说。

“怕我走？这真是笑话，我又不是来闹着玩的。共产党作事从来不耍手腕，不卖假药。我党派我来谈判，就是真心实意。为了国家大事，我个人就是牺牲了，又算得了什么？”

李区长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同睡在一个房间，他二人

早已发出鼾声，而我还是久久睡不着，无数的问题，在我的脑中翻腾。这位郭副官，从他的表现来看，还满不错，国民党会有这样进步的人？我不由得联想到一件事：在接到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谈判的指示时，因为我和高敬亭都没有文化，恐怕在谈判时应酬不过来，希望党中央能派一位有文化、有理论的同志来协助，这位郭副官，莫非就是地下党……

四○　九河签字

早晨八点钟，我和郭副官、李区长骑着马，从三区区公所出发，一路上有许多老百姓夹道欢迎。十一点多，我们到达岳西县城门外一个沙滩上。这里欢迎的人更多了，最前面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摆成四路纵队，他们的后面，还有两团士兵的样子，最后面才是手执各种旗子的老百姓。下马后，李区长介绍我和前来迎接的岳西县方县长认识了，而后并肩走进城门。

我被安顿在一家旅馆里。刚休息下来，方县长便派人送来一纸请帖，请我们吃饭。

在国民党岳西县政府的大厅上，我和卫立煌派来的代表刘刚夫、丘处长等人见了面。他们都穿着军服，扛着肩章，神气活现。姓丘的虽然是一名校官，看到我穿着一身沾着泥巴的土布便衣，似乎不大顺眼，摆着一副爱搭不理的怪相，我自然也不去理睬他。

刘刚夫坐下来，装腔作势地说道：

“方县长虽然通知我说何先生已来到了，我因为有点感

冒，没有前去迎接，还请何先生原谅。”

我应酬说：“我本应先来拜望刘先生，因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也请刘先生多加原谅。”

“不敢当……”刘刚夫站起身来，脱下军帽，而后点头磕脑地继续说：“何先生，贵军在鹞落坪上有多少军队？”

我立即明白，他是问最令王学森痛心的、鹞落坪上的一次埋伏战。我回答说：

“鹞落坪上只有一个团。在大钢岭一带活动的常是一个营。”

刘刚夫有些惊奇，又问道：

“那么，黄冈和麻城东部的战斗，贵军有多少军队？”

“两三个营。”

刘刚夫拖长了声音说：“贵军在鹞落坪不止一个团吧？王师长在那里吃了你们一个老亏！”这家伙不由得说了实话。“黄冈战斗，我知道你们是三个营，你们三个营就抵住了我们的三个旅。现在我们要合作抗日，有了你们这样的军队，抗战一定会胜利。”

这种假惺惺的谈话，我很反感，态度比较冷淡，只是偶而应付两句。

刚吃完饭，郭副官问：

“代表先生们中午休息吗？”看到大家都表示不休息，他接着说：“何先生和刘先生都不休息的话，后面的凉棚已经准备好了，请到那边去坐。你们两位军事家见面光谈战术，现在双方不打仗啦，我看还是言归正传吧！”

大家离开大厅，向凉棚走去。刘刚夫又问：

“何先生，贵军在这一带面积有多大？”

“皖鄂边区共有几十个县。”

“贵军在两个星期内能集合起来吗？”

“单是皖鄂边几十个县里的部队，不用说两个星期，就是两个月也难得集合起来，何况连集合的地点都没有？再说，贵军仍在向我军‘进剿’和攻击，并没有停战。”

“这是个根本问题。”郭副官一旁插话说。

刘刚夫斜看了郭副官一眼，没有出声。等大家在凉棚下入座，他才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开口说：

“还是请何先生先提出条件来，我们好作商量和请示。”

我于是说道：“刘先生是鄂豫皖督办公署的正式代表，看第一步是不是先停战，然后我们再通知各部队集结。关于集合的地点，刘先生是知道的，我们的中心一向是在鹞落坪，不知贵军能否把九河、青天畈一带的村镇退让出来，作为我们的临时集合点。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如贵军不愿退让，那么岳西县、英山县或是罗田县的县城也可以，不过比较起来，岳西县城是最为中心，同时也图刘先生的方便。”

“何先生，贵军集合后的供给问题怎么办？”

“这就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而是我党中央和蒋先生谈判的内容了。”

“贵军的部队集合，用什么名义呢？”

“同样，关于我军的番号，也不是我和高军长所能解决的，而是由我党中央决定的问题。在我军集合的过程中，刘先生如能够给以方便，可以用红二十八军的名义，但不能有丝毫其他的含义，否则部队更激烈地打起来，我们一概不

负责任。”

刘刚夫作出为难的样子说：“何先生是知道的，我部早有命令对红二十八军清剿，如再用这个名义，停战中会发生更多的困难。我的意见是：鄂豫皖是高敬亭先生为军长，可否就以高部为番号？”

“这个问题我不能决定，要等回去请示以后才能确定。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首先解决停战的问题。”

“何先生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也不能作出决定，也要请示卫督办。那就这样吧，今晚六点钟我备便餐请何先生，我们再作交谈。”

下午五点半，刘刚夫派人来请，我和郭副官、方县长、李区长一同前往。刚到办事处，刘刚夫就说：

“何先生，卫督办在电话上请你谈话。”

卫立煌在电话上说：何先生所提出来的条件，我没有意见。第一，关于停战问题，我立即下令我军在各地停战；第二，关于贵军集合地址的问题，我认为何先生提出来的九河一带较为中心，县城是不够合适的；第三，友军的番号问题，这是两党中央决定的问题，刘刚夫先生的提法是不妥当的；第四，友军集合后的供给问题，暂时由当地负责，以后仍是两党中央才能解决的问题；第五，为了实现谈判和停战，我的意见是双方组成代表团，再共同组织谈判委员会，还要组织起草委员会。所有谈判中达成的协议，都要录成文字，由双方同意后签字。我方决定以少将高级参谋刘刚夫先生为正式代表，安徽省的郭副官和李区长协助。听刘刚夫先生

说，何先生对谈判表示很诚恳，我表示感谢。

我和卫立煌在电话中确定：双方组成代表团、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到九河正式谈判。我决定明早八时出发到九河去。刘刚夫忙说：

"一路同行。"

我们从岳西县城出发。下一点时，我先走到霍山到潜山的交界岭上，在一个饭店门外乘凉休息。忽然，便衣队的指导员黄子香出现了，我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路过呢？"

"昨天有电话，说是你们要路过这里，军政委叫我来找你，看有什么情况。"

我把在岳西谈判的经过说了一遍，要他回去告诉军政委，谈判问题还要组织代表团，由双方共同组织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停战的问题，请军政委作一些准备，最好能提出停战中的具体条件，明后天到九河来。另外，请军政委派手枪团三队来作警卫队，最好叫便衣队也来几个人，好跑交通。

黄子香走后不久，李区长也就赶到了，说是因为天气热，刘刚夫他们在后面休息了，明天早上才到九河。国民党这些官老爷们，一步路不走，坐在轿子上还嫌天热！李区长问我是不是在这里歇下来。我还是决定今天到九河。天黑后，我和李区长就赶到了九河。

第二天八、九点钟，刘刚夫和那个特务、政训处丘处长才慢腾腾来到了九河。

大家又在谈判席上坐下来。刘刚夫提出：停战委员会

和起草委员会是确定要组织的，但必须先研究一下停战的条件，然后才能根据双方所提出来的条件起草方案。他并且问：

“何先生提出九河是第一步的集合点，那么总的集合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回答说，为了部队集合较快起见，最好是金寨县和商城县。如果指定湖北和河南两省，那就只有信阳比较中心，便于集合。这几个地方都不行的话，最后只有湖北黄安、七里坪到罗山的宣化店一带。不过，要是在这一带集合的话，河南的部队半年也难以集合起来，要是在金寨或七里坪，安徽省内的部队两三个月内即可以集合。

这个问题争论的时间很长，最后，刘刚夫才说：

“那还是七里坪比较合适，不过我还要请示。”

就这么一个问题，谈来谈去拖了一天，也没有得出个结果，刘刚夫便去界岭休息去了。国民党的先生们每天上班的时间很少，即使来了，也是讨价还价地瞎扯一阵，难得决定一个问题。

在谈判中纠缠时间最长的就是我军总的集合点和集合时间两个问题。这时，卫立煌正要去上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忙着去当官，就想迫使我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集结和退出安徽省。

经过交谈，由我、刘刚夫、郭副官三人为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具体条款的执笔由李区长担任。每天，除了谈判之外，我还要应付国民党记者各式各样的询问、谈话。为了在谈判工作中贯彻党中央的原则，每天晚上，由陈

明江给我诵读党中央有关谈判的文件，有时要读几遍。在不违反中央文件的原则下，根据鄂豫皖的具体情况，把我们的条件在谈判席上一一提出来。

第三天，李区长给了我一份打印好了的条款草稿。当夜，我和陈明江在通往鹞落坪的一个小湾子里，找到了高敬亭，把我们提出来的条件一一读给他听。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提议说：

“军政委，明天签字还是请你去一下吧？签字前，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和我们提出的条件如有不合适的地方，还可以更改。”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天，上午八时，在九河正式举行了签字仪式。在宣读了签字条款以后，为了一句话或一个字，又是争论不休；直到下午四点钟才算签了字。

我方提出的条款主要是：1. 我军在鄂豫皖的集合点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至礼山县、宣化店一带的村镇。2. 我军在鄂豫皖三省共设三个办事处，分驻河南省确山县、湖北省黄安县和安徽省金寨县。3. 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4. 释放一切政治犯。5. 我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要与国军相同。6. 我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工具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一律由国民政府负责。7. 我军驻地如有土匪扰乱和违犯社会秩序者，有权予以镇压。8. 我军进驻七里坪途中，友军不得堵击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负责。9. 我军最后集合时间在年关以前。10。我军如有老弱残废者返乡或探亲，友军和当地政府应保障他们生命安全；如友军认为可疑者，应送我军办事处办理。11. 我军家属一律按

抗日军人家属待遇；过去鄂豫皖三省被国民党强卖之妇女等，愿回原夫原地者当地政府应予协助，使之达到目的。

12. 上述条款仅限鄂豫皖地区，凡属全国范围的问题由两党中央决定。我部番号亦由两党中央确定。

国民党代表提出来的条款，主要有：1. 不打土豪。2. 不破坏交通。3. 不得在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4. 不经国民政府许可，不能扩兵。5. 军队行动要有护照，否则不负责任。6. 友军集合后，不能在各地保留便衣队，否则按土匪处理。7. 鄂豫皖的红军在三个月内集合到湖北省黄安、七里坪。

签字仪式结束后，高敬亭、我和刘刚夫、丘处长共同进餐。席中，刘刚夫又扯到了黄冈战斗的事情，高敬亭不加留意，脱口说出黄冈战斗是他指挥的。我耽心他暴露了真身份，连忙接过话题说：

"黄冈战斗是高军长指挥的，后来因为高军长生病，就由李主任指挥。"

高敬亭并不知觉，仍然大谈黄冈战斗如何如何，使我实难替他遮掩。显然，刘刚夫和丘处长已经发觉眼前这位"李主任"正是高敬亭。我想，这里都是我们的部队，没有国民党的兵，何况谈判已经签了字，他们就是想马上变脸也不成。只是耽心国民党另搞阴谋。

饭后，大家到院子里乘凉。我时刻警惕着四周的情况，果然发现丘处长不见了，到外面找了一圈，确知这个特务溜掉啦！

我赶回院子里，对高敬亭说：

“李主任，你还有事情吗？签完字啦，你是不是回去？”

高敬亭听了，未置可否。

刘刚夫一旁忙劝道：“天气这样热，就在这儿凉快一会吧。为了庆祝谈判的成功，晚上还有戏。李主任不要走了。”

高敬亭仍然不表示走。我真有些急了，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处长都是特务头子，一发现高敬亭就溜走了，不知又搞什么鬼。敌人要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捉去，谈判虽然签了字，也等于个零。……最后，我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假称有人来汇报工作，把他喊到屋里，而后对他说：

“今天算签了字，对条款我还满意，不知军政委的看法怎样？”

高敬亭说：“我也很满意。”

于是，我便把丘处长溜走的情况告诉他，劝他回到鹞落坪上去。高敬亭终于回去了。

我陪着刘刚夫看完戏，第二天便返回了鹞落坪。

四一　七里坪赴宴

在鹞落坪，我和高敬亭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研究。

谈判的第一步已经结束了。国民党所以答应让出七里坪，作为我们的集合点，是因为卫立煌想要我们快一点退出安徽省。但是，七里坪是湖北省的地方，湖北省给不给还是个问题，起码他不会让我们很顺利地驻进七里坪。这样，恐怕我们还得和湖北省、武汉行营打交道，甚至再谈判。不单是驻进七里坪有困难，就是在前往七里坪的途中，还会遇到

很多问题，国民党已经指定了我军行动的路线，这中间他们还可能设有伏兵，企图包围和歼灭我们。由此看来，我们何时才能正式驻进七里坪，很难确定。我把这些情况向高敬亭作了解释，并且建议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除了传达党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再布置一下今后的各项工作。高敬亭认为这里人太少，等到了鄂东再开会，那里还有一些同志可以参加。我又提到皖鄂边的问题："皖鄂边的工作最好布置一下，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部队都带去，万一七里坪住不成，以后再想回来就很困难了。"

高敬亭只简单地说："皖鄂边的工作由你去布置。"

我仍然征求他的意见，说："我是要跟军政委到七里坪去的，我的意见可叫徐文初在皖鄂边代替我的工作。战斗营最好留下来不带走。只是把公开的便衣队收起来，不公开的便衣队不收。这块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时代创造的，还有党的地方组织，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武装力量一揽子收光，要保留革命的种子。这样才符合党中央的指示。皖鄂边军队规定集合的限期是三个月，如果党中央要我们收光，指示来了以后再收也不迟。"

高敬亭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只是我们到七里坪去没有兵怎么办？"

"鄂东和豫东南的部队总比皖鄂边要多。"

"你离开鄂东一年多，你不了解情况。"高敬亭接着告诉我：现在鄂东仅有一个一百多人的独立团，一个有着三十多条短枪的手枪队，统共不到二百人。红二十八军的手枪团在敌人的"三个月清剿"中受损失很大，一、二队共有一百二

十多人，三队收容了五十多人，如果皖鄂边的部队不去，一营又没有转来，那我们进驻七里坪就没有部队了。

听到鄂东和豫东南的情况，我的心中非常难过。但是，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提意见说：我们的部队少，更加不能集中到一起，如果集合在一起，更容易被敌人歼灭。可以派人带着我们的公函，和卫立煌的布告，先到特务营去，叫他们向七里坪出发，沿途贴起布告来。敌人不让路就打到七里坪去。

经过高敬亭同意后，立即发出了通知。桐、舒指挥部，战斗营和各工委接到通知后，连夜赶回鹞落坪。

我要石裕田同志把赤城、赤南、六安等地凡属老苏区的公开的便衣队收集起来，到湖北黄安、七里坪集合。集合的时间不限。不公开的便衣队和地下党员不收。家属工作要很好地安置。我并嘱咐他说："在收集便衣队的时候，要带上公函和国民党的布告，一定要向同志们讲清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你把手枪团二队带去作警卫。队伍集合后，处处要警惕灵活，注意情报，千万不能叫敌人把我们收拾了。"

大部分同志来到后，便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决定由徐文初暂时接替特委书记的工作，军事方面由周奇云负责，各工委不动。会后，我对徐文初说：

"我们去后，这块根据地不是不要，我们还要回来的，它不但现在是我们的根据地，将来还是抗日的根据地。姜术堂如果回来了，你和他详细谈谈，我们的谈判如果符合党中央的指示，就叫他和你们一路去七里坪；如果我们的谈判不

符合党中央的指示，由你负责派人把他送到鄂东老君山高山岗的下畈去找我。”

第二天，高敬亭和我带着部队出发了。我们是根据国民党指定的路线行进的。走到离滕家堡不远的地方，前面是一条大沟，两面是大山。我站到一个高坡上，用望远镜看去，忽然发现沟口两旁的山上有敌人。前面肯定有敌人的埋伏，怎么办呢？这是国民党指定的路线，打，就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我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

部队从罗田北部翻过东界岭，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麻城的乘马岗。敌人发现我们转移了路线，又急忙赶过来，在乘马岗库天河迎面挡住我们。

我军前往七里坪的道路被堵住了，难道返回去不成？迎上去，双方很可能打响。我派人持公函前去交涉，对方的回答是：友军集合的路线不在这里，而在滕家堡，那边国军设有招待……

看看没有办法，我决定独自到前面交涉，敌人如果把我打死，部队就可以打过去，破坏谈判条款的罪首就是国民党。我走到敌军阵前，一〇二师的一个副团长走来问：

“你们是高部哪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隐瞒了，我回答说：

“我是何耀榜。”

“刷”地一声，那副团长在我面前一个立正。

我趁机厉声质问：“你想破坏统一战线？”

“不敢，不敢……”

“让开路口。”

我一招手，手枪团立刻从敌人中间插了过去。我们拖着那位副团长，一同走出了他的防地，才放他回去了。

我们来到黄安三区郑家堂宿营。当天，黄安代理县委书记郑维忠来汇报说，七里坪原先住着一〇三师师部，已退进黄安县城。表面上敌人是走了，实际上又把老君山、天台山、高山岗一带的一个团退到七里坪，至今没有移动。王希九、周八家、潘家河一带还驻着敌人一个保安团。

我对高敬亭说，七里坪埋伏一〇三师一个团，我们现在不能进去。这里也不能久停，为了便利指挥，建议军政委去住高山岗，我去住方蔡家湾。

于是，高敬亭带手枪团一队住在高山岗，我带着手枪团三队住在方蔡家湾。这天早晨，方蔡家湾来了一个人，自称叫王子发，代表七里坪的商人来欢迎“友军”。从谈话中，我才知道他是国民党黄安三区的区长。我立即问他：

“我在谭树岗给你打电话，你知道吗？”

王子发毕恭毕敬地回答：“知道，知道。”

“叫你们来一个人，为什么不来？”

“我们不敢来。”

“你们接到卫立煌先生的通令和布告了没有？七里坪张贴了没有？”

“昨天才接到，已在街上贴出了。”

“你既是区长，有几件事情要向你交代，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你把七里坪一带的群众找回来，不能让群众跑反；再把我们的布告拿去，张贴在三区所属的地区内。从明天起，

方蔡家湾一定要有粮食和小菜卖。此外，还有两件事情请你代为转达：第一，七里坪是我们的驻地，明天我们要住进去。第二，我们的给养不准在本地现筹，由你转达专署，从明天起，每天送一千元来作为我们的给养，以后在国民政府报销，不能报销时由我负责。”

“我遵命照办，回去后一定转达。”

天黑后，王子发从七里坪又跑来说：

“关于何代表进驻七里坪的问题，省政府和武汉行营特派程专员前来欢迎，不日就到，你们进驻七里坪的问题最好和他商议。关于给养问题，暂由七里坪的商号每天供给四百六十元，由我代领，每早送到。以后部队集合多了，再做商议。现在天气很热，我们老来回跑也有困难，何代表这里是不是安上电话呢？”

我回答说：“不用，我不能常住这里，安了电话也不起作用。”

根据情报，程汝怀当夜随保八团到了七里坪附近的一个小湾子里，天明时便住进了七里坪。

上午，程汝怀派人送来请帖，请我和随同人员于下午三点赴七里坪出席宴会，届时并有七里坪几家大商号的经理相陪。

程汝怀这个家伙反动透顶，为什么不早不晚，要在下午三点钟请吃饭？……果然，这家伙没安好心，不久，地下党的同志送来情报，一〇三师留在七里坪的一个团，正用米袋子、盐袋子在仓库、小学校、商店和公共场所等附近作巷战工事，区公所的后门还作了集团工事；保八团在七里坪东面

丘陵地带也做了工事。

根据情况判断，程汝怀的阴谋，可能第一步以请客的名义，把我们诱进七里坪，在巷战中歼灭我们；然后再进行第二步，把守三门，只留下西门，乘我们退出西门时，把我们歼灭在城外一里多宽的沙滩上；最后，用一〇三师的一个团直压到高山岗，保八团攻向方蔡家湾，企图全歼我军。我们有情报，敌人也有情报，他们知道我和高敬亭带的部队不多，才出此阴谋诡计。去赴宴，很可能遭到毒手；不去，程汝怀是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来“迎接”的，敌人则可以借口我们不要七里坪，以后再想驻进去，那就难上难了。我把这些情况和自己的分析，同高敬亭谈了，请他最后作出决定。

在场的除了高敬亭，还有刘名榜、吴先元等同志。大家闷坐在那里，默默不语。看看时间不早了，我着急地说：“去!”心想，就是我死，也要布置一个战斗，打它一仗再死。

“军政委最好带交通队和手枪团一队，埋伏在仰天锅直伸到河边上。手枪团三队的一个班到张家湾，如果打响了，就向七里坪佯攻。我带三队两个班进去，一个可能是拚死，再一个可能是从西门冲出来，从一队的埋伏地过河。”

刘名榜说：“不去吧，让他再打几个月内战。”

最后，高敬亭还是决定去，他说：

“何耀榜同志，还是去，到时候机动一些，我们在外面设法接应。”

一切布置就绪，我回到方蔡家湾，已是下午两点钟。

一百多人的手枪团三队和警卫队集合后，我详细地向同志们说明了程汝怀的阴谋和埋伏，说明我们必须去七里

坪的原因，并且向同志们交代清楚：为了党，为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献出鲜血和生命。最后，我说道：

“共产党员站出来。”

共产党员们毫不犹豫地走出行列。

“同志们敢不敢去？”

“敢去。为了党，为了革命，死是光荣的！”

我挑选了三十二名战士，作为临时的警卫队，向七里坪走去。一过了大河，同志们就齐声唱起雄壮的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西门外人群蜂拥，鞭炮喧天。我们由王子发领路，走到区公所时，国民党的那位程汝怀专员已候在门前。我们共同走进区公所的办公室里。

我坐在桌子的左边，通过窗户，可以看到整个院落。我一面和程汝怀应酬着，一面警觉地观察着屋里院外的动静。这时，程汝怀拿出一包袱胶鞋、袜子、手巾，犒赏“何代表的卫士”，每人各发一份。我随后走到院子里，对警卫队的同志们大声说：

“程先生花了钱，队长、指导员去谢谢程先生。”

警卫队的同志立刻进去四个，“谢赏”之后，就在一旁站下；暗中把程汝怀看住了。

我对王子发说：“你们的厕所在哪里？”

王子发领我走了不几步，果然发现了后门，一看后门没有哨，我扭头喊道：

“警卫队，后门没有哨，你们派人马上站起来！”

警卫队立刻跑去六个人和一挺机枪。

我回到屋里时，程汝怀对王子发说：

“现在准备开饭。”他看到我把警卫队都插开了，可能有点胆怯，又对王子发说：“一〇三师那个养病的团长，请他来陪何代表，怎么还不来？你再去请一下吧。”

团长满头大汗，气喘喘地跑进来了，我们握了手，他刚落座，我就喊道：

“警卫队，来一个人。”一名战士应声走进屋来。“团长有病，你在旁边给他搧扇子。”

战士腰插盒子枪，手执扇子，站在团长身后；又看住了一个。

这时间，七里坪裕丰盐号的经理来到了，一进屋浑身直“筛糠”。我问他：

“高经理，为什么身上发抖？”

高经理结结巴巴地说：“我打了半年多脾寒还没，没好……”

“噢，你也有病呀！那为什么还来呢？”

“程先生叫我来，不敢不来。”

看看警卫队已经布置好了，我这才在酒席上坐下来，和程汝怀谈论国家大事、国共合作谈判。我说：

“程先生今天请客，是为了国共合作，不打内战。我愿意讲一件刚开始谈判时的事情。”

程汝怀忙欠了欠身说：“何先生有什么话请说。”

“当初我们主动提出谈判，三十二师和安徽省四个保安团把我们围了四层，我们在山上只有几十个人，结果还是我

们胜利了。”

程汝怀听到话里有音，看看我身上那支乌亮的驳壳枪，不由得脸色发白。我于是又问：

“有一次，我们手枪团的一个班，在鹞落坪上打垮了王学森一个团，想程先生听说过吧？”

“何代表，你们用的什么神秘呢？”

“共产党打仗从来没有神秘，”我依次看了看程汝怀和那名一〇三师的团长，“你要知道：一人拚命百人难当！”

一听此言，程汝怀不由得哆嗦起来，手中的筷子连菜都挟不住了。

“程先生为什么也发抖？”

“我的痔疮痛……”

我把碗一推：“痔疮痛，你也不能走。警卫队，拿个躺椅来，叫程先生躺在我身边，再过来一个人照顾程先生。”

扭过身来，我又问道：“团长先生，你的病好一些吗？”

“好一些了。”

“你什么时候归队呢？”

“有命令就归队。”

“你是有病休息，讲什么有命令没有命令？！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救国应当一致对外，不要再想打内战；再打内战就要当亡国奴啦！”

他忙站起身来，频频点头：“是，是。”

“好，你是病人，坐着吧，我叫他们好好地照顾你。”我又对高经理说：“你是个商人，身体不好，先回去吧。”

高经理说：“谢谢何先生。只是我一个人走不出去，你

带来的警卫队到处都站起岗哨啦，他们许进不许出……”

“呵，你不要胡说，我带来不到一百人，哪里有那么多人站哨？警卫队，派一个人把高经理送出去。”

高经理随着战士走后，我问程汝怀：

“你是奉国民政府命令来的吗？对谈判的条款还有什么补充和不满意的地方？”

程汝怀的声调马上变了腔，装着一副可怜相说：

“何代表，何必这样呢？我没有什么条件，如果何代表提出什么条件，我一定代为转达。”

“共产党是讲信用的，谈判既已签字，就该按条款执行，我们不会再向你们提条件……”

这时，送高经理出去的那个战士返回来，问我：

“何代表，你热吧？”

“不热……”

那个战士又走近来，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外面没有动静。”

我对程汝怀说：“好吧，谢谢程先生这番美意，现在我要回去啦。程先生，一路出去吧。”又对警卫队说：“你们要好好照顾团长，他是个病人，路上不要叫他跌跟头。”

来到西门外，我告别说：

“程先生的情意，我领受啦。你们回去吧！”

我走了好远，回头看时，程汝怀和那位团长还呆呆地站立在那儿，原来是警卫队在西门附近架着一挺机枪，把他们卡在中间啦。直到我走近河边，才扭身高喊：

“警卫队的同志们不要掉队，快跟上来呀！”

战士们收起机枪，跑步赶上来。

程汝怀和那位团长，这才沮丧地往回走去。

四二　走向武汉

程汝怀的阴谋失败后，不久，国民党武汉行营写来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友军进驻我区防地，我军绝不与友军发生任何冲突，但希望友军能够停战，收回军队，早日集合。另外，南京代表刘刚夫先生不日将经武汉至友军驻地……

我们当时就派人送出通知，收回鄂东独立团，驻扎黄陂站；手枪队驻张家湾；一营回来后驻方蔡家湾；便衣队都集合至两道桥。只是特务营在河南，一时返不回来。

武汉行营派人把我们驻地的电话安装起来。刘刚夫到了七里坪，就打来电话通知我。我随即赶到仰天锅来找高敬亭。

刘刚夫来后，国民党的军队可能很快退出七里坪。根据谈判的条款，原定我军集合的期限是三个月，而从签字到现在，已近两个月了，党中央还没有派人来，也没有指示，我军进驻七里坪以后，必然有更多、更复杂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加以充分的考虑和研究。我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和国民党由军事斗争转到政治斗争，我已经感到很吃力，加上还要照管部队，七里坪又是老苏区，我们驻进了七里坪，必然会有许多红军家属和地下党员来找我们，我如何应付得过来呢？我向高敬亭提议，最好开会研究一下，把工作分担开来。然而他既不提开会的事，也不布置具体工作，仍叫我一个人去应付这许多事情。最后他说：

“你带部队驻七里坪，我还驻方蔡家湾；国民党的代表来了，请他明天来吃饭。”

宴席设在方蔡家湾的一座很大的家祠里。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刘刚夫带领着随行人员来到。饭后休息时，刘刚夫说道：

“我这次来，第一是请友军驻进七里坪；第二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向高军长贺喜。”

我回答说：“刘先生，我军驻进七里坪，这是谈判条款上规定的，在我军集结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友军三番五次的埋伏和阴谋，早就应当驻进去了。刘先生说贺喜，我们不敢当，现在还不是贺喜的时候。”

刘刚夫却面对着高敬亭说：“今天，我是来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宣读委任令的，如果合乎友军的番号时，就请李主任收下；如果不行，我们再作商议。”说着，他站立起来，象宣读圣旨似的读道：“南京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鄂豫皖工农红军、红二十八军整编为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部，特委任高敬亭为司令长官……”读毕，将委任状放在桌子上。

屋子里一片沉默。党中央和王稼祥主任再三叫我们不要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国民党这样做，目的是使我们和党中央分裂，也就是使我们向国民党投降。

我对刘刚夫说：“你带来的委任状，我们不能收，高军长不在这里，你就是留下也没用。我们在谈判条款上是有明文规定的：我军的番号是由两党中央决定，这就不单是南京一方的问题。”

当天下午，刘刚夫亲自扛着国民党的旗子，带着老老少少的百姓们，前来欢迎我们去住七里坪。

高敬亭叫我去住七里坪。我对他说：

“我不能去住七里坪，要是新闻记者一访问，我们就永远没有活动的余地啦。军政委不是派郑智惠去党中央了吗？他已走了很久，估计很快就会回来。我看拖两天再住七里坪不迟。加以我这几天感冒啦，每天发烧，去了也不能应付工作。”

就这样推过去了，我没有和刘刚夫见面。

第二天一早，刘刚夫带着更多的“百姓”又来了。这时，高敬亭要我带领一营去住七里坪。

我只得来到了七里坪，对欢迎的群众讲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一些道理，随后，便在一个连部住下来，使刘刚夫他们找不到我。但是，他们并没有放松我，径直找到了杨克志。杨克志对他们说：

“我们的何代表病得很厉害，根本不能会客。”

这一天，岳西县三区的李区长来到七里坪，他暗中告诉我：“刘刚夫接到南京的电报，说是共产党中央已派郑位三先生来鄂豫皖为代表，不日就到七里坪。刘刚夫先生不相信你有病，他说，你有些疲劳是事实，主要是你故意拖延时间，等共产党中央来人。他今天叫我写信，请附近的县长都来慰问你，看你应付不应付。”

果然，武汉行营派来代表和黄安、礼山两县的县长一起前来“参观”。我们事先已有准备，张贴了许多标语，组织部队和群众欢迎他们。估计这些家伙见了我，必然要提出各

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我首先说道：

“今天，刘先生和武汉行营的代表、两位县长都在这里，我有一件事情和诸位商议。根据签字的条款，各级政府应立即释放政治犯，根据我们了解，国民政府的某些地方政权不讲信用，在签字两个月后的今天，不但没有释放政治犯，反而在暗杀政治犯，如经扶县在三天前的夜晚，将鄂豫皖地区有名的王福明先生在三冲门暗杀了；安徽省的岳西县和湖北省的黄安县、礼山县等，最近也暗杀了不少政治犯。我军殷绍礼负伤后被友军抬去，押在岳西县大牢里，我们收到了他的请愿书，要求国民党政权停止杀害我军伤病号，并按期释放政治犯。礼山县监狱里亦有请愿书送来，刘先生如不相信，请看请愿书。”

我把请愿书一一放在桌子上。

刘刚夫无法抵赖，只得说：

“我已写信给南京国民政府设法处理……。”

吃完饭，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知道他们在天黑后不敢离开七里坪，便说道：

“诸位不是要参观部队吗？我陪大家去看一下吧？”

刘刚夫忙说：“今天谈了很多事情，大家都疲劳，何代表又有病，还是休息吧。”

当夜八点钟，刘刚夫通知我：贵党中央已派全权代表郑位三先生率代表团经过南京，昨天到达六安，今天可能到达潢川。国民政府要我转告何先生，这一带由何代表负责迎接。

我随即报告了高敬亭，派易元鳌带手枪团一个班连夜

赶到宣化店，从大路去接党中央代表团。

郑位三同志来后，我们向他汇报了鄂豫皖三年来的斗争经历。他说：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我来时，党中央再三交代，不叫接受敌人的任何名义。我这几天先了解一下干部和部队的情况。另外，你把皖鄂边的部队调来七里坪；河南的部队不动。”

以后，郑位三同志又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布置了今后的工作。

这时，我们集合在七里坪的部队共有三千多人。

不久，我离开七里坪，到了武汉。在汉口安仁里二号中国共产党武汉办事处，我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详细地向他汇报了鄂豫皖的游击战争和谈判进行的情况。项英同志也向我询问了一些情况。第二天早晨，项英同志对我说：

“何耀榜同志，你就暂时住在这里，我今天坐飞机到西安去，明天可能到延安向党中央请示，三几天就回来，那时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来确定工作。”

项英同志回到武汉后，找我谈话说：

“你仍然是鄂豫皖谈判的正式代表，在武汉公开。现在国民党的代表也在武汉，以后谈判的中心就在武汉。你今后不但要谈判鄂豫皖的问题，还要谈判长江南北有关游击队的问题，直到游击队的番号确定，部队出动抗日为止。”

两个月后，南京失守，周恩来副主席和博古、李克农等同志来到了武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南京办事处和武汉办事处合并，在

武汉日本租界内的大世洋行组成了中共中央长江局。谈判工作就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进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正式宣布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长江两岸的红军游击队，共组成新四军四个支队；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校对
2010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三
05:35:55

观者二校
2010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
18:14:01

观者邮箱：ljctt@263.net
观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eeseasee
观者 QQ：1139496397